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The Incipency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f Taiwan
and it's Discussion around Capitalism (1920~1924)



邱士杰
Qiu, Shijie

指導教授：王遠義、黃俊傑 博士

Advisor: Wang, Yuan-tee, Huang, Chun-chieh Ph.D.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July, 2008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The Incipency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f Taiwan and
it's Discussion around Capitalism (1920~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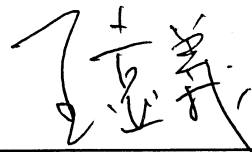
本論文係邱士杰君（學號 R94123002）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7 年 7 月 22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黃煥文



（指導教授）

陳義傑

摘要

這是一篇關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殖民地出現的案例研究。殖民地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在島內外所發起或參與的持續性組織化活動、最終所形成的組織，以及在組織過程中圍繞著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而形成的論述或討論，則是本研究的對象。本文認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初期的發展以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關係為主軸。隨著共產主義勢力的日漸上升，陸續出現以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為主題的台灣資本主義論述、以及具有共產國際色彩的路線討論。本文並認為，存在於中國國民革命內部的緊張關係——政治革命對社會革命、民眾運動對武裝鬥爭、民主主義革命對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隊對統一戰線——是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時不可或缺的參照系。

關鍵詞：社會主義革命、民主主義革命、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無政府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國民革命



This is a case study exploring how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emerged in a colonized society. The constantly organized activities which socialists in the colonized Taiwan called into actio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organizations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as the results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the discourses and discussions developed from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apitalism through this period will be examined in the study. This thesis considers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Anarchism and Communism (Bolshevism)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iwanese socialist movement. As the Communist force got stronger, there came along the discourses on Taiwanese capitalism on the basis of class differentiation along with the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intern.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assumes that tensions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 political revolution vs. social revolution, people's movement vs. arms struggle, democratic revolution vs. socialist revolution, Communist avant-garde vs. united fronts -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study of Taiwanese socialist movement history.

Keywords: Socialist Revolution, Democratic Revolution, Capitalist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archism, Bolshevism, National Revolution(Guomin Geming)

凡 例

1. 在本文中，凡是加粗的**黑體字**，俱為本文筆者所加。
2. 在徵引文獻出現文字上的錯誤時，本文將適當地在錯漏字後方以方括號 [] 注上正確的文字、補上標點符號，或者做些補充說明。
3. 凡是文字加上底線者，即表示此文字原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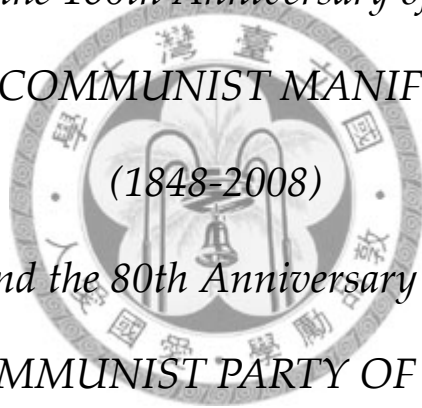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ii
凡 例.....	v
目 錄.....	vii
導 論：把握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方法.....	1
引 言、從一個關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討論談起.....	1
第一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	3
第二節、「1920~1924」.....	7
第三節、當憤怒不只出詩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及其「資本主義論」的關係.....	9
第四節、章節安排與研究的展開.....	12
第一章、山口小靜的生與死.....	15
第一節、山口小靜：自東京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15
第二節、融入島內社會運動的山口小靜.....	20
第三節、花蕾落地.....	25
第二章：島內社會運動中的社會主義萌芽.....	29
引 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29
第一節、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	31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35
第三節、時代問題：資本主義化.....	40
第四節、結論.....	47
第三章、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	53
引 言、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	53
第一節、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	55
第二節、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	62
第三節、時代問題：「政權」.....	67
第四節、結論.....	71
第四章、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首次組織化.....	75
引 言：上海的兩個祕密集會：1921年7月.....	75
第一節：上海的複雜背景.....	77
第二節、平社與《平平旬刊》：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兼容與分裂.....	85
第三節、時代問題：如何面對請願運動的變局.....	92
第四節、結論.....	96
第五章、資本主義論與革命性質的抉擇——兩岸社會主義者的首次對話.....	99
引 言：從彰化通向莫斯科的道路.....	99
第一節、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	101
第二節、許、瞿對話所可能具有的多重面向.....	111
第三節、結論.....	120
第六章、資本主義論的限制——從歷史建構能力出發的考察.....	125
引 言、舊雨來，今雨不來.....	125
第一節、「革命史」歷史建構：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的「國民革命」.....	127
第二節、中國「革命史」歷史建構的開端：重評義和團運動.....	132
第三節、結論.....	140

結語、其實地上本沒有路.....	147
第一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起源問題的總結.....	149
第二節、台灣社會主義者對於台灣資本主義的看法以及革命性質的判斷.....	151
第三節、通向 1927 年的道路.....	154
餘波：「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 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161
引言、連溫卿史料的保存與翻譯的狀況.....	161
第一節、〈蠹魚的旅行日記〉文獻解題.....	162
第二節、向著五一節的東京而去的蠹魚.....	164
第三節、爲了與山川夫婦的見面.....	169
附錄.....	177
附錄 3-1：〈謹迎新春〉明信片全文考證版.....	179
附錄 3-2：〈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爲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	180
附錄 4-1：許乃昌，〈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	182
附錄 5-1：許乃昌，〈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	184
附錄 6-1：謝廉清的「反帝大聯盟」文獻.....	187
表.....	191
表 2-1：治警事件前夕，文協與島內相關團體、核心幹部.....	193
表 2-2：〈蠹魚的旅行日記〉結構簡表.....	194
表 2-3：〈蠹魚的旅行日記〉與連溫卿後續文章之關係略表.....	195
表 3-1：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網.....	196
表 3-2：新台灣（創刊號—第三號）目錄.....	198
表 3-2：《台灣新青年》創刊號目錄.....	200
表 4-1：關於《平平旬刊》聯絡人及聯絡處的記載.....	201
表 4-2：《平平旬刊》目錄.....	201
表 4-3：「平平同人」資料考證略表.....	204
表 4-4：1924 年前後上海台灣人諸組織的活動簡表.....	208
表 4-5：「表 4-4」簡示.....	211
表 4-6：各種組織及刊物的中文、英文、俄文名稱對照表.....	212
表 4-7：許乃昌所謂的十三名台灣左翼積極份子（對照表 4-6）.....	213
表 4-8：上海各事件、組織的關係人列表（以 1924 年上海爲中心）.....	215
表 5-1：社會主義路線內的的兩條路線.....	218
表 6-1：謝廉清在《台灣民報》所發表的文章列表.....	219
表 6-2：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目錄.....	219
主要參考文獻.....	221
跋.....	231

In Memorial of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2008)
and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1928-2008)



本論文的印製承蒙以下師友提供經費贊助

唐 曙：一千元

王武郎：一千元

宋文揚：五百元

緊緊握著你們的手！



導 論：把握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方法

引 言、從一個關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討論談起

我們很長久沒有聽說台灣人對日本有什麼動作的表示。據我所看見的台灣留學生和僑居日本的商人等，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不過我沒有親自到過台灣內地，不能說出他們內地人的真情實況。……

我知道台灣人——有覺悟的——心中是非常痛苦的，有意思不能發表。若是一句話不對，立時就要吃瀾天的大禍！他們也想回到中國，但又因為有財產的束縛——財產不得移出境外——況且中國又是終年戰亂的黑暗地方，回來也是不能自由的！

零零丁丁的台灣人，在偌大一個世界裡，竟沒有一塊能容他的地方，更沒有一點容他說話的空氣，真是苦的很呀！

——謝晉青，〈台灣與朝鮮〉，1920年9月2日。¹

留下上面這段文字的作者，叫做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他是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中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已為當代所遺忘的人物。在漫天無盡的歷史沙塵中，他是不斷被淹沒與再淹沒的那一名。如果不去發掘他，大概不會有人知道，1920年前後的謝晉青，是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及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的重要推手。如果選擇遺忘他，大概也將不會有人知道，這個默默無名的大陸青年，竟是台灣近代社會運動興起時的重要見證人。

當時的謝晉青，與羅任一（羅豁、羅志道，1897~1965）、高一涵（1884~1968）等旅日學生組織了名曰「東京通信社」（1920.7）的小媒體。²假使翻開同時期的上海《民國日

¹ 晉青，〈台灣與朝鮮〉，《覺悟》，1920年9月2日，第1~2版。

² 謝晉青是1920年前後旅日的大陸學生。據其友人高一涵回憶，謝晉青曾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中組織一個「東方書報販賣社」，販售國內進步書刊。東京中國YMCA的馬伯援（1884~1939）憶云，1920年初春，在高一涵的建議下，遂於YMCA內代售北京各種雜誌。謝晉青為籌學費，馬伯援便另闢空間於青年會，成立新書店，讓他代售《民國日報》。「迨後加入朱鳴田、羅豁，由小而大，截然是東京中國留日學生的文化中心。惹得日人注意，並常與日人大杉榮、高津正道等開座談會於該書店。」此外，該書店甚至協助藏匿「上海朝鮮獨立政府派」的抗日份子。後來謝晉青另組「東方通信社」，高一涵謂其「專向國內報界供給日本方面的有統系的新聞」。據日本情報資料，這一「東京通信社」乃是謝晉青（負責人）與羅任一（時為「東亞預備校生」）、高一

報》及其副刊《覺悟》，就能看到許多由謝晉青及羅任一所譯撰的許多日本社會運動消息與理論。而且，通信社成立後不久，謝晉青便迅速地將報道的視線從日本「內地」延伸到至日本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

謝晉青所撰寫的〈台灣與朝鮮〉以朝鮮與台灣人民的共同苦痛為主題。但他更以已經展開各種激烈反抗運動的朝鮮為參照，而對尚未產生解放運動的台灣表示惋惜。雖然他的惋惜乃以「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及僑商為對象，然此並不意味謝晉青的關懷及視角狹窄。實際上，僅僅一個月之後，謝晉青便把視角轉向了台灣原住民，發表了題為〈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1920.10.18)的文章。他譴責日本人對於原住民的鎮壓，更歌頌原住民的反抗。³

也許謝晉青並未將自己當成局外人吧，他對台灣的關心持續著。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1921年1月30日在東京遞交請願書)，謝晉青的視角便又轉回僑商士紳。然而，此時的他已不是惋惜這些人沒能形成反抗運動，而是直言譴責其運動所體現的性質。他譴責領導議會請願運動的「紳士們」，只敢向日本要求「自治」，而不敢要求「獨立」。他在〈台灣人底政治運動〉(1921.2.16)中寫道：⁴

現在的世界大局變了，台灣底紳士們，聽見愛爾蘭；菲律賓、印度等，都有自治底聲浪，所以他們——台灣紳士——也就來向日本人要求自治。要求獨立底話，它們是不敢說的，並且也是不敢想的；所以只有要求極小範圍的自治。他們底目的，是想要日本政府撤廢或改訂這六三法令，給予日本國民所守的同樣的法

涵等人於1920年7月組建，社址設於YMCA會館內。當時謝晉青曾是《覺悟》副刊之特闢專欄「旅東隨感錄」的主要撰稿者，透過大量的報導性文章，將日本社會運動的最新消息傳回國內。1921年12月，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的口供曾云：「謝晉青（警視廳指定乙類需要監視之人物，現居上海）確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羅豁、陳春培皆為無政府主義者，惟其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據高一涵云，謝晉青由日返國之後，經營木工廠、教學兼課、並從事譯著，旋病故。當時高一涵曾去信胡適，希望他能將謝晉青所譯《西洋倫理學史》的稿費交給正在南京的謝晉青治肺病。是否胡適給錢，尚不可知，但謝晉青迅即不治而逝。馬伯援曾稱讚謝晉青「苦工求學，取與不苟，記者[馬伯援自稱]之畏友也」。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則評價云：「同志晉青，從事主義運動，已垂十年，學問淵博，誠勇動人，猶熱心教育事業，不幸短命死矣。」就學術貢獻來說，謝晉青是第一個研究《詩經》中的女性、第一個將西洋倫理學介紹入中國的學者。以上分見：高一涵，〈弁言〉，收錄於三浦藤著作，謝晉青譯，《西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1~2；晉青述，〈[特載]東京通信社的成立、經過、和現在停辦的理由〉，《覺悟》，1920年9月17日，第1~3版；〈本邦通信機關及通信員關係雜纂·通信機關ノ部·13·東京通信社〉，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記録》，編號B03040803800。〈同志消息〉，《春雷》，第2期(廣州，1923)，8；〈附錄三 施存統口供〉，收錄於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370；馬伯援，《三十年的賸話》(台北：非賣品，1984)，97；〈高一涵致胡適(1923.7.15)〉、〈高一涵致胡適(1923.8.6)〉，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0)，209、215。最後，在《白堅武日記》中亦可發現有名曰「謝晉卿」者，是否即「謝晉青」？尚待考察。見：白堅武，《白堅武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³ 晉青，〈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覺悟》，1920年10月18日，第1版。意在言內地說，謝晉青是在歌頌台灣原住民的反日鬥爭；意在言外地看，原住民乃是謝晉青歌頌無政府主義的自然生活的媒介，因為他眼中的原住民的原始生活不需外來文明便能幸福。

⁴ 晉青，〈台灣人底政治運動〉，《覺悟》，1921年2月16日，第4版。

律與他們。唉！要和日本人守同樣的法律！其實，日本底國民現在是否能得自治？台灣底紳士們呀！你們在奴隸地位上，不必向主子計較待遇底優劣。你們果然想自由，還須轉回頭來，向著三百萬同胞們要求。不然，我就要說：你們運動底目的，是為著當日本底議員，做日本底官吏。

謝晉青的嚴厲批判引來了著名文學家劉大白的反詰。他以「漢胄」為名，發表〈台灣底富翁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1921.2.23）一文云：⁵

晉青君對於台灣底富翁巨紳底向日本政府要求及小範圍的自治，頗不滿意；但是我覺得他們到底嚐過了亡國奴底滋味，不能不說他們多少有一點覺悟！你看像橫濱底僑商領袖，還在那兒借著日本政府底勢力，拼命地興文字獄，構煽黨禍，鍛鍊株連，陷害同胞，恨不得早點作亡國奴才好哩！

就現有史料來看，謝晉青與劉大白的討論並無下文。然而謝晉青對於請願運動的揭發，卻是現知最早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謝晉青心中大概有個「解放運動」的藍圖吧！與請願運動相比，朝鮮或台灣原住民的反抗形式也許更符合他的期待。然而謝晉青本人早逝（1923年逝世），從而也無從猜想其最終想法。不過，他在「東京通信社」的同志——羅任一——卻於1924年實現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成功組織化的團體，也就是「平社」（詳見本文第四章）。從1920到1924年，從謝晉青發表〈台灣與朝鮮〉、〈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到一個組織的誕生。其間過了五年的時間，也經歷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謝世。如果這個過程並不僅僅是生與死的交替，又將是怎樣的一個歷程呢？

第一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

本研究的主題，定名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這是一篇關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殖民地出現的案例研究。殖民地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在島內外所發起或參與的、具有持續性的組織化活動（乃至最終所形成的組織），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圍繞著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而形成的論述或討論，則是本研究的對象。同時，本研究還是一篇關於台灣一九二零年代社會運動史的研究，不過研究的焦點擺在長期受人忽略的「左」邊，特別是迄今鮮有人研究的一九二零年代前半期。

之所以採用「社會主義」而非「左翼」，在於「左翼」一語必須相對於「右翼」才能存在。以林書揚（1927~）所定義的「左翼」為例，台灣「經濟上的有產階級所推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就是「左翼」之所以為「左翼」的前提。⁶但由於左右光譜歷來形成於分化

⁵ 漢胄，〈台灣底富翁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覺悟》，1921年2月23日，第4版。

⁶ 林書揚對於「左翼運動」的定義如下，「在一個階級支配的社會裡，對於社會上不平、不公、不正的現象及關係，自然會有被支配、被壓迫的人們，起而對進行支配及壓迫者加以反抗。如果這種反抗只是針對政治領域的抗爭，那麼這種運動的目標也只是針對政治情況做部分改善的一種改良運動。往往，在殖民地社會，會有如地主及殖民地新起的本土工商資本家這些經濟上的有產階級所推動的政治改良運動，這就變成了殖民地運動中的右翼。他們在運動上的要求往往僅限於政治關係的

之中，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右翼」可為永恆的標準。所以本文更傾向從社會主義運動向世界各地的擴張，考察前者（社會主義運動）的普世性與後者（世界各地）的在地性之間的相互滲透關係。⁷而在社會主義的普世性格普遍為台灣既有研究所忽略的狀況下，強調「社會主義」的主體性有矯枉的功能。

「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容易定義的概念。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將社會主義區分為「空想」（utopian）與「科學」（scientific）兩種；當然，恩格斯之區分多少有褒（科學）貶（空想）之意。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著眼於未來社會的「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並且「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然而科學社會主義卻不同，它著眼於當下的社會矛盾，它的基本「內容」是針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科學社會主義更「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構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體系，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⁸

上述區分對於本研究具有啟發性的意義，但恰恰是反面的。因為在本文研究的對象及時段裡，空想與科學的成分交雜（如果可以用這兩個概念概括的話）。因此恩格斯所提到的「空想」或「科學」的特徵（比方設想一個理想社會及其制度、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過程及其階級矛盾、肯定無產階級的歷史性作用），都只能作為定義「社會主義」的輔助性方法。本文則傾向遵從「習慣」，以通常被賦予「社會主義」屬性的對象為研究對象。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社會主義」必須連繫於具體的對象才具有意義；比方「社會主義者」。至於本文所研究的對象，則是由社會主義者及其組織——以《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以下簡稱《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者為主——所形成的「社會主義運動」。⁹

「社會主義運動」是推翻資產階級「現政權」與資本主義社會「舊關係」的「政治行為」。馬克思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係——是政治行為。而社會主

改良。而所謂的左翼運動，就是把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被支配的關係的根上溯至社會結構中最基礎的部份，也就是階級結構中最基礎的部份，有意從此部分來加以改造。這種運動的目標及理念便是左翼的、激進的、革命性的反抗運動。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把殖民地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列為首要的攻擊目標，這就是所謂的左翼運動」見：林書揚，〈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收錄於氏著，《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79。

⁷ 比方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出現，從而使既有的社會運動相對成為右翼。或者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受到既有社會運動的牽制，而具有既有社會運動的色彩。或者既有社會運動如何受到社會主義運動影響而發生變化。

⁸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721、739。

⁹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定義「社會主義（socialism）」時，直接從「社會主義運動（socialist movement）」談起，顯然是把社會主義直接視為運動。見：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Ralph Miliband, eds.,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44-446.

義不通過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爲，因爲它需要消滅和破壞舊的東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動（organisierende Tätigkeit）在哪裡開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裡顯露出來，社會主義也就在哪裡拋棄了政治的外殼。」¹⁰

本文認爲，作爲「政治行爲」的「運動」（movement），以常設性組織（即沃勒斯坦的用語：permanent organization¹¹）的形成爲體現。常設性組織（如工會）可以確保活動（activity）的持續性；活動的持續性則使運動（如工人運動）成爲可能。在俄國革命中，常設性組織出現飛躍性發展。由於長期的白色恐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使常設性組織發生轉變，形成一種不同於工會組織的職業革命家政黨。這種政黨通常被稱爲工人階級之「先鋒隊」（vanguard）。

先鋒隊政黨並非密謀式組織，因爲密謀式組織基本上並不積極尋求群眾基礎，而訴諸於自認爲少數先覺者的個人手段，如暗殺、少數革命家的暴動。先鋒隊政黨也不是形成於工人運動之中的組織，如工會。列寧認爲，先鋒隊政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它的任務不是消極地爲每一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維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¹²列寧的見解，姑且簡稱「先鋒隊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三要素論。

也許是循著列寧的見解，因此中共歷來都自稱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則認爲，如果此說爲確，「共產黨在東亞成立的順序應該是日本、中國、朝鮮，但是，爲什麼事實卻恰相反呢？」「如果說，這種『時差』，僅僅是可以忽略的『極微誤差』，共產黨在這三個國家幾乎是同時成立的，那麼，就必須解釋之所以同時成立的原因。」¹³對於上述問題，石川以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及共產國際的推動，作爲回答。特別是最後一點，形成了東方¹⁴各共產黨陸續成立的直接動力。

石川的問題意識可以總結爲「先鋒隊政黨」如何先於「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而

¹⁰ 馬克思，〈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87~489。

¹¹ 沃勒斯坦對於「運動」的簡單定義是很有效的說明，「運動一詞指的是長於瞬間的某種集體推力。」在沃勒斯坦的定義裡，「某種集體推力」無論「長於瞬間」多少，都被視爲「運動」。然而沃勒斯坦特別指出，在「歷史資本主義」時期，「運動」的極致表現在於形成「常設組織」。見：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1993), 66-67. 中譯見路愛國、丁浩金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38~39。本文可以在絕對的意義上接受沃勒斯坦的「運動」定義，比方所謂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就屬這個層次。但從相對的層次上來說，本文希望某些場合裡將「運動」更細分爲「活動」與「運動」，有無「（常設）組織」（或組織是否得以常設）則是兩者之差別。

¹² 列寧，〈我們運動中的迫切任務〉，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¹³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5。

¹⁴ 本文所謂的「東方」，來自於1920年在巴庫召開的「東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到1941年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之間所界定的「東方」。這些「東方」通常泛指整個亞洲，而不僅僅只有東亞。

出現，或者「先鋒隊政黨」如何先與「社會主義」——而非「工人運動」——相結合。其實列寧也有類似於石川的看法。¹⁵不過，先鋒隊政黨是俄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雖然日後其模式得到推廣，卻並非所有社會主義流派所能接受。因此，若將「先鋒隊政黨」更寬泛地改為「常設性組織」，也許更能描述各種流派的歷史實況。¹⁶也許有人會問，「組織」究竟要存續多長時間才能稱為「常設」？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兼具質、量標準的問題。關鍵在於：就算「組織」無法「常設」，但「常設」如何作為一種動力卻將不斷地驅使「組織」維持自身或如野草般的萌生。因此，以「常設性組織」為研究對象的最關鍵意義在於，如何把握「常設」的趨勢以及「組織」的再生產之間的關係。

就「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來說，從後見之明的角度出發、從「社會主義」的「常設性組織」的成立作為研究入手的途徑，是最普遍與方便的方式。或許正是這個原因，石川才把中共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上海）作為研究重心。不過石川的研究也顯示出：「常設性組織」的成立不但可視為「社會主義運動」形成之標誌，通向「常設性組織」成立的前置過程也應納入研究。因為歷史是連續的。「常設性組織」成立前的社會主義或工人運動乃至其間形成的各種組織，都應納入書寫。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研究時段內的研究對象若不足以令人信服為「運動」本身，至少也應視為「運動」的「起源」（incipiency）；而這一「起源」最起码的意義就是，「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真正的……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¹⁷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內，1923年至1924年是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化的第一次高潮，在日本、大陸，以及島內，分別出現了大小不一的團體，確實「具有多發性」。但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組織無一活過1924年之後，無疑是「中途夭折」，那麼這些組織是否並不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

上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無論「常設性組織」能否成為「常設性組織」、無論能否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無論能否對社會主義認識清楚，十月革命（1917）以及共產國際（1919成立）在全球積極推動運動並扶植共產黨而形成的背景，都為本研究時段內的「運動史」之「可能」創造了條件。僅僅以今日為人所熟知的台灣共產黨（1928成立）來說，最初的創黨成員，幾乎都有中共及日共的黨員背景。而當黨遭鎮壓而潰散時，這些成員又分別能在各地共產黨（如中共、日共）的保護之下進行轉移。此外，共產國際（最為最強大的

¹⁵ 列寧總結俄國社會民主黨（即日後的共產黨）的運動史時，劃分為三個時期。在列寧的區分中，第一時期的「社會民主派是在沒有工人運動的條件下存在的，它作為一個政黨當時還處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即便如此，列寧仍視之為「運動」發展的一個時期。見：列寧，〈怎麼辦〉，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1卷，455。列寧還認為，「各國都經歷過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互不聯繫，各行其是的時期。」而兩者實現相結合並出現黨，則「都是歷史地形成的，都經過了獨特的道路，都是以地點和時間為轉移的。」見：列寧，〈我們運動中的迫切任務〉，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1卷，284-285。

¹⁶ 比方，雖然列寧認為「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並不必然導致列寧所期待的黨。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第二國際時期所形成的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

¹⁷ 引文為吳承明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定義。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

常設性組織，1919~1943）也始終強力貫徹自己的理論觀點於各地共產黨。如果從總的「東方」的共產主義運動來看，個別地方運動及組織的潰滅，並不影響「東方」整體的運動存在。雖然無政府主義具有內在的反組織傾向，卻也相應形成了類似的跨地域連帶（「連帶」泛指運動中產生的聯合，即 solidarity）。¹⁸作為本研究之主題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就是上述背景下的產物。因此本章開頭才強調，本文是一篇關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殖民地出現的案例研究。為了更好地理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不能離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構成的背景。

在中文的研究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是最早形成的學科。但改革開放之後開始針對這門學科的研究範圍、學科性質，及其現實意義進行反思；研究範圍的擴大則首先成為新的要求。有學者即提出以「工人運動」或「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為範圍的研究方式，藉此涵攝「共產主義運動」以外的運動。¹⁹上述見解的基本堅持是以「工人運動」為主體，本文也肯定這一堅持。但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工人運動」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只能先從「社會主義運動」入手。

循著以上關於「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討論，本文所要研究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與石川禎浩的研究類似，是強烈國際影響之下所產生的運動，未必一開始就與本地的工人運動相結合，也未必有良好的社會主義理論基礎。而組織的形成，則是本文考察運動形成的重要切入點。如果本文在「常設」之趨勢以及「組織」之再生產兩者關係的說明上不足以使人信服為運動本身，至少也應視之為運動的起源或萌芽。又由於組織總是由「運動幹部」——而非群眾——所組成，因此從「當時的運動幹部如何形成」²⁰的角度來考察組織的形成與維持，也是很好的切入點或理解方式。

第二節 「1920~1924」

也許有人會問，明確以先鋒隊政黨的型態而建立的「台灣共產黨」（1928~1931）應該是研究的最好對象。為何研究時段還要提前至 1920~1924 年之間呢？回答這一問題之前，不妨先看看現有研究由於研究時段而共同產生的問題。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已在史料及研究俱有積累的條件下成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特別是以下幾本專書及論文：①Hsiao, Frank S.T.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February

¹⁸ 關於東亞無政府主義的跨地域連帶，最扼要的介紹可見：曹世鉉，〈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2 月號（2005，湖南），53~58；阿里夫·德里克著，譚翠鶯、曹義恆譯，〈東亞的現代性與革命：區域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 年第 3 期（2005，北京），8~16。

¹⁹ 殷敘彝，〈略談國際共運史的研究範圍、學科性質和現實意義〉，《國際共運史研究》，第 1 輯（1987，北京），18~20。

²⁰ 林書揚，〈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收錄於氏著，《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81。

1983): 269-288；②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③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④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⑤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⑥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⑦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然而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在社會主義者公開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1927年之後，並視這一分裂為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開端。²¹因為此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公開了自己反資本主義的目的，甚至自我宣稱為社會主義，從而非常容易辨認。

這種便宜的作法留下不少弊病。第一，由於1927年的左右分裂變成社會主義運動的開端，從而無法考慮社會主義運動是否能在1927年之前產生的可能性，甚至倒過來使1927年之前的史料，成為鋪陳這一分裂而聊備一格的補白。²²第二，雖然研究集中於文協分裂之後，但更多是集中在台灣共產黨的興亡之上，實際上是以台共史作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替代品。以「台灣共產黨史」為限定的研究，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以參與台共建黨的成員為主要對象，並向前、向後追溯這些對象的個人活動史。²³這種追溯式的方法，產生一種「必然通向台共組黨」的歷史書寫，也使早期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範圍窄化。²⁴台共史無疑只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部份，但台共史的上下限並不等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上下限。

無論是文協（1927年後）或台共，無疑都是非常需要再研究的對象。然而重新研究這些對象、並克服既有研究缺陷的方法，卻再不能先從這些對象入手。關鍵在於提前研究

²¹ 正文所列舉之既有研究成果幾乎都是此種方法的典型研究。其中，若林正丈將文協脈絡下的社會主義運動及文協分裂置於民族主義運動的脈絡下分析。台灣共產黨則專闢一章。

²² 與這種看法相反，若林正丈對於文協分裂有獨到的看法。他認為，連溫卿率領無產青年奪取文協領導權，是要在文協內部形成如國共合作那般的左右統一戰線，只是這一舉動失敗了。因此，與其認為是連溫卿刻意要讓文協分裂，不如視之為統一戰線失敗的結果。見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287。

²³ 最典型的，就是陳芳明的研究。其《殖民地台灣》一書，凡以個人作為研究對象者，俱為台共黨員。他甚至還為謝雪紅個人以專書形式立傳。簡炯仁一書也有這種傾向，以致他竟然以1930年代被檢舉的台共黨員為對象，從中「抽樣」分析其家庭背景及教育背景。

²⁴ 此外，又因為早期台灣社會主義者與中期台灣社會主義者之間存在人脈與組織上的斷裂，因此，中期台灣社會主義者所撰寫的運動史回顧多半無法追及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運動者無論願不願意，都只能以《台灣社會運動史》作為書寫這段歷史的第一參考（比方張深切、郭德金（欽）、蕭友山、楊克煌、連溫卿）。那末一來，對於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認識，迄今已然墮入從《台灣社會運動史》出、並從《台灣社會運動史》入的迴圈之中。可參見：張深切，《里程碑》（台中：聖工出版社，1961）；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台中：中央書局，1947）；李振芳、郭德欽，《日據時期南京、廣東臺灣學生的政治活動史：南京中臺同志會、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抗日史實》（手抄本）；蕭友山，《臺灣解放運動の回顧》（臺北：三民書局，1946）；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從上述回憶錄的出版日期可以發現，這些運動者在光復之後不久便陸續取得這部列管密藏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雖然取得原因尚不清楚，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見：戴國輝，〈探索《台灣警察沿革誌》有感——《台灣抗日運動史》中譯本出版代序〉，《海峽評論》，第117期（2000，台北）。

時段、擴大史料、並將研究對象擴及台共以外的社會主義流派。只有超出《台灣社會運動史》才能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以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這一研究方法並不只是主觀願望而已，實際上，在 1927 年之前，島內外確曾出現過各種試圖建立起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主義的常設性組織的活動，甚至最終通向組黨（這是本研究的重點）。雖然組織未能得到維持，但成員多能在其他的運動之中獲得保存。而 1927 年的文協左右分裂，乃至台灣共產黨的成立，都與前一階段的保存有關。

當然，研究時段就算提前，既有研究所具有的缺陷，也未必就能得到解決。由於缺乏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理論到歷史的基礎知識，許多研究常常忽略或弄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與概念、甚至提出假問題或假概念。²⁵就此而言，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運動史」，不如稱之為「沒有社會主義」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但是，如何才能把「社會主義」帶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之中呢？本文認為，誕生於運動之中的「資本主義論」，是把社會主義「帶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個媒介。

第三節、當憤怒不只出詩人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及其「資本主義論」的關係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特異的存在。其特點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n Ökonomie*）。但馬克思更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稱為「政治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²⁶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意義很重大。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²⁷恩格斯指出：

²⁵ 以正文所列舉之既有研究成果來說，盧修一、簡炯仁、陳芳明為此種錯誤的典型。盧修一的考證與分析，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台共史研究，然其全書只為鋪陳台共綱領（1928 年）中的台灣民族概念而作。而無注意到台共綱領的根本規定是民主主義革命；同時也沒有注意到第二次台共綱領（1931 年）提出蘇維埃口號的意義。至於簡炯仁，其考證及分析錯誤百出。他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分析台共建黨大會的中共中央代表「彭榮」（簡炯仁謂之即彭湃）如何干涉台共綱領之制定。在他眼中，建黨大會實乃綱領草案（渡邊政之輔制定）與綱領定稿（彭湃制定）之間的鬥爭，前者強調工人領導，後者強調農民。而後者之所以強調農民，則是因為彭湃是農民運動大王。但問題在於，彭榮是否為彭湃，尚有疑義。而從現存的台共建黨大會會議紀錄與相關回憶錄來看，中共中央代表並未改動多少日共幫台共所擬的草案（若林正丈也肯定這點）。至於農民領導或工人領導，則完全是簡炯仁自己編造出來的矛盾，關鍵是簡沒讀懂台共綱領。至於陳芳明，其根本錯誤在於他沒搞清楚國際共運的基本問題，竟說台共將其革命性質規定為「殖民地革命」，而中共則要干涉之為「階級革命」。眾所皆知，國際共運在一九二零年代所產生的分裂，是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斯大林），另一方面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而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對「階級革命」。更重要的是，無論台共、中共、或日共，都在斯大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成長，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定是沒有疑義的。以上，關於台共建黨的史料，可見：〈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紀錄〉，收錄於山辺健太郎編，《台灣（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245~256；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261~266。

²⁶ 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

²⁷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

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這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如果「憤怒出詩人」，那末馬克思主義則要求「憤怒」者能夠成為探索經濟規律的革命家。也就是從現狀中追索歷史規律，並從規律中發現未來的可能。誠如恩格斯從黑格爾的「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的命題中延伸出的見解：「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反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因此「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²⁹而恩格斯所謂的「經濟科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中探索現實性與必然性之關係的方法。

雖然在社會主義由西徂東的時代裡，馬克思主義並非首先被接受、被理解、被運用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對於「憤怒」者所提出的要求（即以「經濟科學」，而非「道德與法」來證實「道義上的憤怒」、乃至馬克思主義之「經濟科學」所規定的研究對象（即「資本主義」³⁰），卻可以在本文所研究的社會主義者們的論述中尋得類似的形廓。對於這些試圖運用「資本主義」及其周邊概念建立具有「經濟科學」性質的論述，本文稱之為「資本主義論」。

當然，「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³¹但在社會主義東傳的時代裡，理論不成熟的原因還包括傳播、翻譯等因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完成了他們自己所期待的「經濟科學」，即「政治經濟學批

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40。

²⁸ 恩格斯，〈反杜林論〉，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92。

²⁹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16、244。黑體字為恩格斯所原有。

³⁰ 嚴格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抽象的「資本主義」，而是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曾因「研究對象」而發生迄今未止的爭論。由於本文研究時段的限制，本文不擬參與這個討論，也無從參與這個討論。

³¹ 恩格斯，〈反杜林論〉，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608。

判」。但對二十世紀的東方社會主義者來說，「經濟科學」需要重新建立。只有重新建立能夠說明本地經濟現象的「經濟科學」，才能支持自己「道義上的憤怒」。

在「經濟科學」重建的過程中，邏輯的推理、現實的觀察、概念之間的關係，乃至方法的運用，可能很隨意也可能很錯誤。由於時空條件的限制，這些狀況都屬理所當然。實際上，恰恰是這些今日看來不成熟乃至錯誤的論述，才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以政治經濟學在歐洲不同時空下所展現出來的不同樣貌來說，恰恰是不同時空的客觀環境的理論反映（比方威廉配第對於殖民愛爾蘭的經濟主張與愛爾蘭實際經濟狀況之間的關係³²）。因此分析社會主義運動之「資本主義論」，至少應從論述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論證方式（即如何自圓其說），以及論證所推導出的結論等方面入手。而本文認為，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過程中的基本問題意識如下：

- (1) 己方所欲推行的進步社會運動（如無產階級運動）如何可能。
- (2) 既存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否仍有進步性。
- (3) 如果既存的社會運動不具或失去進步性，其運動參與者是否具有進步性。

並非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流派都涉及以上三個問題意識，也不是涉及上述問題的流派都擁有他們的資本主義論。但當時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出現資本主義論，正是為了論證上述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而當時的論證方式，則集中在資本主義階級分化是否發生、能否發生、如何發生等問題上。

1989年，金寶瑜與柯志明曾就如何理解「原始積累」的問題而發生爭論，他們當時所爭論的問題有部分正是本文研究時段中所同樣出現的問題。原始積累既包括財富的積累、更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構成。柯志明著重前者（即其所謂「資源轉移」），金寶瑜則重視後者（特別是「無產階級化」）。兩種不同的側重促使兩人互相注意到對方的偏向。其中，金寶瑜因站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立場，而突出了無產階級化的面向。並指出，「大規模的原始積累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進行的。」³³雖然它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就完成了，但原始積累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繼續著，因為在這發展過程中，小生產者不斷地破產。³⁴但柯志明則認為，「金寶瑜的用意……似乎要告訴我們，只有大規模無產化與小規模無產化之分，而沒有原始積累問題。」³⁴柯志明對於金寶瑜的批評採取了取巧的策略，因為他只是在邏輯上回應金寶瑜，而沒有進一步說明兩種無產階級化的差異。而當柯志明明言採取「original accumulation」以迴避金寶瑜從原始積累的「primitive accumulation」所提出的批評時，其實正是退卻了。對於本文來說，評價上述兩位學者的見解並非任務所在。但金寶瑜與柯志明所共同揭示的兩種無產階級化，卻是資本主義論伴隨著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出現而登上

³² 可參見：埃倫·M·伍德著，王恆杰、宋興無譯，《資本的帝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59~63。

³³ 金寶瑜，〈農工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從評《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開始〉，收錄於馬克·薛爾頓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89），145~146。

³⁴ 柯志明，〈「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收錄於馬克·薛爾頓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67~168。

歷史舞台時的基本內容（雖然不盡相同）。然而這種內容的出現，並不只是理論認識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對前述三個基本問題意識時，最初能用的論證方式。

創辦於東京的《台灣青年》與《台灣》是台灣人論述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早園地，也是最早誕生台灣資本主義論的地方。連溫卿回憶，「當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成爲輿論之時，『台灣青年』（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刊）已由彭華英介紹當時如旋風之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而由蔡復春發表階級鬥爭之研究。」³⁵嗣後，該誌改爲『台灣』，在其第四卷第七號（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刊）中，有秀湖生[許乃昌]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一文，檢討台灣議會之目的究竟是少數階級之利害，抑爲大多數之階級利害的問題。」³⁵

連溫卿所列舉的以上三個作者及其文章，僅僅是這兩份刊物中涉及社會主義之文章的代表性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卻反映了台灣人接受社會主義時所發生的變化。彭華英與蔡復春的文章，只是純粹介紹社會主義學說本身。但至許乃昌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這篇名文時，這篇文章便已有能力運用社會主義的概念與原理，去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性質以及議會請願運動之進步性。雖然許乃昌的文章只是這一變化的一個代表，然而這個代表卻說明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史有個極早的發源。陳映真曾指出，「台灣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的知識思想體系，寫成理論文章，成爲台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並不很多，但也還是不少。」³⁶陳映真認爲 1926 至 1927 年間的「中國改造論爭」屬於第一批；台共建黨以後的 1928、1931 年兩次綱領則屬於第二批。這些材料都是「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重要傳統和文獻。」³⁶雖然這些文獻都是本文定義下的「資本主義論」。但本文將以時代更早的、不見得全屬馬克思主義的、卻又誕生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的「資本主義論」作爲研究對象。

第四節、章節安排與研究的展開

本研究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東方殖民地展開的過程；台灣則是這一案例研究的對象。就研究次序與章節安排而言，本文擬按照組織形成的沿革爲線索，以利於說明歷史過程。本文的分析對象，基本上遵循《台灣社會運動史》的歸類。分別以日本與島內社會主義者的連帶、島內既有的社會運動、島外無政府主義、島外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混合，以及島外共產主義爲主軸。本文試圖透過此一敘述順序的安排，來體現台灣社會運動的變遷。（還得交代一點，本文所謂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爲同義詞。）但就整體的內容而言，細心的讀者必然發現：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結合與分離是一個主軸線。此外，在不同的章節內，本文還試圖揭示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與島外社會主義勢力的接觸關係。這種接觸關係由於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運

³⁵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5。

³⁶ 陳映真，〈序〉，收錄於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1~2。

動內部的不同派別)以及社會主義者們的跨國界交往而顯得複雜。

就研究時段而言,愈後面的章節越縮限於 1924 年本身,這是本文基本的章節安排。反過來說,愈前面者,必須愈從更長的時間才能見其社會主義傾向。時段上限之所以定為 1920 年,乃以本章所引用的謝晉青的台灣問題言論為起點。至於時段下限定於 1924 年,則在於當年是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前所未見地同時出現的一年,此外,當年也是台灣資本主義論的一次高峰。自此之後,直到 1926 年底至 1927 年初,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才再次抬頭。

以下將分別簡述各章內容:

第一章以台灣出身的日本社會主義女性運動家山口小靜的生與死,作為一個說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引動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線索。同時以這樣一個女性的生命歷程,說明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即便具有日本人的身分)與日本政府在統治範圍內所營造的鎮壓性歷史環境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二章以台灣的既有的社會運動為對象。第二章試圖以路線對立的角度,說明 192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轉折與總趨勢,而 1927 年之前(特別是 1924 年之前)先後出現於島內的兩個組織(新台灣聯盟及社會問題研究會),則是研究的重點,以此揭示當時蘊含於社會運動中的路線對立與社會主義萌芽。此外本章還要說明當時人(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眼中的左右對立,以及他們眼中的對立如何反映島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總而言之,本章的任務就是從當時人的眼光來為後續章節提供時代背景的說明。而蔣渭水與連溫卿之間的競、合關係,將是主要的研究線索。

第三章則以島外台籍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活動為對象。由日赴華的范本梁則是研究的主要線索。范本梁以北京為活動據點,與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聯繫。在台籍作家許地山的協助下,展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活動,成立「新台灣社」。范本梁的組織活動與無政府傾向直到治警事件之後才愈發明確。改組其組織為「新台灣安社」並正式發行機關刊物《新台灣》,直到 1926 年被捕。對於第二章所討論的台灣既有的社會運動,范本梁是截然反對的代表。他批判這一運動並提出了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共產主義」革命論。不過,范本梁的台灣革命論並非台灣資本主義論。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說,缺乏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及理解,是其一大弱點。實際上,范本梁的個人活動始終無法轉型成組織運動。

第四章則以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交錯之下而崛起的一批台籍社會主義者為對象。他們在各種社會主義勢力的影響下,由於廈門的「台匪」事件以及島內「治警事件」的刺激而集結。這群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朝鮮、日本、大陸的社會主義者結合,形成了具有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雙重背景的組織及刊物,也就是上海的「平社」及其機關刊物《平平旬刊》。以這個組織為基礎,其中的台籍成員擺脫無政府主義而形成了台灣共產黨之前的台灣共產黨——「赤華黨」。隨著平社成員許乃昌赴蘇留學,「赤華黨」的資訊也傳到了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在台共成立之前所唯一知曉的建黨活動。本章將描述其組織集結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及其時代問題。

以上,從第二至第四章,本文並將分別說明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的三大時代問題。依次分別是:資本主義化(即台灣能否完成資本主義化)、國家政權(即如何面對台灣總督

府政權的支配，以及企圖分享政權的議會請願運動），以及如何看待議會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特別是打壓請願運動的「治警事件」之後的請願運動）。

第五章將接續第四章所未能討論的理論問題而展開，主題則是台灣資本主義論以及歷史建構。早在治警事件前，許乃昌就質疑請願運動而提出從社會主義出發的革命論。治警事件後，隨著《平平旬刊》的創辦，刊物的許多作者也就同樣的問題提出看法。1924年底，許乃昌在前述基礎上，就「社會主義革命」或「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而與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上進行討論。以這次討論為標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組織化之外，更出現了理論化。這是當時台灣資本主義論的高峰。由於請願運動者在治警事件中展現的二面性（抵抗的頑強以及運動的脆弱），這個論述反映了社會主義者對於民族主義者的同情，因此形成了既否定民主主義革命、又想容納民族主義者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其理論基礎，則是台灣的全盤資本主義化論，以及連帶產生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設想。

又由於許乃昌與瞿秋白是以「國民革命」作為「民主主義革命」的代名詞而立論。因此，本文將以第五章與第六章的篇幅將討論「國民革命」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關係。並用相當的篇幅比較許、瞿兩人之間的論爭與大陸社會主義運動中類似的革命性質論爭。不過，第六章將進一步從「革命史」與「民族資本主義」兩種歷史建構的缺乏，說明當時台灣資本主義論的限制。

除了結論以外，本文最後一章則將針對連溫卿 1924 年赴日拜會山川均夫婦等社會主義者的過程做一敘述。



第一章、山口小靜的生與死³⁷

午後，又單獨到海邊，這次才看到蔚藍而燦然的海。一個人真想跳起舞來。好多裸體的人在拖著翻覆的船隻上岸。

躺在沙灘上讀《俊寬》。

七點左右回到家裡，山口小姐已經早一步先走了。

——永倉照子日記，1920年2月18日³⁸

第一節、山口小靜：自東京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1. 背叛保守家庭的造反少女

山口小靜（1900?~1923）³⁹生於一個全然與社會主義思想扞格不入的保守家庭，同時也生長在日本殖民壓迫之下的台灣。小靜的父親山口透，曾在甲午戰爭之際擔任近衛師團的從軍記者，隨著最終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行走各地。後來則擔任起供奉北白川宮之台灣神社的神官。小靜的祖父、父親、母親，均有深厚的漢學或國學背景，祖父並在台北各校教倫理。小靜的大哥也是神官，二哥則畢業於東大法學院，是右翼團體「興國同志會」的一員。對於少女時代就被視為才女的小靜，山口家也進行了有計畫的培養，1916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之後，便送至東京就讀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科。她父親準備讓她在女高師畢業後當上女子學習院的教授，期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皇族公主的恩師。⁴⁰

³⁷ 這個標題借用自尾崎秀樹。見：尾崎秀樹，〈山口小靜の生と死——山川菊榮の回想にふれて〉，《山川菊榮集月報》，第4回第9卷（東京：岩波書店，1982），1~3。

³⁸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東京：大空社，1995），273

³⁹ 據《山川均全集》的編者按，小靜生於1901年。另據竹中信子之《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則將生年記為1900年。見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5卷（東京：勁草書房，1976），199；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244。

⁴⁰ 此處關於小靜生平的說明，俱來自山川菊榮。見：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1972），344。關於山川菊榮對小靜的回憶，多已收入其文集《山川菊榮集》。其中內容有不少重複，而平凡社版的《おんな二代の記》已可覆蓋《山川菊榮集》所記載的大部分史實，故本文將

小靜十歲時，發生以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1871~1911）為主角的「大逆事件」。當局宣稱幸德等人意圖以炸彈暗殺當時的明治天皇。在一次飯後聊天裡，對著小靜及其母親，山口透以此事問她們兩人的感想。小靜的母親贊同山口透的判斷，認為這些社會主義者都是壞人。然而小靜竟語出驚人地說，「我不那麼認為。」此話一出，除了極大地激怒其父親之外，她母親也悲憤欲絕地將小靜拉至另處，看著她，流著眼淚說：⁴¹

生出會說這種大逆不道之言之女兒，是我的恥辱，我對不起妳父親、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供奉在神社的北白川宮。我要把妳抓起來刺死，我也要切腹謝罪。

小靜幼年的這番經歷，彷彿是種預示。

1919年夏，正在東京女高師學習的小靜與東京女子大學的永倉照子（永倉てる(子)，林てる子，1900~1923）、貝原泰子（貝原たい(子)，西たい子，1894~1930）等人，前往著名的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家山川菊榮（1890~1980）居所拜訪。⁴²山川菊榮的愛人即山川均（1880~1958），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先驅及領導人，也是日本共產黨創黨期的關鍵人物。小靜與山川夫婦的接觸，使其思想急劇激進化。同年夏秋，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在東京女子大學發表演講，小靜起而提出挑戰性發言，在女學生中造成轟動，小靜的反叛生涯遂於焉展開。⁴³

永倉照子在其日記中寫道：⁴⁴

（1920年2月17日）終於下雪了，一天中翻翻雜誌，在床上翻來覆去，吃著納豆，與山口小姐聊天，感覺到人類被安排的境遇是很重要的，田園的土味，無論如何是拿不掉的，我們會反抗環境，最終還是會被環境所征服。

山口小姐是個懷疑家，因為動彈不得的處境而感到被囚錮。但她卻是一個不能不動的人。

（1920年2月18日）如雪國的陽光那般矇矓的太陽出現於松林之間，仰首看了幾次，會是好天氣吧。很想看藍色的海，真是不看就不想回來，早餐後，兩人相伴到海邊，淺綠色的海，漆黑的天空，山口小姐在冷風中靜默地佇立著。我將頭縮在風衣裡獨自走著，真受不了這麼憂鬱的海，我滿心渴望著光明。

以平凡社版《おんな二代の記》作為研究的底本。《山川菊榮集》中涉及山口小靜的部份可見：山川菊榮，《山川菊榮集》，第8卷「このひとびと」（東京：岩波書店，1982），14~20；67~86；山川菊榮，《山川菊榮集》，第9卷「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岩波書店，1982），260~272；290~293。關於小靜就學的詳細資料，則來自竹中信子的記載。竹中信子並云之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期間，屬於第十期生中組。但當時校名應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女學校」。見：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244。

⁴¹ 河崎なつ，〈噫 山口さん〉，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東京：水曜會出版部，1923），附錄頁8；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26。

⁴²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24、343。山川菊榮對於山口小靜等人初次拜訪的時間分別有1919年夏天與1920年初夏兩種記載。前者應為正確。

⁴³ 貝原たい，〈山口小靜さんの思出〉，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附錄頁4。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25~225；343~344。

⁴⁴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272~273；林てる，〈失はれたる闘士〉，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附錄頁6。

被禁錮的、在冷風中凝望著海面的小靜，當時想到了什麼？

小靜開始參加山川均所主辦的社會主義研究團體「水曜會」。⁴⁵1920年夏天，小靜並與永倉、貝原等女學生進一步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團體，也集會於山川家中（東京府荏原郡大森新宿六八二番地⁴⁶）。山川均回憶：⁴⁷

好像是1920年的夏天，有五六位女性說要開研究會而來使用了我的住家。就在這研究會上，我首次認識了山口小靜氏。

在這會上，我也講過一二次話，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位難得的、思路明晰的人。

山川菊榮則云：⁴⁸

這一沒有正式名稱的女學生團體，每週或隔週到我在大森新宿的家裡集會，有時我作講話，山川先生也來講過。記得當時是好像不以婦女問題而以社會主義的原則論為主題。因時際會，常提起俄國革命，剛好羅素也到中國訪問，改造社的山本實彥就順便請他到日本，這位羅素以純然英國式的自由主義立場對布爾什維克革命提出猛烈批判，當時正值堺利彥與山川進行反擊的時候，當然這些也會被提出來討論。

不久，與會同學希望能進一步與女性勞動者交流。於是山川菊榮便至勞動總同盟本部與鈴木文治（1885~1946）等人會面。恰巧有一《日日新聞》記者在場，菊榮本不欲明言。但因鈴木與那位記者的保證，菊榮便將女學生們的希望說了出來。同年5月便與富士瓦斯紡織會社幾位熱心的女工在鈴木家進行了半天愉快的座談。本來還想每月進行一次，然而女工旋因罷工失敗而被解雇，而且那名記者竟將座談會寫成同月28日《日日新聞》的頭條，導致警察衝到東京女大恐嚇校長安井哲子。沒有面對過警察的校長便在驚慌中開除了永倉照子與貝原泰子。⁴⁹

2. 離開學校之後的生活鬥爭

由於小靜自十七、八歲便肺病纏身、又想專心於社會運動，早先即曾自請退學。但校方愛惜她的才華，便勸她保留學籍；只要接受形式上的考試，便能於次年（1921年）3月

⁴⁵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6。

⁴⁶ 山川振作，〈編者あとがき〉，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3卷（東京：勁草書房，1976），449。

⁴⁷ 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現以同名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5卷（東京：勁草書房，1976），200。

⁴⁸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4。

⁴⁹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4~345；山川菊榮，〈追憶〉，11，收錄於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江刺昭子，〈解説〉，3，收錄於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關於這一事件，永倉照子另有詳細說明，似未立即開除，見：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372~373。

畢業。然而《日日新聞》的報導扭轉了一切。女高師一反態度，竟將小靜無預警退學。⁵⁰

永倉與貝原，後來分別與新人會的指導者林要（1894~1991）以及《社會主義研究》的編輯西雅雄（1896~1944）結婚。隻身離家的小靜，則因愈發嚴重的肺病而決定離京療養。永倉照子寫給林要的信中提到：⁵¹

（1920年12月11日）[關於結婚，]也有山口小姐的恭喜。但她還是要獨行，感覺路是要一個人獨行的。山口小姐與菊榮夫人，可能對我有所不滿。但就積極面而言，大概也不至於放棄我。山口小姐說：「我將暫時對付病魔，等著您重新出發的日子。」

小靜自1920年9月起，連續有38、39度的高燒，10月11日更住進醫院。⁵²與此同時，山川均也因重病而被醫師要求暫離東京去靜養，遂於10月轉移到茅崎西海岸暫住。⁵³小靜拜託山川菊榮，在山川均居所附近找處套房給她。被退學的貝原泰子也受山川菊榮的拜託而至當地照顧山川均。小靜於12月到茅崎海岸。⁵⁴在茅崎的這段期間裡，山川均與小靜有了更多的往來，山川均回憶道：⁵⁵

那年冬天，在我轉地療養的地方，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幾乎每天都和山口氏有談話的機會。同志山口小靜氏是我所認識的許多同志中，能最切題提問的人。而且對我前日所講過的話，還能在次日反覆思考的人。幾個月之後回來，她已成為了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並且是一位熱烈的革命家。直到同志山口小靜氏死後，才聽到她為決心投入實際運動而放棄與愛人結婚的悲壯傳言，當時我並不感到意外。她愛無產階級革命更甚於愛其愛人，⁵⁶我不僅以稱呼其同志為榮，更以稱呼其勇敢的同志、尊敬的同志為榮。

1920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我在茅崎海岸進行轉地療養，當時也正如現在過著自炊自食的生活，不久，山口氏離開了大阪的醫院，搬到我居處的附近來，其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我住處生活。午飯的時候，她就提著加熱便可食用的牛肉鍋，到我這裡一起吃飯。天氣好的時候，就扛著那塊灰色的毛毯，邀我一起去海邊曬太陽，一起躺在那裡互相朗誦著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

在茅崎療養期間，小靜說要做點事情，所以山川均讓她研究匈牙利工農革命。成果則在1921年9月底的水曜會例會上發表。⁵⁷

⁵⁰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6。

⁵¹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422。

⁵²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7。

⁵³ 山川振作，〈編者あとがき〉，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3卷，449。

⁵⁴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7、349。

⁵⁵ 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附錄頁1~2。

⁵⁶ 其愛人叫做溝口義男。小靜認為，雖然溝口對社會主義思想能有共鳴，對於實際運動卻缺乏動機。兩人遂因此分手。見：山川菊榮，〈同志山口小靜を憶ふ〉，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附錄頁21~22。

⁵⁷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9。

1921年春，小靜從茅琦轉到鵠沼的農民家庭療養。因拒家中接濟，上京尋職；但由於有病在身，無法找到適當的工作。那年夏天只好暫時到大森海邊，找個管家兼女傭的工作而住下。然而：⁵⁸

但是到底是從不知勞苦的學生生活過來的女學生，就算在自由自在的人家裡面，要當女傭還是無法勝任。有次主人要她烤麵包，她竟來信告訴我[山川菊榮]，「這實在是一大侮辱。」有天下雨，主人站在門口不動，聞其所以，說是要她拿出他的雨鞋；取出之後，竟以不高興的口氣要她擦乾淨。這時她隱忍已久的滿腹怨氣爆發了，她舉出那男主人的無理之後，還詰問為何他還扣留前任女傭的工資不發。

（前任女傭是她的朋友，也是推薦她來工作的人）當天晚上主人就帶了一個繼任者回來，說：如果還找不到地方去，暫時可以住到找到工作，但是立即宣布解雇。

離職之後，小靜母校的學姊、也是東京女大教師的河崎夏（河崎なつ，1889~1966）暫時收留了她，給她零用錢，也勸她再就學。小靜覺得語言學（語學）很必要，便去拜訪留美歸國的語言學家山田嘉吉（1865~1934）。山田的妻子即是發表母性保護論於《青鞜》雜誌的山田若（山田わか，1879~1957），夫妻均是保守學者。而小靜竟帶著社會主義書籍要學英語。由於山田本就敵視社會主義，又認為對方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子，便拋開語言學而大談其社會主義亡國論。初遇失望的小靜，到了第二次就爆起無名火，「你就去為你的國家策劃永遠的道路吧！」於是，學生開除了老師。⁵⁹

同年4月，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團體「赤瀾會」結成。小靜也是創會會員之一。在赤瀾會的例會上，小靜不改其好問銳進的脾氣，與無政府主義女性運動家伊藤野枝（1895~1923，大杉榮的愛人兼同志）發生爭論。⁶⁰山川菊榮回憶云：⁶¹

當聽說赤瀾會因不易請到演講者而有點意氣消沉之時，她[小靜]很不服氣的說：「一個月只兩次，我可以努力試試。」可惜由於多病而無法實現。不過有一次出席例會，適逢伊藤野枝的演講，她笑著說：「我提出問題時，野枝先生竟不應答而發脾氣！哈哈！」彷彿可以看到始終貫徹熱情卻不談理論的野枝先生的真面目。

據連溫卿的回憶，小靜激怒伊藤野枝的爭論點，在於「政治機關」（如國家政權）除是社會運動的敵人之外、是否也是社會運動應當奪取利用的對象。對於伊藤野枝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政治機關」全然不需要；與此相比，小靜的「馬克思」丰采則格外顯著——社會主義運動須以奪取「政治機關」為目標。連溫卿憶云：⁶²

⁵⁸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7。

⁵⁹ 河崎なつ，〈噫 山口さん〉，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9~11；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7~348。

⁶⁰ 伊藤野枝即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1885~1923）的妻子，經常發表文章於婦女解放運動刊物《青鞜》。後與大杉共同慘死於1923年關東震災的蓄意虐殺中。

⁶¹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0。

⁶²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九回。值得注意的是，連溫卿將小靜與伊藤野枝的爭論場合記為「水曜會」，而非「赤瀾會」。孰者為是，尚待核實。〈蠹魚的旅行日記〉的史料解題詳見本文最後一章：〈餘波：「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在日記中，連溫卿曾將小靜稱為「J女史」，並在〈怎麼是世界語主義？〉一文

社會上一切政治機關現在都被少數階級獨占，所以生出不平均的事實，以此不平均的事實，來否認政治機關是無益於民眾，這個觀念明白是不當的，現在日本的社會運動，皆由經濟上轉向政治上去爭鬥，就是要用這機關去利用罷。女史滯京時候，曾在水曜會例會聽了伊藤野枝女史講演，因他的講演有誤解此點，向他質問，反被他怒罵，「[J]女史曾說過此事，這記憶此時也衝出來。」

1921年9月底，為在水曜會例會發表她對匈牙利工農革命的研究，小靜冒著漏夜大雨從千駄谷趕至大森。山川菊榮評價道，「雖然當時的水曜會可以看到女性的面孔，但是男性仍為壓倒性多數，而且當時尚無男女同校制度。所以她在年長的男性中間發表報告和應答提問實是需要膽量的，山口小靜不但勇於承擔、而且瀟灑地完成了。」⁶³不久，這篇文章便以〈匈牙利的工農革命（匈牙利的勞農革命）〉為題、並以吉田梅子為筆名，發表於《社會主義研究》；二年後，以水曜會小冊子的形式，附上其友人知己的悼文而出版。

小靜也協助山川菊榮的翻譯工作。正當山川菊榮拖著病體、抱著嬰兒一點一點地翻譯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婦人與社會主義》以及拉帕波（Philip Rappaport）的《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⁶⁴時，小靜與永倉照子自告奮勇去山川家裡幫忙菊榮，並分別協助了後一本書的翻譯工作。⁶⁵

由於小靜的病，她的家庭始終要她回家療養；水曜會的同志為了珍惜人才，也不得不讓她回去。這次報告之後，小靜便返回台北，永遠地告別了東京。⁶⁶

第二節、融入島內社會運動的山口小靜

1. 連溫卿與山口小靜的相遇

關於小靜的返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著如下的記載。首先：⁶⁷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

中將小靜稱為「K·J」，亦有「J」字。故此處將「I女史」校訂為「J女史」。可參見：連溫卿，〈怎麼是世界語主義？〉，《台灣民報》，第128號（1926，東京），11。

⁶³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9。

⁶⁴ Philip Rappaport, *Looking forward; a treatise on the status of woman and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13).

⁶⁵ 關於小靜與永倉的協助，見：山川菊榮，〈追憶〉，10，收錄於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以及山川菊榮，〈はしかき〉，收錄於ラッパポト著、山川菊榮譯，《社會進化と婦人の地位》（東京：改造社，1929），5。另外，《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日後也另以節譯方式發表漢譯本於台灣民報上，但未署名譯者。見：〈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台灣民報》，第2卷第10號（1924，東京），7~10。

⁶⁶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0。

⁶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44。

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來說，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可謂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小靜、如果不是連溫卿，在島內社會矛盾因著日本資本主義的滲透而愈發尖銳的情況下，島外（大陸以及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或遲或早一樣會進入島內。但就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向島內的實際發展而言，當以小靜與連溫卿的相遇為轉戾點。以一轉戾點繫於二人之相遇，說來很具戲劇性；但也恰恰是這般戲劇性的相遇，才使連溫卿進而尋得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家相連繫的管道。《台灣社會運動史》又云：⁶⁸

連氏早年研究 Esperanto 語[世界語]，經此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並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歲末與山川均相識，受該氏的指導進行共產主義研究。

倘若上述二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載不誤，那末連溫卿幾乎是在小靜返台之後不久，便在小靜的介紹下聯繫上山川均。本名連嘴的連溫卿，只有公學校學歷，算是自學成才之人。當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他是其中的重要創始成員。但在文協成立之前，連溫卿便已參與由日人兒玉四郎引入台灣的世界語運動；並在兒玉之後，將日本世界語協會（JEA）台灣支部改組為台灣 ESP 學會，擔負起發行《綠蔭》（*La Verda Ombro*）月刊的主編大任，成為當時日本境內三大世界語刊物之一。連溫卿認為，世界語運動「恰好為從嫌惡政治逃避出來的台灣人準備了一條出路」。但對連溫卿來說，即便他已由參與文化協會的鬥爭而超越「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離」的世界語學習，然與社會主義活動家山川均之間的聯繫，才是真正的超越。⁶⁹

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不只為連溫卿打開一條連繫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道路；對於小靜而言，她也以其熱情與誠心，毫無隔閡地被接納於台灣人的運動陣營。此外，她也在台北的靜修女學校（今靜修女中）覓得一個教職。⁷⁰山川菊榮回憶：⁷¹

後來卻驚聞，才回去不到半年，她便於次年春天四月到當地的教會學校任教，不得不使我們擔心，其本人與雙親也因沒有認清其患病的性質而太過樂觀，尤其醫生也難免其責。她不單單在女學校教書，還在台灣青年中組織社會主義團體共同研究，並加入了進步的思想團體——台灣文化協會——融入台灣人的社會之中。當然，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

⁶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4。

⁶⁹ 關於台灣的世界語運動，連溫卿與戴國輝均有概略說明。見：史可乘（連溫卿），〈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台北），91~93；戴國輝，〈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 25 卷第 2 號（1975，東京），57~60。另外，日本已有專題討論台灣世界語運動的論文，唯惜筆者目前無法獲得。見：松田はるひ，〈綠の蔭で——殖民地台灣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東方雜誌（*La Revuo Orienta*）》，第 58 卷第 6~9、11 期，第 59 卷第 1 期。

⁷⁰ 關於小靜進入靜修教書的資訊，來自於：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246。

⁷¹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0~351。

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這是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所說的。

雖然小靜如此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於同年夏天住院達兩個月。⁷²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爲了響應日本內地由左翼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與她的高中校友們於 9 月 22、23 日舉辦賑災音樂會於台北鐵道旅館（原址即今日台北火車站對面）。舉辦救濟外國的賑災活動，於情未有不合。但對日本當局而言，蘇維埃政權及其日本境內的同路人卻是威脅其統治的危險存在，而且這一賑災活動還有爲促使日本承認蘇聯一事營造輿論的意味，因此日本當局不可能隨意放任其活動的進行。就台灣而言，恰巧此時大陸汕頭發生風災，總督府當局遂順水推舟，除在御用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大炒汕頭風災消息之外，⁷³更要求小靜等主辦人應將汕頭風災納入音樂會的主題，稀釋其本來訴求。連溫卿回憶：⁷⁴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短促期間中，台灣社會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這樣情勢必然的影響到各方面所發生之事件，在印刷工第一次罷工⁷⁵之翌年爲募集救濟俄羅斯大饑餓之義捐，曾在鐵道旅館餘興場舉辦音樂會，連續二日，該會之主辦人全部屬於第一高等女學校出身之日人高級官吏及豪紳的子女，例如山口宮司、新元鐵道部長、田傲吉之愛女。唯警察方面則以爲專爲救濟俄羅斯饑餓，是不宜於國際情勢，當時汕頭亦曾發生大水災，損害甚鉅，應兼行救濟，方能獲得社會人士的讚譽的，其結果，反響果然不錯，出演者全部是日人業餘的青年音樂家，入場者十之八九亦爲日人，於此可見當時日人尚未離脫自由主義之傳統。

《台灣日日新報》曾有報導云：⁷⁶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窗會。此回爲欲釀[聚]集汕頭災害及俄國救飢義捐金。訂來二十二。二十三兩日。會場假台北鐵道旅館。開慈善音樂會。目下正稟請許可中。據聞入場料學生券五十錢一千枚。普通券一圓者三百枚。特別券二圓者百枚。計欲得金千圓。內四百金寄往汕頭。四百圓寄往俄國救飢。其餘二百圓充慈善音樂會開催之一切費用云。

山川菊榮則回憶：⁷⁷

⁷²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1。

⁷³ 倘若翻開 9 月前後的《台灣日日新報》，會發現汕頭風災的新聞遠遠多於俄國災情，甚至每日都有爲汕頭風災募捐的新聞。

⁷⁴ 連溫卿，〈城內的政治發展〉，《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4 期（1954，台北），41

⁷⁵ 連溫卿此處回憶有誤。連溫卿所謂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發生於 1923 年 8 月。台灣印刷製本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爲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 9 月才抗爭勝利。除連溫卿在〈城內的政治發展〉的敘述外，此事件還可另見：本刊，〈持久戰に入つたらしい・臺北印刷製本業主對本島人の賃銀爭議〉，《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2 日，第 7 版。

⁷⁶ 〈開慈善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9 月 18 日，第 4 版。

⁷⁷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1。

就在這年夏天，在日本本土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組織聯手發起了俄羅斯飢荒救濟運動，在婦女運動這方面，當時首次廣泛地得到活躍於文化活動的與謝野晶子、深尾須磨子等知名女性的支持，以全國性的音樂會、演講會，以及賣明信片等方式來募款送到蘇聯。在台灣，因病住院的山口小靜也動員同志朋友進行全島性的運動，募到相當於今天幾十萬元的六、七百元捐款，送往蘇聯。

為了協力此一運動，我曾到駿河台的文化學院拜訪與謝野晶子，當時她很爽快地答應援助，但說：「我對事務一竅不通，這方面要請河崎夏小姐幫忙，學校裡面的實務工作都是她在執行」，於是介紹了河崎小姐和我見面。還沒寒暄，她一見面就提到山口小靜的名字說：「十年來教過各個學校，從沒教過這麼一個優秀的學生，她是你們的寶，要多加照顧、珍惜。」在小靜小姐歸鄉之前，能讓小靜以失業之身而無憂無慮地度過一個夏天來靜養與研究，這都應該歸功於河崎小姐的善意。但也恰恰為了這樣的原因，使得河崎小姐受到警方的干涉而不得不搬家。

2. 白色恐怖下的島內秘密讀書會：馬克斯研究會

在島內推動與日本內地同步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這在台灣史上，大概也屬先驅；但在先驅性之外，島內外社會主義所交織建立起的聯繫也許更值得注意。在聯繫漸次豐富起來的過程中，原來被連溫卿視為「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離」的世界語，也成為這些聯繫的良好媒介。除了連溫卿是島內世界語運動的積極份子之外，原來在東京便開始學習世界語的小靜，也在返台之後展現出空前的進步。山川菊榮云：⁷⁸

由於我的姊姊熱中於世界語，從而影響了河崎小姐也開始學習，由於小靜從河崎這位宣傳高手那裡聽到了世界語的妙用，便以其本有之熱心，深入研習，不久有空便能做翻譯，頗能在與外國同志的通信裡忙中作樂，同時也進入英譯資本論的研習。

但在總督府當局眼中，世界語卻是極其「不穩」的危險對象，當局的民族歧視與差別統治甚也反映其中。小靜曾被兼任警務局保安課勤務的「色魔的教育課長」田代彥二叫去問話；在小靜寫給連溫卿的信中說：⁷⁹

⁷⁸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2。

⁷⁹ 山口小靜，〈赤化か綠化か〉，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東京：水曜會出版部，1923），32~34。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49。連溫卿後來回憶起禁止台灣人使用世界語之事例時指出，「說日本人和台灣人學了世界語，然其意義總不能看做相同，因為怎麼呢？譬如日本人讀了世界語用著西曆的年號，這是日本人不過以國際上的慣例用的年號而已。但若是台灣人用了西曆的年號，這可以看做一種的叛逆，因為日本國家有固有的年號『大正〇〇年』而不用之，而卻用西曆，是一種排斥日本固有的年號的行為。當局應難允容之，這是我的友人K·J·由所謂『色魔的教育課長田代』聞及著，那時候他是兼任警務局保安課勤務的。」見：連溫卿，〈怎麼是世界語主義？〉，《台灣民報》，第128號，11。關於田代彥二，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警察機關の構成》（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

我最近有機會和台灣當局的某一高等刑事就世界語的事情做了兩三次問答。他說：「通常日本人和台灣人所做的同樣的行為，必須以頗不相同的解釋來區分。例如在信函中的紀元寫為 1922 年的時候，寫的人如果是日本人，我們會認為他不過是使用了世界通用的年號；但若同樣的字眼出現在台灣人所寫的信函上，這就不得不認為他忽視甚至是敵視日本大正十一年這個年號。同理，都是在學習世界語，對於日本人來說，只是在學習全世界所共同使用的語言；然若是台灣人在學，那就充分表示了他對日本語的排斥。……日本的殖民政策，絕不會容許這種叛逆行為……。」……這就是在台灣的日本統治者的態度與心態。……聽到這裡，台灣人諸君又將作何感想？……諸君先為民族戰爭來戰鬥以前，一定要先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所有被迫害者奮起的時機已經到了。讓我們躍入澎湃的世界革命潮流。時代的波瀾必將諸君送往成功的彼岸。

然而民族歧視並不止如此。舉凡前面提到的音樂會，⁸⁰乃至特殊的名詞用語，⁸¹都能從中間得總督府當局鮮明的差別態度，連溫卿曾有精采的說明。但無論是日本人或台灣人，只要涉及社會主義運動，同樣都會成為當局嚴密監控的對象。當連溫卿於 1924 年前往日本之時，他在船上回想起他與小靜之間的通信：⁸²

去到洗面室洗了臉後，又躺在吊床上，讀一本山川均氏著的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⁸³書後有一篇著者的感想，謂自東京至垂水，二日間能得到的書信，因為是他的，經過一週間後，能得被配達著，要算是很早的，我看了後，回憶我的經驗起來了。

1 [J] 女史和我是同住一個市內，若是書信，朝發而夕可到的地方，他寄給我的信，一週間才到，我寄給他的信，是要二週間後，纔能得到。

在連溫卿與小靜的努力下，他們秘密成立了「馬克斯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會）」，⁸⁴以

978~983；《舊殖民地人事總覽·台灣編》，第 4 卷（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445。

⁸⁰ 連溫卿云：「但是那[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音樂會是屬於日人對日人之對外的行動，自然沒有直接的政治性，倘若是日人對台灣人，或台灣人對外的行動，那麼卻就不簡單。」見：連溫卿，〈城內的政治發展〉，《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4 期，41。

⁸¹ 連溫卿云：「記得世界第一次大戰後，日當局鑑於本省人之思想發達，不得不築建一道防線，令全台的新聞雜誌切實遵守從來之內訓，把日本寫作內地，日本人寫作內地人，台灣寫作本島，台灣人寫作本島人，其用心是不要使本省人感覺著，台灣之政治是與日本內地有差別的，進一步，公開場所若說一句『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無產大眾』、『勞働階級』、『資本主義』、『榨取』等等，在講演會即被終止、注意，若在個人談話，任公職者會被撤職，或被訓責，而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後，情勢就一變了。這些視為危險的單語，就是不受教育的人也得衝口而出，視為日常的常識了。由此可以知道本省人受思想觀念的洗禮已有隔世之感。」見：連溫卿，〈再就台灣文化的特質而言〉，《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3 期（1954，台北），106。

⁸²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回。

⁸³ 山川均，《井の底から見た日本》（京都：更生閣吉田書店，1924）。這本書收錄了山川均自 1921 年 2 月至 1923 年 12 月間所發表的四十篇時評。並於 1924 年 2 月 27 日發行。關於本書資訊，詳見：〈單行書解題〉，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 5 卷，445。

⁸⁴ 「『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所明確提及者，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馬克思」替代「馬克斯」。見：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 138 號（1927，東京），12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學習對象。連溫卿首先取得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意欲以此為講義；但小靜卻需要日譯本，她便寫信向山川菊榮索取：⁸⁵

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拿到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本想在成立馬克斯研究會時以此為講義，但因會內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譯本的需求。於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治時代的譯本已然絕版，無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更糟糕的卻是，警察扣下了這封回信，以此恐嚇山口小姐的父親，加上她近日在台北的活動，使她和她的家庭之關係更加惡化。

而且：⁸⁶

歸鄉後的小靜顧慮到警察，同時認為遲早要上京，所以暫時少作通信。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事情，雖然我在改名寄出的信件中連書名也改變了，但落到警察手裡，事情還是會變大。

最後：⁸⁷

……想不到我的回信和同時送給她的參考書小包裹，竟然被警察扣留沒收，致使她遭到更加嚴密的監視。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年]春天，她的父親也不得不準備辭職，要把她送到東京來。

關於「馬克斯研究會」的詳細經緯，目前並不清楚。連溫卿曾先後在不同文章中或詳或略、或明或暗地提及此一團體。但能確定，它是公開於島內成立之「社會問題研究會」（1923年7月23日成立）的母體，而「社會問題研究會」恰恰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島內共產主義運動之嚆矢。由此來看，「馬克斯研究會」的意義實是空前的。只是，小靜最終並無以親見「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誕生，便因日趨惡化的肺病而謝世了。

第三節、花蕾落地

小靜的病竟致於死，這是山川菊榮等人所原無預想的。1923年2月，貝原泰子（時已改名西泰子）、永倉照子（時已改名林照子）與山川菊榮再次相聚於大森的山川家：⁸⁸

三個人圍著暖爐，做了一番四年來的話舊暢談。當時山口小姐已回鄉里養病，不過我們各自提起她在東京時的許多天真趣事而笑成一團，大家並都熱切期待曾說三月必回的小靜返京。

但小靜畢竟是死了，正是死於3月、死於母喪的打擊與裕仁皇太子訪台所引起的風潮之

⁸⁵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2。山川菊榮並另於書中248~249頁提及此事。此事可見：A氏，〈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二（1923年4月19日）〉，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5。

⁸⁶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3。

⁸⁷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48~249。

⁸⁸ 林てる，〈失はれたる闘士〉，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6；山川菊榮，〈追憶〉，13，收錄於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

中。山川菊榮回憶：⁸⁹

最後，她父親決定要帶她到東京，但在啟程前的大正十一年[1922年]底，臥病已久的母親就先逝世了。

「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母親永眠。在落寞的心情裡，思念及我們許多同志的苦難。現在只有暫時作為有生者的呻吟而繼續下去。」這是次日小靜小姐寫給連溫卿信中的話。

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台灣因那被稱為「攝政宮」的現任天皇之渡台而全島沸騰，「台灣各城市的警察拘留所已然滿員，台北甚至因為無法再收容，就把人銬上手銬，幽禁於個人自宅。各學校的入學考試，奉命延期，困惑著數萬小學生。」連溫卿給我的信中這樣說著。

3月16日，小靜再次住進了醫院。在連溫卿給山川菊榮的信中寫道：⁹⁰

三月十五日的信裡說，她吐了三次血，身體非常衰弱，雖不發燒，但須絕對的安靜。四月底應該可以治好，所以最近要住院，而入院是十六日……

樂觀的預期四月底就能治癒的她，已作不歸之旅。……但這並非無意義的死。這是深入戰場提供槍彈而殉職的，戰鬥正熾猛著，啊！何等悲壯！聽說臨終之日的早晨，雖然拿起鋼筆，但因不能書寫，竟不出一語而嘆息絕望……。

……當地的人都悼念著山口小姐。但運動還是照常進行。甚至寄予重望而努力著。……比方昨天，聽說那個□□□□[攝政之宮]的□□[行啟]要從我們的文化協會門口經過，一大早就來個家宅大搜索，出入之人不問男女老幼全都先作身體檢查；加上憲兵、便衣警察約一百五、六十人，在四周圍站崗、警戒、巡視，過路的人只要被認為可疑就一個個攔下盤問……**要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桃色]的。**(連溫卿氏)

爲了迎接裕仁到神社參拜、爲了擔任先導的光榮任務，山口透拖延了帶小靜上京的日期。⁹¹正當他陶醉於即將到來的榮耀時，小靜走了，時間是3月26日晚上9點40分。小靜以著自己的死，給予父親的皇國狂熱以最後的反叛。此時恰恰是母親逝世於同醫院的百日。28日，小靜於台北三枚[板]橋火葬場火化，爲了「攝政宮」的渡臺，沒有公開的儀式，骨灰則暫存於斯。⁹²對於小靜的死，山川均寫道：⁹³

⁸⁹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2。山川菊榮所引史料原自：B氏，〈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三(1923年4月27日)〉，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6。

⁹⁰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3~354。山川菊榮所引史料原自：A氏，〈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一(1923年4月5日)〉，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4；A氏，〈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二(1923年4月19日)〉，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5。

⁹¹ A氏，〈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一(1923年4月5日)〉，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3。

⁹² B氏，〈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三(1923年4月27日)〉，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6。

明年的勞動節一定要在東京舉行——山口氏留此一言便回去家鄉了。去年的勞動節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參加，今年則有五千名工人階級的先鋒參與。在傾盆大雨中踢濺著泥濘而前進，這樣無產階級軍隊壯烈的情境！紅色的工會旗幟之上，則滴著如血的雨水！「高高舉起啊，血紅的旗；在這面旗幟之下發誓……我們堅決死守保衛紅旗！——」我們無產階級先鋒隊更高唱著這首歌！⁹⁴我真希望能讓山口氏看到今年勞動節的場面，不過無產階級要得到勝利之前，我們必須付出很大的犧牲，我們所尊敬的許多同志和我們敬愛的同僚將在我們前進的路上向左向右地倒下。我不得不咬緊牙關，跨過我們同志、兄弟、戰友的屍體前進，再前進！

堺利彥（1870~1933）賦悼詩云：⁹⁵

又見一顆花蕾落地
停下來
回頭看
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
無暇惋惜

永倉照子則在日記中寫道：⁹⁶

（1923年4月24日）得知山口小姐於三月二十六日過世。真是被奪去應該珍惜的人。再怎麼想，失去了她，對我們婦女是一件憾事。縱使不是從那麼廣泛的範圍來痛惜，對我而言也是失去了一位很有助力的朋友，在我而言，這是最大的悲哀。山口小姐是存在著，在某一個地方存在著，平常這種念頭對我來說是多麼有力的慰勉，然而直到失去了她，我才痛切地感受到。現在，沒有知心朋友這件事也是寂寞之一。知心的朋友、同一思想的朋友，能夠兼而有之自是很高興的事情，不然，我還是喜歡知心的朋友。

……

我要使我的生命能完全燃燒的東西。我好像希望要用我的全身去撲擊某些東西。我正衷心地祈求著緊張和燃燒。

同年7月，照子拜訪了山川菊榮，並將小靜未能譯完的《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帶回翻譯。然而同年年底，照子也病逝了。⁹⁷

小靜死後不久，山川菊榮在《前進》（《進め》）雜誌6月號發表了〈給將投入社會運動的年輕女性〉一文。山川菊榮將女性參與社會運動所必須面對的苦痛、危險，以及各種最終退縮轉向的實例寫於文中，提醒必須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與投入實踐的決心。這封信，無論就過去或現在、無論是女性或男性，只要願意投身社會運動，都是一篇非常值得

⁹³ 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3。

⁹⁴ 此即改編自德國民謠的革命歌曲《赤旗歌》，在當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意義不下於《國際歌》。

⁹⁵ 堺利彥，〈吊意〉，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44。

⁹⁶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342~343。

⁹⁷ 山川菊榮，〈追憶〉，14，收錄於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

參考與反思的學習文獻。山川菊榮在全文的最後寫道：⁹⁸

在您心中是否燃燒著可以忍受任何艱苦、任何犧牲、對任何工作都可以承擔而有準備奉獻此一世的強烈信念？您會拋棄一己的安息、平穩的家庭生活、兄弟情誼，以及以前所教育的價值觀，而自告奮勇的投入慘烈的鬥爭中，並甘於一生當一名痛苦的無名小卒嗎？您能放棄資產階級女兒的安穩地位與溫暖的臥榻，毫不後悔地中彈橫屍、餓倒路旁、甚至刑死獄中，成為階級戰爭之中的一名戰鬥員嗎？在現在直接刺激您、鼓舞您的事情與現象過去之後，您確定能以冷靜的理智與堅定的意志，繼續在我們道路上邁進嗎？

社會運動不是玩遊戲，也不是戲劇，這是慘烈的戰爭。此戰爭所要求的是極大的犧牲，經得起考驗的堅定意志。這是通向未來新社會的階梯與基石。您有這份充當階梯基石的覺悟嗎？

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連溫卿於 1924 年聯繫上正在台灣當兵的《前進》社同人奧野直義，從而將《前進》帶進島內，分送給連指導下的台灣無產青年們購讀。⁹⁹倘若連溫卿在《前進》讀到這篇文章，會否想起小靜？

在通向 1924 年的道路上，小靜先著連溫卿而逝去，在同志們的心中留下了純潔光輝的形象，但畢竟未能繼續接受時間的考驗；在通向 1924 年的道路上，連溫卿承繼著小靜未酬的遺志而前進——既是 1923 年所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 1924 年與山川夫婦的會面，甚至更是 1927 年文化協會的左轉——這是連溫卿即將踏上的革命旅行。

歷史對於連溫卿——乃至所有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考驗，即將來到。



⁹⁸ 山川菊榮，〈社会運動に投ぜんとする若き女性へ〉，收錄於山川菊榮著，鈴木裕子編，《山川菊榮女性解放論集》，第 2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70。

⁹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5。

第二章：島內社會運動中的社會主義萌芽

引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現階段的台灣解放運動有兩條路：一是後退，一是前進。前一條路是引導向**自由主義**妥協的，脫離解放陣營，退到屈服帝國主義，與其妥協，受其保護，與御用紳士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和好，與他們握手變成法西斯主義，最終和帝國主義陣營合體，這是把台灣拉回到十年前大逆不道的大反動道路。後一條是解決群眾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即啟蒙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和小資產者的群眾鬥爭意識，指導日常鬥爭，努力把它組織化，加強群眾運動，促進向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及小資產階級的同盟（集團），走非資本主義的解放道路。這兩派的對立，是為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運動，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爭奪這個主導權的鬥爭，是要走非群眾性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群眾性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分歧點。

——蔣渭水，〈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1930.7.16。¹⁰⁰

一九二零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初次形成並得到發展的時期。此間，台灣人在島內外組建了許多組織。如果組織的延續與否，可以反映組織的重要性或影響力，那末存續時間最長的台灣文化協會也許就是當時最重要、最有影響力者。文協居於島內，是台灣島內第一個群眾組織，¹⁰¹在其形成初期成爲台灣社會運動的主流與主力，以民族主義爲共同底線，¹⁰²支持了以東京爲活動舞台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以文協爲基礎，各種組織陸續從中分化出來；但這種組織的分化，在不同階段具有不

¹⁰⁰ 蔣渭水，〈十年後の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灣新民報》，第322號（1930，台北），18。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197~198。

¹⁰¹ 群眾組織是相對於「指導」型組織而論的，比方島外的東京「新民會」。東京「新民會」雖然出現早於文協、延續時間也長（也達十年），卻是少數台籍菁英的內部團體。因此東京後來才出現以新民會爲「指導」團體，其下另設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即東京台灣青年會。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5。

¹⁰² 台灣總督府編纂之《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爲這些運動「大體上，係以民族自決主義爲基調，組成聯合陣線，持續地集中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見：〈序說〉，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7。

同性質。若將「治警事件」(1923.12)到文協分裂(1927.1)之間的三年視為過渡期，那末，過渡期之前所分化出來的組織(如表 2-1 所列)，多數在未充分的發展的情況下，即因《治安警察法》的逐次打擊而分別瓦解、消沉、或被迫外移，只有文協撐了下來，形成過渡期中的主力。

過渡期之後，文協仍是分化的母體，卻以敵對的姿態發生分裂。以 1927 年的分裂為標誌，蔣渭水所率領的民眾黨退出連溫卿所領導的文協。到了 1929 年，文協內部發生「台共／連溫卿」的對立。1930 年，民眾黨內部則發生「民眾黨(蔣渭水)／自治聯盟」的對立。

過渡期之後的組織分化以顯著的路線對立為其特色，這是過渡期之前所看不見的現象。不過 1930 年的蔣渭水認為，整個一九二零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始終蘊含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兩條路線，蔣渭水稱之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自由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路線，民主主義則代表了非資本主義路線。而蔣渭水將自己在 1930 年所面臨的民眾黨分裂，視為台灣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種前途上的對決點。

其實蔣渭水第一次使用「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概念的時機是 1929 年。當時蔣渭水比較了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1879~1940)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 1888~1938)對於國共分裂的不同見解；其中，布哈林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來描述國共兩條路線的對立。¹⁰³至於蔣渭水運用這個成對概念來分析台灣社會運動，則是 1930 年民眾黨分裂前夕。不過，蔣渭水也不是第一個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概念分析台灣社會運動之人。1928 年，一名叫做「海東」的作者(見南京《中央日報》副刊¹⁰⁴)就曾以完全相同的概念與邏輯，描述了文化協會創立以來所內涵的兩條路線分歧。然而海東眼中的兩條路線對決點，卻是 1927 年的文協分裂。

用什麼概念描述兩條路線(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其實並非重點；關鍵在於兩人都承認兩條路線的存在。雖然兩人對於兩條路線的對決時間(1927 或 1930 年)有不同看法，然而兩人都將過渡期之後的組織分化，視為既有矛盾(即「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激化與延伸。易言之，既有矛盾早在過渡期之前即已存在。如果「海東」與蔣渭水的分析是對的，是否可以認為，過渡期前的組織分化早已蘊含了過渡期之後的路線矛盾，只是環境(如《治安警察法》的打壓)延緩了激化？

從歷史上來看，蔣渭水與連溫卿聯手拉拔、並在過渡期中壯大起來的「無產青年」，可謂考察兩條路線之對立的最好對象。因為無產青年正是幫助連溫卿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重要助力。然而無產青年的出現並非憑空而來。實際上，無產青年是在表 2-1 所列的各組織遭受打擊之後，才浮上檯面(以「台北青年會」的名義)。那末無產青年的出現，是

¹⁰³ 蔣渭水引用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論述，集中於：蔣渭水，〈中國々民黨の歴史(十一)〉，《台灣民報》，第 254 號(1929，台北)，第 10 版。中譯文可見：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540~541。

¹⁰⁴ 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國際事情》，第 18 號，1928 年 5 月 25 日，第 3~4 版；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第 19 號，1928 年 6 月 1 日，第 1~4 版；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第 20 號，1928 年 6 月 8 日，第 3~4 版。

不是也以這些組織為背景呢？表 2-1 所列的「新台灣聯盟」（島內第一個政治結社）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可的島內社會主義組織先驅），就是無產青年崛起的重要背景，也是本章的主要考察對象。

本章的研究有幾項目標，目標之一就是從路線對立的角度，說明 1920 年代島內社會運動的轉折與總趨勢。又由於主要的路線對立出現於 1927 年的文協分裂之後，因此目標之二就是要縮限研究範圍於表 2-1 所列各組織，將研究時段縮限於 1927 年之前（特別是治警事件發生之前），以此揭示當時蘊含於社會運動中的路線對立與社會主義萌芽。目標之三則是要說明當時人（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眼中的左右對立，以及他們眼中的對立如何反映島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總而言之，本章的任務就是從當時人的眼光來為後續章節提供時代背景的說明。而蔣渭水與連溫卿之間的競、合關係，將是主要的研究線索。**

第一節、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

新台灣聯盟是島內最早登記成立的合法政治結社（1922 年），也是持續最久的政治結社（1930 年解散）。然而新台灣聯盟成立沒多久，就因種種狀況而陷入有名無實的狀態。故而「新台灣聯盟」歷來鮮為研究對象。

關於新台灣聯盟結社的原因，歷來說法頗多，且大多是當事人的見解。日後分別居於右、中、左派的葉榮鐘、蔣渭水、連溫卿都曾提出解釋。

葉榮鐘認為，新台灣聯盟是為了解決社會大眾之現實問題，而形成的政治結社。他認為，由於議會請願運動的政治性無法掩蓋、目標又高；而文化協會又以啓蒙為主，不宜拖累。因此極有必要形成一個目標較低的政治結社，以消除「**對於現實的個[別]問題則格[格]於規定無法顧及**」的問題。¹⁰⁵雖然葉榮鐘並未詳加說明「現實的個[別]問題」究竟是什麼，但從運動的內在需要立論，必然是議會請願運動及文化協會的實踐有其不足之處，而這一不足又無法透過更改自身的性質而補強，遂只能另立新性質的組織，以謀發展。

就葉榮鐘在「現實的個[別]問題」所留下的空白而言，連溫卿對於新台灣聯盟成立的解釋，也許恰恰正是最好的補白。連溫卿認為，當時所面臨的兩個現實問題，一個是文化協會所遭受的鎮壓，另一個則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在這兩種內外煎熬的形勢底下，「若無政治團體之存在，則將陷於不能統一大眾之意見的狀態。」¹⁰⁶因此才組成了新台灣聯盟。

連溫卿所講的第一個現實問題，即文協所遭受的鎮壓，實際是指總督府打擊文協及請願運動之「八駿事件」（1922 年 9 月）。在這次事件裡，總督府強迫文協八名領導人（特

¹⁰⁵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407。本段在蔡培火、陳逢源、吳三連所加以改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寫。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355。

¹⁰⁶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80。這是連溫卿在一九五〇年代才完成的著作。但觀點與一九二〇年代的連溫卿沒有太大差異。

別是林獻堂)表態脫離請願運動,震動了以文化為名卻又以政治為實的文化協會。

連溫卿所講的第二個現實問題,則具體地體現於因為蓬萊米改植而激化的佃農爭議。恰恰是這種情勢,構成了台灣社會運動的背景:¹⁰⁷

在被壓迫地位的台灣,有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僅僅在歐戰後數年間而已。……

然自歐戰以後,貧富的懸隔益甚,一般之工人、農民的生活已極了生活線下。若中南部之農民,在這時候雖沒有具體的運動出現,然而一般形勢,卻是屬於不穩,而「業佃協調會」之組織已在這時候出現了。這是大正七年——一一年間之概觀,自是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亦漸形具體的型態,而為其對象當局的一個「妖怪」了。

108

……

大正十二年在不景況底下的台灣經濟界、因為內地種米的耕作成功,而農民爭議發生了。這是欲更換從來租谷[穀]的標準為高價的內地種米,究竟都未見衝突,而即折衷解決,……¹⁰⁹

連溫卿所提出的兩大現實問題,並非人人都能有同樣的看法。以蔣渭水來說,他只注意到第一個現實問題,甚至認為,就是在「八駿事件」的惡劣形勢下,他才「更加一層的決心去做事」,並由此成立了新台灣聯盟。¹¹⁰對於蔣渭水的見解,連溫卿謂之「蔣渭水之主觀意見」,¹¹¹也許他是就蔣渭水突出個人「決心」並孤立看待八駿事件之影響而論的。此外,雖然兩人都肯定八駿事件的影響,但細緻的看法——特別是對林獻堂的態度——卻是不同的。蔣渭水始終沒有譴責林獻堂在八駿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然而連溫卿卻直稱林獻堂等人是同日本人「野合」的「土著資產階級」。¹¹²

連溫卿所提出的兩大現實問題,可以歸結為外在環境對於運動所提出的挑戰。對於蔣渭水而言,外在的挑戰顯然只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鎮壓。然而連溫卿卻更見到台灣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這是就算八駿事件沒有發生,運動本身也必須面對的問題。而當運動必須將這些問題作為自己的問題來解決時,運動本身的既有訴求,是否足以解決它們?

¹⁰⁷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927,東京),12。

¹⁰⁸ 這種筆法,頗有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為開端之《共產黨宣言》的遺風。

¹⁰⁹ 在農民爭議之外,連溫卿緊接著便談到工人的罷工鬥爭,「而工人方面,則有印刷工三百二十名的大罷業,自[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三日互相對峙,卒見成功。」但因此事發生於新台灣聯盟成立之後,故先略去。

¹¹⁰ 蔣渭水認為:「到了十一年,什麼犬羊禍[八駿事件]出現了,任三爺[林獻堂]被困在犬羊城裡。形勢太壞了,我以為非更加一層的決心去做事不可了。遂組織新台灣聯盟,這是本島政治結社的嚆矢,且是全島唯一無二的政治結社。後來因為事多人少不能彼此兼顧,致使這個政治結社全沒有活動的機會,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事啊!總是今日同志已大昌盛了,後來定有活動這個政社的時期。這發會式的宣言書,以出版法違反,被罰去二十金。」見:蔣渭水·雪谷,〈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第67號(1925,東京),45。

¹¹¹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2。

¹¹² 連溫卿云:「土著資產階級與支配階級之此種野合[八駿事件],終於刺激了民族主義者在台北組織政治結社。」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2。

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興的社會主義傾向被視為新台灣聯盟所具有的特色。實際上，《台灣社會運動史》也把新台灣聯盟視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團體，不過《台灣社會運動史》是從聯盟**無法擴大活動的原因**來理解這種傾向。《台灣社會運動史》分析了幾種原因：首先是請願運動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得到強化。其次是「社會主義傾向」尚不成熟於當時的台灣。其三是「姐妹團體」社會問題研究會遭受打擊。¹¹³雖然《台灣社會運動史》並未明言新台灣聯盟為什麼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但從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兩種路線的對立來把握新台灣聯盟之衰亡，卻是銳利之切入點。

還有一則傳聞可以佐證聯盟的社會主義傾向。連溫卿曾云：¹¹⁴

台灣諸運動的中心，[據]說是間接的[地]由中國方面渡來，新台灣聯盟成立當時，有說是廣東「新青年」的影響。因為這樣緣故，和在中國人們書信的往復，一一皆要抄錄發信受信的氏名住所去報告，……

所謂的「廣東新青年」，應該就是已將編輯部遷往廣州、並在中共直接影響之下的《新青年》雜誌。¹¹⁵雖然《新青年》對新台灣聯盟乃至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不容易估計。但至少說明了新台灣聯盟之社會主義傾向的可能來源。當時有一位叫做黃逢霖（亞光，1901~1993）的學生，從台北寫信給曾為《新青年》同人的胡適（適之，1891~1962）云：

116

我自從會讀報章以來，和我做過精神上鼓勵切磨的好朋友的，可算是《新青年》，但是它短命中絕了，到本年[1923年]十月我才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圖書室裏重複遇見它，書面上現出一種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精神來，使我一腔愛護它的熱誠重複發現出來，以為有遠超現代的精神革命出版物做我們青年人的指導，本著奮鬥的精神，向我們黑暗無光、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努力！奮鬥！

黃逢霖是在台的大陸留學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陸續在中共以及中華蘇維埃擔任不少重要職務。從他的信件來看，《新青年》在臺灣並非難以取得。而他所讀到的「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之《新青年》，則是在瞿秋白（1899~1935）

¹¹³ 「依照規約，新台灣聯盟的目的，在於『基於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共存共榮的原理，研究在台灣所反映的事實，必要時隨時發表演講為目的。』於是，屢次集合會員，研議有關政治問題。」「在當時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陣營，新台灣聯盟上述的結成原委，雖是相當進步的特異存在，但因時值一般人對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期待升高，輿論的動向也多支持，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傾向在本島當時的狀況下顯然尚未成熟，而可算是姐妹團體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又惹出了違反出版規則事件，乃陷於自然消滅的狀態，當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計畫形成，終於陷入有名無實的存在。」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9。

¹¹⁴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九十七回。〈蠹魚的旅行日記〉的史料解題詳見本文最後一章：〈餘波：「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¹¹⁵ 關於《新青年》的詳細介紹，可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1978），28~29。

¹¹⁶ 〈黃逢霖致胡適（1923.11.17）〉，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0），220。

指導下改組為季刊形式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1923.6.15 發行第 1 期「共產國際號」）。其實，當《新青年》從內容到封面設計都「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的時候，胡適就已對《新青年》路線頗表不快。¹¹⁷此時直接在封面繪上「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新青年》，則已完全同胡適無關。因此，黃逢霖給胡適的信，無疑是錯愛。但這封信卻也生動地為連溫卿所獲知的《新青年》傳聞作下註腳，同時說明了這份刊物的影響力。

此外，連溫卿還從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對立來看待新台灣聯盟的衰亡。

首先，連溫卿所撰寫的〈新台灣聯盟宣言書〉實已暗示了聯盟的對抗性質。〈宣言書〉指出，歐戰以來，幾千年的「特殊階級」頓失權威，平民則崛起於「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的潮流之中。面對這一潮流，有人想要逆勢而行。新台灣聯盟的成立，就是為與反潮流者對抗而組織的「研究」團體，除此之外，「夫豈有他意也哉」。¹¹⁸

這份〈宣言書〉著意強調自身的「研究」性質，甚至還強調除此之外別無用意。只從這裡來看，根本不可能猜到聯盟竟是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也許這種定位不清的性質，正是新台灣聯盟無法順利運作的原因。但若考慮到以文化為名而有政治之實的文化協會，竟能以同樣定位不清的性質持續運作，就不得不推測新台灣聯盟恐怕具有反潮流者所不能接受的性質。這些反潮流者，連溫卿稱之為「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

連溫卿認為，由於蓬萊米移植與業佃爭議在一戰之後萌發，導致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這種背景促使新台灣聯盟得以形成，卻也促使其消亡。連溫卿認為，由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無法面對經濟矛盾的激化，「恐其波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置之而不顧」，乾脆架空新台灣聯盟。「新台灣聯盟之成立終引起治安警察法之實施，與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之結成，此為民族主義者對於政治運動之見解，開始醞釀分歧的端緒。」¹¹⁹「因此，該聯盟雖不致夭折，亦等於無。而聯盟的構成分子欲利用此機會另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¹²⁰居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陣營的葉榮鐘評論云：

121

但實踐上似乎不無鞭長莫及的困難。……可惜這個臺灣第一號的政治結社，結局

¹¹⁷ 「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是胡適的話。已往的研究都不知道這句話是指《新青年》在內容上大量翻譯出版於紐約的 *Soviet Russia* 雜誌。相關討論與考證，可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40-45。

¹¹⁸ 〈新台灣聯盟宣言書〉：「過去數千年來。於政治社會經濟上之所謂特殊階級。因歐戰之影響。剝脫其假面。頓失其權威。一面如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等之思潮。有非使人人覺醒歸於平等自由不止之勢。磅礴汎瀾[泛濫]浸潤生殼。換著表象熱烈正義之自由衣。乘希望之風。而突進於煌煌烈烈世界最高之理想之時也。然其間多有橫行無視此崇高純真之思想者。急於維持自己之地盤。動輒蒙蔽人類之聰明。攪亂人類所欲進之前途。當此之時。使猶趨趨遑遑。日復一日。實非吾人之自棄而甘於退步歟。奚是吾人不揣僭越。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計。組織新台灣聯盟。而以嚴肅態度為之研究已耳。夫豈有他意也哉。」見：〈新台灣聯盟宣言書〉，《台灣》，第3年第9號（1922，東京），40。

¹¹⁹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1。

¹²⁰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

¹²¹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407。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動。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338。

就因為上述的原因，無法展開活動。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倘若新台灣聯盟是以自我的被架空，預示了台灣社會運動所內含的左右分歧；那麼1923年所公開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也許即可視為社會主義路線表面化、並使「研究」與政治結社相分離的象徵。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見解裡，「社會問題研究會」正是島內社會主義路線之濫觴。

多數與新台灣聯盟有關的史料都把社會問題研究會視為「姐妹團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自然消滅，是打擊新台灣聯盟的因素之一。¹²²連溫卿則認為，由於新台灣聯盟遭受打擊，才促使聯盟成員藉機另立「社會問題研究會」。¹²³無論因果為何，這兩個團體確實存在著「姐妹團體」的姿態。

《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是連溫卿與蔣渭水分別受到日本及中國的社會運動影響而發生的產物：¹²⁴

在東京，新民會的結成、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以及接著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等本島社會運動的勃興真令人眩目。

如此，這些運動雖然在民族自決主義下以大致成功的統一戰線發展下來，但是，在東京及支那各地的諸思想運動也逐漸影響本島人。糾集在接受共產主義者山川均指導的連溫卿，與在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影響下的蔣渭水等麾下的青年同志，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性表示灰心，早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七月，即結成台灣社會問題研究會，……

《台灣社會運動史》並認為，研究會是連溫卿與謝文達（1901~1983，台灣第一個飛行家）合作的成果，並以此進一步煽動了青年群眾，為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準備：¹²⁵

此時，居住台北市的連溫卿與山川均取得連絡，並與島內左翼思想家及居住長春之共產主義者謝文達一起，結成社會問題研究會，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以此對其指導下的青年加以宣傳、煽動，對於當時的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戰線，逐漸地釀成了無產階級運動抬頭的機運。

不過，社會問題研究會並不是1923年下半年才形成的團體。實際上，它是以「馬克斯

¹²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9。

¹²³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

¹²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6~7。

¹²⁵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4。

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會)¹²⁶為基礎而形成的組織。¹²⁷因此社會問題研究會於1923年的「成立」其實是「公開」。而且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反映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而誕生的組織：¹²⁸

其間，台灣曾因蓬萊種米之改植成功，發生小作料(佃租)之換算的爭議，這種爭執蔓延各地。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之「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在這經濟狀態下誕生出來的，這未公開出現以前是個研究會，每星期開會一次，會員中亦有日本人參加，其目的是「立腳於近世科學，基于一定社會條件而研究之」。其趣旨如左錄，發起人是謝文達、蔣渭水、連溫卿，趣旨書是後者擬的，辦事處在永樂町五丁目連家。

文中所謂的日本人，就是將日本社會主義引入台灣的山口小靜(1900?~1923)。故連溫卿又云：¹²⁹

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同人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另外有一位日本人，即山口小靜。

2. 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如本文第一章所介紹，山口小靜的出身背景很特別。她是一個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父親山口透則是台灣神社的宮司。出身可謂高貴了。自幼獨立思考的小靜，高中畢業後即返回日本學習，結識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山川均與山川菊榮。她加入了「赤瀾會」(婦女解放組織)、「水曜會」，積極地參與運動，甚至為此慘遭退學。後來，為了療養長年積累的肺病，小靜遂於1921年10月返台，並與連溫卿等人接觸。「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¹³⁰

小靜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住院。¹³¹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社會主義者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而與她的高中校友

¹²⁶ 關於「マルクス研究會」的詳情，可見本文第一章。「『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所明確提及者，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馬克思」替代「馬克斯」。見：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2。

¹²⁷ 「一方面在台灣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即有「馬克斯研究會」的組織，而為大正十二年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之先驅，然皆沒長命存立於世至今。」見：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2。

¹²⁸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1954，台北)，71。

¹²⁹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2。

¹³⁰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1972)，350~351。

¹³¹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1。

們於 1922 年 9 月 22、23 日舉辦賑災音樂會。這是台灣史上首次舉辦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與此同時，小靜與「馬克斯讀書會」的同人也在台日兩地的文獻傳遞之中展開了《共產黨宣言》的讀書會。讀書會曾因警察扣留來往於兩地的書信而招致恐嚇，除此之外，「馬克斯研究會」的詳情並不清楚。

當時正在「改造社」出版社工作的琉球社會主義者比嘉春潮（1883~1977）回憶：¹³²

為了我至東京而作各種聯繫、並為我的就業進行周全準備的饒平名智太郎與仲宗根源和二位，在當時已與堺利彥、山川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作為核心，牽連於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秘密結成，並是其中的重要成員。組織的組成本來就於極機密之下進行，當時在外圍的我無從知悉詳情，縱使知道一些，以認同者的立場做進一步的探究，總是不禮貌的事。

……雖與山川夫婦是初見面，但我在沖繩的時候，便經由通信而與台灣的獨立運動家 R 氏[連溫卿]、山川夫婦有著友好聯繫，從而才可能透過運動而在 R 氏、山川，以及我之間建立特殊的關係。

……她[山川菊榮]的學生有作為法官¹³³的女兒卻投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山口小靜這位女性。她在台灣支持社會主義者的獨立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就是爭取臺灣人之政治利益的運動。大約是大正四、五年前後，¹³⁴其中的運動同志之一便經由她而得以連繫上山川均，並且請教了運動的理論指導。

……當時長谷川如是閑他們的《我等》雜誌刊出了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世界語手記〈盲學校生活的一頁〉一則譯文。我認為這是一篇優秀而且動人的文章，所以從他們的編輯部取得原文，油印送給沖繩的世界語學者與其他各處。台北的世界語學會也收到了，由此我才同山川均先生有來往的 R 氏有密切的交往。山川先生不只指導台灣的運動，也常常將自己的著書版稅投入，作為資金援助。以後各種的聯繫與匯款都由我經手，那時對於警察而言仍是無名小卒的我，比起知名度高的山川均先生來說，做起事來比較安全。

1923 年初，全台陷入日本皇太子裕仁訪台的風潮之中。身為全台地位最高的宮司，小靜的父親熱烈地期待裕仁的到來。小靜雖然臥病在床，卻以最後的行動繼續反叛父親。1923 年 3 月，就在裕仁抵台前夕，小靜便因肺病而逝世於台北。也許正因小靜早逝，《台灣社會運動史》才沒有將小靜視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成員。與此相反，卻多了蔡式穀（1884~1976）。然而連溫卿始終否認此事，並強調「彼並未參加。」¹³⁵只是，假使蔡式穀並未參加，何以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旨趣書¹³⁶仍列之為同人？此則不可解之處，也是連溫卿沒講清楚的問題。

¹³² 比嘉春潮，《沖繩の歲月——自傳的回想から》（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102~104。

¹³³ 此處有誤，應為神官。

¹³⁴ 此處有誤，「大正四、五年」時，小靜才十五、六歲，尚未赴日認識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

¹³⁵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

¹³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7~248。蔡式穀即列名其中。

不過，若先撇開長期在島外從事飛行事業的謝文達¹³⁷不提，**餘下的蔣、石、蔡、連四人，實即依次為表 2-1 所列之四團體的核心幹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也許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組織脈絡下的、由核心幹部所組成的、並以「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為主的理論研究團體。

為了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他們印刷了五百份旨趣書散發於島內，卻因此而觸犯了總督府當局的出版法規，「趣意書的發表，又被罰了四十金。」¹³⁸但問題並不只是罰錢，而是會亡人散，「石煥長、蔡式毅等逐漸與連溫卿、蔣渭水的思想傾向迥異，事實上研究會已趨於消滅。」¹³⁹

謝文達與石煥長日後的主要活動地，並不在台灣。至於蔡式毅、蔣渭水、連溫卿，則由右而左步向殊途；分別在 1927 年文協分裂之後，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右派）、台灣民眾黨（中間偏左），以及新台灣文化協會（左派）的核心領導。就此來看，曇花一現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或者正是文協及其後續發展的縮影與預示。

3. 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

與〈新台灣聯盟宣言書〉相較，同樣是連溫卿所起草之〈社會問題研究會趣意書〉明確宣示研究會成立於「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如佃農爭議）之下：¹⁴⁰

最近我輩同人鑑於新店發生之小作[佃農]爭議與南部地主小作人協調會之創立，而依照趣旨及綱領組織，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

人類無一人不被社會束縛、暗示，是故有感於社會之缺陷者，相信以其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為對象，而謀求解決。但其所求解決為何？此為吾人所欲知之處，又為組織本會之所以也。

¹³⁷ 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而加入「社會問題研究會」，尚不清楚。但他當時確實具有左傾思想。他在 1923 年 5 月住進長春的病院之後，便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退出飛行事業、登報言之，大有挑戰栽培他的日本當局之意。同年底，謝轉赴日本，12 月 3 日拜訪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16 日正式入社參與編輯；直到 1924 年 5 月 25 日才「退社回長春」。以上資料分見：〈謝氏罷飛行業〉，《台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2 日，第 6 版；〈謝文達君飛行界から隱退・今後は無產者の分相應な・工場の一職工一運轉手として働くと〉，《台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2 日，第 7 版；〈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 13 號（1923，東京），10；〈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 號（1924，東京），17；〈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0 號（1924，東京），15。

¹³⁸ 蔣渭水·雪谷，〈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第 67 號（1925，東京），45。

¹³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4~5。

¹⁴⁰ 這份文獻的中文版由連溫卿所自譯。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122。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相關文獻，《台灣社會運動史》分別在「文化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兩章收錄其旨趣書。但「文化運動」章多收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規約」。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4~248；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4~5。

不但直言歌頌俄羅斯十月革命：

人類有二大歷史時代，即由法蘭西及俄羅斯所表現之革命也。一切古舊傳統主義者及保守主義者因固執頑迷之宿命，對既已突破歷史時代革新期而到之新人類，愚蠢地以嗤笑、罵詈及威嚇欲將瞞著看過。

更質疑當前的社會型態（暗指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恆性：

希望較高幸福生活之人類意識的，果能視為一時之現象乎？受一定生產條件影響之社會果能永久保持其永續性與調和性乎？

看！將要踢破社會制度軀殼之所有問題，如勞資問題與小作爭議，在所謂武陵桃源之台灣已舉起狼火矣，此教示人類如何，乃我輩同人所欲研究也。

因此他們決定「立腳於近代科學，基於一定社會條件以研究之。」

也許恰恰是上述鮮明的左傾訴求，才使社會問題研究會成爲一個「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所不能接受」、「一般人缺乏理解」，從而「任憑支配階級之謾罵惡言」的組織。但連溫卿認爲，「社會問題研究會雖被彈壓，但其影響所及，決[絕]不能謂之甚少。蓋在其主張過程中，無意識所喚起的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民族意識，已如燎原之火，由台灣之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之少數分子，乃至於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即其反映。」

141

連溫卿不但把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影響說得非常巨大，他甚至認爲，新台灣聯盟的成立是《治安警察法》在台實施的導火線。¹⁴²然而，無論是新台灣聯盟或社會問題研究會，均未受到《治安警察法》的直接打擊。反而議會請願運動接連遭遇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台北的被禁止，以及檢舉請願運動者的治警事件。

從文協成立至治警事件，請願運動匯集了島內外最多的力量並遭遇了最大的打擊。此間，社會主義路線也在島內萌芽起來，只是萌芽未能長成樹。但如魯迅所云，「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關鍵並不在於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火種滅絕，而是刺激這些組織產生的打火石何在。這裡的打火石至少有二，首先是全世界自十月革命以來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從島外的蘇聯、日本、中國大陸源源不絕地敲擊台灣；其次則是連溫卿所觀察到的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蓬萊米改植，佃農爭議增多）。在這種形勢之下，階級矛盾在民族矛盾之外而逐漸激化。

山口小靜還活著的時候，曾對連溫卿說，「諸君先爲民族戰爭來戰鬥以前，一定要先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¹⁴³在「民族戰爭」之前所應先「得到」的「解放」是什麼？也許小靜是指「階級」上的解放吧。然而台灣社會運動的水平卻處於一種低度的狀態，無法上升到小靜所言的層次。連溫卿曾對山川菊榮說，「總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雖然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桃

¹⁴¹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2~123。

¹⁴²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1；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71。

¹⁴³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49。

色]的。」¹⁴⁴但要如何使旗幟的顏色轉為赤紅，如何使階級旗幟打出來呢？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誕生，也許正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初步回答。

總之，雖然社會問題研究會並非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母體、雖然它是島內核心幹部在文協左右分裂前的最後集結，卻不等於社會主義運動在島內的中絕。而當連溫卿試圖透過「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以解釋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時，或許可以把從中成立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理解為「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¹⁴⁵的社會主義組織吧。

第三節、時代問題：資本主義化

1. 蠹魚的旅行日記：連溫卿與山川均·菊榮夫婦的首次會面

1923 年底的治警事件之後，只剩文化協會保存下來，堅持進行著面向群眾的文化啓蒙工作。特別在台北，自 1923 年開始分別進行「短期講習會」¹⁴⁶以及「通俗學術土曜講座」¹⁴⁷。前者後來遭到禁止，¹⁴⁸後者則在台北「港町」堅持進行到了 1924 年。在「通俗學術土曜講座」中，蔣渭水演講次數最多（九次），其次則是連溫卿（八次），¹⁴⁹而且還曾遭到臨監警官的中止。¹⁵⁰連溫卿指出，就動員力來看，「每回聽眾平均以五百名計算，已

¹⁴⁴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3~354。

¹⁴⁵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1、739。

¹⁴⁶ 首回：1923 年 9 月 11 日。

¹⁴⁷ 首回：1923 年 12 月 8 日，土曜即週六。

¹⁴⁸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6。

¹⁴⁹ 在將近十個月、共計舉行四十四回六十四次的「通俗學術土曜講座」中，連溫卿便講了八次，僅次於蔣渭水的九次，而與林野並列第二。（據連溫卿所言，是「四十四回六十一」次，但同樣根據連溫卿所表列的各回各次講題來計算，卻應該是四十四回六十四次。連溫卿的計算法甚不可解，故此處改以六十四次記之。）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6~73。連溫卿所主講的場次如下：第三回（1923 年 12 月 22 日）：二重生活。第六回（1924 年 1 月 12 日）：烏托邦。第十回（1924 年 2 月 9 日）：生活之意義。第十四回（1924 年 3 月 8 日）：道德之進化。第十五回（1924 年 3 月 11 日，臨時）：道德之進化（續前）。第二十回（1924 年 4 月 12 日）：原始時代婦人之地位。第廿七回（1924 年 5 月 30 日，臨時）：內地旅行談。第卅九回（1924 年 8 月 16 日）：將來的台灣話。以上分見：〈文協消息〉，《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2 號（1924，東京），3~4；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6~73。

¹⁵⁰ 連溫卿的講演曾遭中止。在 1924 年 3 月 11 日臨時舉行的第十五回講演，「道德之進化（續前）」中，因為「連溫卿氏演說道德之進化，說到灣妻與台灣所云牽手之正比例」（《台灣民報》的說法），涉有「汙辱[日本]內地的女性之言辭」（這是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的說法），遂遭臨監的松崎警部「中止解散」這場聚滿二百多人的講演會。這場講演的具體內容與現場狀況，由《台灣》雜誌

動員二萬二千人。」若就演講主題來看，則「以社會問題方面之講演為最多，幾乎及半，佔三十次之多，以民族問題，勞動問題及文學方面最少，祇各一次而已。」¹⁵¹

在連溫卿的八次演講中，只有一次屬於非學術性的心得報告會，即 1924 年 5 月 30 日臨時舉行的第廿七回講演——「內地旅行談」，這是他赴日本旅行的心得報告會。1924 年 4 月底至 5 月中旬，連溫卿首次踏上日本進行考察訪問。這是連溫卿第一次離開台灣的土地、爲了追尋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聯繫而展開的一場旅行。《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載，是多數研究所引用的說明：¹⁵²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連溫卿為參加世界語學會而上東京時，因有上述緣故乃寄宿於山川家裡，其後，結成密切關係，連溫卿接受山川均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對山川屢次提供有關台灣之諸情況及調查資料。

其實，連溫卿於 1924 年赴日期間的經歷並非毫無遺存。他在旅行中撰寫了日記，並與他的其他遺稿收存在其友人比嘉春潮手中。比嘉春潮後來將這些遺稿轉交給戴國輝（1931~2001）。其中有不少史料已經校訂發表，甚至有中譯本或中文版可供參照。然而直接記載連溫卿於 1924 年訪日期間的史料——〈蠹魚的旅行日記〉——卻尚未「重新」公開發表。

連溫卿在〈蠹魚的旅行日記〉中寫道，他想去東京的原因，首先是他早先幾年就希望能去東京「研究東西洋文物的志向」。後來又因殖民地問題成爲日本媒體的熱點，遂有某報社找上他來負責殖民地問題，才又下定決心赴東京。¹⁵³但是，1923 年的山口小靜的驟逝以及東京震災，又大大地打擊了他。¹⁵⁴最後才因他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同志、飛行家「S 君」（即謝文達）的慫恿，才最終下了決心。於是，1924 年 4 月 26 日，連溫卿從基隆港搭船前往日本「內地」——「這算是蠹魚旅行的第一幕，由此展開起來了。」¹⁵⁵

連溫卿將這場旅行視爲一次在已然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日本內地——所進行的考察。倘若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比擬爲「書庫」、而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程度已屆「臭濕」，那末連溫卿便是在臭濕之中誕生的「蠹魚」。並非「蠹魚欲討亂地方」，而是蠹魚總是「拿這個臭濕充滿的地方來做書庫的」，所以他要向最爲臭濕的日本內地而去。¹⁵⁶

社的記者詳細地報導於同年 5 月 10 日出版的《台灣》雜誌上。以上分見：〈台灣通信〉，《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5 號（1924，東京），11；〈文化協會の講演會解散・連溫卿の講演最中に〉，《台灣日日新報》，1924 年 3 月 12 日，第 7 版。講演者連溫卿，〈道德の進化〉，《台灣》，第 5 年第 2 號（1924，東京），61~64。

¹⁵¹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6~73。

¹⁵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4~245。

¹⁵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回。

¹⁵⁴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回。

¹⁵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五回。

¹⁵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回。

此外，這還是一場始終在警方彈壓下進行的旅行。如連溫卿所言，「保守者亦[或]改良家，都用種種方法去阻止他們的工作，如蠹魚這番的旅行，可算是一個例。」由於日本警察始終光明正大地「尾行」在他身邊監視著，因此連溫卿與警察間的相處，幾乎構成了旅行全過程中的主要部份。¹⁵⁷

但即便有著虎視眈眈的警察「尾行」著他，他仍參加了令他動魄驚魂的五一勞動節遊行，甚至參與了中國留學生的「五·九」國恥遊行。此外，在謝文達以及比嘉春潮等人的協助下，他也陸續拜會了當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領導人物，比方堺利彥、堺真柄（堺利彥女兒）、仲宗根源和、仲宗根貞代（源和妻），而且還包括了許多迄今仍無法考證的人物（比方「S·R 夫人」、「K 氏」、「K 君」）。由於警察跟監不捨，讓他很想早日回台。卻因日本世界語學會的邀請演講，而延長了旅行時間。但也恰恰是在這個延長了的旅行時間中，在謝文達等人的協助下，他戲劇性地在火車站掉包車票，擺脫了警察的追蹤。行進於微雨中的夜行火車，引領連溫卿與山川均、山川菊榮夫婦順利見面；他們一起討論了台灣的狀況，也回憶起小靜的死。最後，他心滿意足地返回台灣。

雖然山川均或堺利彥等日共創黨領導人後來紛紛與日本共產黨決裂。但在日共創黨初期，這些領導人本身就代表著日本共產黨。因此連溫卿與山川均等人的接觸，不能脫離日共的組織運動脈絡去理解。自台共成立以來迄今，一直存在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山川均代表著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而連溫卿私淑山川均所指導的路線，因此連溫卿就是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之代表。這種看法尚待更細緻的研究來檢討，但其結論無論如何恐怕過於簡單。連溫卿與五一節隊伍的相遇，就能從迄今少有人注意到的另外兩個方面體現這種複雜性：一方面是共產主義（以布爾什維主義為代表，當時的山川均即此路線）、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¹⁵⁸

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都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¹⁵⁹[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働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働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

連溫卿對於無政府主義「黑旗」的感動，體現了他的傾向。雖然證明這種傾向的史料還有不少，¹⁶⁰以下篇幅卻將集中討論連溫卿對於日本與台灣兩地「資本主義化」的觀察。就連

¹⁵⁷ 當時的《台灣民報》諷刺那些跟監的警察云：「台灣世界語學會幹事台北連溫卿君，五月一日抵東京遊覽，宿於本社，據連君云，自神戶至東京車中尾行刑事一路護衛，至東京間連換十三個，及至東京驛又有東京的刑事迎接，幫帶行李至本社[。]其後日日有人引導，連君之東京此回初次，人地兩疎[，]有人如此日日跟隨，甚是利便滿足，蓋台灣人中，受此待遇的，實以連君為嚆矢了。」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924，東京），16。

¹⁵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六回。

¹⁵⁹ 「步武」：日語漢字詞。

¹⁶⁰ 連溫卿思想的複雜性，還可從他始終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且未曾斷絕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而見端倪。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旅台期間，曾與連溫卿有密切來往；

溫卿把「資本主義化」當成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而言，恰恰是其共產主義這一政治面貌的最佳體現。

2. 連溫卿對於資本主義的觀察

(1) 資本主義在日本：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的交雜

從連溫卿踏上日本本土開始便不懈地觀察日本的資本主義。在火車上，窗外是一片彷彿台灣蕃社的風景；與此同時，車上卻有人賣著氣球、氣枕之類的工業製品。他感覺，日本文明只表現在都市，鄉村是沒有的。這種城鄉差異不但表現在車廂內，更存在於東京這樣的大都市，「不覺將那『大都市就是這樣』的感想幻滅過去」。他認為東京雖已急劇地資本主義化，但從路上仍有大量獸力馱運的交通工具來看，恰恰反映了非資本主義的殘餘。

161

連溫卿抵達日本的時間，正是關東震災後不久。因此震災所造成的影響成爲他考察日本資本主義的切入點。在連溫卿的這次旅行裡，舉目所見，常是震災之後臨時用「白鐵釘成的」廠舍。這類白鐵廠舍據說是「東京市內第一不潔的，又小又不高，又建築的材料大半也是舊的。」不但大型公園（如：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芝公園）之內佔滿白鐵廠舍，就連他的好友比嘉春潮所任職的「改造社」也是棟白鐵屋。比嘉向他說，「當立在愛巖山上的時候，東京市的全景可綜合在眼下，廠舍的所在一目瞭然，若適那日的天氣很好，日光在那白鐵的屋頂照耀，眩然幾欲刺目。」¹⁶²

與白鐵廠舍相適應的現象，還有文盲的大量存在。東京市內外處處可見「手紙（一讀疊嘎密）喀圭麻斯（譯音）」（能寫書信）的招牌，「這現象可以證明在這地方一定有自己不能寫信的人很多，所以有這個招牌的存在。」雖然日本號稱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兒童就學率，卻仍存在此一現象，「益增我對日本產業發達和國民教育的疑念。」他認為，只有針對勞動者進行教育才能解決這一問題。¹⁶³

然對當時的日本勞動者來說，除了克服失學問題之外，最大的威脅實是失業，「在資本主義社會，可算是個致命的問題了。」在連溫卿叫監視他的刑事帶他遊覽芝公園的場合

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台之後，亦曾為連溫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裡，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溫卿（且只有此二人）並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啟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了。見：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1974），157~159；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1~2；若林正丈，〈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1號（1978，東京），165。

¹⁶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二十五、七十七、七十八回。

¹⁶²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四十五、四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回。

¹⁶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五、七十八回。

裡，不但四處可見白鐵廠舍，更在公園內見到大量的失業勞動者，這也是震災後愈發顯著的現象。京都博覽會所展售的「還壯餅（即不老餅）」，也令他聯想到失業問題，「若人們食著那塊餅，年老就能變個年少的。那末，失業的人越生越多，像這社會怎麼有了法子，去解決那問題呢。」¹⁶⁴

失業問題也直接聯繫到當地台灣籍勞動者的處境。由於震災後的重建工作需要人手，許多台灣人便被招募至東京工作。然而此時的日本已有大量的失業人口，這就導致台灣籍的勞動者時常處於失業邊緣、並遭不合理的工作待遇，「若數日間為雨天繼續沒有工作的時候，那日人就要逐出他們的樣子，不但不給與他們三食，輒以瑣事摧辱他們，而他們又不解日語，欲和他們理論自然是不能的，不得已來訪問雜誌社[《台灣》雜誌社]以求解決。」他並認為，失業問題不只存在於資本主義日本之內。從震災與失業人口問題延伸，美國排日法案的通過，也反映了人口與產業之間的問題。¹⁶⁵

從〈蠹魚的旅行日記〉來看，連溫卿最重視人口、民族，以及產業這三大矛盾。撇開連溫卿的實地考察不提，僅就〈日記〉本身來說，他便花了七回（第51回至第57回）的篇幅，大段大段地翻譯了眾議院議員阪上的相關言論。而就連溫卿自己的觀點來看，產業矛盾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實是人口矛盾或民族矛盾的根據，也才是國際間不和平的根本原因。¹⁶⁶

總的來看，連溫卿眼中的日本全無好處——空氣、道路、甚至公園，都不見得比台灣好；他也常常將這些不好連繫於資本主義。甚至就「讓座」這一行為來說，他在東京也只看到人們爭先恐後；反而台灣人比較會讓坐。他認為，「民族性與動物性是相同的」，所以「愈獨立的民族，排他性是愈濃厚」。日本人之所以在震災中屠殺朝鮮人，正是震災「誘出六十年前之排他性，如野獸一樣的本能。」¹⁶⁷

（2）資本主義在日本與台灣的共同體現：娼妓問題與「不良少年少女」

或許是受到山口小靜的影響，旅行中的連溫卿，特別注意日本的性別問題、婦女問題。一路上，連溫卿也與不少女性有著饒富趣味的對談。而連溫卿筆下所記述的這些女性（即便是妓女），個個色彩鮮明、英姿颯爽、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¹⁶⁸

娼妓是連溫卿旅途中所著意觀察的現象。他特別注意了東京當地的娼寮。他認為，娼妓實與私有制及資本主義有深刻關係，「若現在的資本主義！！私產制度不能革除，那末，任憑有甚麼救濟他們的方法，也不過是在社會政策範圍內而已，決[絕]不是解革社會的根本。」飛行家謝文達曾向連溫卿說，「賣淫者的生活可說是個時代的產物，和那詐譎，欺

¹⁶⁴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二十七、二十八、六十七回。

¹⁶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五十、五十一回。

¹⁶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五十七回。

¹⁶⁷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九、八十、一百零一回。

¹⁶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一、十二、二十、六十三、八十九、九十四。

騙是相比比例的。」但連溫卿更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人們說那是賣淫生活，蓋譏其生活態度和賣淫者的生活態度是一樣的。」在臺灣，私娼年年增多，其中甚至包括許多女學生；這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淪落。

但除了娼妓，連溫卿認為，資本主義還產生了「不良少年少女」，¹⁶⁹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在臺灣城市化地區的發展。後來連溫卿就此問題而分別撰寫〈不良少年少女研究〉(1925年)、〈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續)〉(1925年)、〈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1954年)等文章討論。連溫卿指出，由日本人稻垣藤兵衛所主辦的「人類之家、稻江義塾」，就是針對「不良少年少女」而創設的社會救助機構。

連溫卿對於「不良少年少女」的關心，可以同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在1920年發生的一次論戰相比較。論戰起於謝晉青，論戰集中討論「浮盪少年」是否假藉「自由戀愛」之名欺侮婦女，並討論這一現象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¹⁷⁰然而連溫卿的論述與「覺悟」副刊上的論戰內容仍有差異。連溫卿則關注「不良少年少女」如何產生於資本主義之下，並將這一現象與社會進化聯繫起來。他認為，不良少年少女是在資本主義的「生存競爭」中，遭遇挫敗而矢志墮落的「意志薄弱的人們」，「現在的社會愈發達，而這不良少年少女便愈生愈多。」¹⁷¹不過「不良少年少女」只是連溫卿思考社會進化問題的一個體現，實際上，他所關心的範圍包括整個社會進化史本身。

(3) 階級鬥爭、進化論，與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

連溫卿對於社會進化史的興趣，具體體現在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其實連溫卿正是臺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¹⁷²但他對於社會進化的抽象理論也有興趣。連溫卿清楚區別了達爾文

¹⁶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二、四十三、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四、九十六回。

¹⁷⁰ 1920年8月，旅日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在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發表〈不良的少男少女〉一文；同月，陳望道（首位將《共產黨宣言》全文漢譯者、中共早期黨員，曾脫黨）以「佛突」為名，發表〈婦女解放和浮盪少年〉一文，從而激起長達數月（至1921年5月仍在討論）的論戰。與論者包括沈玄廬（筆名「玄廬」，中共早期黨員，後脫黨）、邵力子（筆名「力子」，中共早期黨員，後脫黨）、劉大白（筆名「漢胃」，文學家）等知名人物。以上提到的文章可分見：晉青，〈不良的少男少女〉，《覺悟》，1920年8月2日，第4版。佛突，〈婦女解放和浮盪少年〉，《覺悟》，1920年8月17日，第1版。

¹⁷¹ 連溫卿，〈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第74號（1925，東京），13。

¹⁷² 在臺灣，連溫卿曾去原住民部落進行考察。在田野調查中，他特別注意男女之間的結合形式。所謂「接竹篙」、「牽手」、「灣妻」、「鮮妻」之類的概念，就是他的調查成果。「接竹篙」係指兄死之後，弟與其嫂結婚的形式；「牽手」則是早期漢人男性移民與原住民女性臨時的性結合，不是正式的婚姻形式。「灣妻」、「鮮妻」的意義同於「牽手」，但卻是日本殖民壓迫台灣與朝鮮的狀況下，日本男性與殖民地女性之間臨時的性結合：「稱結婚後的蕃女為『牽手』，其意義也不過和『灣妻』『鮮妻』的一樣，僅限於在臺灣同棲，若一旦男子離開台灣，那自然二人的共棲生活就告消滅，以後二人的行動全屬自由。就這意義而言，牽手一句話是表示男子的專制，由經濟上欲榨取他人的利益，純然由自己的慾望出發，方便索出的」。以上分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六十八、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回。連溫卿特別重視「灣妻」、「鮮妻」的問題，屢屢在演講或文章中提及（見表 2-3）。在臺灣猶然身陷日本殖民統治的當下，也許正是這樣的切入點，才最能激發殖民地人民

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他討論「不良少年少女」時所專指的「生存競爭」，實際就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階級鬥爭」。：¹⁷³

「生存競爭」一句話是生物學者達爾文創作所使用的，盡人皆知，又盡人無批評心而使用著。然動物界的生存競爭是全然依靠動物自己的力，已決定在動物界的優劣，一旦遭遇比自己強的動物即被噬去，從此永遠由生物界消滅了。若於人的社會雖說是生存競爭，而競爭的工具和那動物的不同，動物是以力，人的社會是以金錢，沒有金錢，生活上必須的食物不能到手，那末，對自己的生活是不能維持，所以說此等人是社會的落伍者，生存競爭的劣敗者。但這點和動物界的劣敗者的結果也不相同，動物界是永遠斷絕自己的生命，人卻不是那樣，猶依然繼續自己的生命，不過那時候生活程度較常人稍劣而已，若人們以力為生存競爭的工具，現在社會上的生存競爭的優勝者未必個個具有常人的力量。所以班捏科古的「社會主義和進化論」一書主張動物界的進化，可拿達爾文主義去解剖說明，然在人的社會只可以拿馬克司主義才能說明社會的進化，這是狠[很]有理。¹⁷⁴

但關鍵並不在於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而在於兩者的同一。也就是兩者都**歷史地**看待歷史現象之成與滅、進步與落後，承認這些現象的種種變化本身體現著**必然性**。「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¹⁷⁵連溫卿積極探尋並說明歷史規律（必然性）與歷史現象（現實性）之間的關係。連溫卿認為：（1）資本主義社會所體現的社會「進化」與階級分化相應而生。因此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可使異民族間的差異在同一階級中消弭，「台灣人的富人和日本的富人，由生活的經濟上相同，沒有民族的排斥觀念，反卻結合起來，這是社會進化上必然到達的地點，所以社會上有兩階級，也是從此分出來的，我們為台灣奔走，是不可不從此見地去做。」¹⁷⁶（2）此外，雖然「進化是社會發達的生命，社會上沒有進化，就沒有發達」，然而「社會愈發達，貧人愈多」，在「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裡，不但「把一般小資本家盡推落在無產者的階級中，驅逐他們在工場內去作工」，還進而「被推出工場外，又著盡在路頭找工作」。¹⁷⁷

以上通論可概述為兩點：（1'）**無論民族是否相同，連溫卿認為同一階級有相同的利害關係**；（2'）**連溫卿特別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階級分化，即資產階級本身的破產**。對

之民族意識。當連溫卿訪問日本，調查研究的態度仍繼續實事求是地保持著。比方他在上野公園遊覽時，發現日本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竟以佛像的形式殘留下來（見表 2-3）。

¹⁷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五、七十六回。

¹⁷⁴ 後來連溫卿將此段抄錄改寫於〈不良少年少女研究〉一文之時，將段落中的「然在人的社會只可以拿馬克司主義才能說明社會的進化」刪去，將其段落改寫如下：「現在社會上的生存競爭的優勝者，未必個個具有常人的力量。所以班捏科古主張動物界的進化可拿達爾文主義去說明，然對於現在社會，那一定是不能的。這樣主張實在不錯。」見：連溫卿，〈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第 74 號，12。

¹⁷⁵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6、244。黑體字為恩格斯所原有。

¹⁷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五回。

¹⁷⁷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八回。

於連溫卿來說，以上兩點也能在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運動之中尋得：(1⁷⁸) 議會請願運動只是「自由主義」的運動，他們忽略了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可能導致運動「極急速轉換為無產階級運動」，因此已經遠遠落後於群眾。然而(2⁷⁹) 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恰恰「加速度飛躍」地進行著。

所以連溫卿云：¹⁷⁸

從來設有實力的台灣人在經濟上已占得確實的地步，那自然於政治上[，]台灣人也要獲得政治權，以擁護自己的地位，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所以現在台灣的政治運動，只是根據這階級要求參加政治而已，不是根據無產階級的運動，以求解放他人即是解放自己。現在的只是要解放他人——即所謂[「]解放同胞，非自己獲得政權立在議政壇上，同胞一定是不能解放[」]的自由主義範圍內[，]去表現一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不知後進地方的資本主義化是飛躍的，不是照先進國的順序去進化，所以他們的活動，若不再擴張其視線，那運動的性質漸與現在的社會的組織相乖離，恐怕未達目的[，]而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口號已去輿論的後援[太遠]也未可知，這現象不是可以拿在中國留學的人們皆不參加的事實來說是那[樣]的萌兆嗎？然[而另]一方面[，]那運動又[具有]能夠極急速轉換為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性，這[就]是前[面所]說後進地方的資本主義化是加速度飛躍的緣故啦。



第四節、結論

1. 島內社會主義者與既存社會運動、島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

若林正丈曾以「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概念，來分析日本在台殖民政府（若林稱之「現地權力」）與這一階級透過「交換」及「仲介」而形成的互利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所體現的「政治」。在若林來看，對於這種關係的不滿，將導致「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游離出民族主義者，「而往台灣社會大眾的方向靠近，也就是往民族主義的方向前進。」¹⁷⁹ 最具體的例證即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過，若林的說明僅止於說明請願運動的主體是「本地地主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否還會超越自己的主體，向下，將「台灣社會大眾」延攬為運動的動力？如果要延攬，又該如何為之？

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說是台灣既有的社會運動領導者（特別是青壯派）思考這一問題的反映。不但反映在青壯派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上，也反映在他們希望能透過社會主義了解正在台灣發生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矛盾。因為，既要向下尋求支援，就

¹⁷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回。

¹⁷⁹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出版，2007），432。

不可能只依靠無法滿足「台灣社會大眾」所有需求的「請願運動」。而要求能夠反映多數人——也許並不包括既有的社會運動領導者——之更多利益的社會主義，就可能因此登上歷史舞台。所以連溫卿才會再三強調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在島內經濟矛盾激化的狀況下誕生的，因為這些矛盾恰恰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所正面臨的利害所在。1925年8月，《台灣民報》設了五個問題讓讀者投書回應。其中，連溫卿對「目今政治急要施政的事項」這一提問，以「施行蔗農組合法」回答；至於「五年以來發生的重要事項」這一提問，則以有關於經濟的「竹林事件」與「蔗作事件」作為頭兩個的答案。¹⁸⁰連溫卿對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的關心，如此顯而易見；或者說，社會與經濟狀況的變化，已經顯著到連溫卿不得不注意的地步了。

當然，僅從幾個領導者本身去關心底層民眾的生活，未必能解決民眾的問題或爭取民眾參與運動。而且，「治安警察法」的實施以及隨後爆發的「治警事件」都打擊了幾個領導者所組織的社會主義小團體。在這種形勢下，島內運動一時萎縮到原點，只剩下文化協會。自此而至1927年初連溫卿率領文化協會左傾化之前，台灣島內的社會運動進入了以文化協會為主體的過渡期（1923.12~1927.1）。過渡期本身反映了運動所遭遇的挫敗，卻也成為運動再興的準備。

島外的社會主義運動始終起著觸發並維持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的開頭語云，「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為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為支那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兩者皆應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年]前後來考察。」¹⁸¹對於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來說，他比較擔心從日本而來的「侵入的途徑」。¹⁸²山口小靜與連溫卿在台日之間所架起的聯繫就是田所擔心的那種「不穩」來源。而連溫卿在1924年前往日本拜會當地社會主義者的舉動，不但正可視為島內社會主義者重謀再起之信號、更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更加深入台灣的前奏。當然，無論是當年山口小靜的返台，或者後來連溫卿的赴日，這種以個人之活動牽繫著運動整體發展的現象，反映了社會主義運動形成初期的實況。最後，誠如連溫卿在1924年便已所揭示的：由大陸而來的社會主義，也在此時逐漸形成了另一條「侵入的途徑」。

2. 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

連溫卿在1924年便意識到路線鬥爭——無產階級運動／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問

¹⁸⁰ 〈本社特設五問〉，《台灣民報》，第67號（1925，東京），53。

¹⁸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1。

¹⁸² 田健治郎於1923年指出：「因對岸充滿危險思想，恐此會侵入台灣來，但本人卻以為從對岸侵入不大，反而此種思想會由內地（日本）而來。在內地東京等處，思想動搖頗利[屬]害。在勞動者及學生間甚為利[屬]害。」「新思想雖好，但動輒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傳染，此又自然流入台灣，想有多少影響波及」上述言論轉引自：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6。

題，蔣渭水則直到 1927 年文協分裂才意識到同樣的問題。1927 年分裂之初，蔣渭水曾用「階級鬥爭／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或者「階級鬥爭／民族運動」區分兩條路線。由於其區分的基準是能否爭取更多的台灣人民參與運動，而「民族主義」就是實現爭取全部台灣人的最好的統一戰線之訴求。因此蔣渭水當時譴責階級鬥爭、支持「民族運動」。¹⁸³但至後期，蔣渭水則以「階級運動（但明言不是階級鬥爭）／全民運動」來表述民眾黨自己的路線，並稱「我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主義，經濟上提倡勞資協調」。¹⁸⁴蔣渭水的變化反映了他對左右翼重新結成統一戰線的渴求（當然當時的左翼也有這種要求），然而這一渴求尚未達成之前，他自己的陣營內部就先發生了分裂。

晚年的蔣渭水開始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概念。區別路線的基準則是此前並未成為焦點的「民主主義」。蔣渭水此時不談「民族主義」而使用「民主主義」的用意，顯然已經是把反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即將分裂而出的地方自治聯盟參與者——視為不可團結的對象了。

當 1930 年的蔣渭水以「民主主義」自許，並對立於連溫卿在 1924 年所已批判的「自由主義」路線時，並不僅僅是接受他在文章中引用到的布哈林之論斷，而是接受共產國際的敵我友分析。¹⁸⁵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來，「自由」與「民主」之別，有時候是指資產階級內部的不同派別。有時候又指稱工人階級（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的差異。無論如何，「民主」二字總被賦予正面的意涵，「自由」二字則比較兩極。¹⁸⁶而在共產國際分析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發生危機（尤其 1927 年）時，「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更成為論戰焦點。代表共產國際主流派的布哈林同反對派托洛茨基，針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能否同無產階級並居於「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之下而發生劇烈論爭。托洛茨基自始否定這個階級的革命性，布哈林則經歷了從部分肯定到完全否定的轉變。¹⁸⁷

¹⁸³ 可分見：〈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1927.5.1）〉、〈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1927.5.15）〉，以上均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23~124；131~134。據聞蔣渭水還曾將運動區分為「現實派（穩健份子）、理想派（急進份子）、折衷派」以及「賢人運動、大眾運動（民眾運動）」。¹⁸⁴以上分見〈解放運動的派別（1927.2.13）〉、〈民眾運動的過程（1927.5.1）〉，以上均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04~107；118~122。

¹⁸⁴ 可分見：〈我的主張（1927.7 月以後）〉，以上均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25~130。《蔣渭水全集增訂版》將〈我的主張（1927.7 月以後）〉判定為 1927 年 3 月，誤。按內文所述史實（提及民眾黨於七月成立），至少在 7 月之後。

¹⁸⁵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是從引用布哈林的一段話中引申出「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的。但他只說引自布哈林，而未說明其出處。實際上，他所引用的是布哈林為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總會而擬的〈中國革命的諸問題（1927.5.39）〉決議。譯文與介紹可見：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 4 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179~190、566~567。

¹⁸⁶ 如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1851~1852），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列寧，〈紀念赫爾岑（1912）〉、〈兩種烏托邦（1912）〉、〈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

¹⁸⁷ 關於兩人的爭論，可詳見：孫武霞、許俊基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在托洛茨基為伊羅生（Harold R. Isaacs, 1910~1986）所寫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序言中，把俄國革命中的「自由資產階級」與中國革命中的「民族資產階級」

雖然 1930 年的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概念與分析方式，但他並未說明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還是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這也體現了蔣渭水政治立場的曖昧性。值得注意的是，同奉「民主主義」為口號的蔣渭水與共產主義者（特別是台灣共產黨，及其文協、農組），並未因著相同的口號而產生合作。可以說，此時舉起「民主主義」旗幟的蔣渭水，主要是向右（「自由主義」）區隔，而不是向左聯合。但既然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話語，應當承認，他為左翼之間的聯合保留了空間。

不過，當蔣渭水曖昧地以「民主主義」向右區隔於「自由主義」時，也不意味著這兩個概念處於同一基準。因為「民主主義」多指統一戰線的性質，「自由主義」則多指一個階級的屬性。「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概念來自於共產國際，是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革命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用語。共產國際最初曾以「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概念規定可以服從統一戰線之國民黨的階級屬性。¹⁸⁸然而這個用語日後更常被表述為「民族資產階級」。

3. 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

但無論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或者「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區分始終在「**指涉部分資產階級**以及**指涉整體資產階級**」之間擺盪：如果比較的對象是外國資產階級，本地的資產階級整體可能被籠統通稱為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比較的對象是本地某一部分的「反動」資產階級，則可能縮限民族資產階級的範圍於另一部分的「進步」資產階級。但是，「進步」與「反動」之間的區別又進一步在「**部分或整體資產階級已然的實際政治表現**以及**未然的預期政治表現**」之間擺盪：已然「進步」者，可能保持進步；一旦變為「反動」，則可能繼續反動；或者乾脆綜合「進步」與「反動」而稱某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有「兩面性」。¹⁸⁹這一擺盪也導致作為階級分析之基礎的經濟分析（如果有的話）處於猶疑。

以上**二重擺盪**也曾出現於殖民地台灣，蔣渭水最為典型。如果真如蔣渭水在 1930 年所言，在他眼前所將出現的分裂是整個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兩條暗流的總對決，他

做了類比。同時也把無產階級政黨同自由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能否在「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下合作進行討論。見：托洛茨基，〈導言〉，收錄於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國革命的悲劇》（上海：嚮導書局，1947），37~50。本書中譯本實出版於 1950 年的香港。

¹⁸⁸ 這個概念的使用可見共產國際確立國共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 1 輯（台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76。

¹⁸⁹ 德國學者羅梅君有類似的觀察。她指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階級分析與被分析的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實際作為有關，而這一作為又主要體現於對外關係上。她認為，中共「鑒於國民黨投降妥協的立場而稱之為落後力量，這樣，共產黨人實際是把外交行為當作確定社會性質的標準了。與在歐洲通常可見的詞彙應用不同，這裡的『進步』和『倒退』概念主要不是從內政方面定義的範疇。」羅梅君更總結認為，「毛[澤東]在區別賣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時，考慮較多的也是他們的政治行為而不是諸如與外國資本的聯繫等經濟標準。」以上引文見：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 和 40 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130

理應在 1927 年或更早的時候就擺出對立的姿態。而不是在其他人（如連溫卿）展開對決之時，站到後來他所反對的陣營之中。但是，蔣渭水所體現的二重擺盪，卻又是一個逐漸縮小振幅並確定自我定位的擺盪。在這個縮小的過程中，蔣渭水選擇了更艱難的道路，一條愈發左傾的道路。

若與連溫卿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相比，蔣渭水的色彩始終曖昧。眾所皆知，在文協左右分裂時，雖然蔣渭水並未站在連溫卿的左側這邊，卻選擇了中派立場。直到文協右派最終選擇另外組建民眾黨時，蔣、連二人的政治聯繫才徹底撕裂。就連溫卿的立場而言，晚年的他，也許仍對蔣渭水有意見（比方蔣渭水個人的「決心」能否促成新台灣聯盟之誕生）。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將他們兩人推回相近的道路上。1929 年，連溫卿遭到已被台灣共產黨所掌控的新文協開除，成爲孑然一身的社會主義個體戶。1930 年，蔣渭水也同當年的文協右派分手，民眾黨最終走上連溫卿當年所選擇的左傾路線。

蔣渭水死前數月，曾與陳逢源（1893~1982）等人在《台灣新民報》上發生論戰。陳逢源是 1926 至 1927 年間「中國改造論爭」的右翼代表，左翼主將則是許乃昌。當時的論爭，預示了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時過四年，右翼代表依然，左翼主將卻換成了蔣渭水。論戰的主題之一，就是蔣渭水對待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陳逢源（署名南都生）批評蔣渭水云：¹⁹⁰

如果渭水君對於台灣解放運動的指導原理，已認定三民主義完全錯誤，非歸依於馬列主義不可，這亦是個人自由的志向，我也不必究改其宗了。然而他卻硬說「三民主義可以發展到馬列主義」這種極不透澈的理論……在來蔣君所信仰的三民主義假使有八分，而添上馬克斯主義二分，如今蔣君倒反信仰馬克斯主義八分，三民主義只剩二分了。

陳逢源的批評，無非是將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加以對立，而得出「八二開」或「二八開」的分析。關鍵卻在於，如果蔣渭水確實如此調和爲之，也必然是其眼中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具有共性，從而才有調和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共性**是什麼呢？這樣的共性是否正是蔣渭水一以貫之的信仰呢？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這麼寫道：¹⁹¹

……十年後的展望是越來越進展、深刻、尖銳化，會跳過許多墮落社會運動家的屍體，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吧。

非資本主義，並不意味著歷史的倒退也是一種選項。而是在**進步**的意義上，**超克資本主義**。而此正是社會主義。如果「非資本主義」就是蔣渭水所要追求的對象，誰能說，蔣渭水（乃至整個台灣社會運動）貫穿整個一九二零年代而逐漸明確的想法，不正是社會主義？

台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

¹⁹⁰ 南都生，〈討究蔣渭水君的理論的重大矛盾〉，《台灣新民報》，第 358 號（1931，台北），5。

¹⁹¹ 蔣渭水，〈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台灣新民報》，第 322 號，18。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98。

望。

——蔣渭水遺言，1931年



第三章、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

引言、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

台灣革命運動進化史，以我們研究結果約有二大進化的趨勢：——
一是，由「無組織」的革命運動，進化到了「有組織」的革命運動！
一是，由「狹義」的革命運動，進化到了「廣義」的革命運動！

……

直到下期的革命，(1920~1925)才純是廣義的革命運動了，……他是一九二零年在日本東京設立台灣青年雜誌社；一九二一年提出台灣民選議會於日本；同年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於台北；一九二二年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立；一九二三年台灣尚志社設於廈門；同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一九二四年新台灣安社創設於北京；同年，台灣及朝鮮合作平報旬刊社於上海，一九二五年中國台灣新青年社開始設立。……同年台灣同志會成立於上海等等。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團體次第設立，這種情形是初期和中期的革命所萬萬不能及的。

——漢人，《台灣革命史》，1926。¹⁹²

1926年，一本不到兩百面的小冊子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這本名曰《台灣革命史》的著作，作者是署名「漢人」的台灣學生黃玉齋(1903~1975)。當年的黃玉齋為何寫下這本書呢？他回憶云：¹⁹³

玉齋早年赴笈歸國求學，於廈門為學生時代，已承師友的慫恿；且當民國十年間吾國革命風潮很高，於是開始蒐集吾台灣抗日革命的史實，在吾國內豈有可求？因此不得不利用學校寒暑假回台北省親的時候，在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台北圖書館」中秘密鈔自日人的著作中關於台灣抗日革命史料，每次鈔譯抗日革命史料之後，不敢自己帶回家中，祇好事前備便的「信封」寫好廈門友人的住址、姓名、貼足郵票等，即刻將鈔就的抗日革命史料分散放在信封之中，即刻投入信箱寄與廈門友人代收。……

¹⁹² 漢人(黃玉齋)，《台灣革命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160~164。標點按原書。

¹⁹³ 黃玉齋，〈台灣初期抗日史略〉，收錄於氏著，《台灣抗日史論》(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3。

今天來看，這本以台灣武裝及非武裝抗日運動為論述對象的專著，在日新月異的歷史學研究及史料積累面前，似乎頗為失色。這本書也幾乎不被當成研究對象，彷彿這本書已然過時而又過時了。然而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這本小冊子，卻是同類型題裁化為書面研究的頭一遭。並是第一本試圖區分臺灣抗日運動的型態變遷（如引文所謂「無組織」至「有組織」的變化）、第一本試圖區分並介紹島內社會運動派系的專著。

如果運動的型態變遷及派系分類可被加以介紹，也許正意味著運動的發展已臻某種階段，所以黃玉齋才有條件為之。從書中內容來看（如上引文），各種台灣青年組織層出於中、台、日三地，確實是「初期和中期的革命所萬萬不能及的」。如果運動還未發展出相對具足的條件，黃玉齋恐怕無法順利寫就其著作。在黃玉齋的分類裡，當時的島內的「政治運動」可區分如下：

1. 「民族主義派」
 - A. 台灣獨立派、
 - B. 台灣光復派、
 - C. 台灣民選議會派、
 - D. 台灣文化協會派。
2. 「社會主義派」
 - E. 無政府主義派
 - F. 社會主義派

如果黃玉齋寫作的篇幅正是當時運動的規模、水平、或聲勢的反映，其中最為混雜不清的政治勢力，也許就是他所劃出的「F.社會主義派」。黃玉齋籠統列以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國家主義，但他並未說明臺灣人所實際進行者究竟為何。¹⁹⁴相對之下，他對「E.無政府主義派」的說明便詳細很多，而其代表，就是 1924 年由台灣人范本梁（1897~1945）創設於北京的無政府主義組織——新台灣安社。

如果直到 1926 年，黃玉齋所能知曉的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只有新台灣安社，其意義何在？可能是新台灣安社的活動非常顯著，也可能是黃玉齋只知道安社的活動細節，甚至，可能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在大陸上——發生了斷層。無論如何，只要考慮到 1927 年的文協分裂才使左派全面浮現檯面，那末，無論黃玉齋將新台灣安社特別拔高的原因為何，其意義都不能小覷。

本章的研究對象是台灣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組織，及其思想，范本梁及其「新台灣安社」將是這一研究的主要（但非唯一）的線索。至於敘述的開端，還得從東京（最早出現台灣人青年組織之地）及北京（大陸上最早出現台灣人青年組織之地）開始說起。

¹⁹⁴ 他只說了一個叫做楊子江的台籍國民黨軍官在福建遭刺。可代表三民主義在「台灣」的發展。

第一節、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

1. 東京的台灣人與他們參加的社會主義組織：可思母俱樂部與其他

東京是台灣人最早在島外成立青年組織的地方。同時也是台灣人最早接觸社會主義組織之處。不過，目前的文獻只能說明什麼人參與了什麼組織，具體的活動很難說明。從史料來看，台灣人幾乎集中參與在東京的「可思母俱樂部」(コスモ俱樂部，1920~1923)，參與者有呂盤[磐]石、黃登洲、彭華英、蔡培火，¹⁹⁵以及范本梁。¹⁹⁶可思母俱樂部因有台灣人的參與，而成爲同時期日本社會運動組織裡的特殊風景。¹⁹⁷其中，彭華英還參與了另一個團體，「曉民會」。¹⁹⁸由於曉民會與台灣的關係，並沒有太多的史料可以說明，¹⁹⁹因此，可思母俱樂部將是本節的敘述主線。

「コスモ」(コスモポリタン，Cosmopolitan)之名，蘊含著「創造無國境的新世界新生命」的意味。²⁰⁰用日本學者松尾尊兌(可思母俱樂部的研究權威)的話來說，可思母俱樂部是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²⁰¹是一個跨東亞各地域的集合體。俱樂部由朝鮮社會主義者權熙國、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以及宮崎龍介所創，活動地點則主要是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加盟」或者「出入」其中的成員，來自日本、朝鮮、中國(如導言曾提到的謝晉青、乃至人在北京的李大釗)、俄國(如愛羅先珂)。可思母俱樂部的成立時間與成員，幾乎與同時期出現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重疊。由於同盟的被解散(1921年5月9日，第二次大會召開時當場遭到解散，同月27日被禁止)，可思母俱樂部的性質就轉變成爲秘密維繫同盟運作及其成員的組織。

但可思母俱樂部並不僅僅是個跨地域的組織，她還是個跨主義——「A」派(「安」

¹⁹⁵ 內務省警保局編，《思想要注意人名簿(1921.1.15)》，<http://members.at.infoseek.co.jp/kafuka1964/meibo.html> (accessed 2007/3/24)。松尾尊兌研究可思母俱樂部時，並未用到這則史料。這則史料中所提到的「黃登洲」、「蔡培火」，均未為松尾尊兌所及，其於三人則都有其他史料佐證。但松尾尊兌曾提到有一名無法辨認其身分的「黃登明」，也許是「黃登洲」。見：松尾尊兌，〈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26(2000，東京)，33。

¹⁹⁶ 〈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大正十年度)〉，收錄於松尾尊兌編，《社會主義沿革(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76。

¹⁹⁷ 〈主ナル思想團體調(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調)〉，收錄於內務省警保局編，《(201)最近に於ける本邦社會主義運動概況》(警察庁移管文書)。比方這篇調查裡，就只強調コスモ俱樂部有台灣人參與。

¹⁹⁸ 關於彭華英，並見：內務省警保局編，《思想要注意人名簿(1921.1.1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

¹⁹⁹ 「曉民會底會員，都是缺衣少食的、而對於宣傳演說賣書報，誰都趕不上他們勇猛。出入他們曉民會一口小屋的，日本人外，有高麗人、中國人、台灣人，其餘就是周圍環視的警察偵探。」見：晉青，〈日本勞工底急進派〉，《覺悟》，1921年5月29日，第4版。

²⁰⁰ 松尾尊兌，〈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號，24。

²⁰¹ 松尾尊兌，〈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號，21。

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與「B」派（「布」爾什維主義，當時幾為馬克思主義的代稱）兩派——的集合體。「A」「B」關係是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整個東亞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大主題。在十月革命之前，無政府主義是東亞社會主義思潮中的主流；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間的關係，也不像歐洲那樣分野清晰或有巨大矛盾。然而十月革命的勝利，加速了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代名詞的「布爾什維主義」在東亞的傳播。於是，「B」派的抬頭，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關鍵因素，加速了從「A」「B」混雜向「A」或「B」派各自的純化。前述章節曾提到，山口小靜在日期間曾因「A」「B」的不同立場而與無政府主義者伊藤野枝發生辯論。兩人的爭論點在於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應該奪取「政治機關」（如國家政權）。伊藤站在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而反對奪取，小靜則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反對伊藤的見解，於是激怒了伊藤。以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兩人之間的辯論正是「A」「B」矛盾逐漸激化的反映。

「A」「B」混雜下的合作，當然不同於「A」「B」分殊之後所重新產生的合作。但合作與否，始終是 1920 年前後東亞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問題之一。在中國，中共建黨前的「社會主義同盟」也具有「A」「B」合作的性質。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活動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曾向大陸傳回大量關於日本社會運動內的「A」「B」合作的消息。他歌頌這一合作，並對「B」派有正面評價。謝晉青指出，從 1921 年開始，「赤的色彩，日日濃厚」，「說起他們底漸趨一致——一致於布黨——實在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同盟成立底功效。」²⁰²陳望道（《共產黨宣言》譯者）則回應強調政府的壓迫才是「A」「B」派「一致」的原因。²⁰³但顯然兩派終究無法攜手面對政府的鎮壓。松尾尊允認為，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一方面是官方鎮壓過甚，另一方面則是「A」「B」對立的激化。由於日共在排除無政府主義派大杉榮的狀況下進行組黨，致使大杉榮重建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北風會，停止發行與「B」派共同發行的《勞働運動》；翌年，在日朝鮮人也隨之產生「A」「B」分裂。在此過程中，可思母俱樂部逐漸傾向於「B」派，並進而地下化。

可思母俱樂部所具有的跨地域與跨主義兩種性質，同樣也體現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上。但就前述幾個台灣人的參與而言，主要只能體現跨地域的部份。跨主義的部份則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日後才出現的話題。

在參與可思母俱樂部的台灣人中，彭華英、呂磐石等人的記載較不一致，范本梁的參與則較有蹤跡可尋。²⁰⁴范本梁（1897~1945），嘉義人。目前確認的用名有：一洗、鐵牛、體信、重生、志義、能鳴者，其中「一洗」的名氣似乎較大。²⁰⁵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

²⁰² 晉青，〈日本社會運動家底最近傾向〉，《覺悟》，1921 年 3 月 14 日，第 1 版。

²⁰³ 曉風（陳望道），〈日本社會運動家態度漸趨一致的原因〉，《覺悟》，1921 年 3 月 15 日，第 1 版。

²⁰⁴ 各種關於可思母俱樂部參與者的記載不盡然一致。比方彭華英以東京「《台灣青年》社」的身分登記在一份同盟名簿中，但在另一份名簿中卻沒有彭的名字。呂盤[磐]石的狀況也類似。可見：松尾尊允，〈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 26 號，33。

²⁰⁵ 王詩琅謂其自號「一仙」，謝雪紅則記之自稱「范一錢」。范本梁自己在廣東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發表文章時，則署名「范一洗」。曾與范本梁見面（1922 年）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則稱之「一洗」，可見這是范本梁的常用化名。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163；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

載，范本梁於 1915 年赴日，先後就讀於東京青山學院、茨城縣土浦中學、上智大學。²⁰⁶此後始與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來往，如可思母俱樂部的領導者大杉榮（1885~1923）。范本梁離開東京之後，曾回憶他與大杉榮的相處云：²⁰⁷

我自己在東京的時候，找他幾次，或是直接間接聽他幾回的演說，……

我在東京的時候，就常常聽他對我們同志說：……

1921 年 6 月 21 日，可思母俱樂部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青年會館舉辦「人類愛的結合講演會」，發表包括法、俄、中、韓五種語言在內的宣言書，並有來自東方各國的人士發言。這次集會是可思母俱樂部留下最多記載的一次事件。²⁰⁸會中，范本梁亦起而講演。但卻遭到臨監警察的中止。²⁰⁹根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說法，范本梁曾因不妥言論而遭拘禁，同年 8 月轉赴北京；所謂的不妥言論，可能就發表在這次集會。²¹⁰無論如何，范本梁就此離開了他所傾慕的大杉榮：²¹¹

兄弟早就被日人迫開黑暗的東京，早就被日人迫開大杉榮先生的左右，又因為我是個流連性的無產階級，自東都[東京]一別，就沒有機會跟他通信，也沒有洋錢買報買誌看，所以他的事蹟或是它的種種事變，一概是兄弟不得知道的，……

除了范本梁之外，彭華英也因大學畢業（明治大學）而在更早的 7 月離開了日本。據日本情報，他前往了上海，與蔡惠如（1881~1929）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共同參與了亞洲各殖民地獨立運動者針對華盛頓會議而舉行的協進會。²¹²彭、范兩人先後離日之後，可思母俱樂部內仍有台灣人的蹤影，但並無法確知是否為前面曾提到的呂磐石等人。²¹³黃登洲與呂磐石則在 1923 年初在東京成立了一個名曰「曉鐘會」的組織（見本文第四章，以及

15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704；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1974），87~88、221。另外，日本情報檔案還有范本梁用名「鐵仙」的記載，此處錄之待考。見：〈秘密出版物「新台灣」二關スル件（1926.5.19）〉，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²⁰⁶ 關於范本梁在日求學的順序，作為范本梁友人的張深切有著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更詳細的記述，故此處採張深切的說法。此外，在日期間，范本梁還曾向當時的《台灣青年》投稿。以上分見：張深切，《里程碑》，上卷（台北：文經社，1998），266；范志義（蒼亨），〈結婚の改善を絶叫す！〉，《台灣青年》，第 1 第 5 號（東京，1920），60~64。寫於 1920 年 10 月 15 日。

²⁰⁷ 范一洗，〈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 1 卷第 8 期（1924，廣東）。

²⁰⁸ 松尾尊允，〈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 26 號，33~41。

²⁰⁹ 〈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大正十年度）〉，收錄於松尾尊允編，《社會主義沿革（二）》，76。

²¹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44。

²¹¹ 范一洗，〈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 1 卷第 8 期。

²¹² 〈特別要視察人台灣人彭華英渡支ノ件（1925.2.13）〉，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²¹³ 1922 年 11 月 19 日，秋田雨雀與包括台灣學生在內的三十多名東亞各地學生，在一個咖啡廳裡進行可思母俱樂部內部的談話會。見：松尾尊允，〈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 26 號，44。

表 4-7)。事務所設於《台灣》雜誌社內，並刊登成立宗旨於《台灣》。²¹⁴同年夏天，《台灣日日新報》與《台南新報》分別登載了兩則攻擊黃登洲的新聞。指控做為「不良學生」與「主義者」的黃登洲去上海領受共產黨的宣傳費，並在東京掛起共產黨支部的招牌。²¹⁵黃登洲旋於同年《台灣》雜誌發表一篇冷嘲熱諷、橫眉冷對的駁文。²¹⁶到了 1926 年，黃登洲參與創建「國際俱樂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俱樂部）」。²¹⁷黃登洲的經歷可以證實他的左傾，同時也說明了在殖民者眼皮底下進行社會運動的難處。也許這就是彭華英與范本梁早早脫出日本的原因。而日本當地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活動，則隨著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而進入了下一個週期。

2. 北京的台灣人組織

以北京為中心的台灣青年啓蒙組織，始於 1922 年 1 月成立的北京台灣青年會，由台灣社會運動家蔡惠如所促成。作家張深切（1904~1965）曾就《台灣社會運動史》所揭載的史料而認為，由於青年會以島內幾大家族的子弟為骨幹、並有大陸方面的官學人士為名譽會員，故可視為一個「穩健」的團體。²¹⁸而張深切之所以特別將「穩健」視為一個組織所有（或者所無）的特質，正是因為日後的島外台灣青年及其組織，幾乎毫無例外地走向激進的「不穩」道路。

從青年會目前唯一存留的機關刊物《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1922 年 6 月 29 日，閏五月五日）來看，這種拒絕激進的傾向也是明顯的。不但其創辦宗旨限制刊物不談政治，刊物本身也被期待成為「一種文化運動雜誌」。²¹⁹另一方面，青年會也將自身的任務限制在「穩健」層次：重建台灣會館、²²⁰學習普通話（成立「白話研究會」）、協助台生以華僑身份進入大陸高校就讀。

如將《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翻到最後一頁，就能看到這份刊物之編輯兼發行者的名字；這個名字也不是別人，即是著名作家許地山（贊堃，1893~1941），當時他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就讀。許地山的參與，反映了青年會組成份子的複雜性。也許彼時台灣割讓不過三十年，離土未遠、親緣仍深，台灣割讓前後即跨海內渡的台灣人，仍可參與其

²¹⁴ 〈[學界消息]曉鐘會ノ成立〉，《台灣》，第 4 年第 1 號（1923，東京），72。

²¹⁵ 〈不良學生の過激主義。或は金の為か〉，《台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7 日，第 7 版；〈學生の主義者〉，《台南新報》，1923 年 8 月 7 日，第 7 版。

²¹⁶ 黃登洲，〈台灣日日及台南新報を讀みて〉，《台灣》，第 4 年第 8 號（1923，東京），83~86。

²¹⁷ 〈東京インタナショナル俱樂部ニ關スル件(1926.4.23)〉，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紀錄》，編號 B03041029600。

²¹⁸ 張深切認為，北京台灣青年會包括了北京知名人士，台灣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台中吳家等望族子弟，故為穩健。見：張深切，《里程碑》，上卷，41~42。

²¹⁹ 《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1922，北京），1。

²²⁰ 當時因為台灣會館已毀，北京台灣人多出入於福建會館、漳浦會館。見：〈在北京台灣籍民ニ關スル件（1925.4.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中。也或許始終以「老台灣人」自許²²¹的許地山，對於台灣的情感厚重依舊。不過，許地山的參與還預示了一層更深的意義，即無政府主義向著台灣青年而滲透的開始。然而這個問題，並無法從「許地山」這三個字直接袂出答案；問題還得從另一個重要的臺灣人說起。這個人，正是從東京來到這座古都的范本梁。

范本梁抵京之後，隨後即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²²²此後他的人際關係更有脈絡可循，交往範圍也較廣。他參與了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活動，也接觸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景梅九（1882~1961）。²²³雖然北京當時仍在北洋政府治下，無政府主義的活動卻奇特地未嘗稍減。當時由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國風日報》及其副刊「學匯」，就被無政府主義者視為「北京最堅硬的輿論界代表，亦國內同志互通消息、發表言論的總機關」。²²⁴

3. 范本梁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

除了報紙之外，景梅九還領導著《台灣社會運動史》稱為「北京安社」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北京安社」與范本梁有密切關係。雖然「北京安社」是個從「名」到「實」都還弄不清楚的組織，²²⁵但若以景梅九作為追索的主線，並以此考察

²²¹ 許地山，〈許序〉，收錄於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北平：新亞洲書局，1930），1~2。

²²² 范本梁旁聽於北京大學一事，北京大學方面尚無史料可以考考。當時北京台灣青年會已為台灣學生爭取到以華僑身份入學的資格，也爭取到旁聽生的資格。據規定，旁聽生要繳小額學費，但不得改為正科生，而且只能自稱「北京大學旁聽生」，不得稱為「北京大學學生」。見：〈旁聽生章程〉，《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8。

²²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87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無論是日文本或中譯本，均將「景梅九」誤為「梅景九」。並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4。

²²⁴ 〈國內同志消息〉，《春雷》，第1卷第1期（1923，廣州），133。

²²⁵ 關於北京安社是否存在的問題，分析如下。據當時北京政府的情報顯示，1922年3月18日，無政府主義者曾於平民學校（西城翊教寺街）內開會，討論設立「北京安社」。並在6月5日的內部集會中散發〈安社社約〉，且有俄、日、朝等國的社會主義者出席。不過，「北京安社」一名，似乎不是公開的、或不是被確定的名稱。雖然《台灣社會運動史》直呼之「北京安社」，但無論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後世的學者，以「安社」稱呼北京這一組織者不多。1926年，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絮」（柳樹人）曾明確寫下「世界語問題（北京安社）」的字句。現代的無政府主義研究則常把景梅九的組織稱為「學匯社」，也許正是「北京安社」。1924年5月1日發行的《春雷》有消息云，「北京同志，組織一世界語俱樂部，於世界語專門學校內」。倘若「北京安社」已然存在，為何還需要一個世界語俱樂部？尤其此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刊物時常毫無避諱地刊載各地的「同志消息」，闕漏「北京安社」的動向就格外奇怪。就筆者所能讀到的同時期無政府主義刊物來說（如《春雷》、《驚蟄》），最多也只提到《學匯》，未曾提到有個「安社」的組織。以上見：〈京師警察廳關於北京無政府黨人集會追悼黃愛龐人銓等情呈（1922.3.30）〉、〈載德關於北京無政府黨人組織世界語學會及活動情形致聶憲藩呈（1922.6.5）〉，均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政治」（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710~712；柳絮，〈主張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節錄）〉，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

圍繞其身邊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大概還是可以進行推測的。1922年11月至翌年1月，滯留於中國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曾與范本梁（以「一洗」之名）以外國人代表的身分，共同出席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無政府主義者連盟（北京 AF）」會議。²²⁶如果「北京 AF」就是「北京安社」，那末《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范本梁與「北京安社」的關係，便能得到證實。

但就算不能證實，范本梁與景梅九等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也能得到說明，而且，包括范本梁在內的東亞無政府主義者集結於北京、匯聚在中國的盛況，亦能由此窺見。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這一盛況才是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朝鮮獨立運動者李又觀（李丁奎，1897~1984²²⁷）當時正在北京。其自作年譜記載云：²²⁸

1922年（26歲），與友堂李會榮、丹齋申采浩、北京師大教授魯迅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俄國盲詩人瓦西里、愛羅先珂、台灣革命同志范本梁等郊[交]遊。

在北京，范本梁還接待過著名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柳子明（1894~1985）。柳子明回憶云：²²⁹

[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那一次我與丹齋先生[申采浩]²³⁰來往的時間較長。同時和台灣朋友范本梁、林炳文²³¹等交往。由於台灣朋友的介紹，我寄住在「泉州會館」裡。

誠如朝鮮共產主義者金山對於這時期北京的記載，「那時候[1919~1923]，在北京有800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300名學生。」²³²在北京為數不多的朝鮮人竟然出版七份雜誌，這在任何少數民族中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²³²但上海也是朝鮮革命者的聚集之地，范本梁曾在上海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員四處奔走，此時是1924年。謝雪紅云：²³³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719；〈同志消息〉，《春雷》，第1卷第3期（1924，廣州），115。

²²⁶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87~88、221。

²²⁷ 金良守，〈日本佔領時期韓國和台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年冬季號（2004，北京），73。

²²⁸ 《又觀文存・年譜》，三和印刷所1974年版，轉引自金時俊，〈流亡中國的韓國知識分子和魯迅〉，收錄於魯迅博物館編，《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5），53。

²²⁹ 柳子明，〈朝鮮愛國史學家申采浩〉，收錄於楊昭全編，《關內地區朝鮮人反日獨立運動資料匯編》，下冊（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87），1370。

²³⁰ 此處所引兩則史料均有申采浩（申丹齋，1880~1936）之名。他是著名朝鮮史學家，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由於他在1928年於台灣被捕，特別注意他是有意義的。

²³¹ 也許是當時正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林炳坤。林炳坤，就讀政治系，1928年畢業。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116；五十周年籌備委員會編，《國立北京大學歷屆同學錄》（北京：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143。

²³² 尼姆・威爾士、金山著，趙仲強譯，《阿里郎之歌——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朝鮮共產黨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90。

²³³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153~155。關於謝雪紅到上海的時間，1924年，張深切在上海之時，與范本梁有密切的交往。可知范本梁至少此時確於上海。而謝雪紅則說她在1923年便與范本梁認識於上海，但謝雪紅對於時間的回憶其實非常有問題。在她的回憶裡，她於1923年4、5月間從台灣轉日本而至上海，並於同年8月中回台灣。當謝再次前往上海時，已是1925年4月間。1924年的回憶可謂一片空白。謝雪紅回憶，1923年，她首次赴上海時，便在船上初識林木順、李友邦。

當時，我認識的青年還有……范一錢（台南人，原名范本良[梁]），後來信仰無政府主義，被捕過。當時他很活躍，和朝鮮人頻繁來往……

當時聽說朝鮮人在法租界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可能因我是女的比較突出，一些朝鮮人和范一錢常來爭取我，勸我到租界去看他們臨時政府的要人。我因感到自己沒有文化，又不懂政治而不敢去，所以始終沒去看過他們。

……

當天[1924.6.17「恥政紀念日」]集會參加者只有我一個是女的，那時還沒有台灣女青年到上海唸書，也沒有台灣婦女出來參加社會活動，因此，平時范一錢等就稱我一點紅。當晚，范等推我上台講話……

更重要的，則是范本梁與可思母俱樂部的舊成員羅任一的交往，不過兩者的交往目前僅有日本的情報資料可以證實。²³⁴羅任一，四川省資中縣球溪河村人。他是前述謝晉青的同志。他在1917年赴日留學，1921或1923年回國。²³⁵羅任一的重要性首先體現於兩點：

第一點是可思母俱樂部所建立起的跨地域連帶的再浮現。在日期間，羅任一曾與謝晉青共同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的活動，可能還包括「日本社會主義同盟」。²³⁶羅任一與謝晉青有很密切的交往，兩人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庇護下，共同創辦了書報社與通信社，前者代售國內進步刊物，後者則將日本社會運動消息大量傳回中國。²³⁷雖然不能說范本梁與謝、羅兩人在可思母俱樂部時期即相識，然而可思母俱樂部所建立起的跨地域人際網絡，顯然不可小覷。

第二點則是羅任一所懷抱的「A」「B」合作之主張。1921年12月，中共創黨黨員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曾提到羅任一與謝晉青的政治傾向。施存統大致肯定謝晉青與

到上海之後，則認識范本梁，並曾參與范本梁等人在6月17日的「恥政紀念日」紀念會上發言，地點在「商務印書館」的「國語講習所」。但是，據陳芳明所得林木順學籍資料，他在1924年3月19日才從台北師範學校退學。據聞這年夏天因與李友邦等人襲擊台北新起街派出所才逃往大陸。此外，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紀錄與張深切的回憶裡，謝雪紅確實曾在上海的「6.17」紀念會發言，但卻是1924年，地點則是務本專校。由於務本專校與商務印書館均處寶山路上，有可能謝雪紅因此記錯。綜合上述材料，謝雪紅首次赴上海的時間應是1924年，否則就是她曾在1924年二赴上海，只是她自己忘了（唯此事可能性較低）。見：謝雪紅，《我的半生記》，151~166；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52；嚴秀峰，〈李友邦與中國抗戰和台灣光復〉，收錄於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61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87~88、91；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48。

²³⁴ 〈秘密出版物「新台灣」二關スル件（1926.5.19）〉，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²³⁵ 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岩佐作太郎，曾引羅豁為友人與同志，並云之1921年6月歸國。以上可見松尾尊兌，〈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號，32。至於1923年的記載，則見於葉博夫，〈羅任一傳〉，《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89，四川），135；李銀耕，〈羅任一在安陽的革命活動〉，《安陽文史資料》，第6輯（1991，河南），23。

²³⁶ 葉博夫曾指出羅任一為「社會主義同盟」的盟員，至於是否為「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則未明言。見：葉博夫，〈羅任一傳〉，《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35。

²³⁷ 關於他們創辦通信社與書報社的經歷，可參見本文導言注釋2。

羅豁是無政府主義者。但認為他們的「主義」與同屬無政府主義派別的大杉榮不同。²³⁸雖然施存統並未說明這種不同究竟為何，但前面提到的「A」「B」合作是個可供推測的方向。羅任一初抵日本之時，曾與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張景共組無政府主義社團，當時他們兼讀兩種主義的書籍。²³⁹羅任一當時的翻譯作品，也兼具「A」（如大杉榮）「B」（如山川均）兩派文獻。²⁴⁰甚至，當謝晉青讚許可思母俱樂部所實現的日本兩派人物的集合時；羅任一則進而盼望國內的「A」「B」兩派能「以一致進行」，作為「今後的方針。」²⁴¹

從史料來看，范本梁本人始終並未展現出「A」「B」合作的傾向。但在「B」派聲勢日漸高漲於全東亞的總形勢下，范、羅兩人面對「B」派所做出的不同選擇，宛如互相驗證的對照組。而范本梁所需面對的考驗，就是一條沒有「B」派的「A」派道路。

總而言之，范本梁與群集中國的東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有很深的交往。然而這些記載至多只能說明范本梁的個人「活動」，而不能說明組織性的「運動」。也許這些活動包括了他與景梅九、羅任一、范本梁、柳子明、李又觀、山鹿泰治等東亞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籍、跨國界交往，從而可被視為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及體現。但若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本身的起源與形成，就必須從「組織」產生與否——而非個人活動或人際圈——來考察。而范本梁為了堅持「A」派本色而遭遇的困境，也是在推動組織工作的過程中才出現的。以下的研究，就從范本梁所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社團來展開討論。許地山也將再次轉回研究的視線之中。

第二節、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

范本梁是一個過激的安那其主義者，一動嘴就是提倡革命、暴動、打手槍、擲炸彈。他專程從北京到上海來鼓舞革命運動。一到上海，就來投宿我們[上海台灣青年會]青年會館，平時他多在外面，到處訪問同鄉青年學生，從事遊說；主張無政府主義，攻擊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其話術的巧妙，我還未見過有人出其右者，他能使人聽他的話，通宵達旦而不感覺厭倦。他的談話，比聽故事或看電影還要有趣。可是他始終未能獲得一個同志的支持，畢竟他的革命理論，雖然能叫人同

²³⁸ 施存統云：「謝晉青（警視廳指定乙類需要監視之人物，現居上海）確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羅豁、陳春培皆為無政府主義者，惟其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見：〈附錄三 施存統口供〉，收錄於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370。

²³⁹ 張景：「一九二零年我們住的宿舍裡來了一個四川學生羅豁，帶來了一些新出版的小冊子，有《克魯泡特金思想文集》、《共產黨宣言》、意大利安那其主義者馬拉特斯泰的《兩個工人的談話》、劇本《夜未央》及《互助論》、《麵包略取》等，分送給同住的一些人閱讀。大家熱情地閱讀，興奮地討論，特別是讀克氏的《告青年》一文和《夜未央》劇本，受了不小的激發，都決心要參加改造舊社會建設理想的新社會運動，這樣就有六七八人成為小團體，命名為『光社』，「就以安那其主義為『光社』的主義」，「這樣不到半年就各自分散了，羅回國後沒有消息。」見：張景，〈安那其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活動片斷〉，《文史資料選輯》，第90輯（1983，北京），117。

²⁴⁰ 主要是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北京《國風日報》副刊《學匯》。

²⁴¹ 羅豁，〈今後應取的方針〉，《覺悟》，1921年6月28日，第4版。

感，手段和方法，卻難能叫人共鳴，尤其他的生活過於浪漫，過於荒唐，沒法子使人心服。

——張深切，《里程碑》²⁴²

1. 「新台灣社」的結成：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

1923年2月1日，一摺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台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²⁴³這份刊物由「贊堃」（許地山）發行、「一洗」（范本梁）編輯，並由「之民」（身分不明）會計。通信者與通信處，均賴當時仍在燕京大學的許地山轉交。²⁴⁴這份傳單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僅從《台灣社會運動史》這樣的經典史料出發，對於范本梁及其組織的認識必然只能停留在1924年以及「新台灣安社」。然而這份傳單不但將范本梁的組織活動整整向前推進了一年，還證實了許地山與他的合作關係，更說明了「新台灣安社」有一個叫做「新台灣社」的前身。此外，當時的范本梁並未直接打出「無政府主義」（乃至音譯的「安那其主義」）旗號，而是以「新台灣主義」代稱其主張。但從他將「道德啊，習慣呀，風俗呀，婚姻呀，家庭呀，宗教呀，國家和強權呀，私有財產制度呀，奴隸和傭工制度呀」這些「不自然的」事物平列為「新台灣主義」所要打倒的對象來看，「新台灣主義」實際就是無政府主義。

雖然目前無法得知許地山認識范本梁的時間，卻顯然絕非《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1924年，而是1923年。²⁴⁵又由於許地山在1923年8月便與冰心、梁實秋離開中國，赴美留學。²⁴⁶因此，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顯然非常短暫。范、許兩人的短暫合作，恰恰是范本梁日後一切活動的縮影。從當時的日本情報檔案（包括《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看，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破碎而不連續（見表3-1）。如果有任何合作，顯然也只能是短暫的。這種合作上的短暫性，反映了他在組織工作上所遭遇的困境。對於這一困境，《台灣社會運動史》有兩點論斷：一是范本梁有著不易與人相處的個性，二是「A」「B」兩種「主義」開始產生分殊。²⁴⁷而本文還可補充第三點，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在地域上的交會與錯別。關於第一點，他的好友張深切曾有翔實的描述，此處概不贅述。以下集中於第二、第三點來討論。

²⁴² 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56、262。

²⁴³ 就此來看，《台灣社會運動史》所提到的「宣言書」，可能就是這份文件。見：《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

²⁴⁴ 〈新台灣創刊宣言配布の件（1923.2.1）〉，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關於通信者與通信處，載云：「北京崇文門內，燕京大學第一院。贊堃氏轉交。」

²⁴⁵ 《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

²⁴⁶ 周俟松、杜汝森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481。

²⁴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87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4。

關於第二、第三點，可以從當時分居華北與東北的兩個著名台灣社會主義者——北京的謝廉清與長春的謝文達——來考察。謝廉清（1903~1961），彰化人。1923年5月進入北京朝陽大學預科，曾於同年10月前往上海參與上海台灣青年會的成立。當時的謝廉清曾有過無政府主義傾向。這從他所使用的筆名（「虛無」、「廉清虛無」²⁴⁸）與主張（「廢姓」）即可見其端倪：²⁴⁹

有一天一位兄弟問我。「尊姓」[，]我聽著很不爽快。再問我「貴處是那[哪]一省。」那就越不爽快了。對了。現在的中國，群雄割據，不能統一。或者這也是其中一部份地原因。還是朝鮮、台灣、和日本的關係不能解決者，也是因為大家，還有這樣十三四世紀底封建思想，所以致成了問題的。大家請想一想。

……

這個「姓」本來是用於區別家庭的（Family name）[，]既然，現代認定社會是家族的延長和擴張底，那就沒有，帶差別性的「姓」地存在了。當然要消滅。至於國境和民族的偏見，自然也要付之水流。……

不過，從文中論點來看，那種希望同時撇開一切姓氏及地域標籤的根本原因，大概不只是「虛無」而已；殖民地青年身處故國古都的某種無奈，似也沉潛其中。至於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雖然無法判斷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但他確實左傾。1923年6月，謝文達在長春以公開信宣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退出飛行事業。同年底轉赴日本，拜訪並參與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的編輯工作；直到1924年5月25日才「退社回長春」。在此期間，謝文達參與了島內的社會主義研究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發起。

《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當時僑居北京的台灣人大部分與謝廉清、謝文達一樣傾向於共產主義」，所以范本梁的活動很少得到支持。謝廉清確實傾向於共產主義，他不但加入中共、還與當時在北京活動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合作（見本文第六、第七章）。但從謝廉清曾經具有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來看，「傾向於共產主義」應該被視為較晚的事情，或至少承認謝廉清兼具這兩種傾向。如果謝廉清真如《台灣社會運動史》所云協助范本梁發行《新台灣》，²⁵⁰便更能證實上述推測。此外，從上述分析可知，無論是謝廉清、謝文達，並非始終與范本梁處於同一地域（狀況同許地山出國一樣），就連范本梁自己，也並不只是呆在北京。從謝雪紅（如前引文）與張深切的回憶來看，范本梁曾在1924年前往上海。²⁵¹

²⁴⁸ 所謂「虛無」，是當時俄國民粹派（「虛無黨」）的中文常用譯語，但因無政府主義之傳入東方，自始就以民粹派思想為媒介，於是「虛無」一詞也常混同於「安那其」。

²⁴⁹ 廉清虛無，〈若廢姓則如何〉，《台灣民報》，第2卷第5號（1924，東京），10。

²⁵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5。

²⁵¹ 關於范本梁前往上海一事，可見：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56、262。

2.從「新台灣社」轉化為「新台灣安社」

1924年2月8日，范本梁在北京大學的「克魯泡特金逝世三週年公祭大會」發表以「大杉榮先生」為題的演說。²⁵²就目前的史料來看，這是1923年范本梁發表《新台灣創刊的宣言》並宣告成立「新台灣社」之後的第一次公開活動。也恰恰是在這一天，范本梁發表〈新台灣安社宣言〉，正式打出「新台灣安社」的旗號。在此之後，一些可能與范本梁有關的事情陸續發生；這些事情，都緊密聯繫於1923年底發生的治警事件：

——首先是1924年新春四處散發的「謹迎新春」的反日明信片。²⁵³透過明信片進行宣傳，乃是當時中日社會主義運動都曾用過的手段；然而這張明信片卻有替「治警事件」受難者伸冤仗義的意味。（全文考證版見附錄3-1）

——其次則是1924年3月5日據聞召開的「華北臺灣人大會」。大會發表了一篇反對治警事件的文件——〈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見附錄3-2）。此文最值得注意處，在於「華北臺灣人大會」對於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的支持與肯定。大會決議「用實力支援貧弱稚嫩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及其期成同盟，務使諸位先鋒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並和他們協力」。²⁵⁴

張深切推測這兩篇文獻可能俱出於范本梁之手，²⁵⁵這一推測的可信度極高。此後不久，范本梁正式以「新台灣安社」發行機關誌《新台灣》創刊號，史料記載這天是4月15日。《台灣社會運動史》云，「新台灣安社終於合流於當時存在於北京猛[孟]端胡同世界語專門學校內的北京安社，在北京安社出版的宣傳刊物中設《新台灣》做為活動的開始。以後，范本梁停止學業專門從事新台灣安社的宣傳活動。」²⁵⁶

²⁵² 關於演講，上海《民國日報》僅記之「台灣人某君」。這次演講的內容後以〈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為題，發表於廣東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關於〈新台灣安社宣言〉一文，《台灣社會運動史》自謂其譯文轉載於《新台灣》。〈宣言〉署名「新台灣安社」、署日期「世界語紀元三十八年二月八日」。見：〈追悼克魯泡特金〉，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2月14日，第6~7版；范一洗，〈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1卷第8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6~10。

²⁵³ 《台灣社會運動史》將此明信片誤記為1923年的賀年片，誤。實際上是1924年。此由明信片所簽署的年份「甲子年正月元旦」（甲子年即1924年）便知。另外，由於這張明信片的中文原文被轉載於1924年1月22日的上海《民國日報》，據此亦可推知此信實為抗議治警事件而發，不可能是1923年。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119；許天民，〈台灣人的賀年片〉，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月22日，第8版。

²⁵⁴ 不過，也許因為文章明確揭示了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目標，要求「打破一切不自然的制度」；並抨擊台灣的總督府與大陸上的軍閥政治，號召「共同推翻一切強權」，所以不少過激字句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被刪去。

²⁵⁵ 就「謹迎新春」而言，從其「純鳴者同人」的署名來看，可能與筆名「能鳴者」的范本梁關係不淺。就〈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而言，宣言的文風、層出的排比句型，以及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如「趣味」、「自然」）來看，也與范本梁的寫作風格相同。

²⁵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87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4。按引文中的「猛端胡同」實乃「孟端胡同」之誤，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在北京西城孟端胡同三十九號。見：壽田，〈國內世界語團體調查〉，《覺悟》，1924

雖然范本梁更為公開地進行他的宣傳活動，但因主義上的分化，復以范本梁身邊的人們總是來來去去（或者范本梁自己總是來來去去），導致《新台灣》始終只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判斷的一份「幾乎由范本梁一人撰述」²⁵⁷的刊物。但更正確地說，《新台灣》始終只是大量轉載外稿的刊物。以《新台灣》第二號（1924.12.5）來說，經考證，多數文章都是外稿，所轉文章底時間跨度也長。改成報紙型態後的第三號（1926.3.1）有較多專稿，但外稿仍多，甚至連1907年所發表的文章也收錄其中。（考證見表3-2）。

大量轉載外稿有幾層意義：首先，這一現象反映了《新台灣》的筆陣確實可能薄弱、甚至可能只有一人。其次，這一現象也體現出一種「揀擇」，也就是透過范本梁對於大家著作的挑選，將東西方無政府主義的菁華，壓縮地、迅速地傳送給台灣人民。然而范本梁在理論上的無力，卻也足以見之。其三，在范本梁所轉載的刊物中，《實社自由錄》是現知最早關心臺灣革命問題者。一個叫「M. Huang」的作者曾號召聯合朝鮮與台灣的志士，「一方謀補助其國民之教育知識，使其有革命之思想。一方而鼓動民氣，實行暗殺，起風潮」。²⁵⁸

據說，《新台灣》的「印刷和北京安社的機關報一起委託北京大學出版部，每號刊行五百份左右，向僑居北京的留學生們、廈門、東京、島內密送分發。」²⁵⁹范本梁曾刻意將刊物寄給一些具有激進傾向的台灣人（比方程水源²⁶⁰）；也寄給大陸上一些作為地方有力者的台灣「籍民」（然而這些有力者竟拿著《新台灣》去當地日本領事館檢舉）；²⁶¹甚至范本梁還強迫好友張深切（1904~1965）把大量刊物帶回台灣（卻在海關遭到沒收）。²⁶²總之，收到這份刊物的各地台灣人，並不盡然認同范本梁的主張。然而范本梁仍以著強烈的個人色彩進行他的活動。他力求糾集同志、力圖宣傳主義、力謀壯大組織，從而產生一條由1922年延續至1926年的活動軌跡（1926年，范本梁於台灣被捕²⁶³）。

這個軌跡，對於「新台灣社」（從而「新台灣安社」）來說，是一條由個人活動努力向著組織運動轉化的歷程。雖然迄今仍難評價這一轉化是否成功，但若相比於台灣人在大陸所組建的其它無政府主義小團體，這一歷程的**持續性**便顯得格外突出。1923年出現的北

年3月8日，第3版。

²⁵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5。

²⁵⁸ M. Huang，〈暴動罷工革命〉，《實社自由錄》，第2集（1918.5）。轉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卷，219。

²⁵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5。

²⁶⁰ 程水源（生卒年不詳），又名陳幸西，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人。曾被日本情報單位視為對於政治思想與時事有「粗暴矯激」之言論與行動的人。他曾在廈門。謝雪紅指出，他可能在抗戰中前往蘇聯留學。見：謝雪紅《我的半生記》，216；〈皇太子殿下行啟二閱スル各種要視察人ノ件（1923.3.16）〉，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²⁶¹ 〈不逞印刷物押收二關スル件（1926.3.29）〉，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²⁶² 范本梁之所以要張深切幫他這個忙，是為了追求蔡阿信（1899~1989），但蔡阿信並不理他。後來阿信與彭華英結婚。見：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68~270。

²⁶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4、10。

京「韓台革命同志會」就是曇花一現的小組織。據洪炎秋回憶，這是一個由朝鮮與台灣青年所成立的組織。雖然洪炎秋並未稱之為無政府主義的團體，但從會內的朝鮮成員均熱中於「暴動、暗殺」的傾向來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不能排除。此外，雖然洪炎秋強調台籍成員（張鐘鈴、洪炎秋、楊克培等）因消極抵制上述傾向而致組織走上消亡，²⁶⁴這種抵制卻不能簡單視為無政府主義與非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對抗。因為張鐘鈴正是日本情報機關所明確認定的無政府主義者。²⁶⁵總之，組織內部的矛盾也許另有所因，但其速起速滅卻是不爭的事實。

范本梁得憑一己之力而持續進行活動的動力何在？「他有怪癖，不和人家取同一步驟，主張個人行動，自作自受，不願意累及別人，所以他的隱密少有人知道。」²⁶⁶雖然不能肯定范本梁離京返台之前是否較好地實現他的組織工作，但在無政府主義所形成的跨地域連帶的過程中，范本梁的腳步必然留下足跡。

第三節、時代問題：「政權」

在與范本梁有關的文獻中，以下幾篇文章最為重要：

1. 1923.02 月前：《新台灣創刊的宣言》，署名「一洗」（范本梁）。²⁶⁷
2. 1924.01.01：《謹迎新春明信片》（可參見附錄 3-1）。
3. 1924.02.08：〈新台灣安社宣言〉，載於 1924.04.15 發行的《新台灣》創刊號。²⁶⁸
4. 1924.03.05：〈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可參見附錄 3-2）。
5. 1924.12.05：〈實行部的宣言〉，署名「能俠者」。²⁶⁹
6. 1926.03.01：〈我們的革命運動〉，署名「斯民」（范本梁）。²⁷⁰

²⁶⁴ 洪炎秋，〈序〉，收錄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2004），4~5。

²⁶⁵ 洪炎秋指出，這個組織的結成，源自於當時就讀於「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張鐘鈴與朝鮮青年的交往。由於這所學校實開學於同年 9 月 11 日，因此「同志會」的結成也許應晚於此。謝雪紅則親自指出：「1923 年間，楊克培、游錦順（彰化市仔尾人等）在北京和幾個朝鮮人共同組織一個『韓台協會』，作為台灣人和朝鮮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相互支持和聯繫的團體。」從前述「同志會」的狀況來看，朝鮮青年的「暴動、暗殺」主張，頗似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有的不穩行動；然而他們（乃至張鐘鈴等台生）是否確有此種「主義」上的意識，洪炎秋並未說明。但在日本情報單位的眼光裡，張鐘鈴等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並云北京的台灣青年曾在 1923 年 9 月 9 日，與「中韓互助社」的朝鮮人共組「九九社」。「九九社」是否就是「韓台革命同志會」？值得探究。見：洪炎秋，〈序〉，收錄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4~5；謝雪紅，《我的半生記》，154；〈在北京台灣籍民二閩スル件(1925.4.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關於中韓互助社，可見本文第四章的討論。

²⁶⁶ 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66。

²⁶⁷ 〈新台灣創刊宣言配布の件(1923.2.1)〉，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²⁶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6~10。

²⁶⁹ 能俠者，〈實行部的宣言〉，《新台灣》，第 2 號（1924，北京），3~6。

²⁷⁰ 斯民，〈我們的革命運動〉，《新台灣》，第 3 號，2。

雖然部分文獻無法確認是否為范本梁所作。但為求敘述上的方便，以下行文仍將以「范本梁的論述」來概稱這些與范本梁有關的文獻。讀者當能自行分辨這些文獻之間的異同。

范本梁是最早針對台灣既存社會運動進行路線分析的社會主義者。范本梁在 1923 年的《新台灣創刊的宣言》中首次區分出兩條路線：一是日本東京新民會所推動的「政治運動」，二是台灣台北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運動」。1924 年的〈實行部的宣言〉則將兩條路線表述為「請願運動」以及「文化運動」。就此來看，前一篇文獻所謂的「政治運動」，也許正是在新民會指導下以東京為舞台的議會請願運動。在所有與范本梁有關的文獻中，除了《新台灣創刊的宣言》稍微肯定文化協會，以及治警事件後的〈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積極肯定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之外，文化協會以及請願運動都是在被批判的意義上才被提及。而〈實行部的宣言〉不但批評了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更進一步批判了當時台灣的三種反日主張。²⁷¹總體來看，范本梁對於台灣既存社會運動的態度體現為完全否定或趨於完全否定。

范本梁的論述可以概述為兩種關係：(1) 少數人的暴力與「自然的趨勢」之間的相剋，(2) 以多數人的暴力對付少數人暴力的反相剋。

僅從現象上看，范本梁的論述以相當矛盾的方式使用「暴(力)」的概念。比方說，〈新台灣安社宣言〉譴責請願運動是「以暴易暴的運動」，但〈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又希望請願運動者「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而范本梁雖然號召台灣人民進行「猛烈的世界大眾革命」、「猛烈的暴動性社會革命」、「民眾用暴力的革命」、「民眾革命」、「直接革命」、「暗殺」、「暴動」以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但他在最初在《新台灣創刊的宣言》提出的主張，卻是反對新民會去「挑戰台灣政府」。范本梁在各種文獻之間以及之內所出現的種種矛盾，有可能他自己的思想出現變化所致、甚至可能是范本梁頭腦不清楚的反映。但若范本梁的想法始終是一致的，此間的一致性又該如何存在？

這個問題可從范本梁的論述中所引用的「以暴易暴」概念談起。「以暴易暴」是吳稚暉所創造的概念，乃其「三期革命說」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是「傳統時代」，特質是「以暴易暴」的王朝交替。後兩個階段則分別是作為過渡時代的「共和革命」，以及作為大同時代的「無政府革命」。學者指出，這種「三期革命說」，是康有為公羊三世說的翻版。而「以暴易暴」階段就等同於康有為的「據亂世」。²⁷²「以暴易暴」意味著以少數人的暴力

²⁷¹ 〈實行部的宣言〉這篇文章批判了三種反日主張。第一種是「復回祖國」論者，他們認為「欲救台灣必先救其祖國」，故紛紛返回祖國。第二種是「得天時」論者，他們認為日本因得其天時才能占領台灣，所以要認命；但若「天公」顯靈，日本人必被剿滅。第三種則是「準備」論者，他們對於請願運動、文化運動深表懷疑，所以主張開戰，但開戰之前，得先準備。「能俠者」批判三種論調的基礎，在於他認為台灣革命必須在台灣進行，並且應當直接進行。所以，他批判第一種主張只是逃回祖國當官僚的走狗，貪生怕死；批判第二種主張過分迷信、荒誕不經；最後則批判第三種主張的「準備」將會準備到無了時，沒有實現的一天。這篇文章的見解極有趣味，可以參考若林正文所區分出的三種「台灣解放構想的座標軸」，分別是「待機派」、「祖國派」、「台灣革命派」。見：若林正文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172~181。

²⁷²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見：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68；李柏玲，〈吳稚暉與早期無政府主義宣傳〉，《大慶師專學報》，1989 年第 1 期。

替代少數人的暴力，暴力並不會在此中消失，而只是移轉。暴力的直接體現，則是國家政權。少數人的暴力意味著對於「自然的趨勢」的扭曲與侵犯，因此，只有消滅少數人所造成的暴力，才可能走向「自然的趨勢」本身。而消滅少數人暴力的方法，只能依靠多數人的暴力。

吳稚暉把「共和革命」作為過渡時代而放在兩個階段中間，其實有將無政府主義革命調和於孫中山反滿共和革命的用意。但范本梁不但沒有共和革命之階段，反而有把一切與「共和革命」有關的事物——乃至政權——歸類為「以暴易暴」的傾向。從而「普選運動，女子參政運動，又如我台灣的民選議會請願運動」這類具有政權要求的運動全部成為他反對的對象。誠如范本梁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所定義的那樣——「以暴易暴的革命運動」就是「私圖自家的權威底不徹底的政治革命的運動」。

因此范本梁論述中的矛盾可以如此理解：只要不以少數人的暴力（政權）替代少數人的暴力（政權），並且最終能消滅暴力（政權）本身，他都可以接受。所以，（1）范本梁之所以反對「挑戰台灣政府」，也許正在於他看到新民會系統的「政治運動」所提出的政權要求；這種要求只能是「以暴易暴」。（2）如果「抗暴」被理解為多數人消滅少數人之暴力之暴力、並就此消滅暴力本身的話，那末歌頌「以暴抗暴」也許就不矛盾於譴責「以暴以暴」。〈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之所以期待請願運動的「諸位先鋒」能夠進行「大眾運動」來「激烈的以暴抗暴」，也許正是如此。只是這個期待落空了。

就反對政權的意義而言。范本梁對於「以暴易暴」的反對體現了他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但他不只反對國家。從新台灣安社留下的文獻來看，「民眾」是重要關鍵詞。幾乎只存在「民眾」、「民眾革命」，而少有「民族」、「台灣民族」。甚至，在「弱小民族」這一慣用語外，還使用了「弱小民眾」一詞。其意義昭然，雖然台灣人是被壓迫的民族，但范本梁及其安社解除民族壓迫的方案，卻是反對民族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因此「民眾革命」的第一層意義，就是反對民族主義。

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范本梁還批判了以「率獸食人而使人類同胞互相爭鬥互相殘殺的那個侵略主義」為內容的「愛國主義」。並批判那些誤解弱小民族（眾）革命運動為「愛國主義」運動的觀點。²⁷³范本梁直挑「愛國」而提出的批判，不但是針對民族主義，更針對「國家」。也就是，弱小民族（眾）的革命並不以建立新國家為目標。〈我們的革命運動〉指出，弱小民族（眾）的革命運動應該是一個與「純粹的社會大革命的運動」有所區別，卻又能聯繫於「最痛快最爽絕的社會大革命——全世界的平民大革命」的「**準備運動**」。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只有在弱小民族（眾）與「第四階級」——無產階級——聯手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從而進行「社會大革命」，「來同申正義與人道於四海；來共謀

²⁷³ 斯民（范本梁）：「自稱社會大革命家的人們，誤認我們弱小民眾的革命運動——台灣的革命運動，韓國的獨立運動，安南的反抗運動，印度的自治運動——以為是局[侷]束於愛國主義的運動而所蔑視的偏見；又是一般怕死的狗鼠之輩（政府的爪牙，資本家的走狗），讀過新台灣安社能使者（實行部）的宣言，所大驚小怪而發出來的一個呼救的咆哮；但是我們的運動是否愛國運動？是否率獸食人而使人類同胞互相爭鬥互相殘殺的那個侵略主義的愛國運動？這是不容我們重新再說的。」見：斯民，〈我們的革命運動〉，《新台灣》，第3號（1926，北京），1~2。

和平與幸福於人群；而來成就一個真平等真自由真博愛的新社會——無政府共產的社會——，而來實現一個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四海皆兄弟五洲同一家的新世界——大同世界——。」

范本梁所主張的「無政府共產主義」(anarcho-communism)，乃是克魯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 1842~1921)所主倡的思想。這一主義，因完全不考慮蒲魯東(Proudhon, 1809~1865)、巴枯寧(Бакунин, 1814~1876)所在意的勞動報酬公正、公平性，取消整個工資觀念與價格系統而被稱為無政府的「共產主義」。至於通向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的方法，就是透過范本梁所接受了的「社會大革命」概念。

王遠義指出，「Kropotkin 不迷信任何形式的經濟或歷史決定論。他相信人類祇有在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自然原則引導下，經由漫長的教育努力，善取古今制度、人事的優點，對於當下不善的事物，逐步予以改良，始得一美好理想的新社會；他稱此途徑為社會大革命。」²⁷⁴范本梁輒以「自然的趨勢」作為人類所應順應的規律。然而，自然的趨勢為何會產生不自然的存在(諸如家庭、私有制、國家、資本主義)?²⁷⁵如果必須要用「猛烈的暴動性社會革命」才能通向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這個門檻是否自然?

范本梁未能回答這些問題，他始終無法說明必然性與現實性之間在歷史上的關係。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當然包括范本梁)對於眼前的資本主義及其社會始終缺乏解釋力、始終不認為這些「不自然」的存在有其理由。或者說，正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所反對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及其社會，而是平起平坐的婚姻、家庭、國家、資本主義，等等。所以不會特別去解釋資本主義及其社會究竟是什麼，從而也發展不出歷史階段論，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舊社會都一樣。但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同。馬克思主義的特色即在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精密剖析，從而由此抽繹出一套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正因如此，在描述未來社會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無法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範疇。²⁷⁶就范本梁的案例而言，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等於零，這反映了他的無政府主義背景。但就他把舊社會與新社會的差別集中在政權可否消滅而言，則必須考慮：台灣所存在的強有力的殖民政權以及一個反殖民政權卻又希望建立代議制政權的運動，是否可能成為范本梁通向無政府主義的時代背景。

就整個一九二零年代的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來看，除了組建於1929年的台灣勞動互助社曾留下抄錄自「柳絮」(柳樹人, 1905~1980)所著《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底更精細的革命理論外，²⁷⁷其餘大大小小的台灣無政府主義組織，都未能留下起碼比范本梁更具

²⁷⁴ 王遠義，〈無政府主義概念史的分析〉，《台大歷史學報》，第33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2004)，419。

²⁷⁵ 這些問題與克魯泡特金思想本身的問題點是類近的，王遠義並指出：「Kropotkin 的學說思想，常常啟人疑問：他的進化思想，是不是一種決定論？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否正視武裝的政治鬥爭？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們之所以不能予以非黑即白的回答之故，正因為 Kropotkin 的思想體系中，既縮合了決定論與意志(will)兩相矛盾的要素，復將革命破舊與平民教育，同列在改造的議程上。」

²⁷⁶ 這種差異，正同無政府主義希望在社會革命之中連帶消滅國家，而馬克思主義需要在社會革命之後保留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是一樣的。關於如何用資本主義社會的語言描述革命後的社會，可見：阿里夫·德里克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205。

²⁷⁷ 柳絮，即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樹人，《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轉引的台灣勞動互助社秘密文書，完

體系的理論。當然，即便這個革命理論初具體系，范本梁的說明仍不脫原則性的表述。不過，早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范天均曾指出，「研究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問題，不能以外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來理解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²⁷⁸雖然范天均也指出克魯泡特金及其無政府共產主義對於中國的意義，遠高於其他任何無政府主義。但從范天均前面一個說明出發，范本梁的思想也許還有深入討論的可能。

第四節、結論

當台灣社會主義者於 1924 年另外組建「平社」於上海時，曾有成員評論當時的台灣社會運動，認為「除開無政府主義少數幾個人而外，要算議會運動頂興盛。」²⁷⁹在「B」派勢力日漸壯大於全東亞的情況下，走純粹「A」派道路的范本梁雖然無法達到議會請願運動的規模，卻仍是其他台灣激進份子眼前的一股勢力。然而范本梁完全排斥「B」派的態度，使他始終無法順利將運動開展出來。

1926 年發行的《新台灣》第 3 期曾宣稱新台灣安社進行改組。其中有署名的發起人（俱化名）有五人，但宣稱總計十八人（此外，還有六人捐款的名錄，但無法確認與前十八人的關係）。改組的成效究竟如何，無法推測。但從《新台灣》過多的轉載稿件來看，《台灣社會運動史》關於范本梁始終處於一人組織、一人刊物的論斷，不能忽視。實際上，沒隔多久，由於北京政局丕變，壓縮了在京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空間，遂使范本梁被迫離京。²⁸⁰同年 7 月秘密歸台，並於同月 15 日遭到被捕。²⁸¹反過來看，設若范本梁確實組成了一個少則五人，多則十八人的組織，北京的白色恐怖或其個人的被捕，是否能輕易地造成組織的潰滅？質言之，范本梁的個人活動，恐怕始終難以形成組織運動。

島外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至此暫告段落。雖然范本梁的活動可以從 1923 下探至 1926 年，然就史料來看，島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起源與范本梁的關係並不大。1926 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成立，這是島內第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范本梁的被捕以及島內無政府主義者的崛起，交錯而生，這就是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 1926 年。

不過，范本梁絕非白白走過。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恰恰說明了范本梁的足跡是如何難以磨滅。黃玉齋將台灣革命分為三期。最近的第三期，就是今日習見意義上的「台灣

全從他所寫的《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抄錄而來。分別是原書的「C.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動政黨連絡」，「E.革命的組織」，以及「F.組織的原則」、「G.戰略」。分見：柳絮，《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書局，1929），20~30；36~51。

²⁷⁸ 〈訪問范天均先生的紀錄〉，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1047。

²⁷⁹ 貞，〈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1924，上海），4。

²⁸⁰ 就日本內部的情報資料來看，1926 年 1 月，范本梁曾一度行蹤不明，4 月時據說在台中出現。見：〈在北京台灣籍民二關スル件（1925.4.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²⁸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1、4、10。

社會運動史」。由於第三期正是黃玉齋所直接身處的時代，他在分析第三期的革命運動時（第十八、十九章），便更有機會運用他所能取得的各種運動材料來寫作。直接引用到材料原文的部份，除了文協系統的刊物（如《台灣青年》、《台灣民報》）之外，也引用到今已不存的《新台灣》創刊號。²⁸²其中，引用最多的一份刊物叫做《台灣新青年》，達三次。²⁸³這是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所刊行的機關刊物，發行於1925年6月。

黃玉齋所引的這些原文，迄今看來有幾個重大意義。首先，這是一種史料保存。若與收羅並日譯所有史料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相比，即便《台灣革命史》只擷取若干史料的片段，卻足使後人窺見其原文面貌。其次，顯然黃玉齋當年是能取得這些原始材料的。但他是基於什麼條件而取得呢？是不是他與這些組織或個人有什麼聯繫呢？其三，黃玉齋顯然也知道當時存在過《平平旬刊》或「台灣同志會」²⁸⁴的刊物或組織，但他為什麼沒有引用，甚至沒有將之歸類？是不是對他來說，這些刊物或組織只是耳聞？

黃玉齋這本書，由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1899~1972）校訂，並予序言。這是一個線索。雖然不能直接從這個線索斷定黃玉齋對於無政府主義，具有任何偏好（比方黃玉齋為何特別突出新台灣安社的無政府主義活動）。但朱謙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絕非萍水相逢。1925年4月12日，朱謙之應邀至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演講。登載這篇演講辭的刊物，恰恰是《台灣新青年》。²⁸⁵《台灣新青年》是個什麼主義都混雜一同的集合。²⁸⁶從作者的筆名就可見其端倪（如「[馬]克思」，「[安]那其」）。一篇題為〈台灣政府貫連資本家榨取民利之要聞〉（署名「那其」）的文章，甚至部分改寫了新台灣安社〈實行部的宣言〉，²⁸⁷並在文章最末呼籲：

我敢說咱留閩的台灣青年一天快一天緊打倒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可實行無政府

²⁸² 《新台灣》創刊號所藉以保存的，只有部份的〈新台灣安社宣言〉，這份文獻目前只能在《台灣社會運動史》見其日譯全文。關於〈新台灣安社宣言〉殘文，見：漢人，《台灣革命史》，131~132。

²⁸³ 分別是：毛常，〈台灣新青年祝詞〉，《台灣新青年》，創刊號（1925，廈門），137；仲農，〈小宣言〉，《台灣新青年》，創刊號，126；愛智，〈新老子的政治哲學〉，《台灣新青年》，創刊號，156~157。

²⁸⁴ 關於台灣同志會，可見表4-6：(04)的考證。

²⁸⁵ 朱謙之，〈台灣學生聯合會演說辭〉，《台灣新青年》，創刊號，11~15。

²⁸⁶ 有的作者，一邊歌頌列寧主義，另一邊則主張無政府主義式的暗殺暴動（表3-2：27）。有的作者擁護文化協會（表3-2：12、26），有的作者主張返回祖國加入國民革命（表3-2：14）總的來看，無政府主義比較突出。除了朱謙之的演說詞以外，有的作者則展現出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復古「國粹」傾向，大談老子與「新老子」，用以古諷今的方式批評辜顯榮，並期待一個小國寡民的世界（表3-2：16）。

²⁸⁷ 那其：「我再說吾台的納稅看有極點還未極點大家評罷了，土地稅、地基稅、自治稅、街庄稅、手車稅、所得稅、自轉車稅、保甲稅、蓄妾稅、戶口稅、遊興稅、衛生稅、市場稅、煙酒稅、家屋稅、奢侈稅、營業稅、人頭稅、等是一小部分，若論稅屈指也不會完的啦！」新台灣安社〈實行部的宣言〉則云：「他們日本強盜就帶[帶]著刀背著銃，提了砲彈用了法律，來命令我們給他納什麼土地稅，什麼地基稅，什麼家屋稅，什麼戶口稅，什麼人頭稅，什麼家畜稅，什麼屠畜稅，什麼地方稅，什麼所得稅，什麼營業稅，什麼煙酒稅，什麼遊興稅，什麼奢侈稅，什麼蓄妾稅，什麼肥料稅，什麼種苗稅，什麼自治稅，什麼街庄稅，什麼保甲稅，什麼市場稅，什麼衛生稅，什麼清水溝稅，什麼塵埃糞稅，什麼手車稅，什麼自轉車稅，什麼牛馬羊稅，什麼豬狗鵝稅……等等。」以上分見：那其，〈台灣政府貫連資本家榨取民利之要聞〉，《台灣新青年》，創刊號，21；能使者，〈實行部的宣言〉，《新台灣》，第2號，1。

於台灣啦，……

1926年的《台灣革命史》，保存了1925年《台灣新青年》及1924年《新台灣》的殘文；1925年《台灣新青年》，則又保存了1924年《新台灣》的遺跡。雖然這不是范本梁所能預想的道路，卻是其無政府主義活動的見證。

范本梁足跡的又一見證，則來自共產國際。1928年6月，在一份報告裡提到：²⁸⁸

近來，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嘉義發生范本梁（Han-honryo）事件，此事並可聯繫到宣傳獨立的刊物《新台灣》的發行，……

引文顯然是指范本梁的被捕事件。這份報告中，唯一與無政府主義運動有關的部份，就是范本梁這段。雖然整份報告絲毫未將范本梁當成無政府主義者來探討，也從未討論島內是否有過這樣那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但范本梁留下了足跡。1931年，日本警特大舉取締台灣勞動互助社時，竟然搜出了范本梁的《新台灣》。²⁸⁹范本梁的腳步雖然艱難，其足跡卻如此難以抹滅。莫怪乎《台灣民報》將范本梁的被捕稱為「社會運動史上」的「四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之一。²⁹⁰稍晚於范本梁的社會主義者周合源（1903~1993）曾讀過一本《新台灣》，周合源說，「內容相當激烈，甚至暗示可以訴之於暗殺手段。」²⁹¹「但我還是不太能贊同。覺得那種行為畢竟是得不償失。但也有些朋友相當共鳴。我們把這一類人民對權力者的暴力手段，叫做群眾恐怖，來和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分開。」²⁹¹

但在范本梁實現周合源所謂的「群眾恐怖」之前，「白色恐怖」就先將范本梁下獄了。獄中的他，留下「瑣言」曰：「夫余之獲禍而至於此，雖係言之不謹，而全失自由之身軀，然心意既無所愧於前人，則大覺廣大高明，毫無喪本然之象，猶若明鏡為醜婦之冤，設有受損被毀之災，固無自失其氣節之患也。」²⁹²並賦詩云：²⁹³

立志男兒要克難 不干荊棘萬重山 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
「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這就是范本梁道路最瀟灑的注腳吧！

²⁸⁸ 《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的檔案（寫於1928年6月31日，原文英文），收錄於K. M. Тертцкий（郭杰）&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白安娜），*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267.

²⁸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6~37。

²⁹⁰ 〈來年に繰越す・重大事件の決算・社會運動史上に特筆すべきもの四つ〉，《台灣民報》，1927年12月25日，第10版

²⁹¹ 林書揚，〈追述世紀的旗手周合源先生〉，《海峽評論》，37期（1994，台北）。

²⁹² 范本梁，〈獄中瑣言〉，《台灣民報》，第137號（1926，東京），15。

²⁹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4、10；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208。

第四章、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首次組織化

引言：上海的兩個秘密集會：1921年7月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21年夏天的上海，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年的七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終於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實現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治集結。這次大會的召開是秘密的，當然也是不合法的。開會期間，在租界警察的破壞下，與會的十幾名代表被迫從城裡的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的嘉興。在嘉興「南湖」水上的一艘小船裡，代表們完成了這次大會。對於中共來說，這次大會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也恰恰是這次重要的大會，在中共黨史上構成了一件長期懸案，同時也成為反共者的一件笑柄——因為竟沒有人（包括大會代表）能說清這次大會的開會日期。

這件懸案直到一九八零年代才得到解決。而關鍵竟是一場凶殺案。7月30日晚，租界警察突然搜查中共的一大會場；31日凌晨，借居於上海「大東旅社」的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在同旅社中遭遇凶殺案。連續遭到兩件事情驚嚇的陳公博，驚魂未定，馬上帶著新婚妻子離開上海。由於陳公博在「大東旅社」所遭遇的不凡經歷，史家們才得以透過當時的報紙，核對出正確的大會召開時間。²⁹⁴

就在陳公博逃出上海、離開大東旅社、拋下歷史性的「一大」不管之時。同樣的上海，同樣的大東旅社，卻在同樣的31日，進行著一個群集台灣、朝鮮、菲律賓、印度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為當時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1921.11.11~1922.2.6）而進行的對策集會，議題則是如何實現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獨立。

據日本情報資料，²⁹⁵會議至少在7月24日時就召開了（中共一大則是23日），台灣的代表則是著名民族主義者蔡惠如以及原在日本留學的彭華英（1891~1968）。此後數月，大東旅社成為蔡惠如等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重要聚會所。某種意義上，此時的大東旅社，正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因為當時的上海是東亞各地激進份子的聚集地。范本梁曾大力稱讚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8，見表3-2：03）當時

²⁹⁴ 關於這一考證的故事，可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266~273。

²⁹⁵ 關於蔡惠如以下各種活動，最詳細的資料俱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這部份史料可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相關史實時的祖本，但所載內容顯然較為完整、正確。

就在上海，據稱與蔡惠如等人有所接觸。此外，同年下半年，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的親善合作為目的「中韓互助社」正式成立，蔡惠如也出席了互助社的一些活動。²⁹⁶實際上，租界警察之所以搜查中共一大會場，並非為了中共本身，而是誤認這些結社者為「日本社會黨」人。就此而言，選擇在上海召開一大的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孤立地進行著自己的集結活動。跨地域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連帶，也同時積極地形成。

會什麼集結在上海？上海是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也是集一切破敗及罪惡於其中的淵藪。²⁹⁷恰恰是雜揉各種矛盾於一身的特質，使得上海成為激進主義的產生地、成為東方各地革命者的搖籃及避難所。當時曾在上海的張深切認為：²⁹⁸

東京的社會運動，當然比不上上海，上海有租界的掩護體，可以大聲疾呼談吐革命，所以各弱小民族或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志士，多避入租界裡從事革命活動。……租界無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基地，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培養革命家的溫床。有這特殊的地界，所以中國更形四分五裂，軍閥層出不窮，任打不倒；也因為有這互不相侵的特殊地界，所以中國革命才能發展進步……

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各弱小民族激進份子群聚上海尋求跨地域連帶，才成為上海的不可磨滅的一幕史像。做為最早奔走於日本以及大陸各地進行反日社會運動的台灣人，蔡惠如力促議會請願運動實現第一次請願之後，即於 1921 年初轉回中國，並在上海與各地弱小民族激進份子展開積極接觸，後來則到北京創立了大陸上第一個台灣青年會。至於彭華英，則分別與同樣參與「可思母俱樂部」活動的范本梁離開日本，先後於同年 7 月以及 8 月抵達上海與北京。

然而，蔡惠如與彭華英的活動，並不直接是台灣人在上海開展運動的起點。對於 1921 年才首次嘗試「政治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人而言，以東京為主要舞台的請願運動仍有極大的吸引力。此外，上海也尚未成為足以撼動中國（乃至東亞）發展的社會運動核心地域。就臺灣人來說，直到 1923 年下半年，以台灣人為中心的社會運動才開始在上海出現。

本章所要討論的對象，就是一個在 1923 年下半年之後誕生於上海的跨地域結社——「平社」。這是一個有台灣、大陸、朝鮮、日本等地激進青年參與其中的結社，也是台灣史上首次定期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宣傳社團主張的結社。由於「平社」的歷史

²⁹⁶ 1921 年 9 月，中韓互助社曾邀廣東政府徐謙出席茶話會，據《台灣社會運動史》云，蔡惠如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反日言論。《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 1920 年，實誤。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82~83；〈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台灣獨立運動計畫ニ關スル件（1921.11.16）〉，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此外，關於中韓互助社的研究，可見：康基柱，〈「中韓互助社」述評〉，《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1998，北京），266~279；裴京漢，《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34~43。

²⁹⁷ 張深切說：「上海的社會現象，無一不使海外回來的僑胞觸目傷心。」「台灣的智識青年，一看這罪惡淵藪，無不扼腕悲痛，恨不能一手擎天，掀起大革命，把一切的罪惡掃除乾淨。」見：張深切，《里程碑》，上卷（台北：文經社，1998），39。

²⁹⁸ 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74。

性準備，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才首次升級進入組黨階段，誕生了台灣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赤華黨」。本章的任務是大致描繪這一集結的輪廓。「平社」及「赤華黨」的組織者——台灣青年許乃昌（1907~1975?），則是本章將時時碰觸的重要線索。因為他是唯一能夠全面說明此過程的關鍵人物。

第一節：上海的複雜背景

1. 上海：主義的激戰地

從現有史料來看，1921 至 1923 年底之間是台灣人政治性活動在上海的斷層期，也是上海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心的蘊釀期。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在上海的發展，今天的歷史學家有自己的理解、分析與回答；當時的台灣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答案。許乃昌是最早關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台灣人，同時也是介紹這種運動給台灣民眾知道的第一人。許乃昌通向上海的歷程，正是台灣社會主義者在上海實現集結的一個斷面。

許乃昌，彰化市人，1907 年生，曾用名「許秀湖」、「秀湖」、「秀湖生」、「沫雲」。家中排行長男。²⁹⁹其父許嘉種（1883~1954）是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健將。³⁰⁰許乃昌在故鄉就讀商業學校預科之後，即以學習英文的名義前往大陸。³⁰¹進入大陸後，首先進入以懷柔華僑子弟為宗旨的南京暨南學校就讀。³⁰²至少至 1923 年 5 月底為止，許乃昌都還留在南京。³⁰³從 1922 年至 1923 年 9 月間，許乃昌頻繁地而廣泛地投稿文學批評性質的文章於各地報刊。部份投稿在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甚至具有先驅性地位。剛到大陸的許乃昌，以引介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為主要寫作取向，但尚未發現有具體的新文學作品。後來他開始將大陸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介紹到台灣（這是史上首次）。³⁰⁴漸漸地，許乃昌把視線

²⁹⁹ 關於許乃昌家庭與出生背景、筆名的考證，可見：邱士杰，〈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上）〉，《批判與再造》，第 20 期（2005，台北），27、35。注釋第 5。

³⁰⁰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36。

³⁰¹ 日本警察單位 1925 年的情報資料載云：「本人[許乃昌]在故鄉的商業學校預科畢業二年之後，約在三年前以研習英語為目的，渡航至上海，在學於同地之上海大學時，親炙俄國文學。」見：〈露國ヨリ歸來セル台灣人ノ言動ニ關スル件（1925.9.21）〉，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³⁰² 關於就讀暨南學校一事，可從許乃昌投稿於《文學旬刊》的稿件署名知之。許乃昌留在蘇聯的檔案資料也肯定了這點。見：K. M. Терпщ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61.

³⁰³ 此據許乃昌所投〈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一文所註明之寫作地點（南京）與寫作日期（1923 年 5 月 29 日）而推知。見：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 4 年第 7 號（1923，東京），43、48。

³⁰⁴ 許乃昌投稿的報刊包括了：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主辦）、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東京《台灣》雜誌，以及東京《台灣民報》。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

從新文學轉移到了思想界。

許乃昌在 1923 年所撰寫的〈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收於本文附錄 4-1)，是台灣史上第一篇介紹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諸派系的文章，更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則素描。這篇文章，將這些派系視為引導中國通向革命——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前提。貫穿其全過程的金線，則是社會主義思潮。當時中國思想界日趨左傾，形塑出「激烈赤化中的中國」：

中國已非台灣的人們所誤認的沉睡中國，現在已經是以思想所組織的**主義的激戰地**。通常，追求更好的社會是人類的本性要求，其直接手段則非○○[革命]不可。一次的○○[革命]會使社會遭受極悲慘的莫大災禍，然此一時性的淒慘，卻能產生美好的社會組織。**可以說，○○[革命]就是社會進化途上一個非經不可的關卡。而行為——○○[革命]——之前，必須有思想為其前驅。**我們可以看出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狀態極端混亂，而其趨勢大部分皆有向左且更左的傾向。研究現在的國情，再觀察這一左傾的思想狀態，不難推測出，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赤色第四階級**的革命發生。

許乃昌將中國思想界區分為如下幾大派系，其中(1)(2)被其視為社會主義流派：

- (1)「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派；
- (2)「今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江亢虎」三小派；
- (3)「社會政策」派(張君勱、戴季陶、胡適等)；
- (4)「過去的人物」(梁啟超)。

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可以一起說明。青年團的成立早於中共，兩者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所成立的組織。但在許乃昌寫作〈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時(1923.3)，黨對團的領導關係尚未得到確立(1923.8才正式確認)。至於所謂的「今日黨」，則是國會議員胡鄂公(胡南湖，1884~1951)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創辦有機關刊物《今日》。他們與

悟》上，許乃昌發表了〈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底見解〉一文。在目前筆者僅見的研究文獻裡，許乃昌與謝六逸(筆名「路」，1898-1945)並被視為介紹「表現主義」至中國的先驅。關於許乃昌〈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底見解〉的歷史地位，可見以下述評：趙樂，《西方現代派文學與藝術》(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6)，735；陳惇主編，劉像愚、曾艷兵等著，《西方文學史》，第3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9。此外，1922年底，許乃昌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上發表〈雜譚〉一文，此文針對當時中國小說之寫作本質，提出了通論性的批評。後來許乃昌又發表了〈[雜譚]讀「心潮」裡底五篇小說〉一文，批評南京新文藝團體「玫瑰社」之刊物《心潮》充斥著僅能稱為「感想文」的劣質小說(從許乃昌的文章可知，當時許乃昌正在南京暨南學校)。對於《心潮》的批評，旋即引起反論，而有〈讀「心潮」後〉一文發表於同刊物，但討論未能延續。在《台灣民報》上，許乃昌發表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文。他認為，中國文化的進步正表現在新文學(白話文學)的發達上，對於同樣提倡白話文的台灣來說，介紹大陸新文學的發展，將很有意義。關於這篇文章的歷史地位：楊雲萍曾評論曰：「這遍[篇]雖是很簡單的，卻是介紹了中國文學運動的整個情形到台灣的最初的一遍[篇]。不過他只是介紹而已，並沒有積[積極]的主張到台灣文學自身的問題。」以上文獻可分見：許秀湖，〈[藝術談]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底見解〉，《覺悟》，1922年12月22日，第2版；許秀湖，〈雜譚〉，《文學旬刊》，第59期(1922，上海)，4；許秀湖，〈[雜譚]讀「心潮」裡底五篇小說〉，《文學旬刊》，第64期(1922，上海)，4；不著撰人，〈讀「心潮」後〉，《文學旬刊》，第69期(1923，上海)，3；秀潮，〈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台灣民報》，第4號(1923，東京)，3；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第1期第1期(1946，台北)，11。

中共之間存在競合關係，但成員多數最終轉入中共。就臺灣人而言，目前僅知謝廉清（1903~1961）同他們有聯繫。（關於「今日黨」，將集中在本文第五、第六章進行討論）

許乃昌所列舉的中共、青年團、到「今日黨」，俱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然而許乃昌還是注意到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派別，即江亢虎（1883~1954）。江亢虎是個雜揉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於一身的早期社會主義活動家，而許乃昌主要把江亢虎當成無政府主義者。不過，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江亢虎實有理論上的矛盾，並非許乃昌所謂的「無政府主義的大柱石」。

在許乃昌所列舉的四大派系中，除了「今日黨」以京津地區為主要活動地，其餘組織都活躍於上海。如果「激烈赤化中的中國」是個「主義的激戰地」，「激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上海。而這些派系在「主義」上的激戰，還體現於一種特別的實踐，就是辦學校。對於台灣人而言，此點意義可能更為直接。

在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的共同指導下，上海大學於1922年正式成立，並於1923年下半年開始招生。圖謀復興「中國社會黨」的江亢虎，也在上海成立了南方大學（1922年）。某種意義上，辦校乃是上海特色的一種反映，當時的上海存在著大量學校。雖說學校的數量，並不反映學校的質量，但對台灣人而言，南方大學、上海大學，以及許多補習學校、教會學校、乃至教會本身，都可以收容台灣人。上海基督教青年會（YMCA），以及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常出現的「務本英文專門學校」³⁰⁵，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這些地方不但是台灣人求學、庇護之所，甚至還是召開社會運動集會的場地。創刊初期的《台灣民報》有不少南方大學的學生投稿，即可為證。與此相比，北京不但難讓台灣人有可供躲避之處，學校的數量也少，就連設立一個青年會，其性質都仍像是個同鄉會。

³⁰⁵ 「務本英文專門學校」是一間由外國小型教會所主辦的補習學校，當時不但有許多台灣青年就讀於此，更是此後經常選擇的集會地點。在台灣社會運動的史料中，這間學校第一次出現於「上海台灣人大會」（1924.1.12）。關於這間學校的歷史：從該校刊登於上海《民國日報》的廣告分析，本校本名「郇立務本英文專校」，後於1924年改名「美國郇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據廣告，本校校址記為「上海寶山路」。廣告刊登者為「校長林鴻斌」，1924年校名更改後，刊登者改為「總理惟經。主任林鴻斌」。本校招生廣告常與基督教傳教廣告同登一處，刊登者記為「上海寶山路郇基督公同使徒教」或「上海寶山路西寶興里口郇總堂」。從務本英文學校為「郇立」（「郇」即「Zion」之意）來看，可能正是這一教會的附屬學校。若從教會地址「上海寶山路西寶興里口」來看，也與日本《外務省記錄》所記載的務本英文學校校址（上海寶山路寶興里）相同。此外，《外務省記錄》也曾指出，校長林鴻斌曾在校內的台灣人集會上，發表演說。*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4)*曾記載上海有個叫做「基督公同使徒在郇」（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 CCACZ）的教會，由C. F. Viking（可能即「惟經」）等美國人主辦。關於上海《民國日報》上的「務本英文學校」史料，可見：〈主耶穌將速重來接受聖徒上天〉，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7月23日，第4版；〈郇立務本英文專校招男女生〉，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7月23日，第4版；〈主耶穌能救人能醫病〉，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2月30日，第4版；〈美國郇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招生〉，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2月30日，第4版；〈美國郇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招生〉，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月15日，第4版。（招生廣告多連日登載，此處引用史料則取首次登載日期）。關於《外務省記錄》，可見：〈在滬台灣人ノ決議文提出二閱スル件（1924.1.17）〉，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關於*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4)*，見：Ricci Roundtable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ttp://ricci.rt.usfca.edu/institution/view.aspx?institutionID=227> (accessed 2007/3/24)

總而言之，上海具有特別有利於台灣人（尤其是激進的臺灣人）群聚於此的條件。

與許乃昌的其他文章相同，他所撰寫的〈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實乃重要的歷史見證。當台灣人想要了解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時，眼前所能遭遇或認識的「運動」，也許正是這篇文章所記載的這些派系。而當時正在南京的許乃昌，顯然也不只是熱切地遙望著上海（乃至北京）的「激戰」。寫下〈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後不久，許乃昌便從南京轉赴激戰之地上海，並於1923年9月以「試讀生」資格³⁰⁶錄取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此後直到許乃昌前往蘇聯的1924年中，許乃昌基本滯留在上海。此時的他，還不滿十八歲。

2. 上海台灣青年會及其成立前後的局勢

或許可以認為，由於有著上海的特殊環境（以及這種環境所形成的歷史性準備，如各種學校），台灣的激進份子才逐漸聚集於上海。他們不但在上海得到庇護，同時也透過這些場所而接觸到場所背後的社會主義勢力，進而實現自己的組織化。

許乃昌在上海的活動是具體而微的例證。也許是上海大學的緣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許乃昌是現知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³⁰⁷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³⁰⁸據聞後來還加入了

³⁰⁶ 當時的上大社會系是新創科系。全校由「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改制為上海大學之後，從1923年6月開始連續進行「招生」、「第二次招生」及「續招生」；許乃昌是在「續招生」之後錄取的。見：〈上海大學招生〉，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6月1日，第1版；〈上海大學第二次招生〉，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7月15日，第1版；〈上海大學續招生〉，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8月13日，第1版。許乃昌錄取「試讀生」的榜單可見：〈上海大學錄取新生案〉，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9月4日，第1版。關於試讀生的規定，筆者尚無法尋得文獻依據。許乃昌入學之後通過的〈上海大學章程〉則有插班生與特別生的規定，特別生招收於缺額時，可酌量免試入學，並可改編為正式生。試讀生之性質可能近於特別生。見：黃美真、石源華、張云編，《上海大學史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64。

³⁰⁷ 在《江蘇革命鬥爭紀略》與《上海大學》曾記載，1923年11月22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批准劉劍華（劉華）、張景曾、龍康莊、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許乃昌、黃儀蕃為中共候補黨員。隔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批准上海大學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就入黨時間與地點而言，極有可能正是當時在上大的許乃昌。《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指出，上海大學的黨組織自1923年7月開始編成上海地委領導下的第一小組，1925年後改組為上大支部，1926年再改組為上大獨立支部。早期上大第一小組的成員多由青年團吸收而來。《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指出，1924年1月13日，上海的49名共產黨員重新編組，而上大第一小組的改組名單中，亦有許乃昌的名字，其組員還包括：劉劍華（劉華）、張景曾、鄧中夏、瞿秋白、施存統、王一知、張其雄、黃讓之、龍康莊（龍大道）、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許德良、陳比難（陳碧蘭）、向警予、沈澤民。見：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主編，《江蘇革命鬥爭紀略》（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72、80；上海市委黨史徵集委員會主編，《上海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137~138；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17、23~24。

³⁰⁸ 許乃昌於1923年12月之後列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團員（當時共136人），並曾以「秀湖」為名，發表文章於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相關史料可見：黃志榮、黃妙珍，〈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區青年團組織發展概況〉，《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2期（1986，上海），42~48；秀湖，〈友邦〉，《中國青年》，第3期（1923，上海），8。

國民黨。³⁰⁹此外，許乃昌更參與組建了上海第一個台灣人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

上海台灣青年會誕生於許乃昌抵滬後不久之後的 1923 年 10 月 6 日。成立地點是江亢虎的南方大學。青年會的指導者，恰恰是兩年前積極活動於上海的蔡惠如。兩年的光陰過去，台灣人終於在上海實現首次集結。

在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之前，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便已依據地域差異，先後在北京、廈門建立起北京台灣青年會（1922.1 成立）、廈門尚志社（1923.6.21 成立）。但在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前後，以華北為活動據點的台灣人（如朝陽大學的謝廉清、北京大學的范本梁³¹⁰）便紛紛南下上海參與活動。其中，謝廉清不但參與了上海台灣青年會的創立，並是青年會的幹部。

與大陸上的其他台灣青年組織相比，上海台灣青年會頗為特殊，因為青年會的活動特別積極。從現有史料來看，上海台灣青年會不但有較多且可指的日常聚會，還有其他青年組織所未見的組織分工（見表 4-8），刊物發行計畫。³¹¹就連最先針對島內「治警事件」（1923.12）做出反應者，也是最晚成立的上海台灣青年會。1924 年 1 月 12 日，青年會在務本學校召開「上海台灣人大會」，並首先發表了聲援請願運動、譴責日本當局的聲明。不過，上海台灣青年會所特有的積極性，似乎是與政治性相分離的。「上海台灣人大會」之後，青年會本身便再無任何政治性的活動。如果「治警事件」沒有發生，這次帶有政治性的集會或許也不會出現。但治警事件前後各種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包括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島內外台灣人而言，治警事件確實是 1923~1924 年之間最巨大的政治炸彈，本文前述幾章已略分析。蔣渭水、連溫卿所主導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在官方的打壓之下，成為治警事件的前奏。至於范本梁的活動，則因治警事件的刺激，而在沉寂近一年後重新出現於歷史舞台，並走向極端反對請願運動、主張「社會大革命」的道路。治警事件激起了島外輿論對於台灣的同情之聲，《台灣民報》指出，「台灣這回的受虧一傳國外，如中國諸大新聞前後數回皆報道其消息很詳細，同情的評論也是

³⁰⁹ K. M. Тертс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61.

³¹⁰ 據張深切回憶，1924 年前後的范本梁其實也在上海。見：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66。

³¹¹ 青年會的刊物迄今未見。但當時青年會曾向人在檳城的江亢虎邀稿（1923 年 12 月 15 日抵達。並有南方大學的台灣學生林耕餘擔任翻譯）。江亢虎云：「在檳城時[]得上海臺灣青年會來函，言將出季刊，屬以一言為弁。游觀之暇。走筆應之。偶錄於此。[『]三十年來志士仁人爭以亡國滅種禍至無日申傲國人。國人淡焉漠焉。或且笑為憂天。不意臺灣同胞乃首當其衝而躬親其境。吾嘗思臺灣同胞[]蓋處人生所至不堪。而茹苦停辛。乃長忍此以終古。匪唯不能見諒於日人。乃至不能見諒於吾國人。日本既以殖民地視臺灣。不使與諸郡縣等。臺人有內附者。吾國人又異族畜之。其無賴則鋌而走險。為虎俵以噬人。惟優秀青年[]脫然來歸。恆思有所樹立。不欲以第一等大帝國國民自豪而特接糞為臺灣人。其遇可哀。其志尤可敬也。吾聞泉漳之間。有捐鉅資資緣入臺籍。以間接托庇於第一等大帝國者。豈真其性與人殊哉。為淵毆魚。為叢毆雀。誰為為之。蚩蚩者吾何責焉。今臺灣人在本土不敢言改革。並不敢言教育。其居留上海者。組織青年會。專從教育入手。蓋國破家亡。即受教育之難已如此。顧吾國[]固儼然猶在。而吾民欲受教育亦難於登天。又安暇為臺人悲哉。臺人勉之。人心一日不死。讀書種子一日不絕。雖謂臺灣未亡可也。[』]」見：江亢虎，《江亢虎南游迴想記(第五版)》（上海：中華書局，1928），36、42。

多的。」³¹²

然而，大陸上的同情輿論，乃至臺灣人對於這種輿論的歡迎，卻有一個更深遠的背景。也就是當時大陸上所存在的排斥台灣人的輿論。這種輿論發生於沿海，集中於閩台交流頻繁的廈門地區。雖然台灣人只是「籍民」，而不是正式的日本人，然而許多惡劣份子卻挾著日本人的氣焰，在當地作威作福，暴亂逆行，因此常被蔑稱為「台匪」、「台灣歹（呆）狗」。這種行徑自然引起了大陸人民的憤慨，對於同感不平的台灣人而言，除了言論譴責之外，實踐上則幾無解決之餘地。³¹³

自日本殖民台灣以來，因「台匪」而起的閩台衝突頻傳，1923 下半年則是又一次的高潮。夾處於台匪事件與治警事件之間的台灣人——特別是大陸上的台灣人，其矛盾處境必然巨大。但在中國形勢愈趨殘破的情況下，發生在民族之內的艱難處境並不僅僅是台灣人的單方面感受，而是雙方面的。1922 年，「台灣青年 S 君」熱情地寫信給郭沫若（1892-1978），希望能夠「遙飛祖國，向文學煅己一身，欲為個真個的中華人。」然而郭沫若卻悲愴地回應道：「你這種悲壯熱誠的大志，令我淚涔涔地湧起無限的敬意與感慨。S 君，我們的祖國已不是古時春花爛漫的祖國，我們的祖國只是冢中枯骨的祖國了。你將來縱使遙飛得到，你也不免要大失所望。」然而郭沫若仍鼓勵云：「S 君，人只怕是莫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一有覺悟之後，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做個『真個的人』罷！」³¹⁴

雖然 S 君未必是 1922 年時正汲汲致力文學批評的許乃昌，但許乃昌的人生道路恰如郭沫若所指示的那樣，從一個「遙飛祖國，向文學煅己一身」的青年，「覺悟」而向著其他「方面」而去；而這個方面，恰恰就是追求台灣人民的解放了。而許乃昌僅僅只是眾多向著這一方面奮鬥的台灣青年的一個代表。就在民族內部及民族之間的艱難處境之中，大陸上的台灣人進一步超越上海台灣青年會與請願運動之類的組織與訴求，集結於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基礎之上。以此為起點，台灣社會主義者實現了規模空前的組織化。

3.報端上的一瞬：「台灣赤華會」與《平平旬刊》的出現

起點始於 1923 年底。在大陸上的共產主義刊物及無政府主義刊物上，出現了兩則與臺灣人有關的組織消息。

第一則消息見於上海的《中國青年》雜誌（1923 年 11 月 10 日）。這是中國社會主義

³¹² 〈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5 號（1924，東京），16。

³¹³ 張我軍曾在《台灣》提出譴責，見：廈門張我軍，〈南支那に於ける排日對策〉，《台灣》，第 4 年第 7 號。本章所討論的《平平旬刊》，也有譴責之文。見：花蕾，〈台匪〉，《平平旬刊》，第 3 期（1924，上海），3。范本梁所主辦的《新台灣》也批評少數台灣人「借了強盜的勢力來做台匪來做歹狗，而侮辱祖國而蹂躪同胞了，尚至無法度生，也就屈服於強盜而做他們的走狗爪牙來陷害有志的同胞了。」見：能俠者，〈實行部的宣言〉，《新台灣》，第 2 號（1924，北京），3~6。

³¹⁴ 郭沫若，〈反響之反響〉，《沫若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245。原載於 1922 年 12 月《創造》，第 1 卷第 3 期。

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誠如「S君」寫給郭沫若那樣，「台灣一個青年」也寫了一封信投稿給《中國青年》，並由惲代英（1895~1931）轉引於他所寫的〈中國的分立運動〉文中。同月23日，這封信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再次登出，不但文字更長，文章的署名者也不再是「台灣一個青年」，而是一個組織、一個叫做「台灣赤華會」的組織。轉錄這篇文章於《覺悟》者則恰恰是許乃昌。這封信並不是一篇希望「向文學煅己一身」的個人戰鬥檄文，而是一個組織針對廈門「台匪」問題而提出的呼籲。其全文如下：³¹⁵

親愛的全中國人民！

我們一部份無智的台灣人，時常在福建一帶，忽視中國國權，倒行逆施，肆行無忌，實在妨害中國的安甯不小。近日又在廈門暴動，白日殺人，引起日本水兵上陸，這是何等可恨而可哭的事啊！

然後：³¹⁶

但是這個罪惡，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的責任的，若是沒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是不会這樣的大膽這樣的猖獗！

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永久地保持其榨取台灣經濟的權利，所以百般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第一個原因。

各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為著要侵占中國的利權無不到處尋找機會，以滿其貪血無窮的獸慾。如最近的關於臨城案件的要求，就是其趁火打劫的一個好例。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為中國人若對台灣人有報復的行為時，便可提出無理的抗議和要求。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作惡的第二個原因。以上的二個原因，由日本水兵的上陸，而證明的[得]十足無疑。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一樣處於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為台灣人的獨立和自由，並且為你們自己的利益，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的意識上，起來打破我們共同的仇敵。我們是被中國的報紙稱為「台匪」的。但相信你們是會完全了解我們的地位的。我們願我們被壓迫的朋友們，都聯合起來，對抗敵人資本帝國主義！

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的聯合萬歲！

中華台灣兩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階級解放萬歲！

台灣赤華會

惲代英與許乃昌所轉錄的文字略有出入，³¹⁷兩人轉錄的目的也不同。惲代英是透過台灣人

³¹⁵ 乃昌，〈被壓迫民族的呼聲〉，《覺悟》，1923年11月23日，第4版。

³¹⁶ 惲代英所接著轉錄的內容略有差異：「但是這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的責任的罪惡，若是沒有日本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不會這樣的大膽，日本人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原因。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處於一樣的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為台灣人，並且要為你們自己，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的意識上，起來打破我們的仇敵啊！」見：代英，〈中國的分立運動〉，《中國青年》，第4期（1923，上海），7。

³¹⁷ 兩文之間的差異，或許是文章並非一次寫成所致，也可能是惲代英或許乃昌自己或增或刪了。

的投書，說明軍閥割據下的「分立運動」（如聯省自治）多麼沒有正當性。³¹⁸至於許乃昌，則是爲了「消釋我們對於台灣民族的惡感」、並「促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覺悟」。

屈指算來，此時距離即將發生的治警事件，還不到一個月。「台灣赤華會」——這個既「赤」且「華」的「台灣」組織——並未等待將來的鎮壓以及伴隨著鎮壓而來的同情，便打出了組織的名號，並以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兩大目標的並舉，作爲爭取兩地人民集結的口號。

第二則消息則見於北京《國風日報》的副刊「學匯」。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的重要言論機關，由范本梁所結識的景梅九所主辦。1923年12月20日，即治警事件發生後第四天，遠在北京的這份刊物也登出一則與集結有關的出版預告：

《平平旬刊》出版預告

本刊爲南方同志所辦，並有台灣、朝鮮等同志數人，內容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定陽曆元日出版。其通訊處：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³¹⁹

顯然，除了號召大陸人與台灣人相親睦的赤華會之外，台灣人及朝鮮人也以刊物的形式——《平平旬刊》——集結起來了。《平平旬刊》的出版預告雖不滿百字，卻是個警號。比起1923年還不敢明言無政府主義（而只提「新台灣主義」）的范本梁，明言「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的《平平旬刊》，無疑具有更爲鮮明的旗幟。另就刊登這則廣告的《學匯》是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來看，也足以爲證。

僅從上述兩則消息來看，台灣赤華會也許較親近於共產主義系統（如中共、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平平旬刊》則可能較爲親近無政府主義系統（江亢虎、南方大學）。不過，如果組織——台灣赤華會——未能爭取更多人參與並延續自身，就只能像范本梁長期處於一人組織的狀態，撐不起一個「運動」。倘若刊物——《平平旬刊》——最終沒能出版，就比擺脫不了一人刊物色彩的《新台灣》的處境還要糟糕，而出版預告所能「預示」的，無非只是一個現實成爲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已。

然而，刊物最終是出版了，但並非廣告所說的「陽曆元日」，而是1924年4月1日。當出版成爲現實，這份刊物甚至超出了刊物的出版本身，組建起《平平旬刊》所隸屬的社團——平社。而且許乃昌也加入了平社，成爲《平平旬刊》的寫作同人之一。可以說，「台灣赤華黨」與《平平旬刊》在報刊上看似偶然的並現，並非沒有關係的兩件事，而是東亞社會主義者即將集結於上海的一次預示。

³¹⁸ 「日本人最要台灣人與我們生意見，然後使我們不願幫助台灣人，幸而台灣青年還不曾忘記我們是骨肉兄弟啊！我們要共同打倒仇敵，我們反對一切的分立運動。」見：代英，〈中國的分立運動〉，《中國青年》，第4期，7~8。

³¹⁹ 〈介紹新著〉，《學匯》，1923年12月20日，轉引自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4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350。

第二節、平社與《平平旬刊》：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兼容與分裂

我自脫出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³²⁰這八個月之中我在諸國的旅途過很匆忙的日子，這回自某處到某處的途中，到上海留住了差不多幾個星期。我在此地會見了，中國，高麗，台灣的同志，大家談論東洋革命的前途。這也可以說是我的亡命生活中一件難忘的事。自命獻身於世界革命的吾人，於東洋的同志，或於歐美的同志，當然沒有甚麼分別。然而我對於東洋的同志總免不了覺得特別的親密

——佐野學，〈過上海〉，1924年4月³²¹

在當時有一名共產主義者，因恐懼東京的嚴厲取締而奔逃上海，與在該地留學的台灣左傾學生……等共同組織了「平社」，且發行機關誌《平平》，將其密送散佈於台灣，此人也和蔣渭水保有密切聯繫。

——《台灣社會運動史》³²²

1. 概觀：平社及《平平旬刊》

平社及《平平旬刊》是一個以上海為活動地、並由東亞各地革命者所組成的跨地域聯合體。如表 4-3 所考證，平社的參與者（以下簡稱平社成員）與《平平旬刊》的寫手們（以下簡稱平平同人），來自中、台、朝、日四地，包含十多名成員。雖然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的成分有頗大落差（平平同人，多來自大陸）。但組織規模仍是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等人所未曾達到的水平。此外，若從刊物屢屢變更的聯絡處與聯絡人來看（見表 4-1），平社及《平平旬刊》與前述南方大學、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必然不淺。

平社就像是東亞各地革命者亡命於上海而實現的一次集結。其中包括由於日本政府鎮壓而潛赴中國的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1892~1953，表 4-3：18），以及不見容於日本當局而流亡上海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呂運亨（1886~1947）、尹滋英（尹蘇野，1894~1938，見表 4-3：17）。不過，使平社實現集結的靈魂人物，並不是這些外籍流亡者。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與范本梁的同志——羅任一。

羅任一從日本回國後，³²³在什麼狀況下而組成平社並創刊《平平旬刊》，目前仍是未

³²⁰ 就佐野學被捕後的供詞來看，他從 1923 年 5 月離開東京之後，於同年 6 月抵達北京。到 1924 年 9 月才從蘇聯出發歸國。但從佐野學自稱「我自脫出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來看，這篇文章至少寫於 1924 年 1 月前後。佐野學也許被捕之後並未供出實情。此外，從當時上海報紙屢稱佐野學潛抵上海來看，也略可為證。以上分見：〈佐野學予審訊問調書〉，收錄於山邊健太郎解說，《社會主義運動（7）》（東京：みすず書房，1982），193~196；並見本文附表 4-4：(07)、(14)。

³²¹ 佐野學，〈過上海〉，《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3。

³²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5。

³²³ 羅任一由日返國的這一經歷，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有一名共產主義

解之謎。至少在《平平旬刊》正式發行之前，羅任一便已出現於上海的社會運動之中。³²⁴

《平平旬刊》創刊之後，羅任一不但成為撰文最多的作者，更是唯一兼具平平同人以及平社成員身分的大陸青年（見表 4-3）。實際上，在當時的日本情報資料（含《台灣社會運動史》）眼中，羅任一正是實現平社組織化的指導者。³²⁵但是，羅任一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是否起到這樣那樣的指導作用（因為沒有史料可以進一步說明），而在於他所曾主張的「A」「B」聯合（見本文第三章）。對於研究平社及《平平旬刊》而言，羅任一所具有的這一背景，是很重要的切入點。

平社與《平平旬刊》確實兼具「A」「B」兩種主義，僅從參與者背景即可看出這點。如表 4-3 所示：以平社成員來說，呂運亨、尹滋英，屬於「B」派傾向的朝鮮革命者。若從平平同人來看，則有潛逃至上海的日共領導人佐野學。身兼平平同人與平社成員的許乃昌本身則是中共黨員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若以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大陸籍平平同人（大多來自浙江與安徽）幾乎都與中共、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有關。他們不但在地緣上有所聯繫，組織關係與活動經歷也都互有關聯。或許正因如此，《台灣社會運動史》等史料才把平社及《平平旬刊》當成純粹「B」派的組織及刊物。

然而平社及《平平旬刊》的「A」派色彩也是有的。創刊前後，《平平旬刊》不但被大陸無政府主義刊物引為同志（前引《學匯》即是一例，並見表 4-1），平平同人還包括兩個著名的大陸無政府主義者：盧劍波（劍波，1904~?，見表 4-3：03）及秦滌清（抱朴，生卒年不詳，見表 4-3：08）。

不過，兩種主義在《平平旬刊》內部的力量對比並不平衡。《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平社判定為「有濃厚的共產主義運動色彩」的社團，日本學者坂井洋史則力圖證明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存在，但說服力不強：（1）坂井特別注意平平同人對於蘇聯、俄國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但是，除了攻擊考茨基的譯稿之外，³²⁶反蘇、反俄或反共，實不足以從反面證明

者」。當然，也可能是彭華英或佐野學。

³²⁴ 1924年2月7日，羅任一以「羅豁」之名出席上海「二七紀念大會」。見：〈二七紀念大會〉，《民國日報》，1924年2月8日。轉引自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等編，《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566。

³²⁵ 比方《台灣社會運動史》就認為，「中國人共產主義者羅豁」以「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為基地，「讓數名台灣人及朝鮮人青年寄宿其宅，施以共產主義教育。」羅任一所曾居住的「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是中共早期機關的駐在地，即新「漁陽里六號」；至於陳獨秀，則曾居於隔壁的老漁陽里，即老「漁陽里二號」。但中共早期機關主要是在1921年前後活動於此。作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初駐在地的新漁陽里六號，據許之楨回憶，原由戴季陶於1919年租住，後由楊明齋、陳獨秀續租。李達亦回憶，由於選派了十來名團員赴蘇留學，此地遂於1921年7月黨大會之後退租；陳獨秀亦於1922年初出獄後不久，搬離了老漁陽里二號。因此，如果羅任一回國之後確實定居於新漁陽里，有可能與中共擦身而過。但是中共早期機關的轉移，是否連帶影響當地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散地，實待探究。見：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9；許之楨，〈關於新漁陽里六號的活動情況〉，《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總第2輯）（1980，上海），39、41；李達，〈回憶老漁陽里二號和黨的「一大」、「二大」〉，《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總第2輯）（1980，上海），19、21。

³²⁶ Kerkezov 著、抱朴譯，〈柯祖基也招認了！〉，《平平旬刊》，創刊號，6~9。但《平平旬刊》編者仍注言，「本文主觀觀念非常濃厚；好在是表示他個人意見。」這篇連載文章實際亦未續刊下去。

無政府主義是這種攻擊的基礎。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同人本身思想的不成熟也是可能的原因，遑論這方面的文章僅僅兩篇。³²⁷（2）坂井認為，對於議會請願運動的反對，顯示了無政府主義否定代議制的典型態度。³²⁸但共產主義者也可能反對代議制；明言以反對代議制作為否定運動之基本理由的平平同人也極少。（不過，從平平同人賀威聖以代議制作為否定議會請願運動的理由來看，請願運動在平平同人眼中的「負面」面貌值得探究。）（3）坂井從一些外在形式來進行正面的推論。首先 1923 年底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學匯》謂之「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其次 1924 年 5 月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春雷》引之為「上海同志」，³²⁹其三〈平社簡章〉以無政府主義式的口吻自稱「實行人類互助為宗旨」³³⁰（又如：「我們是一群渴望和平者，我們要大家都有飯吃，有衣服穿，我們願意人類都一齊到水平線上，我們願意凡人類都能互相親愛，彼此扶助。」³³¹），甚至本文還可補充指出「平社」二字就是無政府主義式的命名（正如「安社」那般）。³³²但就內容而言，實際發行的《平平》旬刊幾無傾向相應的文章；就連同人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如羅任一、盧劍波）也幾乎不從無政府主義去談問題。坂井最後不得不承認，「綜觀內容，其實缺乏能直接將本刊物視為無政府主義宣傳刊物的有力根據。」³³³

無政府主義在《平平旬刊》中存而又不存的矛盾現象，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本文認為，這種矛盾可能是「A」「B」兩派間的力量消長之反映。

2. 「主義」對立：從平社、《平平旬刊》到赤華黨

究竟社團內部的「A」「B」兩派的並存實態為何？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是這樣說的：

——1923 年 11 月，³³⁴台灣、中國，以及朝鮮的革命青年在上海組織了平社（音譯：Pingshe / Пиншэ。義譯：Общество “Равенство”，「平等」社）。平社的成立者包括：彭華英、蔡惠如的長子蔡炳曜，以及許乃昌。平社成員發行了定期刊物《平平》（Pingping /

³²⁷ 赤人，〈中俄交涉破裂的原因〉，《平平旬刊》，第 2 期（1924，上海），1~3；威聖，〈責備賢者的幾句話〉，《平平旬刊》，第 2 期，8。

³²⁸ 坂井洋史、嵯峨隆編，《原典中國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解題·總目次（東京：綠蔭書房，1994），49。

³²⁹ 〈新刊介紹〉，《春雷》，第 3 期（1924，廣州），113。

³³⁰ 〈平社簡章〉，《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16。

³³¹ 同人，〈發刊詞〉，《平平旬刊》，創刊號，1。

³³² 目前所知以「平社」命名之無政府主義社團：平社（山西，1918）、平社（四川，1922）、平平社（四川，1923 年前後）、平社（舊金山，1927）。見：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 4 卷，334；徐善廣、柳劍平，《中國無政府主義史》（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310、314、315。

³³³ 坂井洋史、嵯峨隆編，《原典中國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解題·總目次，50。

³³⁴ 郭杰與白安娜認為 11 月有誤，應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 3 月。但此推測是錯誤的。詳表 4-1：(01) 的史料即可為證。

Пинпин) ³³⁵並派遣了幾個成員回到台灣工作。根據許乃昌的說法，平社的活動相當成功。不過，由於外國租界當局的壓力，以及「為數不多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社團內的非組織化行動，使得社團於 1924 年 5 月停止活動。³³⁶

目前尚無其他史料可以說明平社內部的「A」「B」矛盾，不過范本梁與彭華英（1893~1968，平社成員）之間的對立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³³⁷

華英比本梁先到上海，本梁自認是華英的情敵，他本來對華英就沒有好感，及至本梁信奉安那其主義出現於上海的時候，平添一個思想對立，兩人之間就成為冰炭不能相容了。……

我還在上海的時候，老范有一天瘋狂似地跑回青年會，嚷著找菜刀要去殺死彭華英……我趕緊把菜刀藏起來，極力阻止，攔住不放。……鐵牛[范本梁]氣憤憤地說：老彭的思想不對，會荼毒台灣民眾，所以他和老彭爭辯起來，詎料他[彭華英]不會認錯，反叫外國人打他[范本梁]、侮辱他，此仇不報非人。……總之打過架是事實。

范彭兩人的思想，根本不同，各自獨立一家，不能相侵犯。老彭組織平平社，宣傳他們的言論，老范單獨出版《新台灣》，提倡安那其主義，分道揚鑣已久，老范偏要找他辯論，自討沒趣。根本上，兩人之間不止於思想問題對立，老范似乎還夾雜著情敵意識對待老彭，這實在是使老彭出乎意料的。……當時他們兩位都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革命志士，兩虎相鬥兩敗俱傷，我很不願見他們的仇恨一往趨深，因為我反對蔡培火一派合作「請願」主義，自然擁護彭范等人的革命運動，但我不願意袒護哪一方。

張深切與謝雪紅都指出，平社活動期間，范本梁正在上海。日本情報也指出，范本梁與羅任一來往密切。就此來看，《平平旬刊》與《新台灣》的先後創刊³³⁸乃至社團之間或之內的矛盾，也許都離不開上海這個地域內的主義紛擾或人事糾葛。

就在平社遭遇「A」派「破壞」的形勢下，社團終於產生了分裂。許乃昌等人另外建立起「B」派傾向鮮明的組織——「赤華黨」。可以推測，這是「台灣赤華會」重新以「赤華黨」之名站回歷史舞台的一次嘗試。³³⁹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指出：³⁴⁰

³³⁵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與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均謂《平平旬刊》發行「一個月兩次」，誤。《平平旬刊》實乃一個月發行三次的旬刊。見：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14;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43.

³³⁶ 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14-15;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3-44.

³³⁷ 張深切，《里程碑》，上卷，256、272、273。

³³⁸ 在《平平旬刊》創刊號寄抵台灣後不久，《新台灣》也隨即寄達了。分見 1924 年 4 月 11 日與 21 日的《台灣民報》之〈編輯餘話〉。

³³⁹ 就此而言，許乃昌關於「赤華黨」的報告，或許恰恰證實了許乃昌與「台灣赤華會」的關係。但就「赤華黨」本身來說，除了許乃昌的報告與「台灣赤華會」早先的宣言之外，尚無其他史料可以進一步提供說明。

³⁴⁰ 以下敘述分別轉引自 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4年6月，台灣左翼份子建立了「赤華黨」(Red China Party, RCP / Партия Красного Китая, ПКК)，許多平社成員參與了這一組織。據許乃昌所言，在赤華黨建立前，台灣沒有任何組織敢於以自己的名稱宣示共產主義方向。黨的創建者們希望能在將來與日本共產黨建立聯繫，並將日共組織發展到台灣。

——建黨大會以1924年4月25日與6月1日兩個階段進行。在台中，4月25日的大會選出五名執行委員會委員，黨的非正式成立日期則是五一勞動節。至於6月1日的會議，因為殖民當局的監控，其會議未能舉行。不但推遲至6月20日，地點也改至上海，至此黨才正式成立。至1924年7月為止，³⁴¹黨的成員共49人，包括13名工人，其餘則均是知識份子。³⁴²

——黨的活動招致了日本警方的注意。1924年6月18日³⁴³舉辦起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集會。除了散發傳單，黨的成員還計畫將之秘密送回台灣，然而警方卻得到了這一消息。同時，台灣的日本當局加強控制並增派額外的警力前往上海。這一切顯然對黨造成負面影響，黨員意志不再熱切如昔。據許乃昌所言，由於經費與人力短缺，黨無法持續她的活動。

如果「赤華黨」的出現，可以理解為「台灣赤華會」轉型的結果；平社及《平平旬刊》就應該理解為實現轉型的媒介。就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社會主義者終於超出個人活動而轉為組織運動。相較於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等先驅的努力，上海台灣社會主義者的奮鬥顯然具有更大的規模、擁有更可追索的軌跡。只是前述先驅所未曾面臨的問題卻在上海的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前出現，最突出的就是組織內外的「A」「B」兼容與對立。

以兼容「A」「B」兩派為宗旨，羅任一等人開闢出一條通向平社及《平平旬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裡，羅任一的同志謝晉青，首先把眼光投向了殖民地台灣，首先向台灣呼喚革命並批判請願運動。在這條道路上，謝晉青早逝，卻由他的同志羅任一繼續走了下去。並在台灣、朝鮮、日本，以及大陸各省青年的合作下，最終組織成了平社及《平平旬刊》。「A」「B」合作雖然失敗，但同范本梁所走的純粹「A」派道路相比，平社及《平平旬刊》兼容「A」「B」兩派的嘗試，揭示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過程中的另一條道路。

也恰恰是這條道路的準備，以許乃昌為代表的「赤華黨」才得以從中走出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B」派道路。發生在1924年上半年的「A」「B」合作與分裂，就像是種縮影。這一縮影預示了「A」「B」合作的破裂，預示了無政府主義在東亞各地的衰落，同時也預示了共產主義的「B」派道路之興起。就在6月底所發行的《平平旬刊》上，羅任一譯載

(1928~1931), 14-15; K. M. Тергс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3-44.

³⁴¹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寫「至1924年7月2日為止」，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則云「至1924年7月7日為止」。見：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14-15; K. M. Тергс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4.

³⁴² 就這段的敘述而言，郭杰與白安娜合著明顯優於白安娜碩論。白安娜碩論敘述頗為混亂。

³⁴³ 疑為「6月17日」之誤，但白安娜碩論及郭杰與白安娜合著均如此轉述。

了一篇現在看來意味深長的文章。這篇由日本共產主義者田口運藏所寫的文章說道：³⁴⁴

階級意識這句話，算現代社會主義用得最多的術語中之一……現代的爭鬥，是階級意識醒覺了的解放運動，于是以階級組織的必要為前提這一點，是與從前不同的。社會主義者把持階級爭鬥、高唱平民解放[、]所以大眾**前鋒**的組織，實為必要。沒有組織的爭鬥，難得有什麼**效果**。主張依爭鬥而解放的我們，知道我們最終的任務，是取階級爭鬥的本源。而表示階級爭鬥最正當的方法，即是**政治運動**。沒有政黨的政治運動，定為無組織的反逆而終了。我們努力普及**聯合運動**，同時主張豎起**平民的政黨**。我們**以馬克司主義為立腳點**，做解放運動的前鋒，急急使組織的階級意識越見加強！

無論是建立先鋒隊政黨，投身政治、普及聯合運動(AB合作?)、乃至以馬克思主義為宗。羅任一所譯載的這篇文章，不但可以視為赤華黨建黨的最佳註腳，同時也顯示了羅任一以及平社、《平平旬刊》向「B」的傾斜。不過，赤華黨所揭示的「B」派道路，還同時包括了上海(乃至日本、台灣)的台灣青年組織與社會主義組織的空前整合。因此，對於赤華黨的考察，必須旁及各組織間的關係才能窺其全貌。

3. 台灣人青年組織的興衰與轉折：以 1924 年為中心

以下分製兩表，「表 4-4」以 1924 年前後各種台灣人青年組織為對象，將目前所知的所有事件列出，製成簡單年表；「表 4-5」則將「表 4-4」簡化，將各團體的沿革與活動軌跡圖示出來。

從表 4-4、表 4-5 來看，赤華黨(或台灣赤華會)與平社均主要活動於上半年，姑且稱之為 A 組。至於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以及中韓台友誼會(這是既有史料所未載者)，則居下半年，姑且稱為 B 組。³⁴⁵

雖然上海台灣青年會(及改組後的台灣同鄉會)是唯一貫穿 1924 年前後的組織，然而 A 組向 B 組過渡的時間點，頗相重合於青年會本身所發生的轉折，特別是青年會所經歷的第一次轉折(5 月 24 日)。這次轉折之後，青年會的活動由盛轉衰。這次轉折的性質頗值得玩味：(1) 第一次轉折之後的青年會，只有一名幹部是舊面孔(林堯坤，又名鵬飛)，其餘都是新幹部。然而這個幹部卻是曾經導致青年會陷入財務危機，並已被青年會開除的成員。³⁴⁶ (2) 第一次轉折之後的青年會決議支持請願運動與文協、並向文協尋求援助。

³⁴⁴ 田口運藏著、任一譯，〈階級意識〉，《平平旬刊》，第 9 期(1924，上海)，1。

³⁴⁵ 不過，縱使存在著 A、B 兩組差異，從新組織依次出現的時間順序來看，新組織與前一個組織總在某些時段並存著。隨著新組織的誕生，新組織的各種活動成為整個上海台灣人的運動主體。這一現象同時體現了組織之間的並存與過渡。

³⁴⁶ 如表 4-4 所示。4 月初《平平旬刊》正式發行之後，青年會的「會計科」幹部林堯坤(林鵬飛)出了狀況。先是被日本領事館拘留一周，旋即被青年會決議「脫離」。《台灣社會運動史》指林堯坤涉嫌詐欺案被捕，導致青年會因財務問題停頓。5 月 24 日，青年會在蔡孝乾主持之下遷離原地、進行改組，決議暑假之後重整陣容。奇異的是，林堯坤不但再次成為「會計部」的幹部，而且還是

然而第一次轉折之前參與平社的成員，卻反對請願運動。³⁴⁷

《台灣社會運動史》等史料，經常從正面肯定青年會與其他台灣人組織之間的聯繫。但這種聯繫，應當將青年會發展中的不同階段考慮進來。如前所述，第一次轉折之前及之後的青年會，說不定是完全不同的團體。此外，雖然無法判斷青年會本身的轉折如何聯繫於其他台灣人組織之興衰。但幾乎同時瓦解的平社、赤華黨，以及第一次轉折之前的青年會，關係恐怕不淺。³⁴⁸

許乃昌的報告可以證實上述推測。報告指出，赤華黨統一了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各個分散勢力，包括了平社、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改造同志會、曉鐘會、社會問題研究會（即「表 4-6」中標記★號者）。雖然黨的成員並不多，但成立初期非常有行動力，並透過各種台灣的組織進行合法活動。³⁴⁹此外，還有一份收藏於共產國際並題名為《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的檔案（寫於 1928 年 6 月 31 日，原文英文）³⁵⁰也提到這些組織，「表 4-6」亦列出比較。在人際方面。許乃昌的報告列出了十三名重要的台灣左翼份子及其組織關係，即「表 4-7」。

從許乃昌的報告所列舉的組織來看，赤華黨並未統合「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以及「中韓台友誼會」（以上即 B 組）等團體。顯然赤華黨只活動於 A 組存在的上半年。至於赤華黨所統合的組織，分居上海、台灣，以及日本。

上海的組織，前面已介紹了平社、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改造同志會」，可能正是黃玉齋所謂的「台灣同志會」。但背景迄今仍不清楚。³⁵¹

日本的組織是第三章曾提到的「曉鐘會」。從「表 4-7」可知，曾經參與日本「可思母俱樂部」的黃登洲與呂磐石（見本文第三章），都是曉鐘會的成員。

唯一的舊幹部。此後直至 11 月 16 日的秋季大會之間，活動紀錄稀疏。然當秋季大會召開時，青年會的核心議程竟然又是改組。此次乾脆放棄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組織原則，改組為同鄉會組織。這次會議選出的幹部，只有蔡孝乾是唯一的舊幹部。然而局面似未透過改組而得改善，1925 年 1 月，又有人圖謀復興卻失敗，實際等於青年會的終結，此時連蔡孝乾之名都已不見其中。由此可見，以 5 月 24 日及 11 月 16 日的兩次會議為界，上海台灣青年會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妨分別稱之為第一次青年會、第二次青年會，以及第三次青年會；而 A 組所包含的青年會，也當理解為第一次青年會；至於第二、第三次青年會則可歸入 B 組。前兩階段的關鍵人物是林堯坤、後兩階段的關鍵人物則是蔡孝乾。

³⁴⁷ 青年會決議：(1) 重新協商有關機關誌的發行，(2) 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3) 加強與島內文化協會合作、爭取經費，(4) 決議在暑假之後重整陣容，(5) 接受李山火等人的協助，(6) 重擬幹部人選。

³⁴⁸ 從這個推理邏輯加以延伸，則《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台灣自治協會視為「似乎與上海台灣青年會是同心一體的運動團體」的記述，也應當將此處的台灣青年會，理解為第一次轉折之後的台灣青年會。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90。此外，如果林堯坤確實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平社成員，青年會所遭遇的轉折就更可能波及平社。至於這一轉折是否可以連繫於許乃昌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破壞活動，則待考察。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96。

³⁴⁹ K. M. Тертц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4.

³⁵⁰ K. M. Тертц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66-269.

³⁵¹ 參見表 4-6：(04)之考證。

台灣的組織則是「社會問題研究會」。由於研究會的成員只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以及過世的山口小靜（見本文第二章），而許乃昌又未將連溫卿歸為赤華黨成員，所以「社會問題研究會」與赤華黨發生組織關係的原因值得思索（比方謝文達乃至蔣渭水可能是黨的成員，或者根本就是許乃昌胡說）。至於許乃昌所說的「無產階級政治研究會台灣支部」，則可能與山川均等人所組織的「政治研究會」有關。「政治研究會」是山川均將日共解黨之後，為創立合法「無產政黨」而成立的準備組織，1924年5月才提出組織章程。然而現有史料並無法證實「政治研究會」有台灣支部之存在。³⁵²不過，山川均與連溫卿的關係，卻足以推測許乃昌如此言之的原因。最後，所謂「共產主義同志會」其實也屬不明，然而謝廉清所曾接觸的「今日派」共產黨就曾組織過「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是否就是這個組織？或者另有所存？此皆尚待考察。

第三節、時代問題：如何面對請願運動的變局

1. 好好讀書或者搞運動？

1923年6月，《民鐸》雜誌發表一篇由易家鉞（君左，1898~1972）所寫的〈中國的丘九問題〉，隔年3月又發表〈中國的丘八問題〉，³⁵³引發接連的論戰與圍剿。易家鉞曾與朱謙之等北大學生在1920年組織無政府主義社團「奮鬥社」，一生在報紙上打了不少筆墨官司。³⁵⁴當時所謂「丘八」即「兵」之蔑稱，泛指軍閥士兵。由於流亡學生屢掀學潮，³⁵⁵故被有惡意的批評家視為比軍閥還恐怖的群體，稱之「丘九」。在易家鉞看來，學生就該好好讀書，不應參與政治。許乃昌在平社成立之前即抨擊云：³⁵⁶

易家鉞君呀！政治問題若不根本的解決，怎樣能夠讀真正的書呢？假使能知道「讀書的價值」知道「讀書的方法」知道「讀書的規式」，在這樣暗無天日的社會，能

³⁵² 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政治研究會·無產政黨組織準備委員會》（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3）。

³⁵³ 易家鉞，〈中國的丘九問題〉，《民鐸》，第4卷第4號（1923，上海）；易家鉞，〈中國的丘八問題〉，《民鐸》，第5卷第1號（1924，上海）。後一份刊物出版於3月1日，恰在《平平旬刊》出刊前夕。筆者未能見得上述兩篇全文，只見存目。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1012~1013。

³⁵⁴ 1921年，易家鉞曾因疑似匿名寫作〈嗚呼蘇梅〉一文攻擊蘇雪林（即蘇梅），而遭文化界圍剿，胡適更因此罕見地刊登啟事嚴責之。見：陳雪嶺，〈《閒話揚州》與作者易君左其人〉，《民國春秋》，第4期（1998，南京），47；陸發春，〈蘇雪林與胡適二則史實的考證〉，《魯迅研究月刊》，第12期（2003，北京），61。

³⁵⁵ 據「顧修」所云，此詞據說起於安徽。當時安徽反對軍閥的鬥爭方熾。平平同人中的安徽作者亦與安徽學潮有關。見：顧修，〈青年們能忍受丘九的名詞嗎？〉，《覺悟》，1923年12月7日，第4版。

³⁵⁶ 乃昌，〈學生運動的啟蒙——駁易家鉞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覺悟》，1923年12月14日，第4版。

靜靜地讀書？……（學生若是可說是丘九，易先生是丘十，軍閥大概是丘十一罷）……

唉！可笑的沙上的讀書運動！建設在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甘為奴隸的讀書運動！

平平同人賀威聖進一步指出，「社會運動是學術運動的初步辦法——學術運動者應該加入，社會運動」。³⁵⁷在他所寫的十三篇文章裡，就有六篇直接討論社會運動與學術運動的關係，其中五篇還是大篇幅的連載文章。³⁵⁸可見「實踐」對於平平同人來說，是個急需提上日程的大問題。對於身處異地上海的平平同人（或平社成員）來說，他們又該如何在實踐中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呢？

從《平平旬刊》來看，來自不同地域的同人有不同的關心。但他們都以各地的壓迫形勢作為批判對象。而對台籍同人來說，他們所關心與分析的台灣問題可分為以下幾項：一是台灣人如何面對「冢中枯骨的祖國」並行動起來；³⁵⁹二是日本獨霸東亞之下的台灣處境；³⁶⁰三是如何面對治警事件之後的請願運動問題。以下則針對第三點來加以說明。

³⁵⁷ 威聖，〈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9期（1924，上海），8。

³⁵⁸ 分別是威聖，〈讀書難〉，《平平旬刊》，第3期，2~3；威聖，〈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3期至第9期（1924，上海）。

³⁵⁹ 在平社結成之前，許乃昌便撰文指出，「中國真窮困極了，大多數的人們都沒有得著『人的生活』。（這是二三年前張東蓀氏的話）不但沒有得著『人的生活』，而且時時看見些『平民的慘死』。」在我們這百鬼橫行的萬惡社會，這樣『平民的慘死』已經變成平常的小事。」但許乃昌進一步指出，「我們卻以為這是一張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沉痛的抗議文，用『死』而寫成的深刻的抗議文！」平平同人「任一」亦痛訴，在勞動者流血流汗、身陷貧乏之時，「資產家」的家犬不但穿金戴銀，就連尋狗啟事的獎金也可以與尋人等值，那真是「人不如狗」的時代！平平同人「蕾」則指出，當時的台灣人通常會「把上海當作中國的代表看」。但他認為，這種觀點不但「錯誤」，「他們判斷中國的事實都是很皮毛的。他們的眼光看得太近了。他們看中國這樣鬧法就失望，就以為中國無望了。」他指出，「就是在中國的中國人也往往抱悲觀失望的人不少。但是有志於國事者總應該抱樂觀的態度去努力才好！」張深切也說，「上海的社會現象，無一不使海外回來的僑胞觸目傷心，」台灣的智識青年，一看這罪惡淵藪，無不扼腕悲痛，恨不能一手擎天，掀起大革命，把一切的罪惡掃除乾淨。」以上分見：乃昌，〈平民的慘死〉，《覺悟》副刊，1924年1月10日，第4版；任一，〈人不如狗〉，《平平旬刊》，第4期（1924，上海），2；蕾，〈一個回到中國的台灣人〉，《平平旬刊》，第4期（1924，上海），5~6；張深切，〈里程碑〉，上卷，39。

³⁶⁰ 《平平旬刊》創刊號，有一個署名「真一」的作者在〈台灣怎麼樣了〉文中寫了一篇寓言故事，分別以「華先生」、「女兒」、「倭寇」代表中國、台灣，與日本；並試圖將馬關割台以來的中、台、日關係微縮其中。這樣的寫作手法與同年更早發表於《台灣民報》的〈台娘悲史〉非常接近。〈台娘悲史〉由留學於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所寫，是台灣本土白話小說的先驅。在〈台娘悲史〉裡，本有女兒「台娘」的「華大」，因「日猛」以「高麗參」為贖而被打輸，台娘被迫嫁給日猛作妾。嫁過去的台娘，日子過得痛苦；想向日猛請願，卻更不得翻身。這一尚稱委婉含蓄的寓言，卻使當期《台灣民報》在台灣遭禁。與此相比，在上海發表的〈台灣怎麼樣了〉則把話說得很白。不但直言控訴治警事件與日本統治，也悲慨大陸中國人的無能為力。（這兩則極為雷同的文章，說明「真一」有可能是就讀於南大的「施文杞」。若從南大與「平社」的關係來看，似乎更能加強這一推測。）此外，他們也譴責在大陸作亂的台灣人。「日本是深怕台灣人和中國人攜手。所以才利用台灣的廢物無賴漢來在中國作亂，使中國人痛恨台灣人。」「台灣無賴子越鬧得兇，即是日本心越利害，而台灣同胞就越無立足之地。這是多麼可惜，可恨！台匪竟作了日本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犧牲品」以上分見：真一，〈台灣怎麼樣了？〉，《平平旬刊》，創刊號，9；施文杞，〈[寓言小說]台娘悲史〉，《台灣民報》，第2卷第2號（1924，東京），15~16；花蕾，〈台匪〉，《平平旬刊》，第3期，3。此外，施文杞又稱〈台娘悲史〉為〈台娘痛史〉。見：淚子（施文杞），〈是我的罪〉，《台灣民報》，第2

2.如何面對治警事件之後的請願運動問題。

無分出身地域，平平同人都將議會請願運動視為批判對象。《台灣社會運動史》指出，「創立後不久，便發表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意見，認為該項運動已跟不上時代，並將其要旨通告林獻堂。據說，該社會員相約自第四次請願運動以後，便不再簽名參與。」³⁶¹

連溫卿曾以《平平旬刊》中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沫雲」，即許乃昌）³⁶²與〈台灣怎麼樣了？〉（「真一」）³⁶³二文為例，謂前者反對議會請願運動，後者「則有相反的意見」，³⁶⁴彷彿刊物並存兩種傾向。但刊中所有論及此事的作者均持否定態度。關鍵在於，對於「運動」的否定並不排斥對其「參與者」的同情；治警事件或許正是其中的關鍵。「真一」正是這種既否定又同情的代表。他說：「諸位不可誤解以台灣議會就是他們的目的，這種請願也不過是我們戰鬥的一種方法，他們的腦中還有更理想的目的，他們的背後還更有價值的運動！」³⁶⁵甚至暗示了他對蔣渭水等人的佩服：³⁶⁶

……好的——忠君愛國——沒有學到，反而把那些反叛行為，什麼民族自決，什麼社會運動等等壞名詞都學了回台，竟暗暗地想實行起來。最妙的是台北醫學明明一個只講學問不管政治的學府，而裡面的學生和已畢業的醫生偏偏要和政府麻煩。

但他仍說：³⁶⁷

至於台灣的自治，只能說是總督治，警察治，與平民幾乎沒有關係；請願更是徒

卷第6號（1924，東京），13。

³⁶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96。

³⁶² 沫雲，〈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6。

³⁶³ 真一，〈台灣怎麼樣了？〉，《平平旬刊》，創刊號，9-11。

³⁶⁴ 連溫卿，〈台灣文化的特質〉，《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台北），129。這篇文章與連溫卿同時期所撰寫的《台灣政治運動史》，第二章有大量的重複，包括他引用並論述許乃昌與「真一」的文章的部分。然而，「則有相反的意見」一句在《台灣政治運動史》中則為「提出如下的意見」。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86、356。〈台灣文化的特質〉一文也收入《台灣政治運動史》一書，這裡討論的段落可並見356頁。實際上，連溫卿在摘引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論述時，曾非常「精準」地連續引用許乃昌〈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沙上の文化運動〉，以及〈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三篇文章，但並未指出這些都是同一個人寫的。特別是後面兩篇的筆名均同，但連溫卿卻忽略而不全寫出來。似乎刻意讓這三篇文章給人看起來像是三個人的著作。或許這是五〇年代以後的環境之下所不得不為的。此外，連溫卿所引用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文字，正是中文原文，甚至還摘引了一篇《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中沒有錄入的〈台灣怎麼樣了〉（署名「真一」）一文，則當時的連溫卿可能正是根據《平平旬刊》原件寫作的。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5-86、355。

³⁶⁵ 真一，〈台灣怎麼樣了？〉，《平平旬刊》，創刊號，11。連溫卿對於「他們的腦中還有更理想的目的，他們的背後還更有價值的運動！」這句話有很特別的解釋。他認為「這些思想正是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利害之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所憂慮的思想」，也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6。

³⁶⁶ 貞，〈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1924，上海），4。

³⁶⁷ 真一，〈台灣的保甲法當如何廢除？〉，《平平旬刊》，第9期，3。另可參考真一，〈台灣的自治和請願都不中用〉，《平平旬刊》，第7期（1924，上海），2-4。

取煩惱，長侵掠者的野心；現在只剩了一條路，就是直切了當的對帝國主義宣戰！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載，不但平社曾將反議會請願運動的「要旨通告林獻堂」，還有某個平社組織者「和蔣渭水保有密切聯繫」。³⁶⁸假使將這些說法聯繫起平平同人反議會請願運動的言論，並將被稱為「台灣文化協會上海支部」³⁶⁹的許乃昌、彭華英等人接連組成「平社」等左翼團體的實況考慮進來。或許 1927 年的文協左右分裂，以及林、蔣二人之走向分歧，在此便已埋下伏筆。

話說回來。同情「參與者」是否就連帶同情「參與者」所屬之「階級」？在平平同人中，清楚確認議會請願運動之階級屬性者，當屬許乃昌。他在治警事件前發表的〈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中指出，「如果台灣議會真的開設了，也不會是全台灣人的解放，而只是特殊階級[資產階級]的解放。」他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將與新興台灣資本主義相「妥協」乃至「共同強化對於台灣無產階級的剝削。」³⁷⁰然而許乃昌在治警事件後發表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則對台灣資產階級有稍微溫和的評價：³⁷¹

到了近來因受日本資本主義侵掠入的結果，從來的宗法社會便起了階級的分化，而必然地產出新的資產階級來了，而這個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和那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利益完全相反，因此台灣資產階級隨其本身的發展，也就漸漸露出些反抗日本的統治的面目來了……可是台灣資產階級還是在那舉步的幼稚[稚]時代，所以也就不能像印度韓國等處作比較上革命的行動，而只在於所謂『台灣議會』的參政權運動戀戀不捨而已。

雖然同人們都批判議會請願運動，但若台灣資產階級敢於在一定程度內挑戰日本之統治，難道就不能成為運動的同盟者？假使台灣資產階級是可以同盟的，那麼先進的無產階級應以什麼樣的方式團結他們？彼此間的共同底限又該為何？無產階級最終的政治目標與此底線之間的關係又該是什麼？——這個問題，留待下一章討論。

有意思的是，在平平同人中，並不只有台灣人關心議會請願運動；反對最烈者，甚至也不是台灣人。來自浙江的賀威聖說：³⁷²

議會是什麼東西？不過是特權階級所豢養的走狗的狗窠而已，法律是走狗所訂的。當然是壓迫平民的一種工具。

台灣獨立運動者的一番精神，我們是很尊敬的，然而他們不向人的道路走——奮鬥——偏爬到狗窠裡去磕頭，頭是磕響了，可是人也被狗咬著了。

這就叫做上了狗法的當！

賀威聖的態度，來自於他對代議制度的不信任。「什麼叫做代表會議，就是軍閥為權利和地盤等分配之不均，恐釀成鸛蚌共傷的局面，因此互派代表平分贓物的一幕把戲。」³⁷³這

³⁶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96、245。

³⁶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103。

³⁷⁰ 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4年第7號，46。

³⁷¹ 沫雲，〈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6。

³⁷² 阿鳳，〈上狗法的當〉，《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16。

³⁷³ 阿鳳，〈至死不悟〉，《平平旬刊》，第4期，8。

大概也是他看待台灣與日本資產階級之利害關係的切入點。對於議會的態度，反映他當時並未完全置於中共的運動脈絡之下，因為中共在 1923 年 7 月的〈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便提出以「國民會議」推動「國民革命」。而賀威聖竟然一邊支持「國民革命」一邊反對「國民會議」。³⁷⁴雖然國民會議運動在孫中山北上前後才達到高潮。然其見解與中共的差異，仍反映了彼時二者之間的距離。

第四節、結論

從目前史料來看，平社以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為主要活動，實際上，平平同人所賦予自己的任務，正以文字宣傳為主。雖然平社並未以集體的名義進行出版以外的活動，卻成功實現了刊物的定期發行（十天發行一次，這是台灣史上首份定期社會主義刊物）。又由於刊物本身積極討論各種時事問題，幾位刊物寫手廣泛向外投稿（甚至發生論戰），³⁷⁵並與當時的許多報刊建立起廣告與被廣告的聯繫。³⁷⁶因此刊物的活動力並不弱。甚至，也許恰恰是平社及《平平旬刊》的存在，才為隨後出現的幾個具有激進活動的組織，提供了歷史性的準備（比方台韓同志會）。

1924 年 6 月 19 日，北京政府通令郵局禁止寄遞一系列過激刊物，《平平旬刊》赫然列名其中。³⁷⁷由此可見《平平旬刊》所形成的影響力。除北京政府的禁止外，發行僅有三個月的《平平旬刊》，也因暑假的來臨而宣布暫時停刊，大概因為他們及他們的讀者多是學生吧。³⁷⁸《平平旬刊》的句點，畫在北京政府的禁止、學生的暑假，以及前述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之間，這是頗為弔詭的結局。然而，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們卻未因此止步。在國共合作引領整個中國激進化的 1924 年，在當時大陸報刊所激烈爭論的「讀書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爭論之中，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紛紛走出讀書運動的框框而投身社會運動。又由於他們所個別具有的東亞各地域的背景，因此，他們從上海所邁上的征途，更是以整個東亞為範圍的長征。如果不是上海此時此刻所具有的特殊背景，這種跨地域的連帶顯然難以形成。³⁷⁹

³⁷⁴ 關於賀威聖對國民革命的態度，見：威聖，〈接踵而來的三個紀念日——「五一」「五四」與「五九」〉，《平平旬刊》，第 5 期（1924，上海），1~2。

³⁷⁵ 除了最多同人稿件的《覺悟》之外，在《婦女週報》可見到賀威聖為「西洋人釘死奶媽」問題的投書，在《中國青年》也可見到同人「王秋心」關於「文學與革命」問題的來信與惲代英的回應。

³⁷⁶ 打廣告也是一種政治傾向的表態方式。不但《覺悟》副刊曾為《平平旬刊》打廣告，《平平旬刊》也替《民國日報》作宣傳。《學匯》、《春雷》（這兩者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台灣民報》，以及上大學生主辦的《孤星旬刊》，也與《平平旬刊》互有廣告或被廣告的關係。隨著史料的逐漸發掘，這方面的實例相信將會更多。

³⁷⁷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61~62。

³⁷⁸ 「啟事：現因各學校均將放假，讀者在家的住址我們知道的很少，所以暫停兩月。」見：〈廣告〉，《平平旬刊》，第 9 期，16。

³⁷⁹ 以同樣誕生於上海大學之內的《孤星旬刊》為例，他們也號召推動「亞細亞各民族革命運動」，並把台灣算進必須團結的「弱小民族」之一。《孤星旬刊》是後來「中國少年勞動黨」的前身。見：

從表 4-3 的考證來看，除了盧劍波、秦滌清這兩個無政府主義者之外，大陸籍的平等同人——如羅任一、賀威聖、華崗、姜冰生、崔曉立、徐介藩、劉一清、王秋心——大多加入了中共（乃至國民黨³⁸⁰）。朝、日籍的同人更全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羅任一並未久留於中共黨內。實際上，他同時告別了他曾經想聯合的「A」「B」兩派，而與鄧演達（1895~1931）共同創立了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曾幾次在西安策動張學良反蔣。賀威聖則在大革命中犧牲，成為中共第一個浙江籍烈士。大革命失敗後的華崗，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中寫下第一本關於大革命的專書：《中國大革命史》，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哲學家。劉一清則是上大的積極份子，是五卅慘案隔日的示威總指揮。³⁸¹最有意思的是崔曉立。最後於抗戰中犧牲的他，在國民黨的「杭州軍人監獄」中結識駱耕漠（1908~，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駱耕漠正是在此處認識了台灣人李友邦（1906~1952）。³⁸²台灣籍的同人，以許乃昌與彭華英最為突出。同樣加入中共的許乃昌於同年前往蘇聯，回國後轉戰日本、上海、台灣三地，並在 1926~1927 年間參與「中國改造論爭」，直接領導左翼對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奪權，加速了台灣社會運動的左右分化。彭華英則逐漸淡出左翼，卻也成為文化協會、民眾黨的重要幹部。朝鮮籍的尹滋英，輾轉滿州等地的組織工作之後，前往蘇聯。最後卻因協助季諾維也夫（1883-1936）的嫌疑而遭清洗，處死於 1938 年。2004 年，韓國政府正式頒發「建國勳章」給包括尹滋英在內的左翼獨立運動家，他所獲得之「獨立章」，是同次授勳中最高等的獎章。³⁸³

至於「台灣赤華會」與「赤華黨」，雖然本文都把兩者聯繫看待，但兩者之關係及平社及《平平旬刊》的作用究竟為何？「台灣赤華會」出現於廈門「台匪」亂事方熾之時。她以著呼籲兩岸人民相互親睦、攜手奮鬥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然此姿態僅僅展示為一紙宣言，此後便消失於史料之中。許乃昌親身參與了「台灣赤華會」與「赤華黨」。但就實踐上來看，也許並不存在一個從「台灣赤華『會』」直線發展為「赤華『黨』」（Sehikwo-“tow”）的筆直過程。這個過程既斷裂又連續，平社則是其間的媒介與實際的起點。³⁸⁴

赤華黨可謂台灣共產黨之前的台灣共產黨，但她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的並不只有「赤

劍平，〈亞細亞革命與世界改造〉，《孤星旬刊》，第 9 期（1924，上海），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3~8。

³⁸⁰ 羅任一加入國民黨的部份值得特別說明。他是在 1924 年的上海加入國民黨的，詳情可見，〈羅豁致上海執行部組織部〉，館藏號：環 10545，收錄於台灣大學館藏「中國國民黨史料資料庫」。

³⁸¹ 黃美真、石源華、張云編，《上海大學史料》，139~140。

³⁸² 駱耕漠，〈回憶崔曉立烈士在獄中〉，《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 18 輯（1981，浙江），55~59；駱耕漠，〈赤誠的愛國主義者——紀念台灣義勇隊創立人李友邦〉，《文史通訊》，第 6 期（1982，北京），15~19。

³⁸³ 金喜坤，〈追封建國勳章的被遺忘的革命家尹滋英——領導社會主義獨立運動的朝鮮共產黨核心領導〉，《新東亞》，第 48 卷第 1 號（2005，首爾），432~443。

³⁸⁴ 此外，一個名為「赤星會」的組織也曾記於《台灣社會運動史》之中：「尤其是上海，在旅滬同鄉會名義下促使左傾學生組織化的蔡孝乾、陳炎田等與謝廉清共同組織『赤星會』，發行機關報《赤星》，進行共產主義之研究與宣傳。」「赤星會」是否與「赤華黨」有關？其間關係值得考察。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3。

色」，而還有「中華」(China / Китай)。雖然 1928 年的〈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將赤華黨意譯為「The Red Celestial Party」，但誠如郭杰與白安娜所推測的，此處的「Celestial」當源於「中華帝國 (Celestial Empire)」的概念，也還是「中華」。³⁸⁵這些台灣青年，在廈門匪亂之中崛起、在治警事件後激進、在各種既有的台灣青年團體中吸收力量並最終走向組黨。這就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於 1924 年時的主旋律。

無論平社或赤華黨，主體都是學生知識份子。因此這兩個組織(特別是建黨了的後者)恐怕無法視為「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當時，台灣島內的工人運動才剛剛起步。1923 年，台北爆發由印刷製本業的工人所領導的罷工，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不但連溫卿到老都還記得當年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也特別強調他們的罷工。據其所言，印刷製本業工人的工會組織罷工之後即遭鎮壓。此後直至 1924 年，台灣仍無任何工會。許乃昌認為，只有日本的工會組織提供協助，台灣的工會才可能被組織起來。³⁸⁶

無論如何，組黨畢竟是失敗了。但是許多成員並未就此脫離運動。他們爲了運動在下一階段的復興做了準備。下一階段的開端以 1927 年的「中國改造論爭」爲信號。在論戰中，許乃昌再次成爲核心。然而許乃昌的理論準備，仍然始於 1924 年。許乃昌在 1924 年底發表的〈黎明期的台灣〉，正是台灣資本主義論首先在 1924 年所達到的一次高峰。



³⁸⁵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62.

³⁸⁶ 許乃昌指罷工發生於 1923 年 3 月並於 6 月被鎮壓，但目前能核實的印刷工罷工卻發生於 1923 年 8 月。由於台灣印刷製本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為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 9 月才抗爭勝利。連溫卿雖在〈城內的政治發展〉提及罷工，時間卻誤記為 1921 年。以上可分見：本刊，〈持久戰に入つたらしい・臺北印刷製本業主對本島人の賃銀爭議〉，《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2 日，第 7 版；連溫卿，〈城內的政治發展〉，《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4 期（1954，台北），41；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16, 62-63.

第五章、資本主義論與革命性質的抉擇 ——兩岸社會主義者的首次對話

引 言：從彰化通向莫斯科的道路

就在平社以及赤華黨瓦解之後，許乃昌從上海回到了他的故鄉，彰化。

許乃昌回到台灣之時正值暑假。當時，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恰好正組團返台進行巡迴文化演講，剛好輪到許乃昌的故鄉彰化，於是他們便選擇了「彰化座」戲院進行活動。許乃昌也參與了這一輪的演講。7月23日那晚，許乃昌以「社會改造之一考察」為題發表講演，話沒說完，就遭到了臨監警官中止。³⁸⁷

對於許乃昌來說，他在彰化被中止的演講，不過是他告別故鄉之前的一個註腳。許乃昌在彰化座的講演遭到終止後，便在中共推薦下，³⁸⁸以中國人的身分，³⁸⁹進入蘇聯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³⁹⁰許乃昌是目前所知第一個到蘇聯留學的台灣人。日後日本警方的檔案則指出，許乃昌「在學於同地之上海大學時，親炙俄國文學，又受山川均著作所鼓舞而欲赴俄。去年[1924年]7月放棄學業，與一位中國人（許乃昌自身也自

³⁸⁷ 追風，〈東京留學生夏季回台講演日記〉，《台灣民報》，第2卷第17號（1924，東京），14。

³⁸⁸ 《台灣社會運動史》謂許乃昌是由陳獨秀（1879~1942）推薦下而赴蘇。郭杰與白安娜則根據共產國際檔案而謂其由中共及共產國際送往蘇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45；K. M. Тергш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61.

³⁸⁹ 關於許乃昌進入蘇聯所使用的身分，《台灣社會運動史》謂之「以中國人的身分」。簡炯仁親訪許乃昌（1975年7月27日），謂其以「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名義前往。然而簡炯仁所引許乃昌的口述多有錯誤（比方組織的名稱屢誤），且如本章正文所引史料，許乃昌向日警供稱自己自稱中國人而入蘇，故《台灣社會運動史》恐較確實。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5；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50。

³⁹⁰ 關於許乃昌到底進入蘇聯何所學校學習，《台灣社會運動史》曾有兩種記載：一個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另一個是莫斯科某共產主義學校。孫中山在1925年逝世，為了紀念他才有中山大學。所以《台灣社會運動史》中另外記載「進入莫斯科某共產主義學校」的說法較為保守而正確。郭杰與白安娜根據共產國際檔案，證實許乃昌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38、245；K. M. Тергшкий &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61.

稱中國人)未持護照而達海參崴。滯留約兩個月後,於同年9月7日抵莫斯科。」³⁹¹許乃昌並云,「我因耽溺於閱讀山川均的著作而嚮往俄國,以著永居於彼的決心而與一位中國商人在無護照的情況下抵達海參崴,又因善操中國語而能以中國洗衣工人的身分矇過官憲而抵莫斯科。」³⁹²

許乃昌是抱著「永居於彼的決心」而前往蘇聯的。然而個人的接近,畢竟不等於殖民地台灣所有人民的接近。如果1917年的十月革命帶給了俄國以及蘇聯人民一個新社會。對於殖民地人民而言,十月革命是否可以複製、新社會是否也是可能的呢?

隻身在蘇的許乃昌,並未忘懷苦難中的台灣人民。許乃昌抵蘇不久,便於10月27日提出一份題為〈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Доклад 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Тайване)〉。根據俄國學者郭杰與白安娜的描述,這份報告包括了關於島內地理、人口、經濟,以及政治情勢的幾個部份,也包括台灣人在島內、上海,及日本所組成之各種左翼組織的細節。³⁹³在許乃昌之前,只有維經斯基於1923年向共產國際提出了一個簡略的台灣情況報告。³⁹⁴雖然目前尚不可知許乃昌報告的全內容,但許乃昌的報告,無疑是共產國際關於台灣形勢的第一手資料。

兩個月後的12月20日,許乃昌以「沫雲」為筆名,在中共中央理論誌《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發表題為〈黎明期的台灣〉的文章。由於許乃昌此時仍在蘇聯,如果不是許乃昌早就寫好稿件,就是許乃昌從蘇聯向國內投稿。無論事實如何,在極相近的時間點間發表或遞交的〈黎明期的台灣〉與〈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可能在內容上有極近的親緣,但本文目前只能在無法獲得〈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的情況下單獨討論〈黎明期的台灣〉。

〈黎明期的台灣〉的重要性體現於幾點:首先,這篇文章綜合了此前台灣資本主義論的觀點,可謂集大成之作。其次,瞿秋白(中共領導幹部、許乃昌的老師)對於許乃昌的觀點提出反駁,因此這篇文章還是兩岸社會主義者為了台灣革命問題而進行的首次對話。其三,從現象上來看,許、瞿兩人在共產國際所特有的問題意識(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應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上發生爭論,並以中國革命所特有的概念「國民革命」來代稱「民主主義革命」。

本章將從幾個方面來分析許、瞿兩人的對話。首先概述許乃昌資本主義論的理論問題,並將其論述與其他台灣資本主義論相比較。其次則從共產國際、無政府主義,以及「國民革命」來考察對話所可能具有的複雜背景。其三則以中共史上最早發生的類似論爭來做比較。

³⁹¹ 〈露國ヨリ歸來セル台灣人ノ言動ニ關スル件(1925.9.21)〉,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台灣社會運動史》指出,許乃昌進入蘇聯的時機,可能是同年8月或10月進入蘇聯。但就許乃昌交給日本警方的供詞來看,8月應為正確者。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38、245。

³⁹² 〈露國ヨリ歸來セル台灣人ノ言動ニ關スル件(1925.9.21)〉,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³⁹³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5.

³⁹⁴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258-265.

第一節、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

1. 本文第二、第三、第四章所揭示的三個時代問題

對於本文第二章所討論的連溫卿而言，他所面臨的時代問題是台灣急遽的「資本主義化」。對於本文第三章所討論的范本梁而言，他所面臨的時代問題則是總督府「政權」的強力壓迫，以及一個汲汲追求「政權」的既存社會運動（即議會請願運動）。對於本文第四章所討論的平平同人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則是由於「治警事件」的打壓而造成「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之間的分離；他們一方面批判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卻又同情運動的參與者。

如果將上述三個時代問題綜合起來，也許就是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所面臨的總的時代問題。但問題之所以會一分為三，不同的「主義」立場以及不同的時空環境也許是個原因。然此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在歷史中探索**現實性與必然性**的關係。

范本梁把一切具有「政權」要求的事物視為「不自然」的存在，將之視為對於「自然的趨勢」的反逆。他認為，祇要將不自然的東西除去，自然的趨勢便能得到恢復。但他未能說明自然的趨勢為何會產生不自然的東西。對於連溫卿來說，他則沒有這個問題。他在進化論中的「生存競爭」與階級鬥爭學說中認識到：那些必然被范本梁視為不自然的現實存在（比方人的貧窮）具有必然性。因此，連溫卿並未直接否定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本身，而是從種種社會現象中追索作為根本原因的資本主義如何存在。同時，他也不是直接否定議會請願運動本身，而是說明請願運動為何不具（或失去）進步性。他的論據之一，就是台灣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加速度飛躍」地分化，所以資產階級將破產並補充於無產階級的隊伍。因此台灣社會運動有可能「極急速轉換為無產階級運動」，而請願運動更因此而遠遠落後於群眾。

但即便是連溫卿，他對請願運動的批判也還是有些純粹就本質而論本質的見解（就好比范本梁認為只要跟政權、國家有關的存在都是不自然的一樣）。即便身處於治警事件之後，連溫卿仍然認為無論民族是否相同，同一階級就有相同的利害關係，因此議會請願運動只是「自由主義」的運動。但對 1924 年出現的平社及平平同人來說，他們卻不簡單地認為同一個階級就有相同的利害關係。因為治警事件對於請願運動的打壓，同時證明了兩件事：第一，請願運動只能是叩頭請願的無力運動；第二，遭到打壓的請願運動參與者以其堅強地展現出不屈的姿態。因此，僅從理論出發，已不能聯繫實際；同時，實際也要求重新構築理論。

就在這種時代的要求中，許乃昌的新見解登上了歷史舞台。此即〈黎明期的台灣〉。

2. 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的內容概述

〈黎明期的台灣〉發表於《新青年》季刊第4期「國民革命號」。文章第一節至第三節，僅概略描述了馬關割台前的台灣史（然而文中記載屢誤³⁹⁵）、經濟現狀、政治壓迫。自第四節「文化狀態一瞥」與第五節「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開始，則開始評價台灣資產階級的性質。許乃昌延續了他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與〈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的部分見解。但就涉及台灣資產階級的評價而言，他則延續了〈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的觀點：³⁹⁶

到了近年，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又必然地培養出反對他自己的新階級出來。這便是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

前面已經說明，本來在日本資本主義高壓下的台灣，自身差不多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發展之可言，然而在小工業和商業方面，卻也有些微的發展——自農業到商業、小工業的發展。於是乎新興的台灣小資產階級便成立了。而這個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和那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其利害自然完全相反……

接下來的部分繼續抄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但他補充認為，「再看最近形勢，台灣議會的運動無形中已經消滅，於是台灣小資產階級的非革命的半自治運動也就告終了。」最後的第六節「台灣與社會革命」，則對台灣的革命性質提出意見。正如他在〈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所說的，「在行動——〇〇[革命]——之前，總是有思想作為先驅。」³⁹⁷隨著台灣資產階級運動的「告終」以及「思想的前驅」，「走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運動」直接在台灣提上日程：³⁹⁸

有人說：「現在的東亞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社會革命之前，應該有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中國如此，印度如此，台灣也應當如此。」

是的，現在的中國，當然非舉行全民族的國民革命不可。然而在台灣卻不應當這樣。原來台灣的資產階級是極幼稚的，並且將來也沒有發展可言。現在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落為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漸漸變為無產階級，這樣而至於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

一方面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便是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

這樣台灣的解放運動應當超越「國民運動」，而參加全日本的社會革命運動了。台灣解放運動的意義，不在第三階段而是在第四階段了。我們要看的並且應當看的，是全台灣人的解放，不是特殊階級的解放了。

³⁹⁵ 比方，它把唐景崧寫成唐景和，台灣民主國寫成台灣共和國。

³⁹⁶ 沫雲，〈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第4期（1924，上海），99。

³⁹⁷ 秀湖生，〈歐戰後の中國思想界〉，《台灣》，第4年第5號，38。

³⁹⁸ 沫雲，〈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第4期，100。

在這邊文章所附的〈記者附志〉上，署名「記者」的瞿秋白則提出了批評：³⁹⁹

沫雲同志這篇《黎明期的臺灣》，描寫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臺灣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侵略，很可以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對付殖民地之真精神，中國人讀了之後應當作何感想！我在此地希望讀者注意，甲午以前的臺灣就是現在的中國一樣，現在的中國又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心目中將來之臺灣呢！但沫雲同志的結論，說臺灣將不要經過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國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這未免有點左癡病，這是讀者須注意的，並且也是沫雲同志應自己明白的；因為在現時的臺灣狀況之下，在最野蠻的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臺灣，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已經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談無產階級的革命？我們須明白，列寧主義教訓我們，凡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須得經過一個全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給宗主國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普遍的打擊，纔能進一步行到無產階級革命。所以此時的臺灣，正是應當作全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臺灣，而還未到作單純的無產階級時期的臺灣。所以此時臺灣的無產階級，應該站在第三國際之下，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的幫助之下，去領導一切被壓迫的臺灣民眾，作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

許乃昌的資本主義論以「兩種階級分化」為基礎。第一個分化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分化」（從前資本主義各階級轉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階級）、第二個分化則是資產階級破產成為無產階級。不過，他的「兩種階級分化」集中在分析兩個階級及其各自的運動是否可能、或者是否具有進步性。

許乃昌認為，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及其政治運動（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代表）因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而產生。就涉及資產階級從無到有的發生而言，這是台灣「第一個分化」的現象；就涉及資產階級從有到無的破產（由於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所致）而言，則可視為「第二個分化」的現象。然而許乃昌所描繪的無產階級發生史很曖昧。雖然許乃昌的論述都涉及「兩種階級分化」，但許乃昌直至分析「第二個分化」才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袂出；又由於許乃昌承認資產階級始終只是少數，因此「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體在邏輯上不可能是破產於「第二個分化」中的資產階級，而是破產於「第一個分化」中的前資本主義各階級（比方「受日本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的新無產階級」）。也因此，「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應該是貫穿「兩種階級分化」的總趨勢；**「第一個分化」中的無產階級化應該是主要過程，「第二個分化」中的無產階級化只是補充**。至於「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要動力，則始終是日本資本主義，而不可能是新興的台灣資本主義。

然而許乃昌所描述的「第一個分化」顯然不可能是「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體過程，而且也不可能是一個能與「第二個分化」並行的過程，因為他眼中的「第一個分化」幾乎無法展開。他曾略為提到新式糖廠的發展促使了無產階級的產生：「受日本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的新無產階級（以前大部分是小農民）大部分都集在這些工廠之下，為勞苦的勞動者。」然而這些無產階級在全台灣的階級結構之中所佔比率多少？許乃昌並未說

³⁹⁹ 沫雲，〈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第4期，101。

明。從他的農業階級分析來看，無產階級的比率肯定是低的。因為「農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許乃昌的農民包括自耕農、佃農，以及自耕農兼佃農，沒有考慮農業無產階級）。此外，「現在大地主很少，中等的地主甚多，而這些地主，大部分一方面是小商業資本家。」⁴⁰⁰

總之，許乃昌的論述存在著矛盾。而許乃昌迴避說明了「第一個分化」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之間的關係。

此外，台灣本地資本主義的自身崩潰並不意味著（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崩潰。實際上許乃昌所屢言的「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個意義就是指日本資本主義可能在上升期就導致「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第二個意義才是指日本資本主義本身因爛熟而可能導致的崩潰。

在 1924 年底許乃昌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之前，平平同人也在「兩種階級分化」的角度提出殖民地資本主義論。而平平同人中的佐野學以及許乃昌，則在更早的時候就曾提出過各自的殖民地資本主義論。以這些資本主義論做為比較的對象，可以說明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的理論特點及其沿革。

3.比較一：其他資本主義論如何論證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性

第一：佐野學在 1923 年與 1924 年的論述。佐野學的論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台灣資本主義論。其論述有二：（1）1923 年的佐野學認為，殖民地將因外來資本主義的影響而快速完成「第一個分化」，除了產生資產階級，還將因「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而出現大量無產階級。又由於殖民地出現了無產階級，因此佐野學認為殖民地可以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一同爭取新社會（「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世界共和國」）的實現。⁴⁰¹（2）1924 年的佐野學則認為，即便殖民地社會的「第一個分化」沒有或剛開始，在「社會強於傾向國際化普遍化的現代」，「一社會的跳躍的進化是可能的」。因此殖民地可在「第一個分化」沒有或不充分的情況下，透過全世界的幫助而一同進入新社會（「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的日本」、「東洋共產主義聯邦」、「歐羅巴共產主義聯邦」）。⁴⁰²

第二：許乃昌在 1923 年的論述。許乃昌 1923 年的論述類似於 1924 年的佐野學。在題為〈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全文見附錄 5-1）的文章中，許乃昌認為台灣的「第一個分化」剛開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均所佔少數。但日本資本主義已經「面對臨終」，所以作為日本領土的台灣也可以跳躍地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就算「第四階級」為數不多，但「從日本的資本主義狀態來估計」，台灣也可能「一氣呵成地躍入正義的新社會」，因此「沒有第四階級的解放就沒有全台灣人的解放」。）需注意，1924 年佐

⁴⁰⁰ 沫雲，〈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第 4 期，94~96。

⁴⁰¹ 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 4 年第 6 號（1923，東京），64~75。

⁴⁰² 佐野學，〈過上海〉，《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3。

野學所謂的「跳躍的進化」則是指把資本主義跳躍過去，而不是連溫卿所認為的「加速度飛躍」地完成資本主義。

第三：平平同人在 1924 年的論述。平平同人的並不統一，因此以下只能在大略地概括他們的共同見解。並非每個同人都如佐野學或許乃昌那樣關心「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或者「正義的新社會」。平平同人的核心關懷是論證殖民地人民之間沒有不同的階級利益，從而「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能否重合。他們分別以殖民地的「第一個分化」不存在或剛開始（類似於 1924 年的佐野學），⁴⁰³或者「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類似於 1923 年的佐野學與〈黎明期的台灣〉），⁴⁰⁴去說明台灣人民內部沒有太大的階級差異。至於這些同人提及「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時機，既有「第一個分化」，也有「第二個分化」。

1924 年底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與前述幾種論述之間的結構非常類似。（1）就承認無產階級必在島內大量產生而言，許乃昌的見解類似於 1923 年的佐野學與 1924 年的部分平平同人（即承認無產階級必在島內大量產生）。（2）就「運動，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而言，許乃昌則與 1923 年的許乃昌與 1924 年佐野學的見解相類似（即把國際環境視為無產階級運動是否可能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說，許乃昌在 1923 年的論點可總結為「沒有第四階級的解放就沒有全台灣人的解放」。他在 1924 年所提出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則可總結為「第四階級的解放等於全台灣人的解放」。從「（無產）階級」與「民族」的關係來看，可發現 1923 年許乃昌強調解放的條件，一種以無產階級的解放作為整個民族取得解放的條件。⁴⁰⁵但在 1924 年

⁴⁰³ ① 「韓國無論資本家，無論勞動者，各不能以自身力量形成獨立階級。僅僅以民族而論，都是被壓迫者，[被]榨取者而已。」見：尹蘇野，〈韓國的民族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2。

② 「他們的財產是一天一天的消耗，所以現在台灣是分不出什麼資本家和勞動者，自然而然台灣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級爭鬭是不成問題的。」見：真一，〈再談台灣問題〉，《平平旬刊》，第 2 期（1924，上海），5。

③ 「比起日本的第四階級。中國的勞動者也不見什麼大區別。」見：貞，〈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1924，上海），4。

⁴⁰⁴ ① 「我看若是長久下去，保不住十年二十年之後，台灣三百多萬人民，怕都要變成日本資本主義腳下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真一，出處見表 4-2：21）

② 「照目前狀態演譯[釋]下去，不僅女人會全為奴隸，男人也很可慮」；「當歐戰初終時，經濟膨脹得過甚，都還不覺苦；及至經濟反動襲來，所謂台灣資產家遂一變而為中產階級，再變為破產者。」見：真一，〈台灣的人造地震〉，《平平旬刊》，第 4 期（1924，上海），4。

③ 「台灣受了日本的政治掠奪，受了日本資本家的無形榨取，窮人要漸次無立身之地，從前的發財人也要變到與窮人同地位。」見：貞，〈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4。

⁴⁰⁵ 吳叡人評價 1923 年許乃昌〈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云：「台灣人全體的解放：戰前台灣左翼民族運動的思想遺澤。從許乃昌在 1923 年提出『第四階級』論，主張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應以廣大的農工階級為主體開始，歷經 1926-27 年的中國改造論爭、文協左右分裂、1927 年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到 1928 年台灣共產黨成立為止，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概念，隨著左翼挾『階級民族』觀念步步進逼而持續擴張。1927-28 年以後，儘管仍有種種爭議，『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已成為左右派的共同目標。」吳叡人的詮釋是錯誤的。因為 1923 年的許乃昌恰恰認為，無產階級（即「第四階級」，不包括農民）在台灣所佔少數，而不是什麼「廣大的農工階級」。即便是 1924 年的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認識下，這項標準被解消了，因為無產階級就是整個民族本身。

其實〈黎明期的台灣〉最接近 1923 年的佐野學。兩者的差異在於（1）〈黎明期的台灣〉認為全台灣人會無產階級化，但 1923 年的佐野學則只談到「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2）〈黎明期的台灣〉把「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放在「第二個分化」裡談論，而佐野學一開始就在「第一個分化」中論及「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如果回顧一下許乃昌在 1923 年所曾考慮過的問題（「台灣的經濟狀態尚未發達到遭雙方發生階級鬥爭的程度」、「就算台灣的經濟發達還很落後」），以及他在 1924 年所承認之大量存在的農民（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顯然他對「第一個分化」在台灣的開展水平始終有所遲疑。那末，〈黎明期的台灣〉之所以沒有在「第一個分化」中討論「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也許正因他可以說明資產階級的些微產生，卻無法說明台灣絕大部分群眾並未無產階級化（實際上，他所論及的糖業無產階級並非無產階級，仍然是佃農）。換句話說，他在未來的「第二個分化」中討論無產階級的來源，而不是放在當下（可能正在進行或其實無法進行的）「第一個分化」中討論。這也許反映他當時並沒有「原始積累」之概念，或者反映台灣沒有出現「原始積累」的事實，所以他無法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放在理應作為主要過程的「第一個分化」中描述，而是擺在了「第二個分化」。由於 1923 年的佐野學在討論「第一個分化」之時便提出「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因此可以避免許乃昌所無法避免的問題。

但反過來看，雖然許乃昌迴避說明「第一個分化」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關係，然而「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觀點的產生，離不開日本資本主義在許乃昌面前所造成的殖民地人民普遍貧困化之趨勢。然此現象之本質並不必然是「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而可能是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被日本資本主義所長期維繫（這點在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得到清楚表述）。倘若現象等於本質，無異取消科學本身；沒有認識到這種維繫作用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恰恰存在此種取消的危險。當然，要求 1924 年的許乃昌能達到這樣那樣的理論水平，是非歷史的。

4.比較二：其他資本主義論如何論證既存社會運動如何沒有進步性

許乃昌、佐野學，以及涉及台灣問題的平平同人，都拿自己的路線同既存的路線（以請願運動為主）相對立。而在兩條路線的比較中，除了論證自己的路線如何可能之外（前已略述），最主要的論證方式就是說明既存的路線如何不具進步性。不過，上述論證方式存在著一個發展的過程。分別介紹如下：

許乃昌，其「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觀點下的台灣人民也只是在將來才會無產化，因此無產階級始終不是現實多數的存在。關於吳叡人引文，見：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收錄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思想(3)天下、東亞、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100。

第一：沒有論證的論證：資產階級的運動既有進步性，也可能走向反動。1923 年的佐野學以一種面面俱到的方式評價殖民地資產階級。他認為，隨著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有產階級」將從中分化而出。這個階級可能與外國資本對抗或者合作。其中的「小有產階級」或「小資本階級」更是民族運動的主力，但他們只想追求「自由主義」的「共和國」或「政治獨立」。⁴⁰⁶佐野學認為，台灣議會對於一步步實現將來的民族解放而言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最初的階段」。但他也認為這一運動所追求的「臺灣議會」只會成為「臺灣有產者壓迫台灣無產者的機關」。所以他期待將來能出現更進步的「無產者的民族運動」。⁴⁰⁷

第二：資產階級及其運動必與資本帝國主義共謀，所以不具進步性。1923 年的許乃昌則把殖民地資本主義與母國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之間是否共謀互利，視為判斷殖民地「資產階級」及其運動是否具有進步性的標準。而他當時完全否定新興台灣資產階級具有進步性。他認為，誕生於「第一個分化」中的台灣資產階級必因依附日本資本而走向反動；又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已經「面對臨終」，因此「資產階級便更焦躁地走向反動」。所以，「真正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反對日本資本主義以及新興的台灣資本主義所共同形成的「二重權力」。「台灣議會」完全無法抵抗這「二重權力」，因為這只是「第三階級」向支配者討價還價的解放運動。必然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⁴⁰⁸誠如連溫卿所言，「台灣人的富人和日本的富人，由生活的經濟上相同，沒有民族的排斥觀念，反卻結合起來，這是社會進化上必然到達的地點，所以社會上有兩階級，也是從此分出來的，我們為台灣奔走，是不可不從此見地去做。」⁴⁰⁹

第三：無力抵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不具進步性，但運動參與者值得同情。1923 年底的治警事件之後，遭到鎮壓的請願運動充分暴露出運動的弱點，但也促使參與者得到顯著同情。雖然「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不能直接等同於「資產階級及其運動」，然而「請願運動參與者」所贏得的同情確實透過理論上的設想而移情於「資產階級」；這一設想就是「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

1924 年的許乃昌指出：「台灣資產階級」所推動的「台灣議會是不能給予我們什麼利益」。但是做為「日本資本主義侵掠入的結果」的「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卻與「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利益完全相反」。⁴¹⁰如前所述，部分平平同人從殖民地社會的「第一種分化」並不顯著，來說明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殖民地人民之內並無不同的利益。另一部分的平平同人與許乃昌則透過「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以下代稱許乃昌「全台

⁴⁰⁶ 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 4 年第 6 號，64~75。關於民族運動，還可參考佐野學對於「國民運動」的分析，見：佐野學，〈將來の殖民政策について〉，《台灣》，第 4 年第 1 號（1923，東京），12~18。

⁴⁰⁷ 佐野學，〈台灣議會的設置を助けよ〉，《台灣》，第 4 年第 6 號（1923，東京），64~75。

⁴⁰⁸ 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 4 年第 7 號（1923，東京），43~46。

⁴⁰⁹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十五回。〈蠹魚的旅行日記〉的史料解題詳見本文最後一章：〈餘波：「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 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⁴¹⁰ 沫雲，〈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6。

灣人的無產階級化」) 而把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同情理論化。前面曾提到, 把無產階級的來源放在「第二個分化」——而非「第一個分化」——討論的見解, 可能反映「原始積累」之事實或概念的缺乏。然而「第二個分化」被過分強調的原因, 也可能是一種同情的表現。藉由把當下的資產階級論證為未來的無產階級, 論證當下的資產階級值得無產階級的團結。

但無論把「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擺在何種分化之中說明,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都意味著「(無產)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的重合。⁴¹¹這種重合更意味著民族運動的階級化, 因此階級運動的目標就會成為民族運動的目標。⁴¹²然而這種重合也意味著階級運動的民族化, 平平同人「真一」云, 「假使將來有階級爭鬪發生, 就是不外乎台灣人全體和日本資本家的爭鬪」。⁴¹³「假使」一語, 精要地點出「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實乃具有政治目的的理論設想——「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作為一種「未來」, 其實是為「現在」論證殖民地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也因此, 如果資產階級「整體」都被視為潛在的無產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這種細緻的範疇就沒有形成的必要。即便這種被賦予的「前途」對於資產階級自己而言, 不見得是現實的, 而可能僅是理論的, 甚至不見得是馬克思主義的。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在理論上聯繫起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在「極小化」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時, 還創造了團結他們的理論基礎。但是, 如果過分期待所有人都成為無產者之趨勢, 就可能連帶取消現實的、所佔少數的台灣無產階級之主動性; 反而可能使殖民地資產階級在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傾向下奪取運動領導權。⁴¹⁴

⁴¹¹ ① 「韓國無論資本家, 無論勞動者, 各不能以自身力量形成獨立階級。僅僅是以民族而論, 都是被壓迫者, [被]榨取者而已。所以在韓國今日的運動, 為一民族運動。」「以民族為目的, 圖恢復生命自由, 此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見: 尹蘇野, 〈韓國的民族運動〉, 《平平旬刊》, 創刊號, 2。

② 「假使將來有階級爭鬪發生, 就是不外乎台灣人全體和日本資本家的爭鬪。為什麼呢? 現在台灣的有產階級已經漸漸保不住他們的財產, 結果現在的台灣人全體就是現在和將來的無產[階]級(現在台灣有產階級也是日本資本家的一種勞動者)因此在現在台灣講資本家就不外乎, 在台灣的日本人資本家, 台灣總督府就是他們資本家的大本營。總括一句; 台灣的階級運動就會變成民族運動, 以後的台灣除了民族運動是沒有第二個運動, 就是台灣只有驅逐日本人的運動。」見: 真一, 〈再談台灣問題〉, 《平平旬刊》, 第2期, 5。

⁴¹² ① 「日本的資產階級顛覆了韓國的封建社會; 韓國的民族獨立運動, 快會打翻日本的資本主義罷。所以呻吟於日本勢力之下的東亞被壓迫民眾, 所組織的協同戰線, 在最近的將來, 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廢墟之上, 要建築起自由的東亞社會!」見: 尹蘇野, 〈韓國的民族運動〉, 《平平旬刊》, 創刊號, 3。

② 「台灣也是東方的被壓迫民族, 當這印度高麗, 比律菲利賓, 諸弱少[小]民族都在猛烈地進行他們的獨立運動, 反抗資本帝國主義的時候。台灣若再起來和他們相呼應, 做個東方弱少[小]民族的大團結, 我們東力[方]的社會革命, 就快在眼前, 世界的革命也就很有希望了。」「共同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日本! 這就是你們向自由的路, 也就是你們對東洋革命應盡的義務, 貢獻於世界革命的功績!」見: 真一, 〈再談台灣問題〉, 《平平旬刊》, 第2期, 5。

⁴¹³ 真一, 〈再談台灣問題〉, 《平平旬刊》, 第2期, 5。

⁴¹⁴ 若要評論「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機會主義傾向, 或可參照曾出現於朝鮮共產主義運動中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是一種肯定台灣社會必將全盤資本主義化的觀點。雖然「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始終存在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中。⁴¹⁵然而從較高的理論層次上肯定台灣社會必將資本主義化的論述，卻出現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外。其論述之代表即是日本共產主義者山川均以及學者矢內原忠雄。

1926年，山川發表以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為主題的論文〈殖民政策下的台灣〉。⁴¹⁶1929年，矢內原則發表同性質專著《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這兩篇分別經歷多次漢譯的名著（1926至1930年間山川的論文曾經三次漢譯，⁴¹⁷矢內原專著的漢譯次數則更多），將民族運動與

的「朝鮮延長論」。由於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長期分裂、派系鬥爭，與朝鮮半島本地持續的白色恐怖，大量朝鮮共產主義者流亡滿洲（東北）。當時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因為支配滿洲的主要力量與朝鮮一樣都是日本資本主義，所以滿洲就是朝鮮的延長；換言之，朝鮮與滿洲都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延長。因此，在滿朝鮮人應先反日帝，而非反對滿洲當地的封建殘餘勢力（中國封建地主與國民黨軍閥）。1930年3月20日朝共ML派滿洲總局發表《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解體宣言》，除了宣示在滿朝鮮共產主義者應加入中共外，《宣言》更特別批判了「朝鮮延長論」，要求朝鮮共產主義者也應反對滿洲當地的封建殘餘勢力。不過1930年9月中共的一份黨內指示更明確地指出「朝鮮延長論」的本質問題：「有些在滿自命為朝鮮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當然更如此），認定東滿的延邊和朝鮮一樣在日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實際是朝鮮的延長與擴大，唯一的敵人只有日本帝國主義。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的立場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實際上延邊是東滿的一部份，政治、經濟、軍事的組織系統與奉系軍閥國民黨的統治完全不可分離。中國的地主豪紳封建勢力更是直接剝削與壓迫延邊群眾的敵人。延邊是朝鮮延長的理論避免了與中國統治階級的衝突，離開了階級的立場根本就沒方法解決延邊的群眾（的問題）。」以上見：李鴻文，《三〇年代朝鮮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東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78-82；108-109。「朝鮮延長論」認定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打倒的敵人，卻迴避了封建殘餘勢力，這就使民主主義革命被隱沒或被取消。可以說，克服這些問題的《宣言》正是一份具有組織要求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而那個將台灣視為「日本資本主義的延長」、認為「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或許正有同樣的毛病。而且，台灣也曾出現過類似於「朝鮮延長論」的見解。連溫卿即曾指出：「台灣的產業雖有被促進發達，但其實是表現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延長，而同時為台灣人由台灣產業界失墜的第一步。」見：連溫卿，〈台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台灣大眾時報》，第6號（1928，東京），13。

⁴¹⁵ 1925年，蔡孝乾認為台灣的各階級將會「一齊同歸於無產階級」。1928年，《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詞〉則說：「我們台灣也自受了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後，由資本家壟斷經濟上一切的利益，也使台灣的小資產階級，一落千丈，逐漸流入於無產階級的陣營了。而大多數的農工工人一般無產者，迫得朝不顧夕、窮困日甚。」1929年，〈台灣民眾黨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中說「企業獨佔和租稅負擔過重的結果是促進島民的無產化。」1930年，蔣渭水則在刊載於《台灣新民報》第322號的〈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說：「殖民地人民的無產階級化是會急速發展的，使廣大群眾的陣營更加擴大。因此十年後的展望是越來越進展、深刻、尖銳化，會跳過許多墮落社會運動家的屍體，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吧。」見：蔡孝乾，〈五年來的台灣〉，《台灣民報》，第76號（1925，東京），14；〈創刊辭〉，《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東京），2；蔣渭水，〈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灣新民報》，第322號，18。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198。

⁴¹⁶ 山川均原以〈弱少民族の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醇化融合政策」の下に於ける台灣〉為題發表於1926年的《改造》五月號。同年十二月以《植民政策下の台灣》為名，發表增補後的單行本。後者可見：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1966），285-291。

⁴¹⁷ 第一次漢譯是1926年的張我軍，以〈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為題，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05-110、112-115號）。第二次漢譯則是1926年的李繼煌，以〈嗚呼台灣的民眾〉發表於《廣州民國日報》（9-11月，共22回，現存有缺）。第

階級運動之間的關係重新提出更理論化的說明。這兩位學者的最大貢獻就是將「原始積累」概念引入論述（山川稱之「原始蓄積」、⁴¹⁸矢內原稱之「本原的資本蓄積」）。這一概念的引入，使得那種認為台灣必將資本主義化的觀點提升到頂峰；但這個概念的引入仍未解決本文所研究之各種論述在「第一個分化」與「第二個分化」之間所發生的混淆。一方面，認識到「原始積累」的概念並不意味著存在「原始積累」之事實；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對台灣的支配必然實現資本主義化；最後一方面，由於「原始積累」恰恰是在處理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關係，在兩者之間的消長足以得出結論之前，「原始積累」就成爲一個可以爲兩者間的關係提供解釋、卻又什麼也解釋不了的萬靈丹。

山川均將當時的台灣視爲從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原始積累階段，並以資本對於農村土地的收奪來說明原始積累。雖然這個階段就是「第一個分化」之所在，但有一個觀點是有趣的：他把「自種農減少佃種農增加」（這是他分析的重點）視同於「農村的地主和無產農民兩者的階級分化」，也就是把佃農視爲農業無產階級。⁴¹⁹就理論上來說，「佃農」並非「無產階級」。山川將兩者等同的觀點，也許並不是他理論上的認識出現失誤，而可能是他確信台灣的「佃農」就是將來的「無產階級」，或者強烈帶有「無產階級」性質。

就此而言，確信台灣將資本主義化的矢內原忠雄幾乎延續了他的觀點，此外，兩人都認為台灣的民族運動將與階級運動（無產階級或者被視爲無產階級的佃農）相滲透而互相帶有對方的性質。但在評價山川所說的「有產階級」的問題上，兩者出現了分歧。山川認為台灣的「有產階級」只能依靠日本資本主義而存在，所以「有產階級」無論如何都「早已不是代表台灣民眾的利害的了。」⁴²⁰然而矢內原卻有一個值得玩味的「異見」：⁴²¹

台灣與朝鮮不同：原住民的台灣人，並非全都無產者化；不論在土地集中上或在企業上，**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不論是地主的或資本家的），⁴²²其勢力較強**，故其民族運動不能完全成爲無產者的階級運動；但是至少，在對於總督府及日本人大資本家的關係上，卻可與階級運動同時進行。至於那些對於總督府及日本人大資本家的利害融洽而且從屬的台灣人大資本家，從台灣人民族運動的立場來說，當然不在其內。

三次漢譯則是1930年的宋斐如（筆名蕉農、宋蕉農），以〈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為名發表於北平《新東方》（第1卷第3、4期），同年出版單行本《台灣民眾的悲哀》。此外，台灣大學圖書館還藏有自《新東方》剪貼而來的合訂本，仍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

⁴¹⁸ 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7卷，271；中譯見：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北平：新亞洲書局，1930），28。

⁴¹⁹ 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7卷，263~264；中譯見：山川均著，蕉農譯，《台灣民眾的悲哀》，12~13。

⁴²⁰ 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7卷，265、279；中譯見：山川均著，蕉農譯，《台灣民眾的悲哀》，15~16；47~48。

⁴²¹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250~251。中譯據周憲文譯文改譯。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222。

⁴²² 誠如涂照彥所言，矢內原將地主歸類於「中產階級」，

矢內原認為，以整個民族為範圍的無產階級化是可能的（如朝鮮）；從前引文來看，他還認為這一趨勢可能出現斷點（如台灣），並將「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的「勢力較強」視為出現斷點的原因。⁴²³但他沒有說明的是，「勢力較強」「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是抵抗「第一個分化」還是「第二個分化」；或者說，「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究竟是資本主義的存在還是前資本主義的存在（或者兩者兼具？）。矢內原此處所欠缺的說明，迴避了「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的階級性質。然而無論是矢內原的迴避，或者山川把「佃農」直接視為農業無產階級，他們的見解其實恰恰反映當時台灣並沒有進入到純粹「第二個分化」的階段；而其原因是與「第一個分化」未完成或無法完成相聯繫的。

第二節、許、瞿對話所可能具有的多重面向

為了對抗台灣既存的社會運動，台灣社會主義者分別以設立組織或者提出理論的方式進行路線鬥爭（如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以及平社、赤華黨）。在平社內部或平社與新台灣安社之間，也因為「A」「B」矛盾而出現社會主義路線之間的路線鬥爭。（然而目前的史料無法說明當時的「A」「B」矛盾是否上升到理論層次。）不過，即便是同一條社會主義路線之內，也可能存在路線鬥爭。許乃昌與瞿秋白在〈黎明期的台灣〉中的對話，就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首次在同一個路線內所發生的路線鬥爭。

早在 1923 年所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一文中，許乃昌便在請願運動之外提出了兩條可能路線，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答案（見表 5-1）。到 1924 年底發表〈黎明期的台灣〉，許乃昌進一步論證了自己的答案，並得到瞿秋白的回應。

如表 5-1 所示，許、瞿兩人以「無產階級運動」、「社會革命運動」、「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之類的概念表述一種路線。本文把他們所表述的這一路線與其他社會主義者所用以對立於既存社會運動的路線歸為同一類，以下暫且稱之為「路線 S」。

但是，許、瞿兩人還用了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沒有使用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全民族的國民革命」之類的概念表述另一種路線（而且這個路線還具有代名詞——即「國民革命」或「國民運動」）。本文暫且稱之為「路線 C」。

僅僅從名詞來看，許、瞿兩人所爭論的路線，現象上是共產國際內部所特有的問題意識。又由於討論雙方都是中共黨員，他們之間的討論就不免像是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討論。但本質是否真是如此？

⁴²³ 朝鮮與台灣在日本殖民之前所處的（經濟）歷史階段是不同的。涂照彥認為，台灣所處的歷史階段較高，「前期性商品經濟」的存在即其重大特徵。然而歷史階段較低的朝鮮，何以無產階級化的程度更為徹底？矢內原對於朝鮮的分析值得吟味。見：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537、543。

1. 許乃昌對於「路線 S」與「路線 C」的認識是否來自於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係來比較兩條路線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主義」是一種歷史現象，它伴隨著「資產階級」對於「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 以及「基礎」(base) 的要求而發生。所謂的平均地權、建立議會、實行普選、乃至國家統一，都是民主主義的基本內容，而且都要求「上層建築」的政治革命以及「基礎」的社會革命。但馬克思主義認為，上述歷史現象只出現在「民主主義」**有利於**資產階級發展、而且資產階級**有能力**爭取「民主主義」的條件之下。如果這些條件不具足，資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就會發生分離。或者說，革命動力(資產階級)就會與革命任務(民主主義)相分離。

馬克思主義把「資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的革命對象。但在前述「動力」與「任務」分離的狀況下，「資產階級」所捨棄或無力完成的任務(民主主義)反而可被無產階級所接手。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動力)與「社會主義革命」(革命任務)之間，也可能因為無產階級接過「民主主義」這一任務，從而發生「動力」與「任務」相分離的狀況。

無產階級接手「民主主義」任務的目標之一是打擊(或爭取)某些部份的資產階級。更重要的目標則是爭取農民。由於「民主主義」必然使農民受惠(比方平均地權)，農民就可能被工人階級爭取而加入革命動力。在俄國革命的經驗中，「民主主義」主要體現為工人階級爭取農民並反對資產階級。但在中國革命的經驗中，「民主主義」最初則體現為工人階級爭取某部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國民黨)，後來才把重心擺在爭取農民。但無論爭取任一階級，「民主主義」都不是最終目標。關鍵在於如何透過「民主主義」通向「社會主義」。但如何正確認識「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始終處於爭論之中。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的上層建築——特別是**政權**——的問題上。即，當革命形勢發展到必須建立政權之時，這個政權的階級性質究竟為何；反過來說，將來的革命政權之階級性質將決定通向這個政權之過程的性質，即革命性質。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政權」是他們所完全否認的問題意識。但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所「單獨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是消滅國家並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手段；這種政權通常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至於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所「共同專政」的民主主義政權，則被視為通向社會主義政權的基礎；這種政權通常被稱為「民主專政」。如果只包括工農，「民主專政」會被稱為「工農民主專政」；若進而包括某部分資產階級，「民主專政」則會被稱為「人民民主專政」。盧卡奇(Lukács Georg, 1885~1971)對於「民主專政」的功能有段相當清晰的說明：⁴²⁴

⁴²⁴ Lukács Gyorgy, "Blum Theses (Extracts)," in Gyorgy Lukacs, *Luká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 the question of parliamentarianism and other essays*(London: NLB, 1972), 241-242.

民主專政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早在 1917 年，列寧就告訴想要把黨拖回 1905 年的民主專政形式的加米涅夫，民主專政自 1917 年革命開始以來，就在相當確定的形式上實現了：這些形式之一，就是工人與士兵的蘇維埃所組成的反政府（counter-government）。因此，民主專政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完全實現，就嚴格的字義而言，是一個鬥爭的領域，是一個一切關鍵性的戰鬥都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領域。同時，當然，這也是最重要的戰鬥手段，一個向廣大群眾直接宣傳的手段，去刺激並領導他們進入自發的革命行動，同時，在正常環境下幫助資產階級使勞動人民中的廣大群眾無法組織起來的組織與意識形態的諸形式，也將因此機會而得到鬆綁。民主專政提供創造這些組織形式的可能性，這些形式則能幫助工人中的廣大群眾在資產階級面前堅持他們的利益。在發展的現階段，民主專政原則是與資產階級的經濟社會權利不調和的，即便民主專政的具體客觀與直接要求的外在的階級內容遠遠超過資產階級社會的界線，卻是資產階級民主最完美的實現。

也因此，自俄國革命以來，圍繞著 (a)「民主專政」或 (b)「無產階級專政」而引發的「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爭，陸續在俄國、中國、日本、乃至盧卡奇所屬之匈牙利等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內引起波瀾。在俄國，爭論分別表現在老布爾什維克（主張 a）與托洛茨基（主張 b）之間；在中國，爭論分別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主張 a）與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主張 b）之間；在日本，爭論分別表現在講座派（日本共產黨；主張 a）與勞農派（以山川均為代表；主張 b）之間；在匈牙利，爭論則分別表現在盧卡奇（主張 a）與匈牙利共產黨主流派（以庫恩貝拉為代表；主張 b）之間。

但是表 5-1 所列的所有討論者，無一涉及政權問題。瞿秋白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認識非常清楚。恰恰在瞿秋白回應許乃昌之前，瞿秋白才剛剛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只有**無產階級獨裁制**有了保證之後，民族間的歡喜及自由才算有了保證」「無產階級獨裁制若有動搖，那利於壓迫弱小民族的地主資本家必然要復辟，民族自由仍舊要受摧殘」。⁴²⁵因此瞿秋白回應許乃昌時所出現的空白，確實可以視為忽略。然而許乃昌（乃至表 5-1 所列其他人）所表現出的空白至少有幾種可能：首先是他忽略，其次是理論不成熟，其三則可能是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畢竟無政府主義徹底否定新社會仍將有政權。

由於許乃昌沒有說明革命的政權問題，他對「路線 S」的理解便未必全然來自馬克思主義。許乃昌可能只把「路線 S」理解為社會革命，而非政治革命。然而許乃昌對「路線 C」的理解也未必全然在馬克思主義之內。此處並不是要以非歷史的態度去苛求許乃昌，而是要反過來探求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路線 C」的真實認識。表 5-1 所顯示了一個現象：只有在討論「路線 S」的情況下，「社會革命」一語才得到使用。為什麼沒有人把「路線 C」稱為「社會革命」？這一現象是否反映「路線 C」僅僅被理解為政治革命，而不被理解為社會革命？

⁴²⁵ 瞿秋白，〈十月革命與弱小民族〉，《嚮導》，第 90 期（1924，上海），755。

2.當「民主主義」＝國民革命＝……的時候，「路線 C」可能被如何理解？

當時其實存在著僅僅把「路線 C」理解為政治革命的環境。以中共為例，「民主主義」的概念從「二大」（1922 年）以來始得正面使用。但至 1927 年國共分裂之前，中共為了國共合作，曾技巧性地在許多文獻中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權革命」代稱「民主主義」。這種代稱恰恰體現他們僅僅從上層建築理解「民主主義」，因為必然觸及「基礎」的「民生主義」不在「民主主義」之內。此外，當時對於「封建」（即民主主義的對立物）的理解也僅限於上層建築。當時把「封建」理解為「封建武人」（即軍閥）及其武裝割據，而不是後來所著重的「封建」生產關係（即農村經濟問題）。⁴²⁶

不過，比起刻意以「民權主義」夾帶「民主主義」的混用，中共更顯著的混用則是使用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口號，並將這個口號被詮釋為「民主（主義）革命」。但就實踐而言，兩黨都以實現上層建築的變革為國民革命的目標（特別是奪取政權、國家統一、反對帝國主義）。因此，如果許乃昌僅僅把他所謂「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理解為最終讓資產階級坐天下的、只及於「上層建築」的革命。同時又把他所謂的「社會革命」視為專屬於無產階級的、同時摧毀「上層建築」與「基礎」的革命。那末，這種見解不但與范本梁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沒有什麼不同，反而還將迥異於積極肯定兩條路線——因為兩者都能觸及「上層建築」與「基礎」的變革——的馬克思主義。

雖然國共兩黨都把上層建築的變革作為國民革命的目標，但對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卻有不同設想。國民黨心中的國民革命，是一種必須以軍隊與軍事行動統一全國的革命（比方東征北伐），本質上是武裝鬥爭；共產黨心中的國民革命，則是透過「國民會議」以建立民眾政權的革命，本質上是民眾運動。從許乃昌的文章來看，他很清楚國民黨所設想的那種國民革命。因此他把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政治」、「民主革命」、「北伐」，通通視為「國民革命運動」的內容。⁴²⁷但是，如果許乃昌也清楚共產黨所設想的另一種國民革命，那末這種國民革命所具有的內容，是否也可能成為他反對在台灣進行「國民革命」的原因？比方，如果許乃昌把「國民會議運動」看成是與他所堅決反對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類的東西，他怎麼可能會接受「國民會議運動」式的國民革命？

如果真是如此，民主主義、國民革命、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的差異馬上就被弭平。因為它們通通都是資產階級的運動、甚至只是及於上層建築的運動。如果真是如此，也許就可以說明許乃昌何以會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之中同時否定請願運動與「民主主義」、何以認為「民主主義」除了「革命」之外還可「建設」（聽起來是一個比較和平的字眼）——因為請願運動就是「民主主義」。同時也可以說明《平刊》

⁴²⁶ 關於僅僅把「封建」理解為上層建築之存在的問題，可參見德里克的討論。見：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48~49。另外，德國學者羅梅君也認可德里克的見解。見：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 和 40 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73。

⁴²⁷ 乃昌，〈[雜感]學生運動的啟蒙——駁易家鈺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覺悟》，1923 年 12 月 14 日，第 4 版。

強烈否定代議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民主主義的背景。

當社會主義思還處於傳播期，在東方各地共產黨都尚未與群眾建立廣泛聯繫的時代背景之下，許乃昌未能在「純正」的馬克思主義或中共的問題意識之下提出問題並解答，是合理的事情。⁴²⁸（然而什麼才叫「純正」？這也很值得質疑。）就好比平平同人「少峰」以陳獨秀 1920 年反對「民主主義」的言論作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論據之時，陳獨秀卻已轉軌支持了「民主主義」。⁴²⁹兩者之間的落差，反映了中共當時的理論影響力。

當然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仍可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下進行的討論。許乃昌不見得沒有認識到「民主主義」對於無產階級的意義，⁴³⁰甚至他可能也知道無產階級專

⁴²⁸ 共產國際脈絡下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是很晚才在東方各地取得支配地位的指導理論。①在共產國際存在的期間（1919~1943），除了 1927 年前後曾因托季聯合反對派全面反對斯大林路線而導致思想混亂及分裂之外，都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性質將首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列寧指出：「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時期不會是共產主義革命」，「在其發展底第一階段，殖民地革命應當按照帶有純粹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各點的綱領去進行，如分配土地等等。」就是在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殖民母國日本，也因共產國際認定日本天皇制政權的封建性格有特殊作用，所以日共自 1922 年建黨以來的所有綱領都規定日本革命有民主主義革命任務乃至階段。在中國，雖然 1921 年中共一大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綱領，卻也隨即在 1922 年中共二大上被共產國際所克服，轉為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甚至台共的 1928 與 1931 年兩份綱領，也規定台灣的革命性質首先是民主主義革命。換言之，共產國際把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貫穿在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之中。②雖然日共也是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但日共除了必須同日本既有且混亂的社會主義思潮鬥爭，還必須同強大統一的天皇國家鬥爭。日本共產黨在 1922 年 7 月成立之後，1923 年 6 月便遭到了第一次「大檢舉」；1924 年，以山川均為代表的日共領導人不經共產國際同意而自行「解黨」。在此逆境下，日共連自己的綱領都不能傳播到群眾中（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語），人在中國的許乃昌顯然更難了解日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③當時中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則有個發展的過程。中共二大改提出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之後並未立即系統化；關於綱領系統化的時間至少就有兩種說法。曾是中共早期黨員，後來轉變為中國第一批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鄭超麟（1901~1998），認為是 1925 年 1 月的中共四大。周恩來（1898~1976）則認為是 1928 年 6 月的中共六大，「六大前，中國黨是不懂這個問題的。」即便「從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承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是當時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的、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當大革命失敗，思想混亂便馬上出現。無論是中共四大或六大，都晚於〈黎明期的台灣〉成文的時間。或許可以解釋許乃昌對於國民革命、乃至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解何以不全。④而且，當時的台灣尚未建黨，共產國際的理論規定根本不可能藉由紀律而貫徹在台灣的共產主義者中間；就算以中共黨員的身分來要求許乃昌接受共產國際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規定，中共所可能提供的思想指導也有限。對於運動核心的瞿秋白來說，只須指出革命存在階段性，便已足夠。換言之，存在於許乃昌、中共、日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是運動開展的不平衡以及尚不成熟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當時的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也未以共產國際為核心而在組織發展上搏成一體。關於列寧的言論，可見：張仲實、曾葆華校譯，《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5。關於日共綱領，可見：日本共產黨史資料委員會編，《共產國際關於日本問題方針、決議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1~5。關於市川正一的見解，可見：市川正一著，田舍譯，《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北京：世界知識社，1954），65。關於鄭超麟的見解，可見：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251~253。關於周恩來的見解，可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8~160。

⁴²⁹ 少峰，〈更待何時〉，《平平旬刊》，第 7 期（1924，上海），1。「少峰」在文中並未指出他所引用的陳獨秀言論之出處。經考證，乃是陳獨秀寫於 1920 年的下述文章：陳獨秀，〈民主黨與共產黨〉，《新青年》，第 8 卷第 4 號（1920，上海），隨感錄頁 4~5。

⁴³⁰ 許乃昌曾就臺灣人是否應先「先建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說，「我只稍承認其具片面的真理性。」

政的重要性。真相終究已然無法證實，只能揭示各種可能性。從**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許乃昌與瞿秋白在台灣革命性質上的對話，意義無疑是劃時代的。

有一點是有趣的：瞿秋白只與許乃昌爭論兩條路線，而不討論「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是否正確。雖然無法揣度瞿秋白此處留下空白的�原因，但與「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類似的觀點，卻是中共內部也曾存在的。負責中共北方黨務的李大釗（1889~1927）曾把中國看做是被「世界的資產階級」所壓迫的「世界的無產階級」：⁴³¹

國內的產業多被壓倒，輸入超過輸出，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在一國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社會的無產階級，還有機會用資本家的生產機關[生產工具]；在世界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世界的無產階級，沒有機會用資本國的生產機關……這就是世界的資本階級壓迫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現象，這就是世界的無產階級尋不著工作的現象。歐美各國的經濟變動，都是由於內部自然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變動，乃是由於外力壓迫的結果，所以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

無論許乃昌還是李大釗，他們都用階級對立來描述民族對立；甚至認為這兩種對立將確實在實際生活中重合。這種極端強調「階級鬥爭」、或把「階級鬥爭」加以不斷引伸或者渲染的作法，可能並非偶然。就在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而放棄以「階級鬥爭」為主的社會主義革命，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的合作之時，黨內外都曾引起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爭論（如同許、瞿兩人的對話）。其中最反對中共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勢力，恰恰存在於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就是許乃昌在〈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與中共並列說明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

3.比較：發生在異端共產黨「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中國革命性質論爭

今日黨（又名共產主義同志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胡南湖先生及鄺摩漢先生乃其中堅人物，其下有五十餘名熱誠的黨員，其中還有八九名女性黨員。北京天津一帶都屬此黨的勢力範圍。

——許乃昌，〈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1923。⁴³²

當時中國除了共產黨以外，北京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出版了《今日》雜誌，領袖是國會議員胡鄂公。

——鄭超麟。⁴³³

顯然他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沒有完全否定。見：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4年第7號，46~47。

⁴³¹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收錄於，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

⁴³² 秀湖生，〈歐戰後の中國思想界〉，《台灣》，第4年第5號（1923，東京），40。

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史，長期以來都在「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的單一脈絡中說明。在這種認識裡，中共是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進行組織準備之後，才於 1921 年「一大」正式建黨。近年的研究則突破此傳統觀點。楊奎松、石川禎浩等學者指出，「南陳北李」並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唯一脈絡；各地所進行的組織準備，也並不僅僅是被矮化描述的「共產主義小組」而已。當時確實在各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共產黨」，只是陳獨秀、李大釗的組織得到共產國際的最終承認，才吸納或消滅了那些非正統的異端「共產黨」。比方，石川禎浩就專門研究了由「黃介民」、「姚作賓」所建立的「大同黨」。

「今日派」就是這類異端共產黨，然而迄今少有研究。他們在 1922 年前後，以《今日》雜誌為中心，建立起被中共稱為「今日派」的團體，領導人則是國會議員胡鄂公。胡鄂公（胡南湖，1884~1951），湖北江陵人，辛亥首義功臣。在一九二零年代前期，曾任眾議院議員、北京政府官員。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胡鄂公及其周邊友人逐漸左傾。⁴³⁴1922 年 2 月 15 日，胡鄂公組織發行了馬克思主義宣傳刊物《今日》（月刊）。⁴³⁵這份刊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有重要意義，是最早將《哥達綱領批判》、《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等經典文獻翻譯刊行的園地。

據今日派呈交共產國際的報告稱，1922 年 2 月 16 日，「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正式成立，胡鄂公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據言建立起遍及全國九省十二個地區、共一萬正式會員的組織。⁴³⁶8 月 15 日，他們在《今日》登出〈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的啓事，宣告「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成立。⁴³⁷因此，當胡鄂公的「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與李大釗等「正統」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1921.11.17 公佈發起啟事⁴³⁸），並列於「反帝大聯盟」的參與團體時，並非名稱恰巧相似或抄錯。⁴³⁹只是目前的

⁴³³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196。

⁴³⁴ 目前較詳盡的胡鄂公史實考證，為：賀覺非，〈胡鄂公〉，收錄於氏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470~476；江陵縣志辦公室，〈胡鄂公（1884~1951）〉，收錄於湖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下冊（湖北：北人民出版社，2000），141~143。唯上述二文仍有考證錯誤之處。早期關於《今日》派的研究，則有皮明麻，〈秘密黨員和「今日派」〉，收錄於氏著，《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24~425。對於《今日》雜誌的介紹，則有〈今日（刊物解題與目錄）〉，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三聯書店，1978），第 3 卷，435~440、1118~1121。

⁴³⁵ 這是正式向北京政府登記的合法刊物。詳細資訊見：〈北京地區報刊注冊統計表（1912 年 5 月—1928 年 5 月）〉，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3 輯「文化」（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351；〈今日（刊物解題與目錄）〉，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1118。

⁴³⁶ 〈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報告書〉，《共產主義》月刊第 1 期，轉引自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1997），3~4。

⁴³⁷ 〈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今日》，第 2 卷第 2 號（1922，北京），60~61。就此來看，有論者（如皮明麻）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即「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說法，恐非正確；後者可能只是前者的群眾組織。見：皮明麻，〈秘密黨員和「今日派」〉，收錄於氏著，《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424~425。

⁴³⁸ 〈啟事〉中並言，這一研究會實際創立於 1920 年 3 月。據石川禎浩研究，這似乎是各種關於「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立於該時間的唯一根據。以上並見：倪興祥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詞典》

中共創建史研究常將「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混同於「馬克斯主義研究會」。⁴⁴⁰

「今日派」一詞，典出 1922 年 12 月 27 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在《「今日」派之所謂馬克思主義》一文裡，作者「田誠」點名批判了《今日》與胡鄂公。不過「田誠」的批評實是反批判，因為今日派反對國共合作並首先攻擊了共產黨與陳獨秀。自 1922 年 7 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之後，中共便正式把「一大」認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轉換為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革命論。9 月，陳獨秀於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第 2 期發表〈造國論〉一文，將中共的路線轉換公開化，因為這篇文章公開號召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而不是農民）進行「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兩階級聯合」體現為共產黨與「民主派」的合作；而當時中共所認定的「民主派」，就是中國國民黨。

中共的改弦易轍引來「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今日派之批評。其批評集中於 1922 年 12 月 8 日出版的《今日》。同人熊得山（1891~1939）反對中共「同民主派的國民黨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並認為中國未必不能直行「社會革命」。他只有一句感想：「馬克斯主義啊！你在中國多麼倒霉！」⁴⁴¹由於陳獨秀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使其成為今日派的箭靶。今日派同人「初民」甚以「陳仲甫派」（陳獨秀派）指稱中共，「因為大家深知道陳獨秀先生，總算是共產黨裡面的中堅」。⁴⁴²

但中共方面卻只有前述「田誠」發表一篇文章回敬。「田誠」指責率領「共產主義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5；〈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啟事（1921.11.17）〉，收錄於高軍等主編，《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08~409；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76。

⁴³⁹ 反帝大聯盟的參與團體，有不少名稱明顯左傾的組織；比方「中俄協進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經濟學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俄問題研究會」、「無產者同盟」。當然，這些組織的虛實，今日已無法查考。以上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近代史資料》，第 2 期，108~109。

⁴⁴⁰ 有些資料泛泛寫之，動輒將胡鄂公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名之於李大釗的團體，忽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另有其組織的歷史事實。比方歷史當事人劉仁靜。見：劉仁靜，〈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情況（1957 年 4 月）〉，收錄於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21~322。有趣的是，雖然學者楊奎松很清晰地注意到胡鄂公及其《今日》雜誌同人的存在及意義，卻將他們的研究會誤稱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見楊奎松，〈前言〉，收錄於氏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3~4。有些資料則泛泛列之，將胡鄂公的組織視同於李大釗之團體，歸類為同組織的研究資料。比方郝志群主編，《北京史百年論著資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73。書中收錄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條，便將《今日》雜誌中的〈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列入李大釗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

⁴⁴¹ 熊得山云：「我說了許多矇頭蓋面底話，現在卻要點題了[]就是陳獨秀君等所著一篇對於「時局底主張」，該文內容，是要同民主派的國民黨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嗣後陳獨秀在《嚮導》上又發表一篇『現在中國政治問題底我見』，彷彿先要有資本主義的經過，才可實行社會革命，看他們第一篇，幾如身墮五里霧中，好像看錯了題目似的，接連見著含有該黨分子的出版物如《嚮導》，《民權》等通帶「民主主義」的氣味，我才看出蹊蹺來了。哎！赤色的馬克思主義，給你染上了一片深灰色，馬克思主義啊！你在中國多麼倒霉！」見：熊得山，〈「名」「實」底討論〉，《今日》，第 2 卷第 4 號（1922，北京），2。

⁴⁴² 初民，〈我對於陳仲甫派變更態度的批評〉，《今日》，第 2 卷第 4 號（1922，北京），7。

志會」的胡鄂公不過是北洋政府的扈從者。「田誠」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個個真實的馬克思派現在都應該跟著中國共產黨去贊助國家主義的革命運動才是。」⁴⁴³（文中所謂「國家主義」，也許可以理解為民主主義所要求的國家統一與反軍閥。）

鄭超麟曾指出：「《今日》雜誌站在左的立場，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嚮導》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軍閥御用的國會裡當議員；胡鄂公則徵引列寧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議論議會運動的話替自己辯護。」⁴⁴⁴實際上，當時對中共的路線轉換提出質疑者，並不只有今日派；⁴⁴⁵但是中共只對今日派提出嚴厲批評。不過，爭論並未引起大波瀾。也許中共除了批評之外，更重視團結；或許今日派也是如此（更何況胡鄂公的議員身分也使今日派處於尷尬地位⁴⁴⁶）。今日派旋即合流於中共的黨組織，⁴⁴⁷不再公開反對「民主的聯合戰線」。但從「反帝大聯盟」遺下的文獻來看，胡鄂公及其同人直到 1925 年底都還在宣稱以「社會主義」革命——而非中共所主張的「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帝國主義」。⁴⁴⁸或許，胡鄂公為首的今日派份子，終究沒有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見解。

⁴⁴³ 田誠云：「在他們那幾篇文章裡面把陳獨秀同志實在說得太多。他們居然把陳獨秀同志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認為是他變節了。這個多可笑呢。」「聽說『今日』的作者多半屬於一個什麼共產主義同志會，胡鄂公便是他們的領袖。這就更有趣了。胡鄂公是誰呢？他是從前王占元的政務廳長，現在的國會議員，他曾跑到保定去和曹錕拜拜壽，也曾率領議員到總統府去吵鬧吵鬧，新進又由黎元洪保荐他做教育次長，給他二等嘉禾章。他真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那一組人中間，也許有些誠實的分子，也許有些真正想做馬克思派學生的分子，不過懂得還太少。他們大叫特叫的說：共產主義者要推翻資產階級，反去與資產階級連絡，不是變節麼？」「如果他們自信是誠實的分子，如果他們真要做有氣節的馬克思派，或許首先便要拿胡鄂公等的行動，用馬克思派的初淺觀念，加以深深的考慮。」「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現在唯一的革命的馬克思派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僅僅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且個個真實的馬克思派現在都應該跟著中國共產黨去贊助國家主義的革命運動才是。」見：田誠，〈「今日」派之所謂馬克思主義〉，《嚮導》，第 15 期（1922，上海），122~123。

⁴⁴⁴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196。

⁴⁴⁵ 陳獨秀〈造國論〉發表後，《嚮導》馬上收到商榷的讀者投書，並有高君宇加以回覆，但討論極友善。見：思順來信、君宇答，〈讀獨秀君造國論底疑問〉，《嚮導》，第 4 期（1922，上海），34~35。

⁴⁴⁶ 今日派同人鄭摩漢批判議會運動云，「社會主義實現手段分二種：（一）革命運動；（二）議會運動。議會運動，近十年來，已經破產，因為從前的社會主義者一到議會裡，即為資本主義官僚主義所迷醉。」然而鄭摩漢卻又回護胡鄂公的議員職，「但我以為這是人品問題，不是場所問題，為什麼？彼人若果是真正社會主義者，就在議會裡亦未嘗不可以宣傳或運動。」見：摩漢，〈革命運動與議會運動（卷頭語）〉，《今日》，第 2 卷第 2 號（1922，北京），封面裡。

⁴⁴⁷ 僅以反帝大聯盟來說，曾經並列於參與團體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與「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在日本參謀本部於 1925 年 10 月編印的情報材料裡，就只剩下前者——「馬克思學院[說]研究會」——也許正反映了兩者之合流或後者之瓦解。另外，胡鄂公領導的「國民對英外交聯席會議」等團體也消失了。見：〈北京ニ於ケル主要思想團體〉，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記録》，編號 A03023733600。

⁴⁴⁸ 胡鄂公：「帝國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反帝國主義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產業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的實力的時候，抓住沒有發達的希望，……實行社會革命，勵行國家資本主義，以無產階級的權力和理想努力建造共產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以反抗帝國主義，也是站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的。」「只有團結起被帝國主義壓迫的世界的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實行『階級鬥爭』」見：胡南湖，〈反帝國主義〉，寫於 1925.12.10，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41、43、49。

不過胡鄂公確實加入了中共。時間最早可能是 1923 年底。⁴⁴⁹鄭超麟甚至推測，當時的共產國際曾有意調解中共與今日派之間的矛盾。⁴⁵⁰假使共產國際對今日派之重視確為史實，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除了今日派所自稱的實力外，具有眾議院議員身分的胡鄂公更是中蘇建交的早期支持者。當時胡鄂公甚至發出中蘇建交與國家制憲同等重要的言論。⁴⁵¹但無論共產國際是否極力撮合中共與今日派，胡鄂公都因長期保持秘密黨員身分而不為人知。⁴⁵²胡鄂公的後續經歷多與地下工作有關。夏衍（1900~1995）回憶，1927 年，「國民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自楊度（1874~1931）得到情報，向李大釗等人告知張作霖即將抄入蘇聯大使館。唯惜功虧一簣，李大釗壯烈犧牲。⁴⁵³二零年代，胡鄂公繼續進行地下情報工作。抗戰勝利前夕脫黨，上海解放前夕來到台灣，⁴⁵⁴1951 年逝世於台北。⁴⁵⁵

第三節、結論

范本梁的革命論認為，由於「自然的趨勢」被不自然的少數人之暴力所扭曲，所以必須透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大革命」去推翻一切不自然之物（請參見本文第三章）。但對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而言，范本梁所指控的「不自然」（比方國家或資本主

⁴⁴⁹ 關於胡鄂公的黨籍問題，據包惠僧回憶，中共三大（1923.6.12~20）一開幕就討論胡的入黨，爭論很久，終遭否決。包惠僧並回憶，9 至 10 月間，李大釗曾對他說，胡鄂公「要求入黨是真，反對賄選是假」，「我們不要上了他的當。」但胡鄂公可能仍然入了黨。同年底的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1923.11.24~25）決議「胡鄂公，在未能證明其確未幫忙賄選以前，依舊停止出席小組會議；熊得山汪劍儂因與胡有連帶關係，亦應同樣辦理。」此事並被瞿秋白特別寫在其黨史報告之內。如果胡鄂公此時尚未入黨，大概不可能「停止出席」。以上見：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362~363；〈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紀要〉，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183~184；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179。

⁴⁵⁰ 以彭澤湘（1899~1970）、林可彝（1893~1928）為代表的今日派份子曾先後赴蘇留學。鄭超麟（1901~1998）憶此二人，推測彭澤湘的赴蘇，可能是共產國際意圖調解國內組織矛盾的結果。鄭超麟云：「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密使圖謀調解，甚至請「今日派」派代表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大會。這種幕後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澤湘也許就是「今日派」的代表，與陳獨秀同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我們到時，彭澤湘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後來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產黨，但在革命中未曾發生什麼作用。」見：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88、196~197。可惜彭澤湘在其〈自述〉中，完全未及「調解」之事，故無法查核確切狀況。見：彭澤湘，〈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 5 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5。

⁴⁵¹ 胡南湖，〈主張承認勞農政府的一個意見〉，《今日》，第 2 卷第 2 號（1922，北京），1。

⁴⁵² 比方蔡和森在 1926 年還認為「投機政客（胡鄂公）等」在建黨初期「借立法運動來欺騙工人」。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裡，胡鄂公的黨員身分甚至直到大革命失敗後的 1927 年 11 月，才以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的職位列於。入黨故是無疑，唯細節已闕漏太多。見：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34。

⁴⁵³ 夏衍，《夏衍選集》，第 4 卷（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403。

⁴⁵⁴ 賀覺非，〈胡鄂公〉，收錄於氏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470~476

⁴⁵⁵ 胡鄂公於 1951 年 10 月 8 日病逝於台北和平東路寓所。見：〈胡鄂公病逝〉，《中央日報》，1951 年 10 月 9 日，第 3 版。

義)恰恰是以其現實的存在說明了自身具有歷史必然性。也因此,當范本梁只能從順應自然與否去判斷運動進步與否之時,幾乎非無政府主義的運動都被他抨擊。然而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而有資本主義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卻必須面對幾個問題,一是自己的進步運動是否可能,二是既存的社會運動是否具有進步性。甚至,當既存的社會運動沒有或失去進步性時,還必須面對運動參與者是否仍有進步性的問題。前兩個問題是台灣社會主義者所共有的基本問題,後一個問題則是共產國際陣營底下的共產主義者才有的問題。

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資本主義論以「勞／資」階級分化為核心。而無產階級能否成長、資產階級究竟會成長或破產,成為重要的討論問題。階級數量被他們視為階級力量的體現,因此他們不但論證無產階級可以分化而出,甚至極力論證可以大量分化而出。從用語的使用來看,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描述「路線 S」時的常用語常常突顯革命動力(比方「**無產階級運動**」),這與日後突顯革命任務的規範化用語(如「**社會主義革命**」)大不相同。這一變化正反映了周恩來所曾回顧的一個歷史轉折,「後來才知道:應以革命任務來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以革命動力來決定革命性質。」⁴⁵⁶但當革命性質真的由革命任務去決定時,無論是「無產階級運動」或是「社會主義革命」,都讓位給了透過革命任務而被表述的「路線 C」,即「**民主主義革命**」。這種變化是與後來的運動日趨認識到無產階級無法大量分化而出相聯繫的。

也許有人會接著問,既然認識到無產階級無法大量分化,大可像 1923 年的許乃昌或 1924 年的佐野學那樣,從世界革命的角度來論證革命即可。但在世界革命由於種種因素而日漸難以實現的狀況下,排除世界革命的因素以考慮一國之內的革命性質,就成為很現實的問題。而這種現實性並不意味著妥協,而意味著如何直接投入戰鬥。誠如主張匈牙利進行民主主義革命而遭共產國際打壓——因為「人們仍舊普遍認為,由於匈牙利早在 1919 年就存在過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所以,從歷史上講,採取這種後退的[民主主義共和國]步驟是沒有可能性的。」⁴⁵⁷——的盧卡奇所言:⁴⁵⁸

當我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只要它是真正的革命,就沒有隔著一堵萬里長城的時候,我已到了我能夠自由行動的領域,……

這裡還須考慮一個問題,也就是「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從而「無產階級化」)賦予了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以什麼樣子的感覺,以及他們為何從當時的台灣經濟狀況中感受到那樣的感覺。如本章前面所述,他們所感受到的也許是種整個民族普遍貧困化的趨勢,而「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也許正能說明他們對於這種趨勢的感覺。其實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是著重說明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工人階級」則著重說明「無產階級」重新與生產資料在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之下的相結合。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普遍使用「無產階級」的概念(從而「無產階級化」),也許正是著眼於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只是,這一分離並未產生相應的結合。

⁴⁵⁶ 周恩來著、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8。

⁴⁵⁷ 盧卡奇,〈我向馬克思的發展(1918-1930)〉,收錄於杜章智編,李渚青、莫立知譯,《盧卡奇自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260。

⁴⁵⁸ 盧卡奇,〈自傳對話錄〉,收錄於杜章智編,李渚青、莫立知譯,《盧卡奇自傳》,123。

至於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及其運動的考察，則不只從資產階級在萌生與破產之間所出現的數量變動入手，他們還著眼於台灣資產階級與日本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他們認為兩者本質上必然共謀，但另一方面，歷史事態的遽變，卻又推翻了這種先驗的推測。簡而言之，對於兩者間關係的判斷無論以何種「經濟」的概念與邏輯包裝，都難以擺脫歷史事態所造成的影響。請願運動的資產階級恰恰由於打擊資產階級之請願運動的治警事件而贏得同情。也許正因如此，戰後的歷史學解釋便不再將台灣「資產階級」視為「資產階級」本身，而從非資本主義的存在定義這個階級（比方涂照彥所謂「本地資本」⁴⁵⁹），或者先從這個階級的實際作為來探索這個階級的實際性質本身（比方若林正文所謂「本地地主資產階級」⁴⁶⁰）。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將資產階級及其運動切割開來；一方面否定資產階級的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則肯定參與請願運動的資產階級。肯定某部分資產階級具有進步性，從而論證整個民族都可以成為革命動力。可以說，這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重大理論進展。瞿秋白的革命方案也以整個民族為革命動力，其實兩人的設想本質沒有不同。但兩者的關鍵差異在於，瞿秋白並不以各階級差異的泯除作為論證的基礎，而是把各階級聯合從而以整個民族為範圍的「國民革命」作為他所推薦的方案。

就「國民革命」是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所推動的運動而言，瞿秋白的推薦是暫時壓制住托洛茨基派的共產國際主流路線的反映。然而許乃昌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卻絕非共產國際的觀點。因此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並不能簡單看成共產國際內部爭論（斯大林的「民主專政」路線／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路線）乃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爭論的反映。必須同時考慮其中的自發性，甚至必須考慮許、瞿兩人所各自支持、反對的對象的歷史實態。雖然許多爭論都能體現「國際」的共性，但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這種共性可能僅僅屬於形式，內容卻不盡相同。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論戰就是最好的例子。兩造

⁴⁵⁹ 涂照彥所謂「本地資本」（土着資本，どちやくしほん）的經濟存在，透過「地主制」而得到保存，並與日本資本主義發生並存、拮抗與潰滅。拮抗的政治表現，即是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對於「地主制」的進一步反抗，則形成了農民與工人的階級運動。見：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429~430。

⁴⁶⁰ 若林正文與涂照彥的方法類似，卻又頗為不同。在涂照彥而言是「日本資本」與「本地資本」相對立的範疇；若林則相應改為「現地權力」（即台灣總督府，不直接等於日本資本主義）與「本地地主資產階級」。這兩者之間存在著若林所謂「由交換、仲介進行控制的機制」透過這個機制，「政治實力」與「經濟實力」相襯地形成，並集中體現於一個階級之上，即若林所謂的「本地地主資產階級」。雖然若林並不從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的聯繫去分析「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也不討論這一階級與日本資本主義之間有什麼關係。但將「地主」（前資本主義的支配階級）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支配階級）合成一個概念，不能說若林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再者，既然「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是在「日本權力、資本由上而下強行殖民地式近代化之諸過程——中變形形成的」，換句話說，是從日本殖民之前就既有的階級變形而來的。那末，這種變形就可能意味著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但因若林並不處理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寬泛的概念設定便有利於迴避轉型問題。再換言之便是：領台前的「有力者」大體上仍是領台後的「有力者」，若林只關心這些有力者與現地權力之間的「政治」關係，而不關心有力者之所以持續成為有力者的經濟基礎及其變遷。至於現地權力，對於若林來說，由於不直接等於日本資本的政治代表，也就成為了一個相對純粹、獨立的政治力量。見：若林正文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427~435。

在兩種革命性質間的爭論並不完全來自於「國際」。之所以不完全，在於中共是「國際」支部，而今日派只是異端。所以今日派對於中共接受「國際」指令而轉向「民主主義革命」的反應，也許更適合以「原教旨主義」的態度來說明。也因此，發生在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論戰，恰恰說明了「論爭」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多樣性：雖然現象上看起來像是發生在「國際」內部的論爭，本質上卻未必如此。不能看到中共支持民主主義而今日派支持社會主義，就將兩者分別歸類於斯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

然而歷史的弔詭也恰恰在此。1924年9月17日，不知什麼原因，托洛茨基發報致電由前今日派份子所組織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⁴⁶¹此文是否為托洛茨基最早致電中國的文獻，尚不可知。不過托洛茨基在電文中所提到的「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詳細論列這個有關於全世界的大問題」是什麼呢？是否正是他始終懷抱心上的「不斷革命論」？歷史讓蘇聯的托洛茨基與中國的今日派的相遇成爲一種預示。當托洛茨基再次出現在中國革命上，今日派與「陳仲甫派」之間所爭論的問題，就成爲「陳仲甫派」與中共之間論爭的主題了。



⁴⁶¹ 全文如下：「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執行委員會諸君：我以至誠之心歡迎你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計畫，這種帝國主義現在正在做最後的預備以奴役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進步，端賴中國勞動群眾和忠於人民的智識階級的團結和自覺心的增長；而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之自覺的援助，及世界帝國主義寇賊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也在在都足以促你們運動的成功。蘇維埃大聯合國，忠於他的創造者列寧大師，是完全站在被壓迫的民族這一邊而反抗壓迫者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侵凌侮辱，致使中國人民全向排外的方向走，以爲凡外人都可恨，凡外來的事物也都可恨。但未免陷於敵友不分的狹義愛國主義的弊病。中國的革命健兒，應該使人民辨識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之內都含有明顯的兩個基本階級，即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只有與全世界勞動階級聯合起來，中國的民治主義[民主主義]才能驅除帝國主義的侵掠和加於中國民族獨立的危害。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詳細論列這個有關於全世界的大問題，援助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是每個革命者的責任，而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委員會諸君所肩的責任尤其重大。」見：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259~261。

第六章、資本主義論的限制 ——從歷史建構能力出發的考察

引言、舊雨來，今雨不來

我們對你們朝鮮，台灣，緬甸，菲律賓群島，暹羅，波斯，埃及，阿剌伯，馬來半島，以及各種黑人們來說說罷。……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致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一封信〉，1924年7月20日⁴⁶²

眾位同志！我們三十年前是中國福建台灣人，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下的台灣人。台灣人受日本之壓迫的痛苦，說不勝說，我不大會說北京話，要說也說不出來，——諸位只想想那些殘酷無理的強盜，是怎樣劫掠殺害那些善良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我們台灣人是受的怎樣的痛苦了。……

——謝廉清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集會上的演說，1924年7月27日，北京「來今雨軒」⁴⁶³

在民國肇建的年代裡，許多新生事物的萌發，大多脫離不了西力東漸的洋化色彩。對於沒有西方式「公共空間」經驗的中國人來說，近代意義上的「公園」就是此類「新生事物」之顯例。但在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公園的創設卻從一開始就保存著民族色彩。其典型，就是1914年由前清「社稷壇」改建而成的、保存了古建築與古柏所構成之中國式造景的「中央公園」（後名中山公園）。這是首都北京的第一個公園。隨著五四以來群眾力量的崛起，古意盎然的中央公園超出了育樂游賞的功能，成為北京民眾運動的新地標。而1915年建立於公園之內的「來今雨軒」茶社——宛如體現「來今雨」三字之深意那般

⁴⁶² 《台灣民報》曾刊登這則宣言的原始版本。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後來出版的〈會刊〉第1期以及宣傳品《反帝國主義》一書中，這則宣言改成了「我們對你們印度，朝鮮，斐利濱群島，暹羅，安南，緬甸，波斯，埃及，阿剌伯，馬來半島，以及各種黑人們來說罷！」見：〈北京的反帝國主義聯盟致世界被壓迫民族書〉，《台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924，東京），9；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172；〈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近代史資料》，第2期（1963，北京），106。

⁴⁶³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212。

⁴⁶⁴——則成爲許多群眾集會與革命工作的重要據點。1924年7月27日午後，又一場集會在來今雨軒舉行。不同的是，一名台灣人來到了這裡，他就是身兼上海台灣青年會創會幹部，以及平社與赤華黨成員的謝廉清。

在這場大約一百二十餘人的集會中，卻有七十八人在一小時（三點至四點）之內輪番上台演說。⁴⁶⁵謝廉清是這七十八人之一，更是少數有講詞流傳後世的參與者（見附錄6-1）。與此相比，四天之前——7月23日——在台灣彰化發表講演的許乃昌反而就沒有這樣的好遭遇。如本文第六章所述，許乃昌的講演還沒說完，就被臨監警官所中止。

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眼中，北京的謝廉清與彰化的許乃昌是兩名被相提並論的社會主義者，認爲「該兩人被賦予指導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使命。」⁴⁶⁶他們都曾是1924年上半年曾組建起來的平社與赤華黨的成員，卻在這兩個組織瓦解之後四散，從而在北京或者彰化的不同場合裡面臨了不同的遭遇。但他們仍然在運動中活動著。許乃昌去了蘇聯。至於謝廉清，雖然人在北京，卻也同蘇聯產生了關係。實際上，來今雨軒所舉辦的那場集會，正是當時爲了中蘇建交問題而舉辦的記者會；舉辦這場記者會的團體，則是極力支持建交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以下簡稱「反帝大聯盟」）。⁴⁶⁷

⁴⁶⁴ 關於「來今雨」一語的典故，最普遍的說法是典出杜甫《秋述》詩序，有新舊朋友歡聚一堂之意。

⁴⁶⁵ 〈反帝國主義聯盟招待新聞界情形〉，《晨報》，1924年7月28日，第7版；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206~207。

⁴⁶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3。

⁴⁶⁷ 關於謝廉清以及「反帝大聯盟」的相關史料，在此說明如下：1924年的謝廉清以《台灣民報》記者的身分在北京活動。在目前能確認爲其作品的十一篇通訊裡，就有十篇發表於1924年（見表6-1）。除了《台灣民報》，謝廉清的史料還收存在他所接觸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相關史料中。《近代史資料》曾於1963年重新刊印「反帝大聯盟」發行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第1期（以下簡稱〈會刊〉）。這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史料的首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重新刊行。〈會刊〉收錄了「反帝大聯盟」1924年7月的活動經過與文告宣言，可略爲窺知初期的狀況。據編輯者言，這份〈會刊〉第一期發行於1925年7月25日，但1925年應是1924年之誤。實際上，《近代史資料》的編輯者正以爲「大聯盟」創立於1925年。以上可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收錄於《近代史資料》，第2期，96~109。若以專題研究而言，目前僅知謝蔭明、王凌雲兩位學者專就「反帝大聯盟」提出三篇專題論文；分別是：謝蔭明，〈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黨史資料通訊》，總第4期（1982，北京）；王凌雲，〈大革命時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黨史研究資料》，第5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32~338（王凌雲的研究相對詳細，他也注意到謝廉清的活動，惜未深究。）；謝蔭明，〈北京反帝大聯盟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動〉，收錄於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黨史專題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95~100。然而以上三篇論文僅是下述史料的簡單堆砌：（1）當時的報刊雜誌。如北京《晨報》、中共發行的《政治生活》、《嚮導》等刊物。（2）「反帝大聯盟」出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但不限於重新排印的第1期，他們還使用了第3期（1924.8.20）、第4期（1924.10.1）、第5期（1924.10.5）、第7期（1925.3.10），大概都是直接接觸了原始史料；然而發行狀況、館藏地均不詳，目前台灣也無法取得。（3）「反帝大聯盟」於1926年出版的《反帝國主義》一書。這本書只有王凌雲提及，用以說明「反帝大聯盟」在孫中山逝世（1925.3.12）之後的行動，補充〈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所不及之資訊。王凌雲所用《反帝國主義》（詳細目錄可參見表6-2）值得特別注意，這是下列「反帝大聯盟」已知出版品的其中之一：（1）李漢石（李伯剛），《反帝國主義運動》（上海：經濟研究會，1925.12以後出版）。正文101頁。（2）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輯，《反帝國主義概要》（上海：經濟研究會，1926）。正文148頁。（3）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輯，《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

「反帝大聯盟」正是「異端」共產黨「今日派」（見本文第五章）的餘緒。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恰恰與透過「反帝大聯盟」名義而再次登上歷史舞台的前「今日派」份子有關。本文第五章曾指出，在許乃昌、瞿秋白論爭中成爲主題的「國民革命」之歷史實態，可以成爲檢討許、瞿兩人的論爭本質的一個方法。本章則將進一步從國民革命在一九二零年代所出現的幾次轉折與變化、來說明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屢屢引入「國民革命」概念時所可能具有的意義。如果說國共合作意味著中共從工人運動向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轉換（今日派在此過程中爲反對派），那末「義和團運動」由於「反帝大聯盟」的出現而招致的重新評價，則是中共從民主主義統一戰線向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再轉換。

本章認爲，國民革命本身的轉折與變化，不但是「統一戰線」發生變化的反映，同時也導致了「歷史建構」在愈趨廣泛的統一戰線之中得以實現。然而這種歷史建構通常又適應於否定資本主義化趨勢（或資本主義支配能力）的資本主義論。與這種資本主義論相反的資本主義論，其歷史建構能力都遭到限制，同時也限制了開展統一戰線的能力。

第一節、「革命史」歷史建構：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的「國民革命」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中山政治遺囑，1925年3月

自1924年之後，「國民革命」仍爲台灣社會主義者所關心。1925至1926年之間，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就讀的翁澤生（1903~1939）與蔡孝乾（1908~1982），爲《台灣民報》傳回了大量關於國民革命的新聞。到了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中國改造論爭」，在許乃昌、蔡孝乾、翁澤生這三位參與討論的左派代表中，前兩位則極力論證了國民革命對於中

社，1926.1）。正文267頁。（4）未註明編輯者，《打倒帝國主義》（上海：公理書店，1927.7）。正文214頁。這四本書有密切的關係。第一份文獻是「反帝大聯盟」的歷史回顧與文獻匯集。謝廉清以《台灣民報》記者身份在來今雨軒的全部演說，恰恰收錄在這篇長文之中。第二份文獻則是「反帝大聯盟」組織者所彙編的專稿，其中包括了謝廉清所專門撰寫的〈帝國主義的運命〉一文。第三份文獻則是前兩份文獻的合輯。此書沿襲第二份文獻的排版方式，但在書末補上第一份文獻，將之改題爲〈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第四份文獻則是第三份文獻重新排版後的出版品，不過內容沒有變化。李伯剛（即李漢石）回憶云：「一九二六年，大聯盟準備結束時，編了《反帝國主義》的小冊子，把反帝大聯盟的有關文件幾乎全部都收集在內了。後面有我寫的一篇《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此書質量不高，印數不多，現在可能不易找到了。反帝大聯盟的宣傳經費，蘇聯大使館有些資助。」見：李伯剛，〈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4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6。

國革命的重要性，以此說明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國民革命，而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當時連溫卿對於論爭本質的估計——即論爭實借「中國」革命之酒杯來討論台灣革命⁴⁶⁸——是正確的，對於 1924 年否定台灣應該進行國民革命的許乃昌而言，他在中國改造論爭中的主張無疑將是遽變。

到了 1928 年，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中的〈政治大綱〉正式規定台灣的革命性質為民主主義革命。並如同 1927 年之前的中共那樣，稱之為國民革命。也就是說，瞿秋白在 1924 年針對台灣的革命性質而向許乃昌所提出的建議，終於在 1928 年被台灣共產黨所接受。但還不止於此。因為台灣共產黨（以及協助草擬綱領的日本共產黨）甚至把「國民革命」這個概念當成歷史建構的材料。在台共的眼中，國民革命不僅僅是建黨之後的事情，更是從「台灣民主國」以來就形成的革命傳統。⁴⁶⁹在 1928 年 4 月 15 日建黨的這一瞬間，1895 年的「台灣民主國」與 1920 年代的「國民革命」出現前所未有的等同。在這種等同中，建構起橫跨 1895 至 1920 年之間之歷史進步主線。到了 1932 年，日本共產黨指導下的台灣文化團體除了繼續肯定「台灣民主國」具有「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外，還進一步從「國民革命」的角度出發，將「噍吧哖事件」定義為未能進展至「全民眾的國民革命」。⁴⁷⁰

⁴⁶⁸ 連溫卿說：「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極其多忙長成起來，遂見有兩個潮流的對峙，先是為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巨三箇月間，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因為有這兩個潮流磅礴了台灣，送給台灣文化協會釀成分裂的動機，而使民族主義者總退卻，即結成了勢力組織著「台灣民眾黨」，以和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自是以後，從來少數者的運動，即變作大眾的運動。」見：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概觀〉，《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東京），15~16。

⁴⁶⁹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認為台灣民主國「表現出一種全民眾性的大眾行動的國民革命型態」，但日共原擬的〈政治デーズ草案〉卻認為民主國「不是伴隨全民眾性的大眾行動的國民革命」。台共所做的更改是否是中共的指示？由於台共建黨大會上中共代表「彭榮」對政治大綱的意見並未涉及於此，或許可以推測是台共自己更動的。然而，把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由 1895 年算起，也是許多中國革命者均有的看法，陳獨秀便是一個例子。那麼，兩岸革命者在歷史認識上的一致，或也突顯了甲午戰爭、馬關割台對於兩岸革命者有著同樣深刻的意義，或者中共與台共之間非比尋常的關係吧。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602；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25；山辺健太郎解說，《台灣（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xxii、252、253；陳獨秀，〈二十七年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第 4 期（1924，上海），15。

⁴⁷⁰ 1932 年，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納普，ナルプ）指導下，留日的台朝左翼份子組成文化小組。在其發行的機關報《同志》（カマラード）中，由白秀悟所寫的〈台灣獨立運動略記〉，再一次總結了民主國以來的台灣革命運動史。這篇文章明顯與日共為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原擬的〈政治デーズ草案〉相類似，而與定稿後的〈政治大綱〉不同。就民主國的革命動力而言，〈政治デーズ草案〉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農地主與小商人」，〈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農地主小作人」（小作人即佃農），〈政治大綱〉則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地主、商人及急進的武士」；在民主國是否具有「全民眾的」和「大眾的」性質的問題上，前二者表示否定，後者則肯定之。但是，〈政治デーズ草案〉否定民主國為「國民革命」，〈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認為民主國是未能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治大綱〉則完全肯定民主國是「國民革命」。〈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論及「噍吧哖事件」時，更認為那是一場沒能發展至「全民眾的國民革命」的起義。可以看見，直至 1932 年，仍有台灣左翼認為民主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卻不再稱之為「國民革命」；同時，

從台灣民主國、「瞧吧咩事件」、到台共當下所將進行的革命，國民革命被視為一條貫穿這些事件的金線。然而這種建構何以可能？或者說，這些事件的共通性何在？又或者說，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國民革命」存在著何種內容或形式，而使這些事件有可能被視為具有共通性？

先來考察國民革命的內容。就內容而言，國民革命包含了「民主主義」以及「民族主義」。1923年的許乃昌，把「民主（主義）」視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⁴⁷¹1924年的許乃昌與瞿秋白，則把「民族（主義）」視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通常會將同時複合「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革命合稱為「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就邏輯而言，「民族」與「民主」是**不應倒置的**⁴⁷²（一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不應倒置一樣⁴⁷³），因為他不是簡單的二元結合，根本上還是一元的民主主義革命。佔落後國大多數人口的農民，通常被「民主主義革命」設

卻又將「國民革命」的時代向後推移，顯示「國民革命」似乎在歷史認識中開始消退。最後，〈政治七一草案〉、〈政治大綱〉與〈台灣獨立運動略記〉的關係為何？前兩份文件的傳播方式與影響又是如何？則尚待深究。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66、602；山辺健太郎解說，《台灣（二）》，xxii。

⁴⁷¹ 關於在「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上談到國民革命，可參見：乃昌，〈[雜感]學生運動的啟蒙——駁易家鉞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覺悟》，1923年12月14日，第4版。另外，在「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上談到「資產階級」革命，則可參見：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4年第7號（1923，東京），43-48。

⁴⁷² 關於錯誤使用「民族·民主革命」而發生的問題，陳映真還曾指出：「猶記在六零年代，台灣的報紙報導第三世界反美獨立運動時，常常把外電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誤譯成『國民民主革命』，這就是不懂得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主義（反帝）的、民主主義的（反封建）的變革理論所鬧出來的笑話。陳芳明的錯誤類此。」見：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收錄於許南村編，《反對言偽而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15。

⁴⁷³ 「半殖民地·半封建」之所以不應倒置，是以毛澤東的論述為典範而確立下來的。在這一典範中，「半殖民地」屬於主權概念，「半封建」則是「社會性質」意義上的規定；前者是外爍的，後者是本質的。也因此，毛澤東才會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一步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為東北淪陷了。在台灣，只有劉進慶與陳映真精準地在毛澤東的原意上使用這個概念。令人驚異的是，竟然有人荒謬地責備正確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陳映真是把毛澤東的概念設定讀反了。見：蔡依伶，〈理論陳映真與小說陳映真〉，《印刻文學生活誌》，12期（2004，台北），79。在中國，除了誤寫之外，只有《資本論》的中譯者王亞南始終在其著作中堅持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概念。吳承明讚賞王亞南的這一堅持為「深有見地」。吳承明的稱讚頗令人玩味。以上見：吳承明，〈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收錄於氏著，《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1996），9。此外，學者一般認為，蔡和森於1926年寫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首先將「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連用，而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之語。固然詞語的提出並不代表概念的形成，但反帝大聯盟早在1924年就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一語說明中國的處境，這點值得進一步探索。以上分見：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12；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217。近年來的相關討論見：陳金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1996，北京），227-231；陶季邑，〈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與陳金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1998，北京），221-225；張慶海，〈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兩個概念的理論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226-234。

定為潛在的、對於民主主義有所渴望的革命動力。因此工農的結合，必然由於跨階級以及參與群眾的數量而展現為民族的革命。這是「民主主義」之所以與「民族主義」產生聯繫的根本原因。反過來說也一樣，「毫無疑問，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因為落後國家的主要居民群眾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體現者。」⁴⁷⁴對於中共而言，國民革命在國共分裂之前也已同時取得「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兩種內容。

列寧曾指出，就用語而言，「民族革命運動」比「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更有利於把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同改良的「民主主義」運動區別開來，從而確保運動的革命性。但在中國「國民革命」的實際過程中，強調「民族」並弱化「民主」的原因卻不只是確保運動的革命性。也就是，為了團結絕大多數的人，如果作為基礎的民主主義不夠有效，就祭出民族主義的旗幟，號召願意支持民族主義的各階級。因此，雖然反帝國主義並不必然與民族主義有關，但民族主義通常會訴諸反帝國主義。⁴⁷⁵總之就內容而言，國民革命包括了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

再來考察國民革命的形式。就形式而言，國民革命則體現為「民眾運動」以及「武裝鬥爭」。這兩者是中共所慣用的術語；若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術語，那末前者可以表述為「民眾武裝暴動」，後者則可表述為「革命軍」的「軍事行動」。⁴⁷⁶這兩種形式在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中始終存在緊張。「民眾運動」可以理解為日本式術語「社會運動」所表述的那種運動形式。「民眾運動／武裝鬥爭」的關鍵差異是武裝組織及其鬥爭是否常設化。因為常設化將導致少部分人從民眾之中游離出來成為軍隊，從而使武裝鬥爭從民眾的集體暴動轉化為軍隊的戰爭。恰恰是這個關鍵差異，促使常設化的武裝鬥爭不可能以馬克思主義所傳統訴諸的對象——工人階級——為載體，因為工人階級不可能完全脫離生產，但軍隊基本上由脫產人員構成。（但日後的紅軍克服了這個問題。）當一心執著於北伐的

⁴⁷⁴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⁴⁷⁵ 托洛茨基主義者鄭超麟分析中共在1923年「三大」所提出的「打倒軍閥」（這是民主主義口號）與「打倒帝國主義」（這是民族主義口號）認為，「『打倒軍閥』是隸屬於『打倒帝國主義』的」，這種狀況促使「人們轉移了工農群眾對於本國壓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國主義」。鄭超麟認為，以民族主義口號凌駕其他革命口號，是一種便宜行事的群眾動員方式。不過鄭超麟的這一分析只有部分正確。因為中共並非在三大提出上述兩大口號之後就把「打倒帝國主義」當成群眾動員的主要口號。其實鄭超麟自己也認為，真正以民族主義掛帥的運動型態並非立即於「三大」之後出現，而是1925年的「五卅運動」。不過托派的批評卻恰恰擊中斯大林的觀點，他認為民族主義可在運動中無條件掛帥。斯大林在1924年指出，「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下，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的基礎為前提。」「在爭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鄭超麟的說明可見：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278~279。斯大林的引文可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收錄於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5~126。

⁴⁷⁶ 毛澤東曾有專文探討「民眾運動」與「武裝鬥爭」之間的關係，即：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506~521。托洛茨基派則有鄭超麟討論這個問題，可見：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248、279~283。

孫中山透過蘇聯的支持而成立黃埔軍校（1924.6.16 開學），中共所主導的民眾運動——國民會議運動——也隨著孫中山的北上而以對抗北洋「善後會議」的姿態達到高潮（1924 年底至翌年初）。在武裝鬥爭與民眾運動之間的緊張中，孫中山死在北京。留在他遺言中的，既有「積四十年之經驗」（當然多是武裝鬥爭的經驗），也有「最近」才主張召開的「國民會議」（當然是民眾運動）。對於中共來說，真正走上斯大林所謂「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武裝鬥爭是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義之後的事。至於徹底以農村為「武裝鬥爭」之中心——即武裝鬥爭的根據地問題——則更晚才得到確定。⁴⁷⁷雖然中共領導層在南昌起義之前如何拿捏「民眾運動／武裝鬥爭」之間的尺度，迄今仍然眾說紛紜。⁴⁷⁸但日本的國民革命研究先驅學者野澤豐卻首先從學術上將「國民革命」區分為「國民會議」運動以及「北伐」戰爭兩個階段。雖然野澤只是就國民革命的歷史現象加以區分，卻是一個符合運動內部爭論的區分。⁴⁷⁹

如果「國民革命」對於 1925 年臨死前的孫中山（或者為之擬定遺囑的汪精衛）而言，被認為具有「凡四十年」的歷史。那末他們眼中的「國民革命」必定存在著某種可以串起這四十年光陰的共性。⁴⁸⁰同理，當「台灣民主國」與「噍吧哖事件」分別在 1928 年與

⁴⁷⁷ 這是否就一定要進攻大城市而論的。直到 1930 年前後，以農村為根據地並積極準備進攻大城市，是共產國際的主要方針。此外，對於城市內部的民眾運動（工運、學運），也時常不顧條件地要求罷工或飛行集會。由此而形成了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之類盲動的武裝鬥爭。毛澤東認為，「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起一和白區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見：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509。

⁴⁷⁸ 毛澤東認為，「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的，但都是為著戰爭的。」他總結中共的經驗認為，「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垮台了。」托洛茨基派的鄭超麟則有完全相反的見解。他認為，「北伐勝利轉移了一般人對於『革命』的觀念。」「廣大群眾的武裝暴動確實是變成沒有必要的了。」他認為，暴動及其參與者因此而「不過盡北伐別動隊的作用。」鄭超麟並指出，「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風下工作的幹部，對於『革命』還有正確的認識，即認為革命主要是以群眾暴動手段來實行的。黨把主要力量，把優秀的幹部，配備在下層群眾運動上或黨內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軍隊的工作，」當時並沒有其他的革命觀。可是北伐問題發生了。上海中央反對北伐。後來北伐居然勝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進一步的工農群眾運動，於是一般人，連上海中央在內，改變了原來的革命觀。割據了一個地域，組織政府，編練軍隊，然後出發征伐，以奪取全國政權，——這個方式被視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眾武裝暴動退入於響應革命軍的別棟隊地位。從此，黨就把最好的幹部派去做政府的和軍隊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眾運動了。」以上引文分見：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508~509；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248、282~283。

⁴⁷⁹ 這篇代表作即野澤豐〈序章 中国的國民革命についての序論的考察〉一文，收錄在野澤豐編，《中国國民革命史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4）。

⁴⁸⁰ 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國共合作之前根本沒有系統性的國民革命論，他們不但長期廢棄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原始意義也與國共合作時期的意義不同。孫中山首次提出「國民革命」一詞是 1906 年，但卻是相對於「英雄革命」之語而提出的，沒有具體被定義的內容。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縮限了「國民」的概念，認為之前將全國人民名之「國民」，是種「糊塗」，「必其有心贊成共和，而宣誓註冊者，乃得名之曰國民。」直到 1924 年的國民黨「一大」，孫中山才重新起用「國民革命」口

1932 年被建構為「國民革命」時，這三者之間也必然存在共性；問題只在於這種共性究竟如何可能？——如果國民革命沒有發展到包括「民族主義」與「武裝鬥爭」的階段，而僅僅是停留在中共最初所設想的「民主主義」與「民眾運動」的階段，⁴⁸¹是否可能將「台灣民主國」乃至「噍吧哖事件」視為「國民革命」？尤其是「噍吧哖事件」。對於日本統治者來說，乙未抗日以來的所有具有反日性質的武裝鬥爭都是匪亂，「噍吧哖事件」更被視為集一切迷信、落後、排外，與盲動於一身的最大規模抗暴。「噍吧哖事件」與民主主義或民眾運動的距離顯然太過遙遠。如果說，重評「噍吧哖事件」可能以國民革命在一九二零年代的「民族主義」化與「武裝鬥爭」化為前提。那末「義和團運動」得到重評的過程，則是一九二零年代國民革命之「民族主義」化與「武裝鬥爭」化的起點。而「義和團運動」之所以得到重評，來自於謝廉清所接觸的「反帝大聯盟」。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進行歷史建構的起點。

第二節、中國「革命史」歷史建構的開端：重評義和團運動

歐洲各國政府……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些基督徒建立功勳的時候，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列寧，〈對華戰爭〉，1900 年。⁴⁸²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義和團運

號。這一重新啟用的契機，則是陳獨秀 1922 年的《造國論》。陳獨秀將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名之，呼籲中共黨內接受與國民黨合作的策略，從「社會主義革命」轉換為兩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孫中山重新啟用這個概念，脫離不了中共從中的促成。）某種意義上來說，由於「國民革命」概念在孫中山與國民黨的使用上的變化太巨大，因此可以認為「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具有鮮明的歷史建構之性質。但對今人而言，由於「國民革命」通常被等同於「國民黨的革命」或者「孫中山的革命」，因此其「四十年」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關於「國民革命」意義變遷最精要之研究，可見：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129~165；劉曼容，〈孫中山國民革命觀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7 年第 1 期（1997，廣東），86~92。

⁴⁸¹ 中共將「國民革命」設想為民主主義與民眾運動之結合的想法，最初體現於 1923 年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中。「我們的主張是：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有了國民會議之後，再產生政權：「由此國民會議所產生之新政府，須以真正國民革命的勢力，掃蕩全國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外國勢力。」見：〈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174~178。

⁴⁸² 列寧，〈中國的戰爭〉，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280。

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2006年。⁴⁸³

說明義和團運動的重評與「反帝大聯盟」之前，先從《平平旬刊》與《婦女週報》（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之間的一場論戰來說明當時的時代氣氛。

事情源於《婦女週報》一則新聞，謂紹興一名奶媽因沒照顧好洋人的娃娃，意外致死，便遭西洋人用四根鐵釘釘死在一條長板凳上。⁴⁸⁴事經披露，平平同人賀威聖立於《平平旬刊》指出，此事不但是「某洋人殘忍所致」，更是「資本帝國主義者侵掠弱小民族時所必有的現象」，因此必須「趕走直腳鬼！」⁴⁸⁵

賀威聖的批判引來《婦女週報》一位叫做「馮魯英」的作者提出反批判，「祇看這個題目，就不免有『義和團』的嫌疑了。」⁴⁸⁶對此，平平同人羅任一提出反駁。他承認義和團運動是「罪有應得，死不足惜」的「拳匪」。但他更認為，「因為西洋人欺負我們得太厲害了，這種報復正是除去被欺負的原因，也是要想免卻人類多流血的痛苦。」⁴⁸⁷另一同人「逸民」亦云，「馮魯英先生簡直說『平平旬刊』有義和團的嫌疑，他們眼中的看不起中國人比外國人還要更甚！」⁴⁸⁸義和團仿若是種極不堪的衡量標準，比洋人還要等而下之。羅任一與逸民的見解，反映了一種既想認同義和團運動所代表的「排外」卻又無法認同排外所伴隨的「野蠻」的矛盾態度，同時也反映了全國逐漸升高的排外氣氛。

不久，賀威聖直接投稿《婦女週報》。他回應馮魯英的批評而解釋云，「平平旬刊並不是仇視外人的刊物，有發刊詞作證」；他並「承認」平平同人們的回應「誠然是蠢」、「誠

⁴⁸³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春「2.28：文學與歷史」（2006，台北），137、138。

⁴⁸⁴ 《婦女週報》首先報道此事的文章是：〈女子的生命權在哪里？劊子手「何其多也」！〉，《婦女週報》，第38期（1924，上海），4；蘇哥，〈洋大人家裡的奶媽〉，《婦女週報》，第38期，5~7。

⁴⁸⁵ 阿鳳，〈趕走直腳鬼〉，《平平旬刊》，第6期（1924，上海），2~3。「趕走直腳鬼」的口號，令人聯想起同人「蕾」的「快快地起來把街路上的野獸趕走！」見：蕾，〈一個回到中國的台灣人〉，《平平旬刊》，第4期（1924，上海），6。

⁴⁸⁶ 馮魯英，〈對於西洋人釘死奶媽的懷疑〉，《婦女週報》，第40期（1924，上海），5。

⁴⁸⁷ 任一，〈嫌疑解釋〉，《平平旬刊》，第8期（1924，上海），2~3。

⁴⁸⁸ 逸民，〈我對於懷疑洋人釘死奶媽的感想〉，《平平旬刊》，第8期（1924，上海），4。

然是疏忽」。但賀威聖也指出，馮魯英「單就『直腳鬼』幾個字而大發牢騷，這恐怕也過於片面觀察。」⁴⁸⁹經過《婦女週報》與《平平旬刊》之間的來回論戰，一位對於此事「情跡」深感「離奇」的讀者，在論戰已經「愈加進到空論難辯的路裡」時，查證了真相。原來此事全為虛構。論戰終於平息。⁴⁹⁰

一場虛構的事件何以輕易引起這種論戰？或者說，這種事件何以能夠輕易被虛構出來並引人相信？這裡存在著一個時代氛圍的問題，同時也反映了「義和團運動」在當時所體現出的矛盾形象。就在這種氛圍中，「義和團運動」馬上迎來前所未有的重新評價。重評的契機是中蘇建交所爆發的外交衝突。

1924 年是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十月革命之後遭到西方持續抵制的蘇維埃國家（1922 年，包含「蘇俄」在內的「蘇聯」成立），於 1924 年進入大規模建交期；⁴⁹¹中國與日本則是蘇聯在東亞的兩大建交對象。由於蘇維埃國家成立後即透過各種使者（如加拉罕）宣示了幾次對華友好的政策，中蘇建交遂成為中國人民少數可以期待的平等談判。同年 5 月 31 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通常正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然而中蘇談判並非始終一帆風順。僅僅在 3 月份的時候，談判就曾遭遇破裂。其他國家的干涉自是原因之一，可是蘇聯不願將中東路與外蒙輕易還給中國，也是關鍵因素。於是，即便「期待」與「批判」同樣存諸社會輿論，但是期待的失落卻加強了批判的力量。只是隨著蘇聯的逐漸「讓步」，兩種輿論的力量對比才壓倒性地產生有利於正式建交的消長，得到一個「形式上」放棄大部分對華利權的協定。⁴⁹²就「批判」的輿論而言，存在反蘇言論的《平平旬刊》可為典型。其批判多與 3 月份建交談判之破裂有關。至於言論的基礎，主要來自於民族情緒（而非無政府主義之類的批判）。⁴⁹³

至於「期待」的輿論則可以謝廉清的言論為代表。在中蘇正式簽字前二十天的 5 月 11 日，《台灣民報》登出謝廉清來自北京的一則報道。他在題為「中國人不明去就」的小節中提到：⁴⁹⁴

中俄的會議現在是停頓中，究竟中國承認蘇俄是利？或是害？中國民族是永甘久屈服於東交民巷的勢力之下？或是要民族的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為是？或是盲從洋大人的使嗾為是？中俄交涉停頓，乃是中國人不能明去就所致罷。

並特別加上一段注言云：

⁴⁸⁹ 阿鳳，〈平平旬刊阿鳳君來信〉，《婦女週報》，第 42 期（1924，上海），6~7。

⁴⁹⁰ 李開時，〈調查「西洋人釘死奶媽」消息的結果〉，《婦女週報》，第 43 期（1924，上海），5~6。

⁴⁹¹ 如蘇聯學者所言，「1924 年好像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上互相比賽的一年。」見：伊·費·伊瓦辛著，春華等譯，《蘇聯外交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117~123。

⁴⁹² 關於中蘇建交，目前最新、最扼要的研究是：何艷艷，〈「國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蘇建交談判（1923~1924）〉，《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2005，北京），237~273。以及沈志華主編、楊奎松等撰稿，《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9~13。

⁴⁹³ 這些反蘇文章是：赤人，〈中俄交涉破裂的原因〉，《平平旬刊》，第 2 期（1924，上海），1~3；威聖，〈責備賢者的幾句話〉，《平平旬刊》，第 2 期（1924，上海），8。

⁴⁹⁴ 廉，〈北京通信〉，《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8 號（1924，東京），9。

中俄交涉是有帝國主義在外交總長後面種種左右[，]所以不能承認蘇俄，現在外交總長顧維鈞中國通叫他，洋奴走狗（廉清注）

謝廉清將「中蘇建交」與「民族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畫上等號，立場頗為鮮明。顯然謝廉清並不認為蘇聯與其他外國是一丘之貉。

但中蘇正式建交並非問題的結束，而恰恰是開始。蘇方為表示對於中國的尊重，而將派任中國從未有過的、級別最高的大使級使節赴華（以往最高只至公使級），⁴⁹⁵並要求移交舊俄遺下的使館。但多數尚未承認蘇聯之公使團各國卻以辛丑條約為由，認為使館區不屬於中國管轄甚至不承認蘇聯對於帝俄的繼承權，於是拒將使館交還蘇聯。此事一出，國內輿情譁然，1900年八國聯軍以及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記憶也重新被喚起。就在全國日趨高漲的排外氣氛中、就在中蘇建交所遭遇的阻礙中——誠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注意到的——義和團運動從此而首次得到正面評價，⁴⁹⁶一個民間組織與運動亦就此拔地而起。

7月9日，參眾議員、國民對英外交聯席會議、北京學生聯合會，社會主義青年團聯合發起通告，號召組織「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7月13日下午二時，一個中國史上首次以「反帝國主義」為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正式於北京成立，地點就是來今雨軒。眾議院議員胡鄂公當選主席。⁴⁹⁷原來3月份還希望能在暑假返台推廣教育、提升台灣文化水平——也就是許乃昌後來在暑假所做的工作——的謝廉清，⁴⁹⁸就在這樣的運動風潮中，於同月27日登上來今雨軒的演講台。

⁴⁹⁵ 其他國家當時只派公使駐華。因此，當蘇聯決定派大使駐華，依國際慣例，各國使節在中國的使節團將由最高級別的使節——蘇聯駐華大使——擔任使節團團長。但各國抵制。

⁴⁹⁶ 柯文（Paul A. Cohen）認為：「新文化倡導者把義和團視為落後、迷信和非理性的一群，五四以後人們又把義和團視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者，1924年9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發表的一篇文章最顯著地反映了這一轉變。時為1901年9月7日簽訂的《辛丑條約》的23周年紀念日。在「反帝同盟」的建議下，新近改組的國民黨確定9月7日為「國恥日」，接下來的一周為「反帝周」。這時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緊密的聯盟，軍事上也處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階段。在這種形勢下，原來零零星稱讚義和團為愛國者的言論在激進報刊上匯聚成了大合唱，以中共主辦的《嚮導週報》，為開路先鋒。」柯文忽略了以下幾點：（1）這一運動的形成深深根植於當時的中蘇建交事件（是各國公使以《辛丑條約》為由拒將使館交還蘇聯）以及「國民外交」風潮，是在這個牽涉到《辛丑條約》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才將義和團運動拿出來重新評價。而柯文甚至搞錯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非9月7日「接下來的一周」（the week following as.....），而是前後一周，即9月3日至9日。（2）又由於「五卅」普遍被認為是一九二零年代的首次反帝高潮，因此柯文的上述說明，僅僅是為說明「五卅」而做的鋪陳而已。關於1924年這場運動的細節及背景，他並未深究。於是也不可能考慮「反帝大聯盟」是否在運動中具有獨立性，而將整個運動的領導權或此或彼地歸於國民黨與共產黨，或把陳獨秀的文章視為開端。關於柯文，見：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241. 中譯見：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202。關於「運動周」的制定，是反帝大聯盟第四次執行委員會（7月27日）所做出的決定。見：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206~207。當時北京政府的情報檔案也是如此記載。見：〈載德報告中華學生廢約同盟會紀念九七國恥活動呈（1924.9.2）〉，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民眾運動」（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628~629。

⁴⁹⁷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162。

⁴⁹⁸ 廉清，〈對於今年暑假的希望〉，《台灣民報》，第2卷第5號（1924，東京），12。

由於中蘇建交問題，導致「反帝大聯盟」及其「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誕生，其組織主幹正是前「今日派」份子。從史料來看，「反帝大聯盟」並非自始就決意重評義和團運動；⁴⁹⁹他們對於「反帝國主義」的理解，也有迴避國內政治的嫌疑。因此，即便「反帝大聯盟」有中共成員參與並接受蘇聯使館資助，⁵⁰⁰大聯盟出現之初仍曾遭遇中共中央的陳獨秀以及各方政治勢力的批評。⁵⁰¹（這些批評可能反映了「今日派」的獨立性，或者中共北方黨組織與南方黨中央之間的不協調。）無論如何，由於全國日趨升高的排外氣氛，在「反帝大聯盟」走向全國、甚至走向殖民地台灣的過程中，⁵⁰²義和團運動得到了重評，運動主導權

⁴⁹⁹ 反帝大聯盟對於義和團運動的見解，有個變化的過程。在謝廉清發表演說於來今雨軒的7月27日，反帝大聯盟執行委員「雷殷」（參議院議員）就自稱「我輩之手段異常和平，而所持之態度又極穩健，斷非義和團排外者之流，深望國人諒解云云。」同日舉行的反帝大聯盟第四次執行委員會（7月27日），議決發起「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發出說明通告；但通告全篇只在指控辛丑條約，雖提到「庚子義和團之役」，卻也止此七字，並未重評。隨著運動收攏各方勢力以及各方勢力對於運動提出批評，反帝大聯盟也順著運動的內在要求，更改了自己的看法。反帝大聯盟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周」（1924.9.3~9.9）發表的一則宣言中，把義和團隱諱地定位為具有「壯烈精神」的「愛國運動，民族運動」，但不明言為義和團。與此相比，出現在國共合作大本營廣州的「廣州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就公然以「義和團民族反抗運動」名之。關於雷殷的談話，見：此為刊載於北京《晨報》之大意。見：〈反帝國主義聯盟招待新聞界情形〉，《晨報》，1924年7月28日，第7版。關於文中所提到的反帝大聯盟各種文件，可見：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198、216~218、220。

⁵⁰⁰ 李伯剛，〈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4期，5~6。其中擔任大聯盟執行委員的中共黨員有劉仁靜（用名劉子雲）、李伯剛（用名李漢石）等人。

⁵⁰¹ 在收攏各方勢力的過程中，反帝大聯盟也順著運動的內在要求，更改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他們改變對於義和團的評價之外。最顯著的例子，則是社會各界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宣言〉的批評。〈宣言〉聲明，「我們這個大聯盟，除卻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外，其外任何事物概不與聞」。這點被陳獨秀、瞿秋白等人批評有不反軍閥之嫌疑，因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恰恰是軍閥。就連國民黨方面，也有批評者（廖百芳）謂之「是不敢向曹[錕]吳[佩孚]言思擬議也。」所以江亢虎才指出，「今日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外間已頗譏其不徹底。」反帝大聯盟的李漢石（李伯剛）則解釋，〈宣言〉所另外提到的「凡有甘願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做我們的漢奸者，我們必須用撲滅帝國主義的手段來撲滅他。」恰恰「包括有打倒軍閥，過問內政的意思」。是否反帝大聯盟自始就有李漢石所言的這般打算，實不可知；然而各方輿論壓力卻可見一斑。以上史料可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宣言〉收錄於《近代史資料》，第2期，96。批評反帝大聯盟的見解分見：陳獨秀，〈反帝國主義運動聯盟（1924.7.23）〉，收錄於陳獨秀著，三聯書店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卷（北京：三聯書店，1984），542；瞿秋白，〈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國民黨（1924.9.20）〉，收錄於氏著，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28~635；廖百芳，〈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先決問題〉，收錄於氏著，《濛江餘影》（出版地不詳，1928），33；江亢虎，〈亞東新聞國恥紀念特刊題詞〉，收錄於氏著，《江亢虎文存初編》（南京：現代印書館，1944），227~228。李漢石的辯駁可見：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164。

⁵⁰² 1924年的《台灣民報》也曾持續關注中蘇建交與其後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影響力可見一斑。相關文章如下：〈中國對露國的承認條件〉，《台灣民報》，第2卷第5號（1924，東京），7；〈中俄國交恢復〉，《台灣民報》，第2卷第10號（1924，東京），2；廉，〈北京通信〉，《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924，東京），9；〈既經受諾的中國國權恢復主義〉，《台灣民報》，第2卷第12號（1924，東京），3；〈中國反帝國主義之民眾運動〉，《台灣民報》，第2卷第13號（1924，東京），2；〈加拉罕捧呈國書〉，《台灣民報》，第2卷第13號（1924，東京），2；〈中俄正式會議〉，《台灣民報》，第2卷第15號（1924，東京），2；〈勿落人後（七月十日東京日日社說）〉，《台灣民報》，第2卷第15號，9~10；〈中俄互派大使〉，《台灣民報》，第2卷第15號，10~11；〈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北

也從今日派轉向中共手中。⁵⁰³

如果「民主主義」可以在不易展開的工人運動之上再展開一條團結範圍更寬的統一戰線。⁵⁰⁴那末，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得到重評的義和團運動，則為「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出現提供準備。而「民族主義」統一戰線比「民主主義」統一戰線還能爭取更多群眾。對於中共而言，從工人運動、民主主義、向民族主義的發展，正是統一戰線拓展的過程；⁵⁰⁵同時也起到前述以「**民族革命運動**」替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來確保運動革命性並區別於改良運動的功能。可以設想，在不同的統一戰線之下，歷史建構將不相同；無法進行歷史建構的統一戰線則將缺乏歷史的感召力。⁵⁰⁶當中共把「反帝國主義」作為「民主主義」

京八校教職員發表宣言》，《台灣民報》，第2卷第15號，13；〈廢約同盟敬告使團〉，《台灣民報》，第2卷第17號（1924，東京），9；〈北京通信：中國外交上開一新紀元〉，《台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924，東京），3；〈北京的反帝國主義聯盟致世界被壓迫民族書〉，《台灣民報》，第2卷第18號，9；大川周明，〈東方諸國的民族運動〉，《台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0；〈中國新國恥日排外運動：反帝國主義聯盟對全國的支部發會宣言〉，《台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0；蔣渭水，〈隨感錄：七一與五九〉，《台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1；〈論廢止不平等條約運動（中華新報社說）〉，《台灣民報》，第2卷第19號（1924，東京），9；〈辛丑紀念（九月七日中華新報社說）〉，《台灣民報》，第2卷第20號（1924，東京），9；〈雪國恥的第一步（九月七日民國日報評論）〉，《台灣民報》，第2卷第20號，9。特別是反帝大聯盟的〈致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一封信〉，其致書對象也包括了台灣人民。

⁵⁰³ 「反帝大聯盟」，一般是指1924年7月於北京成立者。但受其影響，天津（1924.8.10）、湖南（1924.8）、上海（1924.8.23）、山東（1924.9.7）、武漢（1924.9.5）、杭州、青州、廣州、太原、四川（1925.1.1）分別成立地方的反帝大聯盟，並各自發表宣言。不過學者也指出，這些地方性組織多由共產黨員領導。——就此來看，當反帝大聯盟從北京走向全國之時，反而是逐漸被共產黨控制的。上述各地宣言均收錄於李漢石，〈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178~206。成立日期則參考了王凌雲，〈大革命時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黨史研究資料》，第5期，335~336。關於各地反帝大聯盟與共產黨的關係，可見：金富軍、蔡樂蘇，〈對義和團的認識變化及其政治意涵〉，《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59卷第2期（2006，武漢），233。

⁵⁰⁴ 中共所推動的「民權運動大同盟」（1922.8.24正式成立）就是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實例之一。他們以封建軍閥為主要反對對象。李大釗與胡鄂公均擔任了領導職務。王凌雲、胡淑敏，〈關於民權運動大同盟組織及其活動〉，《黨史研究資料》，第7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21。

⁵⁰⁵ 陳獨秀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提到了中共在統一戰線上的幾次轉變。就中共向民主主義的轉變而言，「在上屆代表會議上，我們同意東方民族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只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當時的「民主主義」要求集中體現於「打倒軍閥」之口號。然而中共向「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的轉變卻遠遠落於「打倒軍閥」的口號之後。「打倒軍閥的口號已得到中國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響應，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員應該更加注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陳獨秀的上述言論其實正可證明鄭超麟所謂「『打倒軍閥』是隸屬於『打倒帝國主義』的」之見解有誤，因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並非一出台就取得支配性地位。以上分見：〈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68~169；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卷，278~279。

⁵⁰⁶ 設想，如果中共堅持完全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民眾運動，是否能產生歷史建構？實際上，由於中國工人運動起步甚晚，沒有什麼足以建構歷史的好材料。因此1923年「二七大罷工」之類極晚才出現的工運鬥爭，就成為建構中國工人運動史時的主要對象。當然，在這種條件下，與其說是建構工人運動史，倒不如說是召喚那些有限但可知的工人階級鬥爭之記憶。《平平旬刊》就曾登載過歌頌「二七大罷工」以及死難烈士的劇本。可見：小立，〈血〉，《平平旬刊》，第5期（1924，上海），7~8。實際上，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歷史建構是1949年之後的事情，自始就是學院內部的研究專

之外的另一條底線，鴉片戰爭以來的諸多歷史事件頓時成爲**所有階級**可以追慕、繼承的對象。「反帝」與「排外」之間的界線也因此模糊。從「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是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被認識來看，真正**自為**的「反帝」是中共出現之後才有的事情。此前的「反帝」，勿寧說是**自在**的「反帝」，或更精確的說——僅僅是「排外」，因爲「反帝」拒絕無條件的「排外」。而「義和團運動」這種看似最爲愚昧、迷信、野蠻、排外的事件，就成爲歷史建構與重評歷史事件時的最後一道關卡。當這道關卡跨過，不但義和團運動被建構爲「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本身也隨著黃埔建軍以及國民會議運動的失敗，而在民眾運動與武裝鬥爭兩者之間出現消長。

從義和團運動失敗到獲得重新評價，整整過了將近二十多年。「反帝大聯盟」在1924年發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及以「九·七」（辛丑條約簽訂日）作爲新「國恥」的紀念行動，一方面是彙集國內排外運動而形成的一次高潮；另一方面則是更大規模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準備，⁵⁰⁷其中包括了1925年的「五卅慘案」。如果「九·七」前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可以視爲北京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所指導的運動。「五·卅」所引發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可視爲上海的正統共產黨所領導的運動。對於今天的學者而言，後一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當然是最大的（因爲很少人記得前一運動的存在與意義）。甚至當平同人「少峰」（華崗，1903~1972）爲「中國大革命」撰寫史上第一本專書時，他所斷定的「大革命」起點，就是「五·卅」。

因此，以1924年「九·七」國恥爲契機而首次重評義和團運動歷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就在中共逐漸取得主導權的形勢下，使1925年「五·卅」運動成爲「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起點。「反帝大聯盟」與今日派也在融入中共的過程中，消失於中共所另外建構的歷史。⁵⁰⁸建構歷史者卻在歷史的建構中隱沒，這就是「反帝大聯盟」與異端共產黨——今日派——的歷史命運；原來作爲專有名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也逐漸失去了原來的

題。各地的工運史資料以及學者劉明達所主編的一系列資料叢書堪稱典範。

⁵⁰⁷ 圍繞著1924年「九·七」前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影響力，還可從當時中共所領導的「非基督教運動」的變化得到說明。「非基運動」早在1922年時就已在中共所領導「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而出現於上海。當時主要從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去批判基督教，因此成果有限，迅即消亡。1924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興起後，「非基運動」遂得以從反帝國主義的基礎、從中國史上最大教案（義和團運動）的重評之中而復活，甚至模仿「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活動方式（即「運動周」的模式）。可見：薛曉建，〈非基督教運動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19。

⁵⁰⁸ 日本記者布施勝治分析反帝大聯盟的衰落云：「但在是年[1924年]秋間，第二奉直戰爭勃發，北京的警察廳禁止執行委員會開會，並禁止發行會刊，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的運動一時停頓。到第二奉直戰爭的末段，馮玉祥忽向北京行了『苦特打[coup d'etat, 政變]』曹錕吳佩孚失敗，北京的軍權落到馮玉祥手裏，由馮張提攜，擁戴段祺瑞爲執政政府，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又復活了。」「但是這個大聯盟在創立的當初，發起人的中間，有商人，有共產黨員，有國家主義者，有新聞記者，有律師，有學生，……形形色色，分子極爲複雜，所以缺乏永久繼續的可能性。果然到一九二五年春，孫中山和國民黨各領袖前後繼續來京，與馮玉祥攜手謀爲政治的大活動，並且這時候的政治運動漸與蘇俄接近，這個表面上與國民黨沒有關係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也自然有捲入國民黨革命運動中的趨勢，到是年的夏間，聯盟的組織，漸次解體了。其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就移入共產黨所操縱指揮的學生聯合會手中去了。」見：布施勝治，〈ソウエート東方策〉（北京：燕塵社，1926），331~332，中譯可見：布施勝治著，半粟譯，〈蘇俄的東方政策〉（上海：太平洋書店，1927），275~277。但文中的「國民黨」仍要擺在國共合作的脈絡下考慮，並非日後反共的國民黨。

意義。⁵⁰⁹然而首次得到紀念的「九·七」國恥與「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則是甚有延續性的成功嘗試。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曾在 1922 年提出以雙十節為「反帝國主義日」的口號，世人知之甚少。⁵¹⁰然而 1924 年的「九·七」國恥與「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引起大迴響。紀念近十年的「五·七」、「五·九」國恥不但首次遭到取代，非基督教運動也受此影響而設立非基督教周。此後，日期雖有不同，「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形成某種傳統。⁵¹¹

回過頭看《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謝廉清史料。書中「與中國國民黨左派人物接近」之語，也許正是指胡鄂公以及「反帝大聯盟」。至於謝廉清是否「於翌年三月前後進入蘇俄，於同年七月左右歸返北京」，則很值得考慮。因為謝廉清與謝雪紅甚熟識，但在謝雪紅的回憶裡，在她之前赴蘇的台灣人只有許乃昌。⁵¹²再者，既然謝廉清能於 1926 年順利畢業於朝陽大學，是否可能花上四、五個月的時間離校？在謝雪紅眼裡，謝廉清只是汲營於生的「糊塗蟲」。⁵¹³謝雪紅的評價迥異於各種史料所揭示的謝廉清形象；也許她不知道謝廉清的活動，也或許她不願提。囿於材料限制，無法進一步推論。但謝廉清絕非自始至終只是一個「糊塗蟲」。日本激進派鈴江言一（1894-1945）在北京期間即曾與作為中共黨員的謝廉清來往。⁵¹⁴當時謝廉清曾被組織上評價為「是有血性的人，辦事熱心。性甚激烈，信

⁵⁰⁹ 「反帝大聯盟」在 1924 年發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曾一度被視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端。1924 年，瞿秋白認為「國民革命的大運動」的「聲勢」始於「北京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首先成立」。1926 年，日本記者布施勝治（1886~1953）指出，「反帝大聯盟」是首次把反帝國主義運動「作為革命的標語」的運動，且是「中國近年國民運動的一大成功」。不過布施將之視為「共產黨的暗中積極活動而來」的產物。1929 年，吳壽彭等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抄錄布施勝治之書，但直接將「反帝大同盟」視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端。布施之外，著名的日本「中國通」長野朗（1881~1975），陳彬蘇（1897~1945），乃至《社會科學大詞典》之類的辭書或事典，都把「反帝國主義運動」理解為反帝大聯盟在 1924 年所推動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以上分見：布施勝治，《ソウエート東方策》，320~343；吳壽彭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1929），247~253；長野朗《支那の反帝國主義運動》（東京：行地社出版部，1927），134~172。（此書原名《支那の興國運動》，於 1926 年作為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經濟資料出版，內容均同。）；〈反帝國主義聯盟〉，收錄於河瀨蘇北編，《滿洲及支那辭典》（東京：東方文化協會出版部，1932），43；〈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收錄於長野朗，《支那事典》（東京：建設社，1940），167~168；陳彬蘇，〈十七、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過去〉，收錄於氏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上海：世界書局，1928），123；〈反帝國主義運動〉，收錄於高希聖等編，《社會科學大詞典》（上海：世界書局，1930），115~117；瞿秋白，〈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國民黨（1924.9.20）〉，收錄於氏著，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 2 卷，630~631。

⁵¹⁰ 〈京師警察廳查禁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印刷品有關文件（1922.10）〉，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3 輯「文化」（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546~549。

⁵¹¹ 比方 1930 年，中共領導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與上海台灣青年團合作，以「6.17」台灣恥政紀念日至「6.23」上海沙基慘案紀念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紀念鬥爭周」。1931 年，中央蘇區則以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以上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312；江西省文化廳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員會等編，《中央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00。

⁵¹²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216。

⁵¹³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138、148。

⁵¹⁴ 鈴江言一，《中國革命の階級対立》，第 2 卷（東京：平凡社，1975），202；衛藤瀨吉、許淑真，《鈴江言一伝》（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37。

仰甚堅。對於主義十分信仰，很熱心服務。」並曾在「洋車夫運動」中擔任組織工作。⁵¹⁵

從《台灣人士鑑》的記載來看，謝廉清後來陸續擔任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1926）、北京郁文大學教授（1927）、中國陸軍大學教官（1928）等職，教授日文。但日本特務機關直到 1930 年都還在監視他，視之為「在支台灣籍民・共產主義運動重要人物」，謂其曾於蘇聯大使館被張作霖抄去之前，列名中共黨員，此後才不再參與運動。⁵¹⁶抗戰勝利之後，謝廉清因曾參與華北偽政權而一度下獄。最後，與前往台灣的胡鄂公相反，謝廉清於解放後留居北京，終老於斯。⁵¹⁷

第三節、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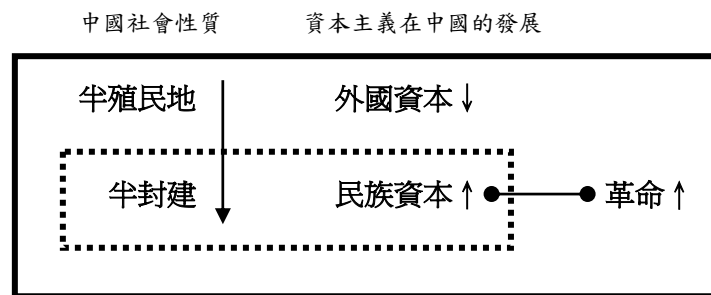
「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

——魯迅致蕭軍，1935 年

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絕不是奴才。

——魯迅評蕭紅《生死場》，1935 年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史學界曾就何者才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進步主線」而發生論爭。論爭中有兩派，以學者林華國的說法，可分別稱為「階級鬥爭」史觀派（或「兩個過程」派）以及「近代化」史觀派（或「兩種趨向」派）。⁵¹⁸爭論起源於「近代化」史觀派對於做為主流之「階級鬥爭」史觀派的反動，而契機則是重新詮釋毛澤東對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定義。下圖中的方形實線框，代表了「階級鬥爭」史觀派所關注的範圍；方形虛線框則代表「近代化」史觀所關心的範圍。箭頭的上下分別代表進步或沉淪：



⁵¹⁵ 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 年）》（北京：北京市檔案館，1991），36、352。

⁵¹⁶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194；〈各國共產黨關係雜件・中國ノ部・共產黨員名簿關係・北京〉，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記録》，編號 B04013047900。這份《外務省記録》檔案保存不甚清楚，本文只能概略猜測文意。

⁵¹⁷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175~176。

⁵¹⁸ 林華國，《近代歷史縱橫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林華國指出，「近代化」史觀派以黎澍、李時岳為代表，他們認為毛澤東僅僅把「半殖民地」視為描述中國主權地位的概念，只有「半封建」才是真正涉及「社會性質」的概念。然而他們的推論比毛澤東更進一步，因為他們試圖論證「半封建」的反面應是「半資本主義」（即民族資本主義），而非僅僅描述主權地位的「半殖民地」。因此他們將民族資本主義視為進步的象徵，而「半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克服「半封建」的過程，就是中國近代史的進步主線。

至於被「近代化」史觀派所批駁的「階級鬥爭」史觀派，則以胡繩、范文瀾為代表。他們並不否認「近代化」史觀派所詮釋的毛澤東。但他們更重視由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相結合而產生的「沉淪」。挽救沉淪的力量可以是民族資本主義，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不可能允許它發展；「半封建」的另一半也可以是民族資本主義，但更以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外國資本主義為主體，而且外國資本主義並不導致中國資本主義化。因此挽救沉淪的動力便只能是階級鬥爭（泛指一切革命反抗）。

從林華國所總結的兩種史觀來看，兩種史觀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發生結合的歷史事件上（如：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共同採取認可的態度。但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發生分離的歷史事件上，兩種史觀的真正傾向就突顯出來了。對於「階級鬥爭」史觀來說，他們肯定義和團運動（因為革命），但否定洋務運動（因為反革命）。而「現代化」史觀的見解則恰恰相反，他們否定義和團運動（因為不利於民族資本主義，所以他們其實還想進而否定太平天國運動），並肯定洋務運動（因為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換句話說，兩種史觀共同存在兩條歷史進步主線，一條主線是「革命」，另一條主線則是「民族資本主義」。只是兩種史觀所側重的主線不同，而歷史進步主線自然也是歷史建構的主線。至於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之間的分離與結合，也自然是民族資產階級與革命之間的分離與結合，從而是革命動力與革命任務之間的分離與結合。

「民族資本主義」之所以可能成爲一個共產主義政黨所接受的歷史進步主線，並不在於中共擁護「民族資本主義」，而在於他們要同那些有可能對抗外國資本主義（從而可能服從於「民族」利益）的「民族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不過，這並不見得是主要的原因。

實際上，從「民族資本主義」出發，正可在「革命」以外尋得新的歷史建構空間，特別是以此說明中國歷史的客觀趨勢與世界歷史的客觀趨勢之間的關係。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它試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1949年）之前——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1840年為下限）之內——補上一個「普世」而且無法證偽的資本主義階段（雖然只是一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階段）。⁵¹⁹如毛澤東所云，「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

⁵¹⁹ 本文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也視為民族資本主義。許滌新指出，「繼承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而來的民間企業，即民族資本主義。」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

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⁵²⁰這也可以證明中國人民「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但就「階級鬥爭」史觀而言，「民族資本主義」在歷史建構之中更重要的作用則是要以自身的無力說明「革命」的必要性：雖然中國歷史本來在普世的客觀趨勢之內，卻因帝國主義而走出普遍的客觀趨勢，進入特殊的、只能沉淪的客觀趨勢之中。這種沉淪表現於兩方面，一方面是民族資本主義無法發展。如毛澤東所云，「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⁵²¹二方面則是帝國主義也不可能代替民族資本主義而使中國資本主義化，完成馬克思所謂的帝國主義「雙重使命」。因為帝國主義並不根絕中國的前資本主義勢力，而是與之勾結。由於以上兩個方面，讓中國進入一種只能沉淪的畸形社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革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包括義和團運動在內的各種革命，都得到了肯定。

但無論如何，就歷史建構本身（或者對於歷史進步主線的發掘）的歷史而言，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晚於革命史的歷史建構。而革命史的歷史建構——如本章所討論的——則始於 1924 年義和團運動的重評以及統一戰線的民族主義化。由於革命史的歷史建構先行，才限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之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如果革命史的歷史建構能被排除，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就可以獨立存在或者取得其他的內容。因為，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實際發展確實就是「不發展」。這種「不發展」，在中國保持形式上之主權地位的情況下，更容易感受到。自國民黨於 1927 年政變取得政權以來，此後的十年乃至二十二年之間，陸續以國家的名義或資源開辦了各種資本主義企業，然至 1949 年之前，中國不但始終沒有資本主義化，而且似乎越發難以資本主義化。⁵²²在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獲得國家支持卻又不得發展的情況下，⁵²³人們自然容易從中國無法資本主義化去感受問題，「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在這種現實的環境下，民族資本主義反而以著本身的失敗而強化革命的必要性。

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直到 1928 年台共提出「一九二八年綱領」才確認台灣並未

⁵²⁰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589。

⁵²¹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640。

⁵²² 汪敬虞：「我在進行中國國民所得的研究和統計的整理編制時，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並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在進行估計工作之前以致整個過程之中，並沒有想到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更沒有規定一個事先設想好了的目的。我和巫[寶三]先生都是在看到估計的結果以後才動手寫出……文章。」「我們的驚異到了可怕的程度，說明『中國經濟很難得到發展』是我們當時也不曾料到有如此嚴重、然而卻是活生生的客觀現實，而不是如兩位教授[久保亨、牧野文夫]所說的『是為了論證共產黨政治統治的必要性』而有意進行不客觀的研究和統計編制。」見：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5。

⁵²³ 與國家關係密切的「官僚資本」正可視為「民族資本」的最高形式。雖然史學界通常會將兩者加以區分，但通常難以區分。許滌新的一段說明正可說明兩者之間的聯繫。他認為，「雖然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有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個體系，但並非所有的資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劃歸這個或那個體系。」因此「我們並不一一區別每家企業是官僚資本或民族資本，不去尋找這種形而上學的煩惱。」這種難以區分恰恰體現兩者之間具有共性。許滌新的見解可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 1 卷，20。

資本主義化，並藉由「國民革命」的概念而產生了歷史建構，此後陸續肯定了台灣民主國與噍吧哖事件。與之相較，台共成立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即便同情台灣民主國與噍吧哖事件等抗日武裝鬥爭，也並未將之建構成爲一條歷史進步主線。因爲他們的歷史進步主線很窄，僅僅是資本主義化而已。而在他們認爲台灣將因日本資本主義而全盤資本主義化的認識下，他們都把眼光投向了未來、投向了與資本主義直接對立的社會主義革命、乃至僅僅投向了也許可以分化而出的無產階級。

如本文所分析，一九二零年代存在著一種把「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理解爲「資本主義」客觀趨勢之展開的觀點（以《資本論》與《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揭示的客觀趨勢爲典範），許乃昌、平平同人、山川均、矢內原忠雄都是這種觀點的代表。這種觀點認爲，「日本」只是「資本主義」客觀趨勢的承擔者，除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崩壞之外，資本主義不會造成資本主義以外的結果，所以這種觀點並不質疑被理解的「資本主義」客觀趨勢本身。而是積極地找尋客觀趨勢的體現處。他們因此而迴避眼前已經觀察到的現象——日本「資本主義」竟然造成了「資本主義」以外的結果——大量存在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在這種觀點下、在民族資本主義並非在國家支持之下而遭遇失敗的情況下，即便民族資本主義遭遇日本資本主義的打擊而破產，也只被視爲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內部矛盾而已（即前述章節所謂「第二個分化」）。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這種處境所能獲得的**感覺**，並不是台灣無法資本主義化，而恰恰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本身。

這種觀點雖然否定日本，卻無法徹底否定日本帶來的資本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沉默或不自覺地、甚至被迫接受帝國主義「雙重使命」的觀點。雖然這種觀點可以成爲一個通向未來的末世論述，卻難以從「民族資本主義」或者「革命」的方向上出現歷史建構（因爲台灣不被認爲無法資本主義化）。雖然這種觀點更有資格——因爲承認台灣的資本主義化——稱爲「資本主義」論，卻也只能到此爲止。⁵²⁴直到「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年），許乃昌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認識才出現變化，他開始承認前資本主義不見得會被資本主義所克服、反而被保存下來的事實。到了台共建黨（1928年），許乃昌所認識到的事

⁵²⁴ 換句話說：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所使用的方法，是否能研究非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例子，可從王亞南撰寫《中國經濟原論》（1946年）時所遭遇的問題談起。王亞南是中國最早完整譯出《資本論》的學者（其合作者是郭大力）。他所撰寫的這本書，以說明中國社會性質爲主題，並採用馬克思《資本論》所使用的各種經濟範疇來說明，可謂社會性質論戰（以及農村性質論戰）的最後總結，享有「中國式的《資本論》」之美譽。此書一出，即遭爭議。有批評者認爲，既然王亞南認爲中國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何能採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論》諸經濟範疇？王亞南接受這一批評，但他認爲，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來研究非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的社會，就是要說明這個社會的沉淪或不正常性。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比較性的研究。但究竟能不能直面這種兩種經濟型態並存的社會而研究，卻是當時已經提出的要求，也因此，當時的中國才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才有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這是爲了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經濟規律而發展出來的學問。從而使得一個本來只以資本主義社會作爲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爲一門被擴張的學問。具體成果則以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以及許滌新《廣義政治經濟學》爲代表。關於上述學術史問題，可見：陳其人，〈理察德·坎蒂隆的經濟思想——一種從分析土地關係開始研究社會經濟的理論〉，收錄於氏著，《陳其人文集——經濟學爭鳴與拾遺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489~450。並見：吳承明，〈論廣義政治經濟學〉，收錄於氏著，《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29~43。

實，終於也成為台灣共產主義者的綱領性認識。——雖然帝國主義「雙重使命」的觀點仍交錯於同時出現兩種歷史建構的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之中。

然而就算能夠出現「民族資本主義」歷史建構，這種建構也是有侷限的。因為它只是一種單線進步史觀。這種史觀所認定的「進步」，就等於資本主義，只是論者更願意正面承認民族資本主義（而非外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與此相反，「革命史」歷史建構則以「反對沉淪」來定義「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便不會是唯一的進步主線。「革命史」歷史建構其實是多線進步史觀——雖然他們還是必須從中挑出一條最進步的主線；就中共而言，此即「新民主主義革命」。

* * *

抗戰初期，其實恰恰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同月月底，楊逵（1905~1985）在閱讀了蕭軍（1907~1988）所著《第三代》之後，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愉快」的心情寫下一篇書評。楊逵的「愉快」是這樣來的：⁵²⁵

作品中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入「馬賊」的故事。所謂的「馬賊」，並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於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義，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

楊逵的筆，就在刪節號之後停住了。

光復以後，過去由日本殖民者所正面標榜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終於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各地的舊社會運動幹部群集此日紀念五十年間死去的烈士。1946年6月17日，這天舉行了台灣島內首次的紀念忠烈祠典禮，並在連溫卿、楊逵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從1924年首次舉行於上海的恥政紀念日集會，到1946年舉行於台灣島內的紀念忠烈祠典禮，台灣人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悼念成千成萬仆倒在日帝屠刀之下的先烈。在當時的《台灣新生報》上，楊逵將他埋藏近九年而難言的話語說了出來：⁵²⁶

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清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為了殺戮、侮辱被稱為「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清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為長毛賊之亂，也

⁵²⁵ 楊逵著、曾健民譯，〈《第三代》及其他〉，收錄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學習楊逵精神」（2007，台北），28。此文寫於1937年7月31日，首次發表於日本《文藝首都》，第5卷第9號，1937年9月。

⁵²⁶ 楊逵著、曾健民譯，〈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收錄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學習楊逵精神」，18、21~22。此文首次發表於台北《台灣新生報》，1946年6月17日、18日。

把孫文國父稱為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力量稱為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

.....

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覆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為土匪，而我們尊稱為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



結語、其實地上本沒有路

赤潮澎湃，曉霞飛湧，
驚醒了五千餘年的沉夢。
遠東古國，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神聖的勞動。
猛攻，猛攻！
捶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
奮勇，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無論黑，白，黃，無復奴隸種！
從今後，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產大同。
看！
光華萬丈湧。

——瞿秋白詞、許地山曲
《赤潮曲》，1923年



第一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起源問題的總結

一九二零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是在三個層次的背景之下誕生的。

第一，從世界的範圍來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以及一戰以後世界民族自決風潮，構成了主要的國際背景。第二，從東亞的範圍來看，日本大正議會民主時期、中國國共合作以及國民革命，則構成了第二層的地域背景。第三，從台灣的範圍來看，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則更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興起為直接的原因。

1. 世界背景

在第一個層次的背景下，導致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自誕生之日起，即具跨越性。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或其他——進入東方的時候，彼此尚未相互敵視，此間，無政府主義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然而十月革命以及共產國際的成立，卻促使「B 派」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迅速在東方傳開，進而擠壓「A 派」的無政府主義的生存空間。所以，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始就出現以下幾種現象：(1) 純粹「A 派」的活動者，幾乎無法把個人的活動轉化為組織化的運動（如范本梁）。(2) 真正實現組織化運動者，都必須面對「AB」合作以及「AB」破裂的歷史性挑戰（如平社）。(3) 純粹的「B 派」組織——台灣赤華會·赤華黨——雖然誕生，但旋即消亡，以致僅能在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尋其蹤跡。(4) 無論是「A 派」、「B 派」、還是「AB」合作或破裂，運動本身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台灣的侵占，並以驅逐日本人作為運動的目標。這種「反日」以及社會主義相複合的歷史現象，也許意味著兩者互為因果。但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反日或者反帝，並不直接導致「國家」意識或者「民族」意識的產生，這些意識反而還成為被極端反對的對象。相較於 1928 年台灣共產黨成立以來所提出的「共和國」、「蘇維埃」、或者「台灣民族」的主張，本文研究時段內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並無根除「A 派」思想，從而體現出更為純粹的、具有世界（革命）意義的理想傾向。

雖然本文按照組織沿革而有幾種區分。但這些組織之間的界線並不見得清晰。「AB」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組織的興滅太快。但這種快速的興滅並不意味著運動的消失，而是運動匯入更大的運動之中（即第二個層次的背景）。本文第二、第三章曾分別提到「海東」在《中央日報》上對於台灣社會運動路線分歧的分析（1928 年），以及黃玉齋在《台灣革命史》所做的更早區分（1926 年）。1926 年的黃玉齋，將台灣區分為「民族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並將後者再簡單分為「E.無政府主義派」以及「F.社會主義派」。至於 1928 年的「海東」，則區分為「自由主義派」與「民主主義派」。在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前後所分別出現的兩種區分，構成了台灣光復以前大陸知識份子建構台灣知識的主要寫作根據，並在不斷的傳抄中保存下來。但這兩種區分更反映了台灣社會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變化趨勢；而對 1926 年之前的黃玉齋而言，當時的「社會主義派」還只是初生且難以區分之勢力而已。

2. 東亞背景

以第二個層次為背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從誕生之日起，即以中日兩國為存在範圍、直接構成運動本身的島外起源；同時也使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能夠把自己鑲嵌在更大的、卻又擁有具體的組織關係的運動之中。誠如《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的開頭語所言，「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為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為支那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兩者皆應追溯

到大正十年[1921年]前後來考察。」⁵²⁷

日本的大正議會民主時期，促使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得以恢復生氣，進而成為最早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誕生地。當時的「主義者」都參與了當地的社會主義組織。而且，恰恰是因為大正議會民主的時代條件，促使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可能，從而進一步讓請願運動以一個被批判對象的姿態，成為台灣社會主義者藉以樹立自身的依託。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個別社會主義者在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往來——比方山口小靜的返台或者連溫卿的赴日——成為兩地社會主義運動交流溝通的渠道。然而日本警特對於兩地社會主義者的鎮壓卻也未曾停歇。無論是山口小靜的被迫退學（僅僅因為與女工進行座談會），或者來往信件遭到無理檢查，乃至連溫卿在日本所遭到的日夜跟監，日本政府對於社會主義者與弱小民族始終抱持敵意。也因此，在日本與台灣之外另尋活動地點便成為必需；中國大陸則成為奔逃、迴旋的好地方。本文所提到的蔡惠如、范本梁、彭華英，乃至在平社組建前夕從日本逃赴中國的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皆是如此。

在中國，由於中國的廣袤地域、軍閥割據，以及各帝國主義勢力瓜分中國，促使社會主義者能在各種力量交錯的地方生存下來，比方上海、北京、乃至更南方的廣州（國民黨根據地）。上海與北京最主要的流亡勢力，是朝鮮人；甚至上海還存在著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因此，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從誕生之始，便脫離不了與朝鮮革命者的合作。從1921年上海的「中韓互助社」、范本梁在北京上海與朝鮮革命者的交往，到1924年最終成立的「平社」，乃至1928年呂運亨參與台共的建黨，率皆如此。

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大陸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仍處於分裂狀態，不但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大量存在，以共產主義為主要訴求的組織也尚未統一。所以當時避居大陸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所可以接觸到的多種多樣的當地社會主義者與團體，大不同於中共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之中取得獨占性地位之後的狀態。遊走北京的范本梁與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所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合作，同樣在北京的謝廉清則與該地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接觸並參與了他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至於上海，圖謀復興「中國社會黨」的江亢虎以南方大學為基地，吸收了不少台灣學生，同時也一度成為「平社」組建之時的通訊地。此外，中國共產黨則以上海大學、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國共合作的有利形勢，吸引了大陸各省以及殖民地台灣的激進學生群集上海（有上海大學）與廣州（有黃埔軍校）。在上述客觀條件下，才使「平社」能以兩岸學生為基礎，加上朝鮮、日本兩地革命者，綜合「A」「B」兩種勢力而組建完成。

然而，中國所具有的「有利」之處並不僅僅是地域廣袤、軍閥割據、或者帝國主義瓜分而已。中國革命當時所取得的進展與激變，在東亞以及世界的範圍之內俱屬僅見。關鍵因素是1924年正式實現的國共合作以及兩黨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這一客觀條件的形成，促使中國進一步成為東亞激進份子的中心，使得包括台灣人在內的各地社會主義者、激進派有可能以中國（特別是像上海這樣的地方）作為成長、避禍的地方。形

⁵²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1。

象地說，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是在「怒潮澎湃，黨旗飛舞」⁵²⁸的「國民革命」中，向著「赤潮澎湃，曉霞飛湧」的未來而前進的。

許地山與瞿秋白所合作的《赤潮曲》是中國第一首無產階級歌曲。但歌曲並不只在中國唱響而已。許地山與瞿秋白兩人與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接觸，正顯示了「B」派的「赤潮」不但從蘇維埃溢入即將陸沉的神州、還與「A」的「黑潮」同時溢出並滲入殖民地台灣。許地山與瞿秋白對於台灣及其社會主義運動的關心並非偶然，其實未曾中止。直到1930年臺灣人宋斐如與大陸學者呂振羽等人在北京創辦《新東方》雜誌，還能看到許地山的身影。瞿秋白則與參與組建「平社」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呂運亨一道，在1928年之後再次躍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舞台，參與了台共建黨。瞿秋白甚至還介入了其後發生的台共改組問題，並始終關心者他在上海大學所教出來台灣社會主義學生們。⁵²⁹

3. 台灣背景

第三層背景的存在，則使整個一九二零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能夠依憑著這個對立面而確認自身。

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是被社會主義者所批判的對象，但主要是批判前者。請願運動之所以成為批判對象，來自於運動本身的以下弱點：(1) 誠如葉榮鐘所注意到的，請願運動是一個政治目標極高的運動，文化協會則是以文化啓蒙為主的、政治目標極低的運動。因此，無論是以東京為舞台的請願運動，還是以台灣為基地的文化協會，都無法解決台灣島內所發生的其他政治、社會問題。所以，蔣渭水、連溫卿等人才會力促實現以政治（新台灣聯盟）及社會（社會問題研究會）為目標的新型結社——即便最終仍在島內的嚴峻形勢下潰散。(2) 但就算運動有其「高度」，其實質卻確實如社會主義者所批評的那樣：運動的政治要求只能等日本政府點頭才能實現，是一個「叩頭請願」運動。(3) 更重要的是，1923年底的治警事件徹底顯示了請願運動的無力。這種無力既反映了台灣島內的客觀政治條件如何嚴峻，反映了請願運動者本身的無力，當然也連帶引來社會主義者的同情。雖然請願運動仍在島外的日本繼續進行，但島內的社會運動卻自此回到以文化協會為運動主體的狀態。當文協再次成為如當年分化出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那般的母體時，就是文協本分發生左右分裂的時候——1927年。

⁵²⁸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語出《黃埔軍校校歌》（即《陸軍軍官學校校歌》），作詞者陳祖康（1901~1979），創作於1926年。

⁵²⁹ 何池，〈「彭榮」究竟是誰——試析中共黨史上的一樁迷案〉，《黨史文苑》，第6期（2004，江西），106~108。這篇論文指出，普遍被認為是「彭榮」本人的彭湃，當時正在廣東海陸豐指導作戰，並不可能參與上海的台共建黨大會。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只有瞿秋白可能出席。而且從「彭榮」在台共建黨大會上的報告內容來看，正是瞿秋白即將在中共六大上所進行的報告概要：〈中國革命與共產黨〉。至於瞿秋白與台灣學生之間的師生情誼，可見：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

雖然本文儘可能從上述三個層次來說明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截至 1924 年為止的發展，但仍有相當多的部份未能觸及。以島內的社會運動來說，治警事件以後，島內右翼運動展開擁護總督府政權的運動，辜顯榮等推動的「有力者大會」便是一個頂點，但本文未能針對右翼的進攻以及左翼的反撲（比方「無力者大會」）進行說明。而且，在本文的研究範圍裡，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在本文的研究方法之下是個相對消極的存在。如果要特別針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與這些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也許還有其他更好的研究方法。此外，本文雖然針對上海的台灣人運動進行了概略的說明，但畢竟沒有針對社會主義運動以外的組織進行分析（比方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等）。而且，本文始終沒有直接觸及華南的台灣人運動。雖然當時華南的台灣人運動並未展現出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但隨著南方各省——以廣東為中心——由於國民革命而產生的激進化，從 1924 年以後便分別在南京（中台同志會）、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等地誕生各種台灣人組織，這些組織的社會主義性質究竟如何？與此同時，從 1925 至 1928 年之間的上海台灣人活動，卻在《台灣社會運動史》呈現一片空白。是否當時的激進台灣人都向南轉移？或者這種空白來自於《台灣社會運動史》本身的缺陷？上述問題，都還需要繼續研究。



第二節、台灣社會主義者對於 台灣資本主義的看法以及革命性質的判斷

1. 台灣社會主義者們所提出的台灣「資本主義論」、革命性質論，以及歷史建構

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台灣社會主義者多數能提出各自的資本主義論。圍繞著資本主義在台灣所產生的問題而發生的論述，說明了多數的台灣社會主義者都希望能將自己主觀上的「道義上的憤怒」，尋得一個能以「經濟科學」（而不是「道德與法」）為依託的客觀基礎。⁵³⁰不是依據「道德與法」而討論社會應該是什麼，而是透過「經濟科學」去分析社會為何是這樣那樣。范本梁所追求的「自然的趨勢」類同於前者，而其他擁有資本主義論的社會主義者則類同於後者。兩者的差異就在於能否說明現實性與必然性之間在歷史上所呈現的關係。

當時擁有資本主義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在迴避眼前已經觀察到的現象（台灣社會並未資本主義化）的情況下肯定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因此他們的肯定基本上是對資本主義化的客觀趨勢的肯定；肯定這個趨勢將在未來導致整個台灣社會資本主義化。雖然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並不深刻與正確（當然不可能深刻與正確），但就他們試圖從台灣

⁵³⁰ 關於「道義上的憤怒」、「道德與法」，以及「經濟科學」的討論，詳見本文導言。

未來的資本主義化之中發現——而非發明——未來社會的可能性而言，是一個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想法。許乃昌認為，台灣將來的資本主義化將導致「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因此，革命動力將是無產階級（同時也是整個民族）。瞿秋白則批評許乃昌的觀點。瞿秋白並不否認革命動力應該是整個民族，但並不是未來無產階級化了的整個民族，而是現下各階級聯合起來的整個民族。因此，雖然許乃昌與瞿秋白都認為必須爭取整個民族成為革命動力。但由於兩人對於革命動力之內的階級差異（只有一個階級或包含多個階級）有不同的估計，所以前者自然從無產階級本身利益的高度來規定革命任務，後者則必須國民整體的共同利益的低度來規定。雖然當時的共產國際對於以上兩種革命——前者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後者稱為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則代稱為「國民革命」）——的革命任務有其定見，但並不能保證處在共產國際組織體系之下的許乃昌就完全能按照國際的想法去理解這兩種革命。而其理解的不完全性，也許正反映了其他社會主義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對他的影響。

雖然許乃昌所提出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有機會主義傾向，但更體現了他相信台灣各階級都有革命性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之中，既有的社會運動——以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為主——的參與者就成為其理論所必然團結的對象。因此，許乃昌雖是社會主義者，但他恐怕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瞿秋白建議台灣應該進行「國民革命」，這個建議反映了共產國際革命戰略——「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為其形式——在東亞的擴散與逐步貫徹。對於台灣而言，再一次討論「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革命的時機，是1926~1927年間的「中國改造論爭」。真正接受「民主主義革命」的時間，則是建立台灣共產黨的1928年。到了1930年，蔣渭水甚至也開始自稱為民主主義者（但不講革命）。從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出發，可以看到一條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民主主義革命」接受史。

不過，這個「民主主義革命」接受史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建構的歷史。從1928年台共建黨以來，開始將馬關割台以來的各種反日抗暴稱之為「民主主義革命」。甚至，由於國民革命在大陸上的迅猛發展，當時的台共也將這些「民主主義革命」稱之為「國民革命」。在大陸上，歷史建構從「革命史」與「民族資本主義」兩個方向出發，但主要是藉由論證後者的「不發展」來論證前者的必要性。在台灣，類似的兩種建構只出現在共產國際體系之下的台灣共產黨之中。由於其他流派認為台灣已經（或即將）受日本資本主義支配而資本主義化，所以不可能出現「民族資本主義」歷史建構，也無法出現「革命史」歷史建構。也許正是上述原因，凡是具有「全盤資本主義化」見解（或者承認資本主義取得支配）的資本主義論，都因缺乏歷史建構的能力而難以在兩岸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發揮作用——當然也包括本文所研究的、擁有類似見解的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

2. 如何透過「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革命」改善研究

從民主主義革命（或國民革命）出發，還有利於改善現有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研

究。

目前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最優秀的成果，體現在若林正丈、蕭聖鐵與 Sullivan，以及盧修一的台灣共產黨研究。盧修一的成就在於他的考證，但他未能就運動本身的問題而論之。因此可供檢討的理論性問題很少。至於若林正丈、蕭聖鐵及 Sullivan，則緊扣共產國際的戰略變化而立論。這個變化就是以 1928 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為標誌的激進化。此後，共產國際從跨階級的統一戰線時期，進入「階級對階級」的激進時期。若林據此認為成立於「六大」前夕的台灣共產黨，表現出了兩個時期之間的過渡性質。但本文的研究還可補充一點：使用「國民革命」的台灣共產黨，甚至還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餘波。

蕭聖鐵及 Sullivan 則認為，台共第二次組黨時（即所謂「改革同盟」）所實行的路線，是一條共產國際在激進時期所推行的「布爾什維克化」路線，這一路線的實質目的，是加強國際的控制。雖然若林正丈、蕭聖鐵及 Sullivan 注意到共產國際對於台共所實現的制約，卻沒能注意到台共為何援引中共表述民主主義革命的用語——國民革命。雖然蕭聖鐵及 Sullivan 注意到這個現象，甚至從中發現歷史建構（比方把 1895 年的台灣民主國定性為「國民革命」），卻沒有深究。而「國民革命」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是一個可以忽略或不加深究的存在呢？本文研究所揭示的答案，是否定的。

若林正丈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的方法有三種：（1）當他研究民族主義運動（即議會請願運動）時，是透過「現地權力／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兩者之間的互動來把握運動。（2）但當他在研究大陸上的臺灣人民族主義運動之時，則把「國民革命」視為一種民族主義運動，並以此討論臺灣人對於「國民革命」的參與（其中並包括了以大陸為根據地的台灣社會主義活動）。（3）至於他對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研究，則如前所述，共產國際的戰略變化成為他的主要方法。雖然若林採用的三種方法有其分開使用的適用性和成果。

但以上三種方法卻能透過「民主主義革命」而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中得到統一的理解。因為：（1'）「民主主義革命」必須處理「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是否可以成為革命動力的問題。所以「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在當下就衡量「現地權力／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兩者之間的關係。這種歷史當事人所做的衡量，有利於後人的研究。（2'）「民主主義革命」由於中國革命的影響而取得「國民革命」的代名詞。因此「國民革命」並不只是民族主義革命而已。而還是具有共產國際的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意味。（3'）「民主主義革命」本身就是共產國際意圖貫徹在東方的戰略，但也確實存在變化。但激進化的本質為河？以 1927 年的中國「大革命」失敗與 1928 年的共產國際「六大」為標誌，原來被視為「民主主義革命」之革命動力的「民族資產階級」，終於被踢出去。動力只剩無產階級與農民。

最後，在「國民革命」中實現的國共兩黨「黨內」合作本身也是一個研究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切入點。當時，中共將國民黨視為幾個階級聯盟的統一戰線黨而加入，企圖藉此擴大統一戰線及其影響力。這種「兩黨論」指導下的運動方針其實並非中國所獨有。在日本，遭到天皇制政權瘋狂鎮壓的日本共產黨，在 1927 年前後透過合法無產政黨「勞動農民黨」（1926~1928）開展統一戰線、參與國會選舉。在朝鮮，朝鮮共產黨各

派系也與民族主義者共同組織了統一戰線黨「新幹會」(1927~1931)。在匈牙利，由於1919年革命的失敗，匈牙利共產黨也透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作為公開的合法政黨進行活動。以上這些在「兩黨論」指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有些與「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選擇有關。但在共產國際開始強化「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中，「兩黨論」卻遭到「國際」的批判。「國際」認為，運動的開展不應是共產黨選擇一個統一戰線黨作為掩護或者作為爭取群眾的方式，而應該是共產黨本身實現「大眾化」。

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語境裡，「大眾」的概念在1927年之後開始廣泛流行。將「大眾」理解為無產階級者所在多有。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大眾黨」的概念至少具有三種用法，一是指稱一種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黨。(比方1928年台灣共產黨建黨於上海時，曾提出要將文化協會改組為一種「大眾黨」。日本共產黨所控制的勞動農民黨也被視為一種具有「大眾黨」性質的政黨。)二是指稱一個實際的統一戰線黨的名稱。(比方不少文獻都把前述台共的「大眾黨」主張理解為一個叫做「台灣大眾黨」的黨)三是指共產黨本身「大眾化」之後的性質。(這是共產國際反對兩黨論的結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本身實現大眾化，而不是建立一個大眾黨來掩護自身。)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三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必將成為研究文協左右分裂以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重要切入點，同時也能研究「台灣話文論戰」時期的路線爭論。此外，如果將早期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想法——「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納入考慮，也許更能理解當時社會主義者對於「大眾」的看法。

第三節、通向1927年的道路

如本文所揭示，在1920至1924年之間所出現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大部份都是知識份子，特別是學生。由於這種特殊身分，使得他們多以教會、學校（甚至教會學校）為活動地與庇護地。換言之，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多屬業餘，而非職業革命家。然而這種業餘性多發生在島外，島內社會主義者的職業化程度則更高，舉凡蔣渭水，連溫卿，皆是如此。

因此，當1924年過去，雖然島外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在大陸）有較大的活動空間，然而復興運動的主體，卻始終留在島內。在本文第二章所界定的過渡期（1923年12月的「治警事件」到1927年1月的文協分裂）之中，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有兩條復興的線索，一個是歷盡打壓而存活下來的台灣文化協會，另一個則是「無產青年」的崛起。

1. 許乃昌所批評的「沙上的文化運動」

1923年底，許乃昌在上海發表一則號召青年學生投入「國民革命運動」的文章。如本文第四章所述，許乃昌寫作這篇文章的原因是為了反駁易家鉞（易君左，1898~1972）

關於學生應當「速行讀書運動」而不應參與政治的論點。許乃昌認為，「政治問題若不根本的解決，怎樣能夠讀真正的書呢？」他抨擊易家鉞只是在宣傳一種「可笑的沙上的讀書運動！建設在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甘為奴隸的讀書運動！」⁵³¹

1924年5月，許乃昌在《台灣》發表〈沙上的文化運動〉一文，將反對「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的訴求轉化為適應台灣的運動方針。此時許乃昌的重點並非「讀書」與「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是要求台灣人應該要排除陳舊的中國舊文化與資產階級的日本新文化。因為，「文化經常是依經濟組織的變化而變化，時時刻刻進展的經濟組織將時時刻刻產生新的文化。」所以「不與我們的時代的經濟組織相矛盾的文化，才是新文化、合理的文化。」

許乃昌指出：⁵³²

看吧！我們台灣各處可以看到高大的製糖工廠的煙囪，那巨大的煙囪經常吐出漆黑的煤煙。在那煙囪下面，有許多男女甚至孩童在配合著機器而勞動。這就是說，我們新的文化必須是這製糖工廠實景的反映才對。⁵³³

因此我們的文化運動不單要排斥日本的資產階級文化，也應該開始反抗橫臥在我們面前的污濁的「五千年的文化」，並且要有為創造新的文化而戰鬥的鮮明意識。在此將會有美麗的文化的花朵開放，新的人類歷史的一頁由此展開。

「新文化」不是既有的存在物，必須在現代的物質基礎上、在鬥爭中得來。雖然此文之討論主題是台灣文化運動的方向，但因當時的台灣社會運動諸團體（無論是文協或公益會等）均訴諸文化以為掩護，從此文也可視為一篇號召社會主義者投入政治鬥爭——也就是山川均所謂「方向轉換」——的檄文。

三年後，連溫卿（1895~1957）在〈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中評論這篇文章為台灣「要求大眾文化的萌芽」。⁵³⁴連溫卿發表此文於《台灣民報》的這天，正是台灣文化協會召開臨時理事會的日子——1927年1月2日。就在這天，以連溫卿方案為底稿的新台灣文化協會會則通過，文協「綱領」改立為「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這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次重大轉折。1924年的許乃昌也許未能預見這樣的變化，然其努力不但預示了變化本身，也成為了實現變化的前提。許乃昌向（密切聯繫於文協、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雜誌投稿這篇文章，或許也是想在文協之內促進某種改造或發出變革的警號。——雖然這一改造或變革的來臨，並不及時。

如果許乃昌的〈沙上的文化運動〉——如連溫卿所見——是台灣社會主義者從文協內部爭奪領導權的「萌芽」，那末許乃昌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見本文第五章的討論）便可謂社會主義者在文協外部開展新路線的警號。同出於許乃昌之手的這兩篇

⁵³¹ 乃昌，〈學生運動的啟蒙——駁易家鉞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覺悟》，1923年12月14日，第4版。

⁵³² 沫雲，〈沙上の文化運動〉，《台灣》，第5年第2號（1924，東京），35~38。

⁵³³ 許乃昌在另一篇文章中有類似的說明：「看呵！看那製粉工廠的大而且高的煙筒，騰騰地吐出暗黑的煤煙出來了！現社會的惡魔正在這黑煙中沉沉地演死的跳舞！唉！唉！」見：乃昌，〈平民的慘死〉，《覺悟》，1924年1月10日，第4版。

⁵³⁴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927，東京），12。

文章，也許更反映了形成過程中的台灣左翼運動與著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之間的競合關係。更不可忘記的，則是許乃昌在 1926 年底至 1927 年初同陳逢源在「中國改造」問題上所發生的論爭。左派以許乃昌為核心，糾集翁澤生、蔡孝乾等人，向右派陳逢源發起了總攻。在文協即將分裂的前夕，中國改造論爭為左派的奪權形成輿論準備。⁵³⁵誠如連溫卿所云：⁵³⁶

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極其多忙長成起來，遂見有兩個潮流的對峙，先是為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亘三箇月間，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因為有這兩個潮流磅礴了台灣，送給台灣文化協會釀成分裂的動機，而使民族主義者總退卻，即結成了勢力組織著「台灣民眾黨」，以和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自是以後，從來少數者的運動，即變作大眾的運動……

2. 無產青年的崛起

如果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島內核心幹部基於台灣社會問題以及社會主義的興趣而發生的集結。那末，幾乎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同時成立的「台北青年會」，就是蔣渭水與連溫卿向文協以外的底層青年——更正確的說，「無產青年」——招手的一次嘗試。其實，早在「無產青年」興起之前，蔣渭水便開始指導校園內的「騷擾事件」，推動校園反日活動。風潮起於 1922 年 2 月的台北師範學校學生，「這些學生中的主要份子，都是經常出入文化協會幹部蔣渭水處，受其指導，進行研究的人。」⁵³⁷後以 1923 年 7 月 30 日翁澤生大鬧集美學校同學會為標誌，宣告了「無產青年」的興起。「這些行動不容置疑是無產青年團體的宣傳活動；由十數名預謀者有計畫地加以發動，從同學會退出後，翁澤生、洪朝宗、鄭石蛋等十數人立即往江山樓與蔣渭水、王敏川、許天送等人會合，就青年會組織事宜協商。之後寫成台北青年會宗旨書與會則草案並接受文化協會幹部的指導，進行組織青年會的籌備工作，聲稱八月十二日舉行創會式。」。他們最初的組織叫做「台北青年會」。也許連溫卿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激起「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的論斷，就是這樣來的。

此時距離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僅僅一周而已。雖然「台北青年會」的結社計畫，立遭當局以《治安警察法》取締（1923.8.11）而無疾而終。然而「無產青年」卻以「台

⁵³⁵ 相關研究可見：邱士杰，〈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上）〉，《批判與再造》，第 20 期（2005，台北），26~38；邱士杰，〈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下）〉，《批判與再造》，第 21 期（2005，台北），26~40。同文並收錄於《史繹》，第 35 期（2007，台北），69~140。

⁵³⁶ 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概觀〉，《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東京），15~16。

⁵³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28。

北青年讀書會」、「台北青年體育會」的名義開展組織工作，「仍舊在連溫卿、蔣渭水等文化協會幹部之指導下進行活動」。⁵³⁸實際上，1924 年以後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就是「無產青年」。1926 年，無產青年組成了無政府主義的「黑色青年聯盟」；1927 年，無產青年協助連溫卿奪取文協領導權；1928 年，另一部份的無產青年在上海組織了台灣共產黨。

從《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看，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形成之初，起了比較顯著的指導作用。然而最終使無產青年成爲一股足以奪取文協的政治力量的人，卻是連溫卿。連溫卿在無產青年形成初期的作用，是個值得與蔣渭水相比較而同時探討的問題。就史料所見，蔣渭水所贏得的欽慕最多、最顯著，此與連溫卿形成了對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謝玉葉之事例，可略爲說明：⁵³⁹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生謝氏玉葉，不上學而時常出入文化協會辦事處，詢問其理由時，毫不怯懦地回答說：「蔣先生等的意見很高遠，令人不勝感激。我和其他很多朋友加入了文化協會。雖然現在的台灣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下，但不久會歸入台灣人的手來統治」。……

然而最終領導無產青年奪取文協領導權的人爲何仍是連溫卿？一種可能的原因是連溫卿對於台灣社會上的「不良少年少女」的關心。也許只有連溫卿，才真正看到「不良少年少女」有可能轉化爲推動社會變革的「無產青年」。另一種可能的原因則是連溫卿與山川夫婦所建立的關係。山口小靜當年的返台，建立起連溫卿與山川夫婦之間的聯繫；連溫卿本人。也在 1924 年 4 至 5 月前往日本旅行，當面拜訪山川夫婦。無論是從日本到台灣，或是從台灣到日本，都體現了社會主義依靠少數先覺者而進行傳播、形成聯繫的早期特色。雖然並不能認爲連溫卿壟斷了這種聯繫，這種聯繫卻實實在在地給連溫卿貼上標籤，或者替他背書。所以連溫卿總被視爲山川均的台灣門徒（或者負面用語：「落胤」——私生子），總被視爲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但連溫卿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個「山川主義」者？這個問題實需再行探究。

前面提到的謝玉葉（葉綠雲、謝玉娟、謝志堅、玉鵬），後來成爲翁澤生的妻子，並共同參與台灣共產黨的建黨。雖如翁澤生、謝玉葉這些早期的台灣激進青年最終都成爲比蔣渭水、甚至比連溫卿更激進、更爲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者。然若文化協會並未在連溫卿指導下而發生 1927 年的左右分裂，蔣渭水又將對這些青年起到什麼作用呢？雖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葉榮鐘曾「惋惜」云：⁵⁴⁰

⁵³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12。

⁵³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33。

⁵⁴⁰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383。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改成：「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及日共山川派系連溫卿的牽制與蠱惑下，思想發生變化，行動也自難免有出軌的行跡。於是自然而然與由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形成對立。初時因總理林獻堂的權威與聲望，足以抑制雙方對立的激化，文化協會的活動還不致發生問題。及至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的時候，由於修改章程

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及日共山川派系連溫卿的牽制與蠱[蠱]惑下，思想日趨尖銳，行動也自難免有遷就的行跡。於是自然而然與由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形成對立，但是初時因總理林獻堂的權威與聲望足以抑制對立的激化，源此協會的活動也不致有阻礙團結的情事。及至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的時候，由於修改章程的提議成立，遂導致分裂的破局。葉榮鐘雖然語帶批評，卻也肯定了一件事，也就是蔣、連兩人的思想相近性，以及兩人對於無產青年的指導地位。雖然「無產青年」並不等於「台灣社會大眾」。然而「無產青年」的出現，不但使運動主體從「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向下轉移，並使社會主義從既有的社會運動之中抽離出來，而逐漸成為獨立於既有的社會運動之外的新路線。此間過程，無論自覺與否，蔣渭水與連溫卿始終參與其中。

不過，即使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 1927 年得到復興，運動的形式卻未能發生轉變。「轉變」是同海峽彼岸的革命運動相比而論的。在大陸上，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自始就出現「民眾運動」（社會運動）與「武裝鬥爭」兩種形式。兩者的差別不僅僅是常設性武裝及其鬥爭是否存在，還包括是否出現「根據地」（如廣州國民政府）。中共直到 1927 年之後才開始拿起槍桿子進入「武裝鬥爭」並建立「根據地」。後來甚至建立起蘇聯以外唯一的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埃。

對於日本及其殖民地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而言，只有朝鮮因為地近大陸，所以稍有武裝鬥爭。但台灣及日本卻始終無法從「民眾運動」（社會運動）轉化為「武裝鬥爭」，更遑論是「根據地」。這種侷限，可能來自於地域過分狹小，也可能來自於日本國家的強大鎮壓力。對於一九二零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而言，這種侷限所造成的危機，宛若無法擺脫的宿命。但也恰恰是在這種持續不絕的危機中，運動渡過了他的一九二零年代，乃至更久。

3.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馬克思在其十七歲時，曾寫下一篇作文。他是這麼說的：⁵⁴¹

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衝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

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

的提議成立，遂導致分裂的局面。」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338。

⁵⁴¹ 馬克思，〈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馬克思的一生正如這篇作文所述，早在少年時代他已經思考著這樣嚴肅的問題：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以十七歲少年的領悟，那是何等的純真。而更可貴的是，護著這分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作品中。」⁵⁴²人生是有限的，馬克思也無法逃脫這個自然律。然而馬克思以及他的先行者與後來者，卻共同在實踐中走一條最終讓世界各地的被壓迫者也走上道路。走上這條道路的革命者，也把他們有限的人生，珠玉般地鑲嵌在這條尚未走向盡頭的大路上。

在 1920 年到 1924 年之間，殖民地台灣的少數先行者也開始走向這條大路，甚至想要引領全台灣人民一起走上去。雖然這條道路很曲折，但畢竟從未中絕。「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歷史還得從 1924 年之後繼續寫下去。為了彌補先人的遺憾，其中一章的開頭必須是這樣：

台灣共產黨的歷史，在中國歷史學上是一個「空白」。我們中國人，從來沒有人有系統地寫過台灣共產黨的歷史。……

——蘇新，〈台灣共產黨的歷史〉，1981

⁵⁴² 林書揚，〈遲來的春天〉，收錄於氏著，《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179~180。

餘波：「蠹魚」的旅行日記 ——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引言、連溫卿史料的保存與翻譯的狀況

連溫卿於1924年赴日期間的經歷，俱以日記的形式保存下來。這份日記與著其他的連溫卿遺稿，均收存於連溫卿的琉球籍好友、學者比嘉春潮（1883~1977）手中。在戴國輝（1931~2001）教授發表於立教大學《史苑》學報之〈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及其稿本〉一文裡，⁵⁴³他回憶起比嘉春潮與他的交往及自身追索連溫卿史料的過程：⁵⁴⁴

筆者之所以能發現連溫卿的日本關係人物，乃在於一出版就讀到勁草書房出版的《山川均全集七》（1966年8月），並以書內的〈殖民政策下的台灣〉的編者註為契機：「本篇頗得力於山口小靜小姐在台灣的世界語運動同志連溫卿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不久之後，更得到池田敏雄先生（平凡社）的指點，得知沖繩出身的碩學比嘉春潮老先生的傳記《沖繩的歲月——從自傳式的回想說起》（中公新春1969年3月）裡面，連溫卿以R先生之名而出現，於是委託友人中村女士設法安排訪問比嘉翁之事宜。終於在1972年7月5日及1973年2月24日兩次拜訪並進行訪談。

第一次訪談時，得以借到連溫卿於1954年9月28日寫給比嘉翁的信，以及〈結束旅行之人的日記（旅行を了りたる人の日記）〉（1930年）。當時比嘉先生說：「連先生有一疊尚未發表的稿本在這裡，但不曉得收到哪裡去了。」

記得是第二年（1973年）年初，經過中村女士，比嘉翁說他找到了那份稿本，問我要不要去看，於是便利用借閱稿本的機會，再謀訪問的機會。

當時所得到的稿本就是這裡所發表的〈日本殖民政策在台灣之展望（台灣に於る

⁵⁴³ 戴國輝教授的這篇文章，迄今仍是關於連溫卿史料及生平最翔實的介紹。以這篇文章為基礎，1983年在《夏潮論壇》上發表了中文的連溫卿生平介紹。日後張炎憲所撰之〈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一文，亦未能超越戴國輝更多。見：彰生，〈日據時期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夏潮論壇》，第1卷第3期（1983.4，台北），58~61；張炎憲，〈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收錄於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361~369。

⁵⁴⁴ 戴國輝，〈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35卷第2號（1975，東京），59~60。

日本植民政策の展望》(文末記有「1930年8月13日」之語以及「先送改造社內」的紅字。此處刊出時，已經題目改為〈在台灣的日本殖民政策之實態(台灣に於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以及回歸祖國之後執筆的〈土地收奪過程〉、委託出版的「內容目次」和作為樣本之一部份的〈第六節 收奪的進化〉等三份稿本。從前述之連先生致比嘉翁信函以及委託出版之樣本的引述來推測，似乎連溫卿將他在戰後以《日本統治期間在台灣所執行的土地收奪過程(日本統治期間中を通じて台灣で行はれた土地收奪過程)》為名的著作，委託舊識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之世界語運動者山鹿泰治與比嘉春潮，去安排發行出版之事宜。

在另一篇文章裡，戴國輝教授則有這樣的說明：⁵⁴⁵

……當年比嘉已是九十歲的老翁。但他的記性絕佳又健談，讓我受益良多。日後我將邂逅的經緯詳述並把比嘉貸給的連溫卿未發表稿件加以校訂刊登出來：有(1)〈台灣抗日左派領導人連溫卿及其稿件〉。(2)連溫卿著〈日本在台的殖民政策之實況〉(同時刊登於《史苑》[立教大學史學會的半年刊]第三五卷二號，七五年三月)。(3)連著〈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掠奪土地的過程(一)〉(《史苑》第三七卷一號，七六年十二月)。(4)連著〈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掠奪土地的過程(二)〉(《史苑》第三九卷一號，七八年十一月)。(5)連著〈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之三十三天〉(刊登於和(4)同號之《史苑》)。

比嘉翁另外提供我連的中文〈蠹魚的旅行日記——一九二四年〉的稿件。因是中文，我不便刊登於《史苑》。盼望最近的將來能找出來公諸於世。

戴國輝教授所已校訂發表的上述連溫卿史料，目前均有中譯本或中文版可供參照。⁵⁴⁶然而直接記載連溫卿於1924年訪日期間的史料——〈蠹魚的旅行日記〉——卻迄今尚未「重新」公開發表。

第一節、〈蠹魚的旅行日記〉文獻解題

關於〈蠹魚的旅行日記〉，戴國輝教授曾指出：⁵⁴⁷

⁵⁴⁵ 戴國輝，〈旅日時台灣史料及資料的蒐集與運用〉，收錄於戴國輝著、林彩美主編，《台灣史研究集外集》(台北：遠流出版社，2002)，35。

⁵⁴⁶ 分別是：連溫卿著，佚名譯，〈日本對台殖民政策的真相〉，《台灣思潮》，第1期(1981，洛杉磯)，46~62；連溫卿原著，林勞歸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台灣風物》，第36卷第1期(1986，台北)，57~80。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掠奪土地的過程〉，則有連溫卿以中文發表的〈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被收奪的過程〉可供對照。中文版的這篇文章以連載的方式發表於1949年《公論報》的《台灣風土》副刊，章節內容與日文版有所出入，此間細緻的差異，尚待比較。

⁵⁴⁷ 戴國輝〈連溫卿の二つの日記〉附錄於連溫卿〈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39卷第1號(1978，東京)，99。此處中譯文則採用林勞歸(林書揚)的譯文，見：連溫卿原著，林勞歸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台灣風物》，第36卷第1期，80。

連氏另有一本用中文發表的「蠹魚的旅行日記——一九二四年」。予以登載的是那家報社尚屬不明，不過從比嘉翁所提供的剪貼簿上的剪片和附在卷首的黃希純的介紹加以推測，可能是中國大陸上發行的報紙之一。將來把本誌所載之一連論文與本日記合訂為一本時，予[預]定也把該日記照原來中文予以再錄其中。

如戴國輝教授所介紹的，原來收藏於比嘉春潮先生那裡的〈蠹魚的旅行日記〉，實際上是個剪貼本。是連溫卿（使用筆名「越無」）將日記投稿到某報紙之後，分期連載，然後依次剪貼成一本。在這系列連載的首篇裡，由「黃希純」所撰寫的引言透露了一些相關線索：⁵⁴⁸

越無君。帝國主義壓逼下之弱民族也。與予為精神交。數月前嘗以是編日記郵示。且屬為之發表。惜屢以時事見阻。延擱到今。誠負君多矣。君本漢族。年富願宏。致常為強魔所嫉忌。一切天賦的自由。幾盡被蹂躪。此雖可目之為被征服的民族對其所謂「主人翁」應有之義務。然按之正誼。殆適得其反。而夫已氏之狐惑伎倆。亦往往露其破綻。君子竊羞之。彼日以「人道」「親善」「解放」等名詞作口頭禪以蠱其民眾者。清夜以思。曾亦啞然自笑其失也否耶。邇值報業復版伊始。謹為之弁敘數言如左。以介紹於讀者，並藉向越無君道褻慢之歉忱。

十三、十一、十二、黃希純、[。]

線索之一，首先即是「黃希純」這個人。據侯志平所編〈中國世界語運動年表〉，1922年9月以後，「廣東黃希純在《台山童子軍》雜誌上編輯『世界語主義專欄』(La Esperantismo)。」⁵⁴⁹從「世界語」這層關係來考慮，「廣東黃希純」極可能就是寫下上述引言的「黃希純」。⁵⁵⁰因此，戴國輝教授關於此系列連載發表於大陸報紙的推測，可信度是很高的。線索之二，則是引言所謂「邇值報業復版伊始」一語，這一線索卻暗示〈蠹魚的旅行日記〉實連載於一份剛復刊或剛復版的報紙，且連載必晚於1924年11月12日。

接著來關心《蠹魚的旅行日記》的結構。其連載編號自第1回始，第105回終，記錄了連溫卿首次赴日期間（1924年4月26日離台，5月20日返台）的種種記聞與心得（見表2-2）。其中第78回重複兩次，因此連載實際共有106回。倘若當時連載於日刊，至少將達三個月。

連溫卿採取日記的形式寫下這份長文，然而4月28日、5月8、9、10、11、15日在比嘉春潮的剪貼本中是不存在或無法判別的。以4月28日來說，由於4月27日與29日之間的連載編號沒有中斷，因此4月28日確定是空白的。換句話說，這份刊行出來的日記——無論是作者連溫卿的因素或刊行者黃希純的原因——並非日日均記。以此為前

⁵⁴⁸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一回。

⁵⁴⁹ 侯志平編，〈中國世界語運動年表〉，收錄於氏編著，《世界語運動在中國》（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85），29。

⁵⁵⁰ 關於黃希純，1922年至1923年間，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文學旬刊》亦有同名作者翻譯或詩作。有可能是同一人。另外，在中國國民黨黨史上，也有一位同名的海外華僑，1911年曾任中國同盟會加拿大支部支部長，是否為同一人，尚待考察。以上見：賈桂芳編，《文學研究會資料》（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116、1118；〈黃希純〉，收錄於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2064。

提，加上比嘉春潮的剪貼本漏貼數回，因此 5 月 8、9、10、11、15 日在這份日記中的記錄狀況，其實無法確切判定。日日均記的可能性恐怕較低。只有尋得刊行這篇日記的原刊物，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連溫卿所寫的這篇日記非常不容易解讀。問題可分幾個方面：

首先，雖然這是一篇基本上以漢語白話文寫作而成的日記，然其語法乃至漢字的運用，必須時時兼以閩南語才能加以理解，其中甚至還包括不少日語漢字辭彙。換言之，倘若缺乏閩南語以及日語的背景，將不容易閱讀這份史料。

其次，連溫卿的這篇稿子是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書寫的。連溫卿常在觀察到某些現象或實況之後，大加議論一番；加上有時針對不同的現象提出類同的見解，因此從中體現的思想見解總是零碎不堪。連溫卿對此寫作方式實亦深有檢討，「我的話思著就寫，所以常常脫出歧路，……但總要後退數步，才能繼續前話」。⁵⁵¹這些論說文字的長短不一，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感到累沓難解，乃是勢所必然。

其三，連溫卿的這篇文稿常有第一、二、三人稱混用的狀況，加上文中標點符號的排版錯落不一、文章剪貼不全，連溫卿又常以化名代稱所記述的對象，更容易導致讀者不易知曉連溫卿的敘述脈絡。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化名也是殊難破解的難題。

倘若將《日記》與連溫卿日後所撰寫的其他文章結合起來看，那末《蠹魚的旅行日記》簡直可謂那些後續著作的祖本（見表 2-3）。若欲探究連溫卿如何延續或改變其思想，細緻地針對《日記》及其後續著作進行比較，將是不可迴避的任務。

第二節、向著五一節的東京而去的蠹魚

1. 在前往日本的船上（4 月 26 日～30 日）

4 月 26 日，這是在大雨中揭開序幕的一天。

上午十一點多，連溫卿告別還在病榻上的父親，在母親的送別中離開台北。雨還是下個不停，坐在母親叫來的人力車上，耳邊不斷傳來紛雜急促的聲音：⁵⁵²

那車衝雨驀進，我坐車中覺腦袋裡還是空空虛虛，沒有甚麼離愁別恨的東西，只聽得雨落幌上，「浙瀝的」作響，除了此聲以外，又有輪輦和大地摩擦聲音，和車夫「踢踏」聲音，直透我的耳神經，好比促我緊行的命令一樣。我在途中沒有別的念頭，但我這回到了京中，一定要那樣做去，這樣做去的思想，時時衝出腦裡來，不一時又消滅去了，沒有甚麼結果的，接踵又衝出那個[恐]怖的思想來，促我的注意，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⁵⁵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六回。

⁵⁵²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五回。

由於連溫卿所服務的南國公司裡的一小廝，在前幾日不慎向便衣憲兵透露了連溫卿的訪日行程，才致使連溫卿產生這般患得患失的恐怖情緒。他忿忿地想：⁵⁵³

量是有參加甚麼政治運動或其他的團體，總是[在]法律範圍內面⁵⁵⁴[裡面]，已有所容認的，此番旅行全屬個人，設使被了官憲誤解為我帶有甚麼政治的，或其他的色彩，於我個人的事業難道也不能成功的嗎，而不受他阻害，這是我不要官憲知道的緣故呢。我又轉來[回過頭來]想想，這班忘八的瞎馬知道我這回的旅行，他若不論那是個人的，也是有甚麼的，總要起了野蠻人的吠，皂白不分，要怎麼呢。我想他必定有對待束縛我的手段，是故不可不先籌一個好好計來抵當[抵擋]他才是……

還在想著，連溫卿已抵達了台北火車站。他要就此乘車至基隆港搭乘「亞米利加丸」赴日。⁵⁵⁵

……我向車外遂與 E 君道別[。]那車筒上嗚然一聲啟行，此時不知什麼緣故，悲哀的觀念抱住我的理性，幾乎就要迸出熱淚來。……及身子坐定以後，思之不覺自笑自憫起來，為甚麼那霎時間能變得那麼的狀態……

到了基隆，連溫卿首先至 N 公司（南國公司）⁵⁵⁶的基隆出張所拜託 T 君購船票。才上船，馬上就有水上警察來訪，幫他換了個較好的二等艙。⁵⁵⁷

4 月 27 日，晴天。連溫卿起床後，讀了讀山川均的新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想起了山口小靜。在船上，他遇見一位舊識 C 君。連溫卿與 C 君，是在連溫卿因社會問題研究會違反出版法而在高等法院受公判的三月時認識的。他並認識了來自新竹的「禾某兄弟」——「兄焜君是中央大學學生，弟霖君是北京大學學生」——顯然，此兄弟即蘇惟焜與蘇維霖（即蘇蕪雨）。此外，他還認識了 H 氏三兄弟、「卓雨階氏之子 K 君」和「獻氏之甥屯君」。⁵⁵⁸

在連溫卿的籌畫下，當晚舉行了場台灣人茶會，有二十多人參加，多為學生。會上才知，H 氏三兄弟原以為連溫卿是「總統[督]府」派來調查留學生的日本刑事，自此誤解始消。連溫卿想：⁵⁵⁹

似不知被誤認為偵探的人，反受真正的偵探尾行，這不是趣味的事麼。

4 月 28 日，連溫卿未留日記。

4 月 29 日，晴天。船已進入福岡的門司港。連溫卿收到一封昨夜由 S 君（謝文達）

⁵⁵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六回。

⁵⁵⁴ 「內面」：閩南語。

⁵⁵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六、七回。

⁵⁵⁶ 蘇新指出，連溫卿「青年時代曾在台北的『南國公司』（當時一家經營台灣—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公司）任高級職員。」見：蘇新，〈連溫卿與台灣文化協會〉，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100~101。

⁵⁵⁷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八回。

⁵⁵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十三回。

⁵⁵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四回。

⁵⁶⁰從東京拍來的電報，催促其一定要來東京。連溫卿與蘇氏兄弟等人原欲登岸參觀，卻因他們的臺灣人身份而遭水警滯留調查。⁵⁶¹

雖然日記缺少第 17 回，但從第 18 回來看，連溫卿一行人還是登岸了。按文中所述，蘇維霖即是欲於此處下船；而連溫卿返船之後，則將朝著賴戶內海前進。⁵⁶²

2. 從神戶到東京（4 月 30 日）

4 月 30 日，晴天。上午九點，「亞米利加丸」進入了神戶港。在準備登岸的過程中，水上警察特別針對連溫卿進行檢查，引起船上人們的目光。檢查行李時，水警甚至連木瓜都要檢查。登岸後，一行人遂前往「亮君」處拜訪，連溫卿也因此回憶起自己的家史：
⁵⁶³

亮君二十餘年前曾在台灣，在台灣稔識我父，二十餘年前，我的家庭是何等幸福，那時候我的父親可是北部屈指的大商人，然今已零落久矣。而二十餘年前——當我七八歲的時候——一個落魄者[亮君]，由中國至台灣，由台灣而之神戶，以期挽回失遇，而今他雖不至大商人，已是一店之主，……然我不意在此能聞得這樣懷舊的話，焉不得感慨起來，……

此間，又換了個跟監的刑事，蘇惟焜索性叫他帶大家去導覽市區。⁵⁶⁴

當天下午一點四十分，決定先經大阪去京都逛博覽會的連溫卿一行人抵達京都。此時又換了個刑事。交接時，大阪刑事又云，可請京都刑事陪你們逛博覽會，「我聽了，覺他們猜事甚是機敏，只點了頭，就下車了。」逛完後，要離開京都。連溫卿托蘇惟焜去郵局拍電報給謝文達，通知連溫卿將於次日早上八點三十五分到京。並旋於晚上 7 點 38 分於京都站出發。在車上，肚子痛了起來，連溫卿遂拿出木瓜與蘇惟焜分食，希望木瓜有助緩解腹痛。只是，火車的晃動還是讓他不易入眠：⁵⁶⁵

頓醒時，向後一瞧，那尾行的刑事，兩個眼睛像著電球不少減的光耀。連溫卿觀察到，各地刑事交接有其按照地域之別而分配的原則。但在這種交接與監視中，連溫卿也成了火車旅客的焦點。⁵⁶⁶

⁵⁶⁰ 連溫卿曾云「我的友人 S 君是飛行家」，可見 S 君即「謝文達」。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三回。

⁵⁶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六回。

⁵⁶²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十九回。

⁵⁶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回。

⁵⁶⁴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二十四回。

⁵⁶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二十六、二十九回。

⁵⁶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回。

3. 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5月1日）

5月1日，天氣晴。

上午8點35分抵達東京站，卻沒碰到謝文達。新來跟監他的刑事，幫他拿行李，卻又帶著他亂繞。浪費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目的地：⁵⁶⁷

……轉入一小路，約再行百步許，見牆圍的門上掛著「□□□□[台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的招牌，步入內門上還有「□□[台灣]青年會」及「□□[台灣]雜誌社」的招牌掛著，及推開門，則K君和R君立著說，來得好！來得好！我們在樓上看見你來，K君目著了我，又轉視那刑事，說他是你的朋友麼，我說不是不是，他是個狗啊，……

K君疑惑，何以連溫卿沒在車站遇到早上六點就出門的謝文達。但K君與連溫卿並未選擇留在社內等待謝文達：⁵⁶⁸

K君說今日是閑散的，可與我共遊，今日是人日，有勞働[動]祭，⁵⁶⁹我兩人欲往觀此，遂即出門，搭了電車，在途中乘換一次，到了上野公園前下了車。時午前十一時半，上野公園是拿一個圖造就的，觀岡上沒有甚麼異常光景，g君說那示威遊行，還不能即到，所以人們也不團集起來，我們可先往咖啡店，用了午飯再去觀看罷，而那咖啡店的女茶倌很不親切，用了飯擬再飲著咖啡，呼之，像沒有聽著的，而又遲遲不來，我們拿錢置在棹[桌]上遂出，往岡上吃卵冰去了，[。]

但在大馬路上，卻全然感受不到遊行即將開始，或將經過此處的跡象：⁵⁷⁰

在大路上看見行人沒有什麼豫兆，使人能夠推想那示威遊行一定能從這兒經過與否。不若再往山麓看了形勢，也是問了個消息，以決我們的行止。及到了山麓，那樣子依然是和山上不異。報紙的報導是正午十二時從這兒經過，在岡上再集合然後解散的豫定，但今已下午將近二時，恐迫是變更了豫定，也未可知。欲向他問一問，然在這兒往來的人們，誰知道那個事情，我們是不能猜定的，這時候覺得自己孟浪，空費時間在[山]麓一往一來，恰適躊躇之間，忽到了一個電車，走出十幾個的巡警來。這時候我們也無意識中[，]無言集注視線在那群巡警身上，看見他們耀武揚威，揚揚然由坂上步登岡上去。K君始向笑說，風來必有雨，我們可隨後去罷！他們都進入自治會館內，又返步，在那會館前後一巡，見了巡警陸續到來，也有步行的，也有乘自轉車的，也有乘自働[動]自轉車的，都到了自治會館就沒了形影。

⁵⁶⁷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一回。

⁵⁶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二回。

⁵⁶⁹ 「五月一日（May day「人日」），就是「勞働[動]祭」日，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北美「市加我」市，開國際的和國民的八大會議，決定每年五月一日為期，為實行八點鐘制度，而舉示威遊行，總同盟罷工。於是一八八六年遂為世界第一回的實行，這就是「五一」的起源。今年[1924年]東京的「五一」也熱鬧的很，參加人員將近數萬。」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924，東京），16。

⁵⁷⁰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三回。

原來這是遊行即將抵達的徵兆：⁵⁷¹

我們已明白這是「非常召集」，那末遊行將到矣，乃決在公園正面的石塔[階]的傍邊等一等，及至了正面，也不知何時來了個交通巡警，站立在那石塔[階]整理著往來的人們，這時候人們在公園內獨集，已暫暫增加起來了。

……忽傳來一句話「遊行將到矣」，這是第三次的，覺得人們大噪起來，即從岡上瞰[瞰]下山麓及公園對面那條大路上，看見在那地方站立的人們都紛紛蜜[密]集堵列起來，霎時間那條大路上的兩傍立著「人」的牆垣一樣，而山麓至岡上都被人們站立著如蓋上在的，表出「人山」那句話的議[意義]的光景。

在自治會館內的巡警[，]已於一時間前各以三四十人為一隊，陸續從墳上下來，駐在那山麓和那條路傍，「遊行到矣」這句話一傳來，即看見那巡警分隊堵列在人們的前面，少久，見了沒有那的形勢，巡警又分散在路傍休憩，這時候和從前二次的堵列是不同的，見他們的面都緊張起來，兩個眼睛眦裂甚大，他們的左手力握著劍柄，造出一種雄壯的零圍氣⁵⁷²[氛圍]，令人振奮，而我左右前面的人們各伸頸遙望，或說「那遊行已到了某處，再一轉街道便得到來」，或說，「你不看旗影在那兒麼」，既聽了，也隨人們向那條大路上去看，極我的眼界，在那白白坦坦的路上，卻沒有甚麼影子可望，而人們都說著來的，也有只是著，然這時候有從他處來的電車，到了停留場就停止便不稍動了，而一種雄大的歌音微微陣動我的耳膜，使人如在劇場見了掀起幕面那瞬間的狀態，人們反卻寂寞起來了，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都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

那示威遊行將近山麓，而一聲「萬歲」(讀曰琶恩雜以)又作，如白晝以霹靂，天崩地裂一般，在那兒站立的人們都脫了帽子高握手中給那遊行聲援，和那遊行歡呼。這時候民眾的前面雖有警隊堵列，然他們所說的威權也是秩序似不知逃往何處。歡呼之聲又作，**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⁵⁷³[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働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働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

「明年的勞動節一定要在東京舉行！」⁵⁷⁴這是山口小靜於1922年返台時，向山川均所發出的偉願。就在小靜離世後的一年，連溫卿站上了這片小靜所曾期盼的、戰鬥著的熱土。看著眼前雄偉壯盛的階級隊伍、看著漫天翻飛的赤旗與黑旗，連溫卿內心的澎湃與激動

⁵⁷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回。

⁵⁷² 「零圍氣」：日語漢字詞。

⁵⁷³ 「步武」：日語漢字詞。

⁵⁷⁴ 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5卷，201。

躍然紙上。⁵⁷⁵——此時的連溫卿，心中會否想起小靜？

遊行過後，K 君送連溫卿回到雜誌社。⁵⁷⁶這次總算見到謝文達了。⁵⁷⁷謝文達說，他一大早就跑去車站等他，卻沒等到人。而在連溫卿與 K 君觀看遊行之時，刑事竟不斷地騷擾雜誌社，每三十分鐘就來找連溫卿一次。他只好不斷的保證連溫卿住在雜誌社。不過，謝文達不但未在連溫卿回來後阻止他出門，反而帶他出去見東君（比嘉春潮）。⁵⁷⁸

沒想到，到了比嘉春潮的家，比嘉人卻跑到雜誌社找他們了。於是他們只好再等他回來。比嘉春潮說，他直到今天早上九點才收到連溫卿從京都發的電報，出奇地緩慢；然而這種電報一般只需三小時便能送達。但當比嘉想要進一步通知謝文達的時候，他已不在了。於是比嘉就自己跑去東京站等連溫卿，卻也沒有等到他。⁵⁷⁹

連溫卿這樣寫道：⁵⁸⁰

是夜我們雜談至十時餘，恐怕沒有電車，遂告辭了，自台北至東京，在船中四日，在火車中半日，一夜，及至了東京終日勞勞，還不覺著身體的疲憊。這是異常的例。然是夜[]因為想念過去的事[]都難急眠去，[。]

第三節、為了與山川夫婦的見面

1. 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5月2日～4日）

5月2日，晴天。出門之前，連溫卿赫然發現自己的行李少了一些東西，裡面的墨

⁵⁷⁵ 這年五一勞動節後九天，5月10日出版的《台灣》雜誌刊出一則題名〈關於五一勞動節〉的文章。文中記述1923年日本當地的勞動節場景，但對認識1924年的五一來說，或許也有參考價值：「去年[1923年]東京與大阪各約有一萬人參加（其中朝鮮人約五百人）。」「臨急，都是以啤酒箱或肥皂箱疊成演講台。」「穿著工作服的強健的年輕人，在臺上展開雙手怒目演講，台下拍手不斷。一激動，聽眾就一起站起來，大搖工會旗幟，高呼萬歲。其間會宣讀大會宣言。在尚未獲得八小時工作制的國度，要求八小時勞動立法的項目必然列於其中。不承認工農俄羅斯的國家裡，也應該會及時列入承認俄羅斯的條件吧。而在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裡，他們也會高呼「□□□[殖民地]解放」。去年[1923年]在東京就採用了「制定八小時工作制、承認工農俄羅斯、解放□□□[殖民地]」的三大口號。」「演講大會之後，就進行示威遊行。各工會以工會旗幟為前導，各隊分別推出一人擔任指揮，在其領導下整齊行進，行進時，會唱起《國際歌》與勞動歌曲。在日本，遊行隊伍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或左傾嫌疑者，會全部被拘留收押。就如此進行到下一個演講會場，聽講完畢才宣佈解散。這一天，無分主義立場，所有的工會都會參與，所以這一天的共同宣言、共同口號便成為這一個城市、這一個國家勞動階級的共同目標，將成為勞動階級運動的原理與戰術。」見：記者，〈メーデーに就いて〉，《台灣》，第5年第2號（1924，東京），74~75。

⁵⁷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六回。

⁵⁷⁷ 按連溫卿在文中所記，乃是「K君」。但從前後文義來看，應是「S君」的誤排，即謝文達。

⁵⁷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七。連溫卿云：「東君的本姓叫做『比嘉』，而這一字的意思在沖繩說是『東』，所以便宜上以東字代比嘉二字外沒有甚麼意思在。」由此可見東君即「比嘉春潮」。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十八回。

⁵⁷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七、三十八回。

⁵⁸⁰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八回。

水罐也灑沾出來。雖然「籠內籠外沒有絲毫的破損」，但是「籠內物已不翼而飛」：⁵⁸¹

咳，我明白了。若是朝鮮人那籠內藏的東西必是炸彈，抑是爆彈，若是露西亞人那籠內藏的東西一定是不穩文書抑，是宣傳赤化的書籍，然而台灣人的那籠內東西藏的是甚麼？想他們統治者要試嘗嘗這個趣味，將我要贈給他人能吃的東西搶去，這不是因為他們匆匆檢查而拿忘記再要收入來作原因的。台灣的社會，可算是平和了，台灣人的思想可說像我失去甘甘甜甜的東西一樣平穩了，他們可以放心，不要猜疑，而斷送大和魂的優越能力罷！

早上九點，從若松町搭電車到水道橋，再轉火車到終卓、再換電車到瀨田，要去玉川，此處已是東京郊外。連溫卿一行人吃過午飯後近一點，便去訪去年曾在台灣見過面的 K 氏（與 K 君不是同一人）。旋即轉往日比谷公園遊覽。下午五點，回到《台灣》雜誌社。⁵⁸²

回雜誌社後，才知今天刑事來了五六回：⁵⁸³

他說自神戶尾行你至東京交過我，尚未把你的身體交過警視廳，他的責任是對上司不住的。我們聽了悻責他，說你不是個犯人，也不是個罪人，那有將你的身體交過警視廳的必要麼，說了不要理他，他默然退出，……

至此，連溫卿才知曉刑事交接的原則：⁵⁸⁴

至此我始明白，東京驛是日比谷署管轄的，我到了東京驛下車是那刑事的責任。我住的雜誌社是早稻田署轄的。所以他要在我的面前先和警視廳的刑事交代換，然後由警視廳的刑事和早稻田署的刑事交代換，方能完了他的職責，[。]

晚上收到來自台灣家裡問安的電報，「遂即返電謂我無事到京了。」⁵⁸⁵

次日，即 5 月 3 日，早上下了雨。與 K 君會談之時，警視廳的高等刑事突然來訪。（#48）高等刑事將跟蹤他的原因與原則做了一次詳細的說明：⁵⁸⁶

他對我說，你的性質什麼，警視廳全然不知道的，但打總督府已經有通牒來，我們不得不照那通牒尾行你，從來的慣例在內地——在東京不[需]要尾行的人們，住了台灣就受了總督府的尾行很多，若照你所說，未曾有在台灣不受了尾行的人，來了東京就要動起警視廳來尾行的。然警視廳自己也有個獨立意見，你可以被他尾行，待三四日後看見你的樣子什麼、再講究個方法罷。像你入京的第一日和昨日刑事後沒尾行著，警視廳說那二日間你的行衛[為]是不明的。……若尾行的刑事對你有不滿的事情，你可以叫他不要那樣，他一定是聽你吩咐。我是關係政治方面的，受了思想取締係[系]的懇願所以來[打]擾你，這也要你諒解。你若不[接]受了刑事的尾行，其實是[對]你不利，因為刑事每日要報告上司，既尾行

⁵⁸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三十九回。

⁵⁸²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回。

⁵⁸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六回。

⁵⁸⁴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六回。

⁵⁸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六回。

⁵⁸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四十九、五十回。

你不得，便沒有報告的材料，一定要捏造事實，你不住的地方——譬如界[堺]利彥也[或]是山川均的[住]處，他若報告你住了，是[對]你不利的。

午後持續下雨。刑事幾次來訪。本欲訪問 S·R 夫人的連溫卿決定乾脆不出門了，以免「擾阻他的將來」，於是寫了封信給 S·R 夫人，請她有空時找他。不過 K 氏今日回訪連溫卿，「K 氏來訪很惹起我昨日去訪問他的印象，他不在家，他的夫人和我見面後，問我這次旅行是單獨上京，或是帶著家眷的，使我對他躊躇了回答。但他已來，我這次旅行大半的原因都解決了。」從這句話來看，K 氏應是連溫卿訪日的主要會面對象之一。

587

晚上，比嘉春潮與石君（石煥長？）來訪。相約次日至「井頭」地方遊覽。連溫卿忽然想起前天晚上發生的一件趣事：⁵⁸⁸

我說那東京驛的刑事帶了一個單子，寫著我的住址，姓名，年齡，而觀看那「職業欄內」寫著「無職業」三字，我不是無職業[而]是告假[假]來的，想是總督府通牒所以然。石君聽了，便嬉嬉說，「你旅行中是沒有甚麼職業的，所以要那樣寫著」的這時候的樣子。我想那話是不錯，這旅行那是我的職業麼。

5 月 4 日，是個晴天。連溫卿與比嘉春潮、石君、仲曾根（仲宗根源和⁵⁸⁹）、謝文達一同去「井頭」郊遊。下午四點，與比嘉春潮、仲宗根源和、石君分別回到雜誌社。晚上則在刑事的跟蹤下，去銀座喝了麥酒。仲宗根源和向連溫卿轉述了他在獄中所體驗的關東震災，並說明了朝鮮人與社會主義者如何藉機遭到屠殺。⁵⁹⁰

2. 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5 月 5 日～14 日）

5 月 5 日，仍是晴天。因著刑事的持續跟監，連溫卿一度萌生離京返台之念頭。然而日本世界語學會的事務卻讓他決定再留下來看看：⁵⁹¹

我上京的目的，大半已告終了。因為我四圍的情形既是這樣，很使我思出立即回家的意思。本擬搭乘八九日的輪船歸台，而以有人互相勸留，又以 J.E.I.[Japan Esperanto-Instituto，日本世界語學會]欲於十一日歡迎芬蘭公使 RaMsteq 博士 [G.J.Ramstedt, 1873~1959⁵⁹²]和自日內瓦國際聯盟歸國的藤澤法學士，倘若我還要逗留至那時候，那學會也要招待我的緣故，乃決定再滯在數天。

5 月 6 日，晴天。連溫卿去京橋區拜訪友人。⁵⁹³連溫卿思考：與台灣相比，東京是個小得太多的地方，然其警察人數卻比台灣還多，連溫卿認為，「警察人員多是表示那社

⁵⁸⁷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五十七回。

⁵⁸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五十八回。

⁵⁸⁹ 連溫卿文中均將「仲宗根」記為「仲曾根」，實有誤。

⁵⁹⁰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六回。

⁵⁹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六十六回。

⁵⁹² G.J.Ramstedt 是芬蘭首任駐日公使。

⁵⁹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三回。

會上的治安很紊亂。」這是資本主義導致道德敗壞的具體反映，「社會的道德較未發達的地方是很頹廢，所以治安上要那樣多數的警察。」⁵⁹⁴警察實為鎮壓特定的少數群體——境內弱小民族與社會主義者——而大量存在。連溫卿被警察跟監的根據之一，正是他的台灣人身分。不過「他們對台灣的知識是令人嘖飯，可傳為笑柄」，竟然有警察「把台灣人[當作]即是生蕃人的想念。」此外，日本警察眼中的台灣人還是特別狡獪、野蠻的對象。而動輒叫刑事帶他去觀光、叫刑事幫忙付錢的連溫卿則自嘲，「事事都照我指示，連我一日間的電車費，皆誠意代我支出，然若以三四毫的電車費要買我對他的同情，俾我推塞他們所豫想的未開[化]人的性質，未免覺得太廉了。」⁵⁹⁵

5月7日，晴天。「今天半日以上的電車費也是刑事代我支出，午前中往上野公園觀『觀月橋』。」「吃了午飯，攜一個映像機，往日比谷公園遊覽，那映像機是比嘉春潮攜往『井頭』公園拍照的，尚剩餘二葉，俾我出遊，可以照完。」「然後在江戶川公園遊覽，那刑事太親切，時時說他不甚麼疲勞，叫我拿那映像機給他幫帶，我只向他說謝。」這天恰巧是中國的「五七國恥紀念日」，遇上當地中國留學生所舉辦的遊行。⁵⁹⁶回到雜誌社，K君告訴他去年更為激烈國恥紀念日之景況，K君自己甚至還參加了學生佔領中國公使館的行動。⁵⁹⁷

自5月8日至11日間，因日記殘缺而無法辨明具體日期。其間，連溫卿見到了甫出獄的堺利彥：⁵⁹⁸

我們進入門內看見門邊貼住一條白紙，用紅的墨水寫著「社會主義大意，壹毫，」而堺[堺]氏夫人從樓上導我們上去。堺[堺]氏面色黃白點兒，說因為共產黨事件在獄很久的影響，現在稍不健康，適恰「馬克斯主義」月刊初期已出，⁵⁹⁹他拿那月刊問東君[比嘉春潮]看見不看見，[。]我們談話未及十分久，他的夫人又上樓說〇〇組合[工會]的人要面談，遂約再會下樓，適和那〇〇組合人們在內相遇，皆是二十多歲的人。

並且曾去「牛這[込]區」的中國餐館吃炒麵。「咳！這和台灣的不同，是燙油的麵了，可做陪酒的菜，是不能代飯吃的。因為這緣故，枉得刑事在外面多等候點兒。是夜我已不再出去了。」⁶⁰⁰

⁵⁹⁴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四、七十五回。

⁵⁹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六、七十七回。

⁵⁹⁶ 「五月七日，日華二十一條協約最後通牒之日，中國國民以此為國恥紀念日，每年舉行大會，本年[1924年]五七，在東京的中國學生，也在小石川基督教聖公會內開會，聚集的男女學生數百，慷慨悲歌，示威行列到，公使館，至黃昏時無事散會。」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6。

⁵⁹⁷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回。

⁵⁹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八十三回。

⁵⁹⁹ 即《マルクス主義》雜誌，創刊於1924年5月，乃自日本共產黨合法機關刊物《階級戰》改組而來的後續刊物，由西雅雄掛名負責。相關介紹可參見：二村一夫，〈雜誌『マルクス主義』の5年間〉，オンライン版『二村一夫著作集』，<http://oohara.mt.tama.hosei.ac.jp/nk/mxmkaidai1.htm> (accessed 2007/6/21)。

⁶⁰⁰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十二、九十三回。

5月12日，晴天。上午同炳君去池袋找S·R夫人，十一點回到雜誌社，然後又來了個刑事。午後又下雨，日本世界語學會的委員來訪，他同時也是三田新聞人員、慶應世界語會幹事。這位委員找了連溫卿很久，聽說連溫卿一直遭到跟監，遂乾脆向警視廳問到連溫卿的住址。他邀請連溫卿在5月14日去慶應大學演講。不過，管理慶應大學的芝警察署提出但書，「說不令我講演關於政治問題，倘若饒舌著一句也要命令中止。」當天晚上，與□君去I君處。後來仲宗根夫婦也至。「仲君即介紹我給他的夫人，隨這機會我對貞代夫人[仲宗根貞代]說，M娘⁶⁰¹很要望你使真柄氏（界[堺]利彥氏的女兒）學習世界語罷。」⁶⁰²

5月13日，是個涼天。比嘉春潮至，還相機給他。晚上比嘉春潮與仲宗根源和再次來訪，並與謝文達一起去附近咖啡店。⁶⁰³

3. 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5月14日～20日）

5月14日，晴天。上午，謝文達與女僕先將連溫卿的行李帶往東京站。午飯之後，由於跟監的刑事始終沒來，他們乾脆自行至警署報備慶應大學的演講事宜。⁶⁰⁴

因為我不熟悉街道的原故，遲一時間[小時]到了慶應大學，但講演的順序我是在第一番[第一順位]的，為了遲到這時候恰適第二番[第二順位]的正在講演中。A君看見我，即說你很忙，我不予先知道中村君去擾你勞駕，實在對不住。我的演題是「社會的言語性質」，本欲以日語講演，為中村君的希望，卻用世界語講演的，而他做我的通譯。

演講的大意如下：⁶⁰⁵

可以說言語的起緣是由保護自己生存的工具，但到了經濟稍發達時候，那保存自己生命的工具卻要變做侵略他人的工具，是和民族問題相全[相同]。

現在社會言語的性質是一方面排斥他民族的言語，一方面卻準備著自己的言語，要使他民族使用的，這不是一個矛盾麼？

而不知被支配者使用著支配者的言語，只是限於主權上，那有絕滅自己的言語地[的]理由嗎？像民族問題被統治者在統治者社會內。雖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以期博得偌大的幸福，卻不可誤認（犧牲）二字為（絕滅）的意思。言語問題也是這樣[，]所以我說言語問題不可看作感情問題，可以當作社會問題而觀方可。

演講完後，連溫卿向場外刑事告知晚上不再出門。然而連溫卿卻早了一小時吃飯，並與

⁶⁰¹ 文中還有一個「M嬢」，應與「M娘」為同一人，但真實身分尚無法查考。

⁶⁰²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十三、九十四回。

⁶⁰³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十七、九十八回。

⁶⁰⁴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十八回。

⁶⁰⁵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九十九、一百回。

謝文達、炳君坐車回東京站，但連溫卿並未返回住所——他離開了東京：⁶⁰⁶

我和炳君在站內等等，將我的往三宮的車票——午前中購的——給 S 君[謝文達]帶去，不久，S 再入來，我的車票已改札[剪票]了，乃將水道橋的車票換給 S 君，坐在車內等待開車了。S 君突然說，你不可逞身在車窻[窗]外，曾尾行你的刑事打那兒來的，我引身坐定，即有個人從車內行過，這雖不是我的尾行，然將開車時候，說事刑[刑事]要在車調查的。稍頃列車振動⁶⁰⁷[開動]了，我對 S 君炳君只得目禮說謝，這時候天下雨了。

在車上，回顧起這次日本行被跟蹤的情景，也想起匈牙利「乞丐與國王」的故事：人人棄之的乞丐與眾人追擁的國王，究竟誰比較自由呢。這次，算是成功地擺脫了跟監的刑事了，「我想若至了明日，纔知道我已離開東京，那時候不知道他[刑事]要怎麼[辦]呢？」只是，沒能參觀勞動學校仍讓連溫卿覺得是此次旅行的一大憾事。「在黑闇[暗]中火車只是驀進，若細心[]也能辨別雨聲滴滴的聲音，我也坐著睡去了。」就在這列總算沒有刑事跟監的火車上、在夜幕中，睡去了的連溫卿向著神戶的垂水而去，也許這是蠹魚旅行的最終目的、也許是那唯一存著一點光明的所在。那裡住著小靜與他的共同導師——山川均以及山川菊榮。⁶⁰⁸

由於第 102 回漏貼，無法得知連溫卿是在 14 日或 15 日抵達山川家、也無法知曉他與山川夫婦初見面時的狀況。然從殘存的第 103、104 回來看，山川夫婦仍得到連溫卿細緻的記述。在山川家，連溫卿與山川菊榮共同追憶了「J 女史」（山口小靜）的死。山川均讓山川菊榮帶他去逛逛號稱日本第一的舞子公園，但因連溫卿是在避開刑事嚴密盯梢的狀況下進入山川家的，只好再以秘密的方式摸出門去。對於舞子公園，「這公園的特色不過沒有甚麼雜木，遍地都是老年的松柏而已。」但他仍不禁想起小靜：⁶⁰⁹

在這舞子公園，這時候只有我一人，覺[得]很寂寞，若 J 女史在，我想一定和我在這兒飽滿著這單調的光景。

由於當地沒有旅館，連溫卿便留宿於山川家一夜，並與山川夫婦討論台灣問題到晚上九點。⁶¹⁰

次日晨起，連溫卿不禁走到樓上的窗邊眺望對面可見的大海，山川菊榮趕緊阻止了他，以免被刑事看見。連溫卿準備搭上八點五十分的列車返回神戶。離開前，山川菊榮想要送他山川均所寫的新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這正是連溫卿在「亞米利加丸」上所讀的那本書——於是菊榮又改贈以她與小靜、照子共同翻譯的《社會進化和婦人地位》。連溫卿便又避開刑事的監視，別過了山川菊榮，前往神戶登船。

在船上，他想起昨日在山川家看到的望遠鏡：⁶¹¹

⁶⁰⁶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一百回。

⁶⁰⁷ 「振動」：閩南語。

⁶⁰⁸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一百零一回。

⁶⁰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一百零三回。

⁶¹⁰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回。

⁶¹¹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一百零四回。

船將過內海的燈台恰適船內要吃午飯時間，若山川氏夫婦在他的樓上以望遠鏡，欲在這甲板上找我，怎麼能找得出來呢；趕緊吃了，便抓上甲板，船已經離遠了。在船上，仍有不少刑事。連溫卿無暇顧之，只是不斷地回想這次旅程；也如來程那般，不斷想起小靜、想起她的死。終於，到了 20 日，抵達了基隆港。完成了蠹魚的這次旅行。



附 錄



附錄 3-1：〈謹迎新春〉明信片全文考證版

中文原文詳見：許天民，〈台灣人的賀年片〉，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月22日，第8版。文中以花括弧{ }圈起的字句，乃闕漏之處，此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登載的日譯文補上。日文譯文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93~94。

《台灣社會運動史》將此明信片誤記為1923年的賀年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119)，實際上卻是1924年。此由明信片所簽署的年份「甲子年正月元旦」(甲子年即1924年)便知。另外，這張明信片的中文原文也被轉載於1924年1月22日的上海《民國日報》，據此可推知此信實為抗議治警事件而發，不可能是1923年。轉載這張賀年片於《民國日報》的「許天民」，在收錄本文的〈台灣人的賀年片〉之開頭中說：「我的朋友台灣人S君。前日拿一張他給他們的同胞的賀年片給我看。我讀了那片上的文章。也頗為他所感動。現在就鈔在這裡給我們的文弱沉寂的青年們看一看。題為「謹迎新春」。詞云。」以下則接〈謹迎新春〉全文。

同胞呵。我最敬愛的同胞呵。無聊的悲苦的嚴冬過去了。活潑的爛漫的新春開幕了。你們如何還是氣息奄奄貪睡作夢而不醒呢。樹間的蟲鳥都活潑地唱著自由之歌。自由自由。是吾儕之終局。然我輩必須灑血而爭鬥。野外的草花盡爛漫地說著和平之曲。和平和平。是大家之究極。然個個必須奮勇而前進。你們為何還不動。而甘心{沉默}於威嚇高壓之下呢。⁶¹²唉。同胞呵。我最傷心苦悶的同胞呵。數十年來被{日本政府}欺壓的同胞呵。{備受帝國主義威嚇的}我台灣諸同胞呵。無聊的悲苦的嚴冬已經過去了。活潑的爛漫的新春早就開了幕了。樹間的蟲鳥都活潑地跳著。野外的草花盡爛漫地笑著。萬物之靈長。華夏之遺民。焉何還不醒來呢。為何還不敢抬頭呢。

唉。唉。同胞呵。可憐的同胞呵。自由之光是何等美麗呵。和平之花是何等燦爛呵。我們情願與大家灑血流淚而為之奮鬥。

大家有血有淚的大家啊。

趕快起來奮鬥罷。大膽地併[拚]命地去奮鬥。奮鬥。奮鬥。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奮鬥愈猛烈。我們的人生是愈有趣味的。他們的快樂是無可倫比呀。我們不要徘徊不前咧。活潑的爛漫的新春開了幕了。我們絕不要逡巡不進咧。

{甲子正月元旦}

{純鳴者同人鞠躬}

⁶¹² 原句排版為「你們為何還不。動而甘心□□於威嚇高壓之下呢」。「沉默」二字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補上。

附錄 3-2：〈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

——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

中文原文詳見：〈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25日，第6版。文中以花括弧{ }圈起的字句，乃闕漏之處，此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登載的日譯文補上。其中，「如狼似虎的警察」一句據漢人，《台灣革命史》補上。分見：漢人，《台灣革命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123~124；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93~94。

《民國日報》的編者，在收錄本文的新聞開頭寫了一段補充說明：「台灣自被日本佔領後，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在重壓之下，未嘗稍歇，徒以日本的滅口辦法，非常嚴密，故台人自決之聲與熱血，不能發暴於世界，最近台人又因力爭人格民權，為日本駐台總督府所摧殘，拘捕之牒，遍於民間，台人憤極，開華北臺灣人大會，發表宣言如下。」以下則接〈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但其中有不少過激字句在當時的報刊上被刪去。還需注意一點，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的中譯本漏去「援助我們內政運動的台灣諸先鋒」一句。王詩琅的中譯本則完整譯出。

親愛的同胞們，自日本霸佔台灣，我三百四十有餘萬的台灣遺民，可憐的無告的台灣遺民，受了多少日本人的侮辱，官僚的欺壓，軍閥的虐殘，資本家的橫暴，種種痛苦，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前年的大隊軍兵慘鑿[殺]大埔林哆吧唉[咩]數歲[萬]無辜的老幼，{如狼似虎的警察}酷刑彰化無數的良民，種種傷心跳膽的慘聞，是大家不忍聞而又是個個難得忘記的，[。]

又此次我們內政運動的先鋒們，為保持人格，擁護民權，尊重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權，而溫順地陳情於帝國議會，竟被總督府拘禁四十九名，起訴十四名，還有數百名被警官拷問，受警察無端的家宅搜索{，以致人心不安，老幼徬徨街頭}，同胞呀，有志的學生青年呀，你們看這慘無人道{逆盡天理}的日本總督府政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怪物}，反來剝奪主人翁的自由來了{，這誰能夠理解的到嗎}，我們當主人翁的還能忍得嗎，{同胞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趕快站起來團結吧！趕快驅逐這些殘暴無法的官僚吧！}

諸位，我們最親愛的諸位，不願意壓迫掠奪殘虐，願意休戚相關的有為的諸位，總督專政，禍害台灣，到現在已達了極點了，政府暴虐{，軍閥殘暴}，警察橫行，財主恣志，禍害勞苦的民眾，到現在也達了極點了，做人應當享受的一切的自由，一切的幸福，一切的趣味，也都為他們所侵犯，也全為他們所掠奪，也盡為他們所霸佔了，[。]

這樣的蹂躪民權，霸佔一切的自由，掠奪一切的幸福，侵犯一切的趣味，慘無人道而無可申訴，不僅是這回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自身的問題，凡是台灣的遺民，凡是全球的被壓迫的弱少的勞苦的民眾，都應該奮起，都應該一齊奮起，做個很大的運動，一致反抗{我們共同的仇敵政府——軍閥——資本家及其爪牙}，援助我們內政運動的台灣諸先鋒，濟度我們全球的被壓迫的勞苦的人類同胞{，這也正是為我們台灣同胞，為全世界

同胞的生存與自由的，也是要剿滅我們的共同仇敵，解除我們共同的壓迫，追求我們人類共同的幸福，以圖恢復我們作為人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力。}

{全島的同胞們！有志氣的青年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

{我們華北台灣人大會已全體決議，用實力支援貧弱稚嫩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及其期成同盟，務使諸位先鋒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並和他們協力，向全世界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毒辣政治，同時聯合各地同志，共同推翻一切強權，打破一切不自然的制度。}

同胞們！有志氣的學生青年們！全島被壓迫悲苦的同胞們！}

{起來！快起來！快起來奮鬥！各位一齊起來奮鬥。目前正是生死關頭，時間極為緊迫！}

{華北台灣人大會}

{世界語紀元三十八年三月五號}



附錄 4-1：許乃昌，〈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

秀湖生，〈歐戰後の中國思想界〉，《台灣》，第 4 年第 5 號（1923，東京）

一、從混沌的思想界看中國的將來

中國已非台灣的人們所誤認的沉睡中國，現在已經是以思想所組織的主義的激戰地。通常，追求更好的社會是人類的本性要求，其直接手段則非〇〇[革命]不可。一次的〇〇[革命]會使社會遭受極悲慘的莫大災禍，然此一時性的淒慘，卻能產生美好的社會組織。可以說，〇〇[革命]就是社會進化途上一個非經不可的關卡。而行爲——〇〇[革命]——之前，必須有思想爲其先驅。我們可以看出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狀態極端混亂，而其趨勢大部分皆有向左且更左的傾向。研究現在的國情，再觀察這一左傾的思想狀態，不難推測出，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赤色第四階級的革命發生。

二、激烈赤化中的中國裡

前面略有提起的，在小黨分立、並有無數傾向的現今思想界裡，最有勢力、且最認真在嚐試的，是社會主義潮流。追溯其社會主義的源頭，可以遠發於滿清時代。當時由吳嗣微、張靜江以及馮自由等留洋歸來的人們所提倡，但由於當時的民智尚低，勞資二階級之鬥爭還不顯著，加上政府對新思想的管束頗嚴，所以當時對社會幾乎不見影響。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乘勢而大有發展，到了最近，又受俄羅斯破天荒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及歐戰之後急轉直下的思想潮流所影響，加以國內封建軍閥橫行暴虐與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使得國民在思想上大爲變調，其傾向明顯地社會主義化，最終呈現出今日這般濃厚的色彩。在日本因共產主義宣傳之嫌而被放逐的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一到上海就被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聘請爲講師。同樣的，在日本因遭行李大搜查而大爲憤慨的俄羅斯工農政府的全權大使越飛，去年甫至北京，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就帶著學生，爲讚美蘇維埃俄羅斯而召開盛大的歡迎會。現在社會主義的宣傳機構到處公開而毫不忌諱，中學的教科書也有社會主義的推薦文章；若問智識階級誰是他們最崇拜的人物，都一致地舉出陳獨秀（後文參照）與列寧。

三、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

在中國，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遵奉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其領袖則是思想界的權威陳獨秀此人。在其下，有蔡和森先生、孫鐸先生等勇敢的青年闖將在活動著。陳獨秀先生於 1915 年自法國歸來，主編《新青年》雜誌，並與胡適、高一涵等人成爲文學革命的急先鋒，繼而被蔡元培先生聘爲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不過卻因宣傳共產主義的理由而先後三次入獄，並於 1922 年出獄後遠走蘇維埃俄羅斯，最近歸國，現在爲全國無產階級所推崇並勇敢地站在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線；深謀遠慮的先生實乃全國青年所崇拜的第一人，先生所主編的《新青年》自 1919 年以來，已經成爲社會主義運動的機關報，而其發行量長居中國雜誌界的最高位。先生的大雄辯和大文章，正如其非凡的性格，而其誠摯的精神和多姿多采的活動，必將成爲中國青年至大的教訓

與不絕的警鐘。(前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與上海的報紙曾經報導，先生因牽連於這一次的京漢鐵路大罷工而被北京政府逮捕的消息，另一說則是先生已應孫逸仙的電招而已南奔廣東。)

四、今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江亢虎

今日黨(又名共產主義同志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胡南湖先生及鄭摩漢先生乃其中堅人物，其下有五十餘名熱誠的黨員，其中還有八九名女性黨員。北京天津一帶都屬此黨的勢力範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1921年由俄羅斯歸來的張椿年奉莫斯科國際青年共產黨之命而組織的。現在當然是隸屬於國際青年共產黨。總部設於上海，在全國有29個支部，團員至少有一萬二千人以上(據聞這一團體也有二成左右的女性團員)。1922年在上海、長沙、武昌、漢口、廣東等地所勃興的激烈串聯罷工，確有賴於這一團體靈敏活潑的活動。現在的上海南方大學校長江亢虎，乃是社會主義者中被稱為極左翼的克魯泡特金派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最高領導人。先生在前清光緒年間，曾經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因其曾為無政府主義運動奔走，遂被當時的頑固政府所壓迫而不得不亡命美國。辛亥革命之後曾一度回國，歐戰之後又遊歷了歐洲十四國，並在莫斯科滯留約一年的時間以研究蘇維埃俄羅斯。到了去年春天才抱著很大的希望回國。其夫人(德國人)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現在二人恰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相依相輔，成為全國無政府主義的大柱石。

五、社會政策派

立足於現在的制度組織上，企圖在經濟上的弱者與強者之間加以調和的社會政策，無疑沒有馬克思主義那樣風靡一時的優勢。但因提倡得早，所以在中上流階級有著不容忽視的力量。比方胡漢民、汪精衛，以及戴季陶等人，當可稱為這一派的老前輩吧，(戴氏近來已漸左傾)張君勱(南京東南大學教授)、胡適、高一涵、王伯秋(三人俱為北京大學教授)，錢智修、周鯁生等人都是這一派認真的中堅人物，其中胡適與高一涵二位《努力》週刊上有不斷的發揮。

六、梁啟超與東洋思想

梁啟超已是過去的人物，而非現在及將來的人。先生所活躍的舞台經歷了清末到最近的四五年間，其燦爛輝煌雖已是過眼煙雲，然而先生無疑是全中國人所崇拜的近代偉人。事實上，先生在近代中國確有值得崇拜敬仰的貢獻。在暗無天日的滿清時代，從其師康有為為立憲政治之施行而大聲疾呼，不斷為沉默的社會敲響警鐘的人，是先生；為此觸及滿清政府之忌諱而成為國外亡命客的人，也是先生；成為財務大臣、以其靈敏的政治頭腦向中外發揮的，仍是先生；1916年袁世凱一稱帝，由天津奔赴雲南，與革命巨頭蔡鍔共同首舉義旗的，也還是先生。如前所述，先生已非現在及未來的人，但我們不能忽略先生歷來的言行對現在與未來的思想將有很大的影響。如世人所週知，先生是一位偉大的國學者，他是在舉國奔向外來思想的時候，將本土在來的東洋思想用現代科學的眼光加以認真發揮的人。社會上之所有東洋思想之不可忽視的勢力，當然和傳統的關係有其緣由，但由先生之手發揚光大，則是吾人所不可忘卻的。(一九二三、三、一五)

附錄 5-1：許乃昌，〈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

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 4 年第 7 號（1923，東京）

一、資本主義與台灣榨取

當資產階級反抗封建權力而建立資本主義的初期，還是革命性的、戰鬥性的。那個時代的殖民政策是本國本位的所謂重商主義。到了資本主義發達到生產消費品的工業時，資本主義成為和平的和自由的，以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作為經濟上的信條的殖民政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容許自治的自由貿易主義。當資本主義將生產機關發展成為生產的工業——鐵工業時，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就轉變為保護政策主義和獨佔主義。和平主義就轉變為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了，在此時，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容許的自由又被奪去。到此，無產者的階級性就越發成熟，在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就引起了民族自覺。面對臨終，資產階級便更焦躁地走向反動。

以上所述是資本主義和殖民政策的歷史典型，那麼，日本的資本主義和殖民政策，是發展到哪一個等級？

畢竟，日本的資產階級反抗封建權力而初次建立資本主義還是最近的事情。和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經濟的發展遠落其後，因之，不容否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其獨特的特徵。就是說，日本的資本主義剛勃興且正要飛躍於國際上的時候，不得不迎面碰到歐美等國的先進勢力。因此，日本的資本主義一開始就充分地帶著軍國主義的色彩，因而無法在日本資本主義裡看到自由的、和平的自由貿易主義時代——將來當然也不會有一——從而，由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就不斷地○○[剝削]○○○○[中華民國]這樣的經濟後進國以及○○[台灣]這樣的弱小民族以繼續榨取其經濟利益。帶著同化之假面具的○○[總督]獨裁政治，以及其他所有的台灣統治政策，都是由此策劃出來的。建立在日本資產階級經濟權利之上的台灣的政治權力，已成為維護其在經濟支配的絕對有力之依據。

二、問題的台灣議會

囚困於狹窄之島上，在○○○○○○○○○○○○○○[台灣總督府殖民主義]擁護資本主義的台灣獨裁政治之下，於今已嘗過了二十餘年的辛酸。最近以來，緊跟著此島的發展，時代之風如潮水一般地撲來，台灣當局所夢想的「維持現狀千年八千年」已然不再容易。現在已可以從賢明的台灣當局那堅固的權力範圍之內，聽見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第一步的第三階級運動所發出的微柔之聲——「設立台灣議會！」台灣統治的現狀：「此帝國統治下三百六十萬新附民眾所不能忍受之苦痛」而詰難之，「設置由台灣住民所公選出來的議員所組織的台灣議會。由之制訂在台灣所應施行的特別法以及附有台灣預算之協贊權的台灣統治法」，「能體會一視同仁的聖旨，俾立憲政治的惠澤能夠均霑」作結。而且這個呼籲已經漸漸擴散到民眾之間，也成為比較覺醒的智識階級的趨向。

我們首先要鼓壯其志，至少，能排除唯利是從、以獻媚官府為最高美德的一般智識

階級，對於以犧牲之精神，企圖為同胞之利益與幸福奉獻的志向表達十二分的敬意，不過現在應進一步檢閱其陣容，探窺其內涵。

現在我們潔白的俎板上，有隻叫做「台灣議會」的鮮魚躺在那裡，等待我們忠實的解剖。我們必須以十二分的誠意、如物理學者對待一滴水那樣的嚴肅態度來從事解剖。

三、是台灣人的解放嗎？

如前所述，現在的政府對台灣所施行的獨裁政治，都是屬於日本資本主義、根據日本資本主義、為了日本資本主義而服務的政治。因此，真正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應意味要防止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而且，不僅是防止日本資本主義，同時也應○○[剷除]正在蠕動出繭的台灣資本主義。但遺憾的是，只用一隻魚，做不了佳餚，要面對日本資本主義和即將出繭的台灣資本主義這二重權力，台灣議會有喪失戰鬥力之虞。並有向此可怕的權力卑躬屈膝投降、甚至成為助長這兩個○○[剷削]台灣無產階級的日本資本主義及新興的台灣資本主義權力之後援委員會之憂。也就是說：如果台灣議會真能在台灣開設，這不是全體台灣人的解放，而是特殊階級的解放，我們擔心迄今仍然獨占台灣利益日本資本主義與新興的台灣資本主義由此妥協，並協手○○[剷削]台灣無產階級的○○[利益]。這實在是不可疏忽的事情。現在正是台灣無產階級必須站上這條警戒線以防禦資本主義侵略之秋！

四、台灣人解放的根柢

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還不是可促成台灣人解放的方式。只怕成為即將發生的台灣資本主義者和日本資本主義者在台灣的利害鬥爭之工具。果真如此，則夾在中間的台灣無產階級就沒有什麼福音可聞，這是無庸置疑的。為此，我們要譴責台灣議會的不徹底。為何不去追求比台灣議會更大的目標？我們應為真正能解放全台灣人的運動——今天的資本主義爛熟之後，必然會發生的新社會的改造運動，以盡人類之一員的使命，並圖謀我們的正義的自由和幸福。無產階級完全解放之日，應即全體台灣人真正解放之日，也應該是全人類真正得到自由與平等的日子。

不過，有人說：「台灣的經濟狀態尚未發達到勞資雙方發生階級鬥爭的程度。故其必然的過程乃是台灣人先建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誠然，誠然，對於這一說法，我只稍承認其具片面的真理性。可是現在的台灣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日本版圖的一部分。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不是單獨由台灣人的手所能在台灣進行的事情。而應該是由有籍於大日本帝國的所有忠良臣民在日本領土的各個地方所進行的事情。而這些大日本帝國的忠良臣民——大和民族、朝鮮人，以及台灣人的無產階級運動都應立足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由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

那末，日本資本主義已然發達到何種程度了呢？正如開頭所講的，已經到了踏著來途的舞步走到大結局這一幕了。

就算台灣的經濟發達還很落後，但從日本的資本主義狀態來估計，就算台灣人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有一氣呵成地躍入正義的新社會的可能性。

所以，台灣的解放變成必須要飛越「台灣議會」而到社會改造的第一線去取得勝利。

台灣解放的意義不在於第三階級，其炫目的焦點已然照在第四階級之上了。我們所要聽且不得不聽的，已不是特殊階級的解放，而是全台灣人的解放。

五、向著自由的道路

榨取並壓迫台灣人的是誰？不用說，就是○○[日本]資本主義與可能是將來的台灣資本主義的一部份日本人與台灣人。並不一定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加害於我們，也不一定所有的台灣人都在受苦。在日本資本主義之下，除了我們之外，還有日本和朝鮮的無產階級在受苦。萬國的資本主義之下有萬國的無產階級——俄羅斯除外——在受苦。這些人都和我們站在同一立場，所以都是應該同我們相互提攜的人們。

所以，人類的歷史使命是要面對著以榨取民眾利益以維持其存在的剝削階級，以自覺自己的階級的存在，痛切的意識到階級共通的利害，應該開始為階級性存在的主張而鬥爭。

如前所述，我們再次呼籲。第四階級得到完全解放之日，就是全人類得到自由與平等之日，沒有第四階級的解放就沒有全台灣人的解放。(一九二三、五、二九)



附錄 6-1：謝廉清的「反帝大聯盟」文獻

1924年7月27日，謝廉清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發表演說。其演說詞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212~215。他所撰寫的專稿〈帝國主義的運命〉亦收錄書中（第119~124頁）〈帝國主義的運命〉並有編者按語謂：「謝廉清同志，台灣人，是一個極熱烈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這篇文是他被壓迫來華後，百忙中抽暇所做的。我們非常感謝。（編者）」（第124~125頁）

一、謝廉清在來今雨軒的演說詞

眾位同志！我們三十年前是中國福建台灣人，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下的台灣人。台灣人受日本之壓迫的痛苦，說不勝說，我不大會說北京話，要說也說不出來，——諸位想想那些殘酷無理的強盜，是怎樣劫掠殺害那些善良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我們台灣人是受的怎樣的痛苦了。

我們台灣人曾經幾次圖謀脫離日本的羈絆，可惜結果屢次都是失敗。諸位看看地圖，就可以知道，日本挾著在被壓迫階級吸收來的雄厚的經濟勢力與奴隸彼國的人民訓練歷年武裝精緻的海陸軍，圍吞我們孤懸海中，飽受掠奪而羸困了的臺灣，自然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們台灣人並不因此灰心，我們只要一日不死，仍常與彼帝國主義的日本奮鬥一日。只要我們能夠繼續努力奮鬥，前途仍然可望得著光明。

因為帝國主義登峰造極的時候，也就是彼要進到墳墓的時候了。帝國主義的日本，此時經濟的勢力固然雄厚，海陸軍的武裝固然精緻，而彼帝國主義的運命，也就必然的要因此顛覆。在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之下的，不僅只台灣人，還有和台灣人的境遇一般的朝鮮人，還有產業落後的中國人，還有名列日本籍而實際上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做彼の奴隸的日本工人和農夫；這些人只要都是一樣要生存，就不得讓彼帝國主義長此壓迫，就不得不要起來反抗！台灣人的流血慘劇，朝鮮人的獨立運動，中國人的排日的運動，日本的社會黨興起，就是反抗彼帝國主義的壓迫，要求生存的表現。帝國主義的日本愈雄厚其經濟勢力，則被壓迫者要求生存愈厲害；海陸軍的武裝愈精緻，則一旦倒戈，彼帝國主義的孽類愈益粉碎的[得]一個不留！

諸位同志，我們顛覆帝國主義的力量，已經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孕育出來了，只差一種組織將之聯合起來，將之一貫的運動。我們有許多同胞因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日本而離開了故鄉。我現在到北京，就是想四處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同志的。前幾天在報上看見了北京忽然有反帝國主義大聯盟之組織，我是欣喜極了；我是極願意加入這個戰團，做一個攻毀帝國主義的戰士。我並願意介紹我們台灣的同胞，一共與這個大聯盟結合起來，聯成一個廣大的聯合戰線，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攻！

諸位同志早已知道的清楚，帝國主義只知唯利是圖，彼壓迫產業幼稚的國家，弱小

的民族，本國的工人，並不分彼此，任何地方，任何民族，同是一樣壓迫的；所以反帝國主義也不是中國一國的事，也不是台灣一隅的事，也不是任何地方一個地方，任何民族一個民族的事，乃是各地方各被壓迫的民族共同的事，所以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是一個階級的；唯一的方法，只有聯合被壓迫階級的，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攻！做階級鬥爭！

諸位同志！我們要堅固我們的意志，普遍我們的宣傳，擴大我們的組織，嚴密我們的陣勢，接連的對著帝國主義攻打，帝國主義自然有被我們攻毀的日子。我們這個反帝國主義大聯盟之成立，是向帝國反攻的開始，我們還要準備著猛烈的戰爭。

諸位同志努力！我們不久就要看見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民族，紛紛樹起反帝國主義的旗幟！

二、謝廉清，〈帝國主義的運命〉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形式，是以科學的技術，利用蒸氣電氣，機械作工具；所以生產量是非常的大；自由競爭是他頭一個的特色，自然與手工業時代的生產量，是相去很遠了。少量的生產，向來常是供不及需的樣子，但一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各資本家挾其資本，而不慮及社會的消費力，就自由競爭的生產下去，結果不但說能夠充分的供給一地方一國內的人的需要[，]並且還有剩餘的生產品——即所謂過剩生產——堆積如山。機械工業的生產量這般大，所以過剩的生產品是有增而無減的。對此過剩的生產品假使沒有相當的辦法，將此放任下去，則過剩生產品越積越多，結局生產自不得不停頓，工廠也就不得不關閉了。若然，則資本的運用豈有獨存之理？這將與生產的停止和工廠的關閉是同樣的運命的——資本的運用不得不告終；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勢必斃命了！但是狡猾的，聰明的資本家，及其御用的財政，金融，經濟……等學者專家，是很會用變通的辦法的，能夠把垂死的資本主義起死回生的。那種高明的辦法，不外乎割他人的肉，來補他自己的瘡，榨取他人的膏血，來肥滿他自己的身體。

當他們的資本在本國沒有運用的餘地的時候，他們就恃素日訓練來的雄厚的兵力，和強悍的外交手腕，向著經濟落後的國家，弱小的民族，加以武力，施以侵略。比方日本的吞併高麗，佔我台灣，就是一個好例。在本國垂死的資本主義得著了新領土，好像將死的人得著仙丹似的。既然得著新市場——新領土——則國內所有的過剩生產品不患沒有銷路。並且能運用將死的資本了。這個時候的資本主義，可說是已經達到最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適才所說的佔領新領土，新殖民地——即新市場，我們叫做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期。

帝國主義是國際的性質，在國際自由競爭的市場裡經常要做市場的霸王，是他的根性。社會上的一切，統歸他所有，受他取捨，更是他所希望的。所以每一個資本家（工廠主）都是盡量的生產下去，而他們的政府則極力的將種種的產業保護政策使生產量更增加；使與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的生產品競爭，以期博得最後的勝利。然欲達到這個目的，勢必要求原料的來源與自由銷售的市場，是以帝國主義雖得著殖民地，能供給原料，

銷售商品；但是還不能夠滿足牠的社會的性質——生產力有加無已而殖民地範圍及其消費力[有]限，到一定的時期，總也要告終的。既是不能無窮的發揮它的佔有的性質，就不得不需要能夠毫無障礙的自由銷售生產品和採取原料品的範圍。於是他們的慣技，強悍的外交手腕，雄厚的兵力，不客氣的來脅迫弱小的國家，訂立種種的不平等條約，劃定勢力範圍。比方列強強制中國和他們訂立辛丑條約，及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把東三省做他的勢力範圍便是。雖然殖民地之財富，勢力範圍之寶藏，固非取之不竭，吸之無窮，如長江之水似的。但人口與消費力有限，經過一定的時間，自又有過剩的生產，和原料缺乏的恐慌。資本家唯一的侵略工具——金融資本——又擋著了。此是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勢力範圍殞命的時候；這是帝國主義的第二期。

資本帝國主義的謀士，財政家，金融家，經濟學家，到這個地步也就漸沒有變通的辦法，而要束手待斃了。地球上所有的市場，分的分，割的割，以外再也不能夠發現新市場了。帝國主義至此可說是日暮途窮了！死，是帝國主義必然的運命。但臨死的帝國主義，決[絕]不願將此放任下去的。社會上的弱小民族，經濟落後的國家既侵略殆盡，依他們的根性——社會的性質——乃不得不心與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決勝負——就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於是離開平和時期而入於衝突時期了。請看侵略中國的各個帝國主義底國家的衝突，就可瞭然。在外交上常有糾紛，便是他們互相衝突的鐵証。如日對美，美對英，英對法，法對日，都免不了相互間的衝突。更舉一個例子說，美國計劃和主張的新銀團與中國的門戶開放，於英日不利，他們就反對起來。又如此回的慘殺案，英日兩國，則大發揮特發揮帝國主義的力量來壓制中國；而美國呢，則乘此機會假仁假義，施了一大推的空人情，欲買中國人的歡心，而圖中國市場的獨占，和排斥與自己分贓的帝國主義底國家。這正是他們相互衝突的好例子。帝國主義者的衝突，依他們的根性發展下去，則彼此的互相排斥衝突是一定免不了的。至於帝國主義者間只能為某種利益而取聯合戰線，或對於或種的事件有時能夠步調一致；但是不能夠說彼此的衝突就打消了，他們依然是衝突。他們的聯合是不可能的。比方此次的屠殺事件，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的步趨將近一致，這是他們各個都看到中國群眾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事例，已經達到很高很可怕的程度；為維持他們的勢力，所以不得不取共同一致的態度。雖然，他們互相的衝突，決[絕]不因此而打消，是以他們是不會成聯合戰線的。帝國主義者間較大的衝突必然引起戰爭。戰爭的結果，一定有戰敗國的。那我們可以說在社會作孽的帝國主義國家少了一部份。再申言之，帝國主義者間的戰爭，是催促帝國主義的滅亡。這可說是帝國主義如肺病者到了不可醫治的第三期。

資本帝國主義，依他的史的發展，得證明他的崩壞是一種必然的運命。帝國主義的國家那般的衝突，那樣自相殘殺，以促進他們的本身滅亡；他方面又有在他們的制度底下孕育起來長大起來的解放的革命運動，一天一天跟著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而成長，到這個時候其勢力已經風靡了全世界，將爆發的排置，也差不多快排置好了。如各國都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各被壓迫民族也都有民族自立的運動。如雨後的春筍，勃勃而起，這兩個運動，都是要帝國主義的死命的。

這兩個革命勢力的聯合，就是帝國主義的催命符。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第四期，即滅

亡時期。

幾百年間縱橫天下，榨取和殘殺了無數萬無產者的資本帝國主義呀！死路是你必然要跑到的。轉眼的天下，一定是無產階級的天下！



表



表 2-1：治警事件前夕，文協與島內相關團體、核心幹部⁶¹³

組織名稱	成立、申請日期	聯絡人與辦事處	主幹者	專務理事	發起文獻
台灣文化協會	1921/01/17 成立	蔣渭水。太平町三丁目大安醫院		蔣渭水（共一名。僅次於總理、協理。蔡培火亦曾任此職） ⁶¹⁴	由連溫卿提出組織規則。 ⁶¹⁵
新台灣聯盟	1922/10/17 成立	石煥長。永樂町四丁目長安醫院。後因石煥長渡華，轉移至蔣渭水處。 ⁶¹⁶	蔣渭水（即主要負責人。共一名。原主幹者為石煥長。）		有中、日文二種。日文由連溫卿起草。 ⁶¹⁷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禁止）	1923/01/30 申請 ⁶¹⁸	蔡式毅。太平町二丁目蔡式毅律師事務所。 ⁶¹⁹	石煥長（被日官方視為主要負責人。共一名。）	蔣渭水（另一名為蔡培火。共二名。）	

⁶¹³ 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編纂者眼中，與文協有直接關係的結社是：（1）新台灣聯盟、（2）被禁止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台北）、（3）現在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東京）、（4）社會問題研究會、（5）台灣雜誌社。本文認可這樣的分類，唯此處略去地處東京並以刊物發行為主的台灣雜誌社，並略去後來在東京申請成功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下所列之主要資訊，除特別另外注釋者外，俱來自：〈文化協會會員の各種結社關係〉，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160~165。《台灣社會運動史》另外編纂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係主要の各種結社關係〉一表，內容大體與〈文化協會會員の各種結社關係〉相同，唯將「社會問題研究會」寫為「時事問題研究會」則誤。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係主要の各種結社關係〉，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337~340。

⁶¹⁴ 文協創立時，按〈會則〉，未有「專務理事」的設置，只有次於總理、協理的「理事」一職（若干名）。修改〈會則〉後，則於總理、協理之下設置「專任理事」（一名），以「輔佐總理協理擔任一切會務」，是會內排名第三的職務。見：〈台灣文化協會會則〉，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40~141；〈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創立第三年度第一回報告）〉，《台灣民報》，第2卷第4號（1924，東京），14~16。

⁶¹⁵ 「組織上之規則是由連溫卿提出，曾在艋舺徐慶祥家加以修改，並據此招募會員。」見：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1953，台北），68。

⁶¹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7。

⁶¹⁷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80~81。中、日文兩種宣言書，分別載於〈新台灣聯盟の出現！〉，《台灣》，第3年第8號（1922，東京），67~68；〈新台灣聯盟之出現〉，《台灣》，第3年第9號（1922，東京），39~41。後者為前者之漢譯；但前者多收錄了新台灣聯盟的規約。兩篇宣言書均附有「錫」的同文異譯介紹，「錫」即王敏川。此外，《台灣政治運動史》所收錄的宣言，與《台灣》所收錄者不同。

⁶¹⁸ 此為正式向總督府當局提出申請的時間，但旋於2月2日被駁回。

⁶¹⁹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71。

⁶²⁰ 若據〈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則〉，會務由二名「專務理事」所總理，並無「主幹者」之職稱。然而總督府禁止台北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命令書，卻以僅任「理事」職的石煥長為對象而發出，並謂之「主幹者」。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60、356~357。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至東京重建之後，首次選出

			620		
社會問題研究會	1923/07/23 成立	連溫卿。永樂町五丁目連溫卿宅			原文日文。由連溫卿起草。 ⁶²¹

表 2-2：〈蠹魚的旅行日記〉結構簡表

連載期	內容	補充說明	
1	黃希純引言	寫於 1924.11.12	
2~3	見面話		
3~4	我旅行底希望		
5~8	(1924.4.26)		都在在前往日本的船上。30 日登岸後，從神戶到東京
9~16	1924.4.27，晴		
16~21	1924.4.29，晴	缺第 17 回	
21~30	1924.4.30，晴		
31~38	1924.5.1，晴		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
39~47	1924.5.2，晴天	缺第 44、47 回	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
48~58	1924.5.3，雨天	報紙誤排為「五月二日」。	
58~66	1924.5.4，晴天	第 63 回後段誤貼至第 68 回之後	
66~73	1924.5.5，晴天	第 68 回後段缺	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
73~78	1924.5.6，晴天		
78~81	1924.5.7，晴天	報紙將連載第「78」回重複二期。	
82~93	無法判別日期	缺第 82、86、88 回；第 85、87 回依次貼於 91 之後	
93~96	1924.5.12，晴天		
97~98	1924.5.13，晴天		
98~101	1924.5.14，晴天		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
102~104	(疑 1924.5.15)	缺第 102 回	
104	1924.5.16，晴天	報紙誤排為「九月十六日」。	
105	1924.5.17~20，完		

說明：〈道德の進化〉非連溫卿所作，卻是連溫卿演講內容之記述稿。連溫卿以「史可乘」為名撰寫的〈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一文，是筆者目前所能尋得的、由連溫卿親自總結台灣世界語運動史的唯一一篇論文。但連溫卿可能早在 1936 年於 La Revuo Orienta 發表的〈台灣エスペラント運動の回顧〉一文中便已說明。唯筆者迄今仍無法取得此文，僅在若林正丈所撰文中見其引用。見：若林正丈，〈黃呈聰における「待機」の意味〉，《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1979，東京），85。

的「專務理事」則有五名。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の成立〉，《台灣》，第 4 年第 3 號（1923，東京），80。

⁶²¹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3 期，71。

表 2-3：〈蠹魚的旅行日記〉與連溫卿後續文章之關係略表

討論課題	〈日記〉所刊回數	後續相關文章
論日本的生殖器崇拜傳統殘存於公園中所供奉之佛像	第 78 回	〈是不是性器崇拜之遺物〉，《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5，台北。
台灣出現不良少年少女的問題	第 94、95、96 回	〈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第 47 號，1925.10，東京。 〈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續）〉，《台灣民報》第 48 號，1925.10，東京。 〈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5，台北。
論諸種婚姻結合概念（「牽手」、「接竹篙」、「灣妻」、「鮮妻」），離婚與自殺問題，賣淫與私娼私生子問題	第 68、69、70、71、72、73、92 回	〈道德の進化〉，《台灣》第 5 年第 2 號，1924.5，東京。 〈婦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台灣民報》第 67 號，1925.8，東京。 〈牽手考〉，《民俗台灣》第 3 卷第 8 號，1943.8，台北。 〈再就台灣文化的特質而言〉，《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3 期，1954.12，台北。
論階級鬥爭與進化論的異同	第 75、76 回	〈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第 47 號
論蘇維埃政權與各國社會運動之關係	第 97、98 回	〈「亡羊補牢」〉，《台灣民報》第 123 號，1926.9，東京。
論「言語的社會性質」	第 99、100 回	〈言語之社會的性質〉，《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9 期，1924.10，東京。
論社會進化可以飛躍	第 40 回	〈要怎麼看〉，《台灣民報》第 135 號，1926.12，東京。 〈要怎麼看（下）〉，《台灣民報》第 136 號，1926.12，東京。
1.		

表 3-1：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網

◎代表關係人、參與者，【】括號內表所任職務，()括號表化名、別名

		(A) 北京台灣青年會的結成 (1922.1) ⁶²²	(B) 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 別號(1922.5.5) ⁶²³	(C) 關於北京台灣人活動的 情報(1922.6.5) ⁶²⁴	(D) 北京台灣人的思想運動 (1922.8月後) ⁶²⁵	(E) 《新台灣創刊的宣言》 的印行(1923年初) ⁶²⁶	(F) 《新台灣創刊的宣言》 的散佈的情報 (1923.2.1) ⁶²⁷	(G) 新台灣安社的結成 ⁶²⁸	(H) 新台灣安社發行刊物 《新台灣》的協力者 ⁶²⁹	(I) 范本梁的交友狀況 ⁶³⁰	(J) 關於《新台灣》的發行 回顧 ⁶³¹
(01)	林炳坤	◎									
(02)	陳江棟	◎					◎				
(03)	鄭明祿	◎									
(04)	劉錦堂	◎		◎							
(05)	黃兆耀	◎									
(06)	林子明	◎									
(07)	林飛熊										
(08)	范本梁	◎			◎	◎(一洗)【編輯】		◎	◎	◎	◎
(09)	林瑞膽	◎									
(10)	蔡惠如	◎									
(11)	吳子瑜	◎									
(12)	林松壽	◎									
(13)	廖景雲										
(14)	林煥文	◎									
(15)	關錦輝				◎ ⁶³²				◎		
(16)	謝廉清				◎			◎	◎		
(17)	謝文達				◎			◎			
(18)	許地山		◎(贊堃)			◎(贊堃)【發行】		◎			
(19)	王悅元		◎ ⁶³³	◎							
(20)	林阿謨								◎		

⁶²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116。

⁶²³ 《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1922，北京)。

⁶²⁴ 〈在北京台灣學生二關スル件(1922.6.5)〉，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⁶²⁵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3。

⁶²⁶ 〈新台灣社創刊宣言配布ノ件(1922.2.19)〉，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⁶²⁷ 〈新台灣社組織ニ關スル件(1922.2.19)〉，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⁶²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3。

⁶²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5。

⁶³⁰ 〈在北京台灣籍民ニ關スル件(1925.4.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⁶³¹ 〈秘密出版物「新台灣」ニ關スル件(1926.5.19)〉，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⁶³² 〈皇太子殿下行啓ニ關スル各種要視察人ノ件(1923.3.16)〉，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⁶³³ 本則史料記為「王宅」，即「王悅元宅」之意。

(21)	之民					◎【會計】				
(22)	羅志道									◎
(23)	鄭開源									◎
(24)	游祥耀								◎	
(25)	程水源					◎ ⁶³⁴				
(26)	張鐘鈴								◎	



⁶³⁴ 〈皇太子殿下行啟ニ関スル各種要視察人ノ件(1923.3.16)〉，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2-2）》。

表 3-2：新台灣（創刊號—第三號）目錄

No	作者	文章名	性質	轉載來源考證
	創刊號 1924.4.15			
(01)	新台灣安社	新台灣安社宣言 635	文	
	第二號 1924.12.5			
(02)	能鳴者（范本梁）	卷頭言	文	
(03)	一洗（范本梁）	頌揚同志和田久太郎的堅強勇敢的一擊！！	文	
(04)	能俠者（范本梁？）	實行部的宣言	文	
(05)	體信（范本梁）選	新詩拔萃	詩	
(06)	時潮兒（范本梁？）	日美戰爭與台灣革命	文	
(07)	健民（黎健民）	非孝	文	健民，〈非孝〉，《民鐘》，第 1 卷第 2 期（1922.8.1）。 ⁶³⁶
(08)	竹英女士	論貞節	文	
(09)	安敦	我要說的話	文	安敦，〈我要說的話〉，《互助》，第 1 期（1923.2.15）。 ⁶³⁷
(10)	云責	敬告勞働界同胞	文	云責，〈敬告勞働界同胞書〉，《實社自由錄》，第 2 集（1918.5）。 ⁶³⁸
(11)	平民之聲	巴枯寧的革命精神	文	萬聲，〈巴枯寧的革命精神〉，《學匯》，第 34~36 期。 ⁶³⁹
(12)	師復（劉師復）	無政府淺說	文	師復，〈無政府淺說〉，《晦鳴錄》，第 1 號（1913.8.20），2~8。
(13)	伯克曼	暴動與無政府主義	文	Alexander Berkman 著、震瀛譯，〈暴動與無政府主義〉，《實社自由錄》，第 2 集（1918.5）。 ⁶⁴⁰
(14)	克魯泡特金	秩序	文	克魯泡特金著、真民譯，〈秩序〉，《民鐘》，第 1 卷第 1 期（1922.7.1）。 ⁶⁴¹
(15)	高德曼	組織論	文	高德曼著、凌霜譯，〈組織論〉，《實社自由錄》，第 2 集（1918.5）。 ⁶⁴²

⁶³⁵ 這是目前僅知的《新台灣》創刊號內容。

⁶³⁶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702。

⁶³⁷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726。

⁶³⁸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696~697。

⁶³⁹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714。

⁶⁴⁰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696~697。本書誤植為「Alexander Berkman」。

⁶⁴¹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702。

⁶⁴²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696~697。

(16)	森芳生	最後之革命	文	森芳著、W.S.譯，〈最後之革命〉，《學匯》，第 190 期。 ⁶⁴³
(17)	儀呵巴尼智著、安民譯	在公有地的說教	文	
(18)	大能	血與淚（劇本）	文	大能，〈血與淚（劇本）〉，《民鐘》，第 1 卷第 9 期（1924.8.1）。 ⁶⁴⁴
(19)	體信（范本梁）選	悲壯淋漓	專題	
(20)	一洗（范本梁）	飄零者	詩	
(21)	光華	菲律賓革命兒黎沙兒之絕命詞	詩	
(22)	儀呵巴尼智	共和國	詩	
(23)	宗岱譯	波蘭戰歌	詩	
(24)	愛羅先珂	盲目詩人的童話	文	愛羅先珂著、魯迅譯，〈時光老人〉，《晨報副鐫》（1922.12.1） ⁶⁴⁵
(25)	本社同人	要緊通告	文	
(26)	能鳴者（范本梁）第三號 1926.3.1	編輯後記	文	
(27)	鳴俠、致遠、贊是、幕真、愛陽，（等十八人）	新發議文	文	
(28)	本社同人	年頭言	文	
(29)	斯民（范本梁）	我們的革命運動	文	
(30)	革新之一人	革命原理	文	革新之一人著，真（李石曾）譯，〈革命原理〉，《新世紀》第 22~24 號（1907.11.16~1907.11.30）
(31)	鞠普	毀家譚	文	鞠普，〈毀家譚〉，《新世紀》，第 49 號（1908.5.30）。 ⁶⁴⁶
(32)	玄玄女士	男女平等說	文	玄玄女士，〈男女平等說〉，《良心》，第 1 期（1913.7.20）。 ⁶⁴⁷
(33)	安敦	勞働運動	文	安敦，〈勞働運動〉，《互助》，第 1 期（1923.2.15）。 ⁶⁴⁸
(34)	燃（吳稚暉）	有宗教與無宗教	文	燃，〈宗教問題〉，《新世紀》，第 54 號（1908.7.4）。 ⁶⁴⁹
(35)	森芳生	平民的疾呼	詩	
(36)	菸僧	感事	詩	
(37)	全上	友於	詩	
(38)	能鳴者（范本梁）	編輯後記	文	附記有「捐助者芳名」，分別是：「Jack」、「G 生」、「春子」、「BT」、「俊蓮生」、「Woo」。

⁶⁴³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712。另有「M.S.譯」的記載，見徐善廣、柳劍平著，《中國無政府主義史》（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367。

⁶⁴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704。

⁶⁴⁵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1 卷（北京：三聯書店，1978），503。

⁶⁴⁶ 見高軍編，《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12~217。

⁶⁴⁷ 見曹世炫，《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307。

⁶⁴⁸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 3 卷，726。

⁶⁴⁹ 范本梁僅節錄部份，若干文句並有改動。

表 3-2：《台灣新青年》創刊號目錄

No	作者	篇名
(01)		卷頭語
(02)	中國台灣新青年社	本社宣言
(03)	毛常	台灣新青年祝詞
(04)	守株	台灣新青年社序
(05)	浪嘯社	台灣新青年刊
(06)	陳笑奇、王瘦農、邱少陵、李振文	台灣新青年刊
(07)	美華中學輔德自治會	台灣新青年刊
(08)	瘦瘦	李序
(09)	朱謙之	台灣學生聯合會演說辭
(10)	黃炳炎	我對台灣之感想
(11)	浚清	台灣新青年之感想
(12)	克思	我所知的文化協會與公益會
(13)	邢其	台灣政府貫連資本家搾取民利之要聞
(14)	仲農	小宣言
(15)	武巒冥鴻榮陽	泣告同胞
(16)	愛智	新老子的政治哲學
(17)	陳兆元	台灣的青年們應該起來工作嗎？
(18)	光華	望同胞努力前進
(19)	李革面	盼望我同胞
(20)	其本	思想之自由說
(21)	玉樹	平等說
(22)	李思華	台灣慘史之感言
(23)	陷天山人	台灣人心改造論
(24)	救青	余之懺悔
(25)	郭名同	台灣被日本壓迫的苦狀
(26)	邢其	黑暗的台灣
(27)	鏡童	革命歌
X	黃炳炎	敬告台灣學生
X	黃炳炎	感懷
X	玉鵬女士（謝玉葉）	祝台灣新青年社成立
X	仝人	敬告台灣諸姐妹
X	王樹（玉樹？）	感作
X	陷天山人	政府抽稅感作

（X表示殘缺未存。）

表 4-1：關於《平平旬刊》聯絡人及聯絡處的記載

No.	登載處	登載日期	記載內容	可參考表 4-3
(01)	《學匯》的《平平旬刊》廣告	1923.12.20	「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 ⁶⁵⁰	(04)
(02)	《平平旬刊》創刊號	1924.04.01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羅個儻」 「上海北四川路[一]百二十號青年會羅個儻」	(01)、(02)
(03)	《平平旬刊》第 2 期	1924.04.11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王德豐」	
(04)	《春雷》第三期	1924.05.01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轉羅個儻」	(01)、(02)
(05)			《春雷》上海代售處：「戈登路南方大學羅赤人」	

表 4-2：《平平旬刊》目錄

No.	作者	欄目	標題	可參考表 4-3
創刊號・1924.4.1 (16 面)				
(01)	同人	評論	發刊詞	
(02)	尹蘇野	評論	韓國的民族運動	(17)
(03)	佐野學	評論	過上海	(18)
(04)	赤人	評論	祥經絲織廠大火以後	(02)
(05)	沫雲	評論	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	(12)
(06)	Kerkeзов 著、抱朴譯	譯述	柯祖基也招承了！ ⁶⁵¹	(08)
(07)	任	文藝	軍隊化的四川	(01)
(08)	真一	文藝	台灣怎麼樣了？	(15)
(09)	同舟	特載	麵包(獨幕劇) ⁶⁵²	(24)
(10)	王之石	特載	回鄉	(21)
(11)	赤人	詩	月下	(02)
(12)	白弓	詩	參透	(25)
(13)	阿鳳	隨感錄	上狗法的當	(04)
(14)	威聖	隨感錄	北洋學潮雜感	(04)
(15)			平社簡章	
(16)	平平社		代表章程	
(17)			編輯室啟事	
第二期・1924.4.11 (8 面)				
(18)	赤人	評論	中俄交涉破裂的原因	(02)
(19)	沫雲	評論	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	(12)
(20)	沫雲	評論	第二次限制軍備會議	(12)
(21)	真一	特載	再談台灣問題	(15)
(22)	赤人	詩	月下 ⁶⁵³	(02)
(23)	同舟	特載	麵包(獨幕劇)(續)	(24)
(24)	威聖	隨感錄	責備賢者的幾句話	(04)
(25)			編輯室啟事	

⁶⁵⁰ 〈介紹新著〉，《學匯》，第 379 期（1923 年 12 月 20 日，北京），轉引自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四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350。

⁶⁵¹ 文後標註「未完」。第三期「編輯室啟事」並云此文續稿未到，留待第四期發表。實際上卻再無下文。又，本文刊出時，作者「抱朴」誤植，見表 4-3：(08)。

⁶⁵² 文後標註「未完」。

⁶⁵³ 本詩為重新發表，原已登載於創刊號。

(26)			前期正誤	
第三期・1924.4.21 (8面)				
(27)	一之	討論	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工作	(22)
(28)	威聖	談話	讀書難	(04)
(29)	花蕾	談話	台匪	(13)
(30)	蘇野	特載	韓國民族運動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獻	(17)
(31)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	(01)
(32)	同舟	戲劇	麵包(獨幕劇)(續)	(24)
(33)	赤人	詩	旅夜	(02)
(34)	任一	隨感錄	老成人的談話	(01)
(35)		(廣告)	民國日報 四大特色	
(36)		(廣告)	僑務旬刊	
第4期・1924.5.1 (8面)				
(37)	威聖	評論	吳佩孚的供狀	(04)
(38)	劉一清	評論	調和與革命	(10)
(39)	任一	談話	人不如狗	(01)
(40)	真一	特載	台灣的人造地震	(15)
(41)	蕾	特載	一個回到中國的台灣人	(13)
(42)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43)	同舟	戲劇	麵包(獨幕劇)(續)	(24)
(44)	阿鳳	隨感錄	至死不悟	(04)
五一紀念特刊・1924.5.1 (8面)				
(45)	蘇野		五月一日的過去和現在	(17)
(46)	任一		五一節的暗示	(01)
(47)	貞		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	(16)
第5期・1924.5.11				
(48)	威聖	評論	接踵而來的三個紀念日——「五一」「五四」與「五七」	(04)
(49)	任一	評論	戀愛與經濟	(01)
(50)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51)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52)	劍波	談話	南京學生造反了	(03)
(53)	王之石	詩	醉後	(21)
(54)	扶雅	詩	父親的滋味	(23)
(55)	小立	戲劇	血	(07)
第6期・1924.5.21 (8面)				
(56)	阿鳳	評論	趕走直腳鬼	(04)
(57)	真一	評論	日本人口裏的文化政策	(15)
(58)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59)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60)	劍波	詩	暴雨	(03)
(61)	王秋心	戲劇	女巫(遊戲的喜劇)	(11)
第7期・1924.6.1 (8面)				
(62)	少峯	評論	更待何時	(06)
(63)	沫雲	評論	日本對台灣的武裝大示威	(12)
(64)	真一	評論	台灣的自治和請願都不中用	(15)
(65)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66)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67)	姜冰生	文藝	將你們這種人一概殺盡	(05)
(68)	介藩	文藝	海濱的晨光	(09)
(69)	王之石	文藝	野花	(21)
(70)	王秋心	戲劇	女巫(遊戲的喜劇)(續)	(11)
第8期・1924.6.11 (8面)				
(71)	任一	評論	誰是和平障礙物	(01)
(72)	任一	評論	嫌疑解釋	(01)

(73)	逸民	談話	我對於懷疑洋人釘死奶媽的感想	(14)
(74)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75)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76)	王秋心	戲劇	女巫(遊戲的喜劇)(續)	(11)
(77)		(廣告)	孤星(旬刊)	
(78)		(廣告)	民國日報(日刊)	
(79)		(廣告)	上海大學校刊	
(80)		(廣告)	安徽黎明週報	
(81)	發行部	(廣告)	改正定價	
第9期·1924.6.21(與增刊合計16面)				
(82)	田口運藏著、任一譯	評論	階級意識	(01)、(19)
(83)	少峯	評論	應該動手了!	(06)
(84)	真一	評論	台灣的保甲法當如何廢除?	(15)
(85)	一之	評論	到自由之路的障礙	(22)
(86)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87)	王秋心	詩	火災(劇詩)	(11)
第9期增刊。1924.6.21				
(88)	王之石	詩	夢	(21)
(89)	王之石	詩	雜感	(21)
(90)	王秋心	戲劇	女巫(續)	(11)
(91)	平林初之輔著、真一譯	譯述	家族制度與婦女參政運動 ⁶⁵⁴	(15)、(20)
(92)	冰生	小說	沒相干!「五九紀念日衢州學生界的寫真」	(05)
(93)	王之石	隨感	中國出版界的悲觀	(21)
(94)		(廣告)	新建設月刊	
(95)		(廣告)	孤星旬刊	
(96)		(廣告)	上海大學校刊	
(97)		(廣告)	民國日報	
(98)	平社		啓事	

⁶⁵⁴ 本文文後附一則《平平旬刊》的「記者附誌」。

表 4-3：「平平同人」資料考證略表

(打*號者代表為譯稿，打?號者表示存疑)

No.	筆名	本名	篇數	活動概述與考證
四川				
(01)	任一、任	羅任一	13+1*	羅任一(1897~1965)。詳見正文
(02)	赤人	羅赤人	5 ⁶⁵⁵	羅赤人(生卒年不詳)。1921年，一個署名「赤人」的中學生即投稿《覺悟》以控訴某校(顯然是中學)破壞學生會。1922年，羅赤人等人上海浦東中學學生，組織《人》刊，這是一份被同時歸類為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刊物。社團約有三四十人，並開辦義務夜校。1921年的「赤人」可能就是浦東中學的「羅赤人」。自1922年至1923年12月底，「羅赤人」列名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團員。表4-1所載之上海南方大學的「羅赤人」，應該就是《平平旬刊》的「赤人」。 ⁶⁵⁶
(03)	劍波	盧劍波	2	盧劍波(1904~?)，原名盧廷杰，四川省合江縣人。盧劍波是五四後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1923年，他在南京創辦無政府主義雜誌《民鋒》。1925年五卅慘案後，他從南京搬至上海，並在1926年於上海復刊《民鋒》。 ⁶⁵⁷
浙江				
(04)	威聖、阿鳳	賀威聖	13	賀威聖(1902~1926)，字剛峰，浙江象山縣人。幼時乳名鳳寶，故又常稱「阿鳳」。 ⁶⁵⁸ 《平平旬刊》中署名「威聖」以及「阿鳳」的文章，均應其作品，且為《平平旬刊》撰稿第二多的作者。賀威聖在1923年進入滬江大學，退學後轉入南方大學(從而可以說明《學匯》上的《平平旬刊》出版預告為何記為「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後因不滿校方而自行退學。最後於1924年進入上海大學就讀社會學系，同年加入中共，並在冬天返回故鄉象山，建立起當地第一個中共支部。 ⁶⁵⁹
(05)	姜冰生、冰生	姜冰生	2	姜冰生(1906~1937)，浙江象山人，在寧波四中學習期間結識華崗(少峰)，並成為中共寧波特委刊物《火燿》週刊的主要撰稿人。1924年，姜冰生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五卅慘案後，曾與賀威聖回象山開展宣傳活動。後來成為中共象山獨立支部領導成員。 ⁶⁶⁰ 1925年曾以本名在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發表文章。
(06)	少峰	華崗	2	華崗(1903~1972)，又名少峰，幼名延年。浙江衢縣人。其於1924

⁶⁵⁵ 其中包括一篇重複刊登兩次的文章，按兩次計。

⁶⁵⁶ 赤人，〈破壞學生會的卑劣手段〉，《覺悟》，1921年5月25日，第4版；〈漫談我中學生生活與再晤蔣經國同學〉，收錄於政協川沙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川沙文史資料》，第1輯(上海：政協川沙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146；黃志榮、黃妙珍，〈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區青年團組織發展概況〉，《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2期(1986，上海)，42~48。

⁶⁵⁷ 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1009~1022。

⁶⁵⁸ 朱華庭，〈「要將投袂興神州」——賀威聖烈士傳略〉，收錄於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不朽的戰士：浙江革命英烈傳》，第一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

⁶⁵⁹ 朱華庭，〈「要將投袂興神州」——賀威聖烈士傳略〉，收錄於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不朽的戰士：浙江革命英烈傳》，第一集，2。

⁶⁶⁰ 〈姜冰生〉，收錄於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象山文史資料》，第五輯(浙江：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113~114。

⁶⁶¹ 若以《平平旬刊》為準，華崗在此之前所公開發表的文章，目前僅知有《學生雜誌》的〈關於

				年前後多以此二者為筆名。 ⁶⁶¹ 1924年暑假，華崗以華少峰為名進入寧波四中學習，同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間，華崗也曾參與主編《火燿》週刊， ⁶⁶² 並曾到象山進行過組織工作。 ⁶⁶³
(07)	小立	崔曉立	1	崔曉立(1900~1941)，又名小立、紹立、尙辛，曾化名邵林(麟)書。浙江鄞縣人。1923年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後轉社會學系。1924年加入中共，1925年參與五卅運動，同年赴蘇留學。 ⁶⁶⁴ 1924至1925年間，曾以「小立」、「崔小立」為名在《覺悟》副刊、《上大五卅特刊》等刊物發表文章。 ⁶⁶⁵
(08)	抱林(抱朴)	秦滌清	1	秦滌清(生卒年不詳)，筆名抱朴，鄭超麟則記之為「秦滌青」。 ⁶⁶⁶ 浙江鎮海人。一九二零年代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曾參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赴蘇留學，回國後反共，投靠國民黨。 ⁶⁶⁷ 《平平旬刊》將「抱朴」誤植為「抱林」，後刊出勘誤表校正之。
安徽				
(09)	介藩	徐介藩	1	徐介藩(1910~1983)，原名徐齊邦。安徽省固鎮縣人，1920年前後組織安徽學生會，1923年秋於安徽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因學潮遭鎮壓，徐介藩與王步文(安徽人)遭通緝並開除學籍。徐介藩逃往南京，1924年報考東南大學未果。旋於1925年進入黃埔軍校，加入中國共產黨。 ⁶⁶⁸
(10)	劉一清	劉一清	1	劉一清，生平不詳。除於《平平旬刊》第4期發表〈調和與革命〉 ⁶⁶⁹ 此則文章外，第8期還有廣告云：「安徽黎明週報：武力壓迫下的新刊物，富有反抗精神，定價二分，通信處上海大學劉一清轉」。 ⁶⁷⁰ 安徽《黎明》週報創刊於1919年6月，前述之王步文是創辦人之一。1923年10月，《黎明》週報被查封。隨著王步文於1924年春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黎明》週報亦在上海復刊。 ⁶⁷¹
江西				
(11)	王秋心	王秋心	5	王秋心(生卒年不詳)，江西永修人。他與其堂弟王環心(1901~1927)在1924年之時均於上海大學就讀，兩人同因其文藝創作而一時聞

學生政治運動與入黨問題》(1923年12月)與《學生與賭博》(1924年2月)二文，分別署名「華延年」、「華少峰」。在《平平旬刊》之後所首次發表者，則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61期(1925，上海)所刊之〈青年團體報告：社會科學研究會〉，署名「少峰」。如上所述，可知華崗當時所用的筆名多為「少峰」無疑。以上見：向陽，〈華崗著作年表〉，《衢州文史資料》，第6輯(1989，衢州)，258；華丹坡、李彥英，〈華崗著作年表補遺〉，收錄於劉培平編，《戰士·學者·校長 華崗同志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467。

⁶⁶² 傅能華，〈華崗〉，收錄於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281~312。

⁶⁶³ 王慶祥，《范船僧》(浙江：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7)，2。

⁶⁶⁴ 〈崔曉立〉，《浙江人物簡志》，下冊(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280；崔紅軍等，〈回憶爸爸崔曉立烈士〉，《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1981，浙江)，44-54。

⁶⁶⁵ 關於《上大五卅特刊》可見：黃美真、石源華、張云編，《上海大學史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240~241。

⁶⁶⁶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194~195。

⁶⁶⁷ 胡慶雲，《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355。

⁶⁶⁸ 〈徐介藩〉，收錄於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197~198。

⁶⁶⁹ 〈調和與革命〉，《平平旬刊》，第4期(1924，上海)，1~2。

⁶⁷⁰ 〈廣告一〉，《平平旬刊》，第8期(1924，上海)，8。

⁶⁷¹ 王傳厚，〈中共安徽省第一任省委書記——王步文傳略〉，收錄於安徽省政協《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編委會編，《革命中堅》(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85~88。

				名，出版有《海上棠棣》一書。王秋心曾在 1924 年春天受孫中山接見，並受中共派遣回江西進行革命活動。 ⁶⁷² 1923 至 1925 年間，曾以本名在《覺悟》副刊發表文章。
台灣				
(12)	沫雲	許乃昌	4	許乃昌 (1907~1975?)。詳見正文
(13)	花蕾、蕾	彭華英 (?)	2	彭華英 (1893~1968)。《平平旬刊》中署名「花蕾」與「蕾」的文章，均與台灣問題有關；「花蕾」這一署名，則令人聯想到「華英」二字，也許可以推定「花蕾」與「蕾」即彭華英的筆名。
(14)	逸民	林耕餘 (?)	1	林耕餘 (生卒年不詳)。江亢虎曾云：「林君生閩南晉江。寄居臺灣，留學東京。畢業高師。今入南方大學文科。專攻國學。」 ⁶⁷³ 江亢虎南遊東南亞時，只帶了林耕餘隨行。在《台灣民報》創刊初期，常見林耕餘以「逸民」、「海外逸民」之名發表文章。後來林耕餘曾以南方大學附屬中學學監的名義，出席 1926 年 11 月舉行於日本長崎的「亞細亞民族會議」，負責翻譯工作。 ⁶⁷⁴
(15)	真一	張沐真 (?) 施文杞 (?)	6+1*	「真一」或「貞」，有兩種可能。(1)張煥珪 (1902~1980，台中人)。張煥珪即《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平社成員「張沐真」。據秦賢次指出，張煥珪也曾在上海大學學習，並曾在《平平旬刊》上發表文章。但是《平平旬刊》上並未有署名「沐真」的作者，或可推測「真一」或「貞」即張煥珪；當然「真一」與「貞」也可能並非一人。不過，在 1924 年 9 月底發行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工餘》上，有署名「一真」的譯稿；1928 年 3 至 6 月間，無政府主義刊物《革命》週報上，也能看見署名「真一」或「一真」的作者。上述這些類似的筆名間的聯繫為何？是否張煥珪便是「真一」？此事仍待考證。但在《平平旬刊》上，「真一」與「貞」均以台灣問題為寫作主題，則是無疑的。 ⁶⁷⁵ (2)施文杞 (生卒年不詳)。「真一」在其發表於《平平旬刊》的〈台灣怎麼樣了〉中， ⁶⁷⁶ 寫作了一則寓言，以「華先生」、「女兒」、「倭寇」，分別代表著中國、台灣，與日本。這種寫作手法與同年 2 月 11 日發表於《台灣民報》的寓言小說〈台娘悲史〉極類似。 ⁶⁷⁷ 〈台娘悲史〉由留學於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所寫，是台灣本土白話小說的先驅。施文杞同時也是上海台灣青年會成員的成員，《台灣民報》創刊初期的重要作者。〈台娘悲史〉使當期《台灣民報》在台灣遭禁。這兩則極為雷同的文章，說明「真一」不但可能是「張煥珪」，也可能是就讀於南大的「施文杞」。若從南大與「平社」的關係來看，似乎更能加強後一推測。
(16)	貞		1	
朝鮮				
(17)	尹蘇野、蘇野	尹滋英	3	尹滋英 (1894~1938)。尹滋英 (1894~1938)。尹滋英，曾用名蘇野、S.Y.生，加入中共後用名「丁一英」。曾任朝鮮青年會聯合會領導工作的執行委員，並是「大韓民國」上海臨時政府改造派的核心。他

⁶⁷² 王秋心，〈親切的教誨 難忘的記憶——回憶孫中山先生兩事〉，《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6 輯 (1981，江西)，26~28；戴啟棠，〈王環心〉，收錄於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英烈》(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66~72。

⁶⁷³ 江亢虎，《江亢虎南游迴想記(第 5 版)》(上海：中華書局，1928)，4。

⁶⁷⁴ 周斌，〈亞細亞民族會議與中國的反對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06 年第 3 期 (2006，北京)，128~159。

⁶⁷⁵ 秦賢次，〈《新知識》導言〉，收錄於《新知識》復刻本 (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7；坂井洋史、嵯峨隆編，《原典中國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解題・總目次，152~155，168。

⁶⁷⁶ 真一，〈台灣怎麼樣了？〉，《平平旬刊》，創刊號 (1924，上海)，9。

⁶⁷⁷ 施文杞，〈[寓言小說]台娘悲史〉，《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2 號 (1924，東京)，15~16。作者又稱此篇為〈台娘痛史〉。見：淚子 (施文杞)，〈是我的罪〉，《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6 號 (1924，東京)，13。

				同時也是上海高麗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後來則任職於朝鮮共產黨滿州省委，並曾加入過中共。 ⁶⁷⁸
日本				
(18)	佐野學	佐野學	1	佐野學（1892~1953），早期日本共產黨領袖，1933年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叛黨。其發表於《平平旬刊》的文章譯者不明。
(19)	田口運藏	田口運藏	1	田口運藏，生平不詳。目前僅知他曾化名「乃木」，代表日本出席第一次遠東民族大會（1921.1.21~2.2）。 ⁶⁷⁹ 本文由「任一」所譯。
(20)	平林初之輔	平林初之輔	1	平林初之輔（1892~1931），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奠基人。因1922年在《播種人》雜誌發表《文藝運動與工人運動》而嶄露頭角。 ⁶⁸⁰ 本文由「真一」所譯。
無法確認				
(21)	王之石	不明	6	目前無法考察三人之身分，但在《覺悟》副刊上，均能看到署此三名的文章。其中「王之石」與「扶雅」的文章均集中於1923至1924年，且與《平平旬刊》上的同名投稿一樣，多為詩歌、小說類的藝文性文章。從二者所署之寫作地點來看，當時均在上海。
(22)	一之	不明	2	
(23)	扶雅	不明	1	
(24)	同舟	不明	4	
(25)	白弓	不明	1	



⁶⁷⁸ 金喜坤，〈追封建國勳章的被遺忘的革命家尹滋英——領導社會主義獨立運動的朝鮮共產黨核心領導〉，《新東亞》，第48卷第1號（2005，首爾），432~443。

⁶⁷⁹ 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2卷（東京：大月書店，1987），135、506、561、609。

⁶⁸⁰ 劉柏青，《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5），26~27。

表 4-4：1924 年前後上海台灣人諸組織的活動簡表

No.	日期	事件內容
(01)	1923.10.06	「上海台灣青年會」在上海南方大學成立，辦事處設於開北寶山路振盛里 948 號。([A] , 84 ; [O] , 164) ⁶⁸¹
(02)	1923.11.10	《中國青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登出「台灣赤華會」關於廈門「台匪」之宣言。([B])
(03)	1923.11.23	許乃昌將「台灣赤華會」之宣言轉投《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 ([C])
(04)	1923.12.20	北京《學匯》登出《平平旬刊》出版預告。([D])
(05)	1924.01.12	上海台灣青年會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召開「新年會」，或稱「上海台灣人大會」。通過譴責治警事件之宣言。([A] , 86~87 ; [F] ; [G] ; [H] ; [I]) ⁶⁸²
(06)	1924.3 月上旬	上海台灣青年會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召開春季大會。([O] , 164 ; [J])
(07)	1924.03.13	本日上海《民國日報》述及佐野學潛行至滬之事。平社機關刊物《平平》即有佐野之文章〈過上海〉。旋即引起日本警察機關的注意。([E] ; [N])
(08)	1924.04.01	平社正式發行《平平旬刊》。中有台灣青年會成員參與研議。事務所在「洽[哈]同路民厚北里四零八號」。([A] , 96 , 245 ; [O] , 167~168) 通信處為四川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羅倜儻」。
(09)	1924.04.03	上海台灣青年會委員林鵬飛(林堯坤)被駐滬日領事館叫去，拘留一星期。([M])
(10)	1924.04.05	上海台灣青年會召開本年第四次委員會，議決(一)本年六月中發行本會季刊，(二)向各方捐募基金，(三)舉連啓南為東京方面通信員，(四)會員林鵬飛脫離本會。([K])
(11)	1924.04.07	台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訪問東京的《台灣民報》社，詢問上海所召開的臺灣人大會以及上海台灣青年會要出版雜誌的事宜。([M])
(12)	1924.04.11	《平平旬刊》第 2 期發行，通信人改為「王德豐」。
(13)	1924.04.21	《平平旬刊》第 3 期發行。
(14)	1924.04.23	本日上海《民國日報》再及佐野學潛行至滬之事。([L])
(15)	1924.04.25	「赤華黨」建黨會議在台中舉行，選出五名執行委員。
(16)	1924.05.01	《平平旬刊》第 4 期及《五一紀念特刊》發行。
(17)	1924.05.09	上海台灣青年會幹部與部分朝鮮人參加「國民對日外交大會」之國恥紀念日大會。並在市中散發傳單。([A] , 87 ; [O] , 166)
(18)	1924.05.11	《平平旬刊》第 5 期發行。
(19)	1924.05.21	《平平旬刊》第 6 期發行。
(20)	1924.05.24	本月，上海台灣青年會負責張羅經費的林堯坤因詐欺案被捕，使該會活動因經費問題陷入停滯。([A] , 89) 停頓後的上海台灣青年會，5 月 24 日在幹部蔡孝乾的主持下，將辦事處移至「法租界[巨]籟達路鉅興里六號」。([A] , 89)
(21)	1924.05.31	5 月前後，上海台灣青年會幹部與平社關係台灣人共同組織「台灣自治協會」，辦事處設於平社以及法租界巨籟達路鉅興里六號的上海台灣青年會內。([A] , 90 ; [O] , 168) 5 月 31 日，台灣自治協會發表〈台灣自治協會宣言〉([A] , 90-91)
(22)	1924.06.01	《平平旬刊》第 7 期發行。
(23)	1924.06.11	《平平旬刊》第 8 期發行。
(24)	1924.06.17	本月，上海台灣青年會發出檄文散發於島內及各地，反制「全島有力者大會(6.27 舉行)」。([A] , 88~89) 6 月 17 日，上海台灣青年會與台灣自治協會在務本專校召開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集會，散佈傳單數萬份。([A] , 87~88 , 91 ; [O] , 166~170) 本章內文討論的「赤華黨」也可能參與其中。
(25)	1924.06.20	「赤華黨」建黨會議在上海舉行，正式宣告建黨。
(26)	1924.06.21	《平平旬刊》第 9 期及增刊發行。
(27)	1924.06.25	台灣自治協會印發傳單。([A] , 91)

⁶⁸¹ 這兩則史料均以 10 月 12 日為成立日，但據謝廉清於同年 10 月 10 日寄給《台灣民報》的報導，卻是 10 月 6 日。此處以謝為準。見：虛無(謝廉清)，〈上海台灣青年會之創立〉，《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 號(1924，東京)，13。

⁶⁸² 另外，目前只有《台灣民報》將上海台灣人大會說為「1 月 14 日」舉行。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8 號(1924，東京)，第 16 版。

(28)	1924.06.29	本日下午三點，台韓同志會正式成立於才[戈]登路南方大學。這一組織的成立，曾有台灣青年會幹部及「文協上海支部」成員參與研議。([A] , 103~104 ; [O] , 170~172) ⁶⁸³
(29)	1924.07.10	台灣自治協會成員向中國各學校團體新聞社散佈傳單。([P] , 175~177)
(30)	1924.07.29	本日晚，台韓同志會在霞飛路上海商科大學第一講堂召開「台鮮人大會」，分發數萬份傳單。並製作要求中華全國學生總會允許臺鮮人入會的案文。([A] , 104 ; [S] , 204~206)
(31)	1924.07.31	台灣自治協會成員向中國各學校團體新聞社散佈傳單。([Q] , 198~200)
(32)	1924.08.02	本日，日本情報指出，台韓同志會現有八九十名成員，製有會徽，並有組織暗殺隊的打算。([R] , 200~204)
(33)	1924.08.05	台韓同志會派遣會員至中華全國學生總會的預備會會場（舉辦於復旦大學中學部），分發傳單。並計劃在將來的大會上進行大大的宣傳。([T] , 207~209)
(34)	1924.08.14	台韓同志會在中華全國學生總會預備會上散發傳單，並在 8 月 15 日與該會學生代表一同被招待於某餐廳。([U] , 209~211)
(35)	1924.08.21	台灣自治協會派遣會員在「市民外交大會」上向八百餘名聽眾述說台灣人的悲慘境遇，並分發傳單。([A] , 91 ; [V] , 213~216)
(36)	1924.08.28	台灣自治協會至「全國學生大會準備會」（舉辦於南洋大學中學部）散發傳單，「要求收復失地、同情台灣人、並煽動他們抵抗日本」。([A] , 92 ; [V] , 213~217)
(37)	1924.08.31	台韓同志會在「國貨維持會」舉辦的「第一次國貨救亡大會」會場上，攜帶傳單申請演說，然以外國人而遭拒，散發傳單後離開。([A] , 106~107 ; [V] , 213~219)
(38)	1924.09.22	台灣自治協會在務本專校開會。決議繼續進行運動，並在附近散發傳單。([A] , 92 ; [V] , 213~218)
(39)	1924.11.16	上海台灣青年會召開青年會秋季大會（於閘北公興路共和樓茶館）。同會將青年會改組為「旅滬台灣同鄉會」。([A] , 89)
(40)	1924.11.30	台韓同志會委託「國立南洋大學學生會」散發傳單。([A] , 107)
(41)	1924.12.02	台灣自治協會在上海大學學生會散發傳單。([W])
(42)	1924.12.11	台灣自治協會在「務本英文學校」舉行「茶話會」。([A] , 92 ; [W]) ⁶⁸⁴
(43)	1924.12.14	台韓同志會在「對日外交會」之第八次國貨會（舉辦於愛而近路紗業公所），散佈傳單。([X] , 224~225)
(44)	1924.12.21	台韓同志會、「中韓台友誼會」在「對日外交會」之第九次國貨會（舉辦於愛而近路紗業公所）散佈傳單。([X] , 224~225)
(45)	1924.12.23	台韓同志會在東方大學召開的學生會散佈傳單。([X] , 225)
(46)	1925.1 月	旅滬台灣同鄉會因經費不足而無力再興。1 月份，許又銘、謝呂西、林振聲等人以台灣同鄉會名義召集，但失敗。([A] , 89~90)
(47)	1925.01.04	台韓同志會在務本英文學校召開茶話會並散佈傳單。([X] , 225)
(48)	1925.01.10	中韓台友誼會在天后宮內的「對日外交市民大會」散發傳單。([Y] , 236~237)
(49)	1925.01.18	中韓台友誼會在天后宮內的「江蘇同鄉會」散發傳單。([Y] , 236~237)
(50)	1925.01.26	中韓台友誼會在「學生總會」散發傳單。([Y] , 237)
(51)	1925.02.02	台韓同志會在「勸業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會」散發傳單。([Y] , 237)
(52)	1925.02.16	中韓台友誼會與台韓同志會在「東方大學」開學式後，散發傳單。([Y] , 237)

[A]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

[B] 代英，〈中國的分立運動〉，《中國青年》第 4 期（1923，上海），7。

[C] 乃昌，〈被壓迫民族的呼聲〉，《覺悟》，1923 年 11 月 23 日，第 4 版。

[D] 〈介紹新著〉，《學匯》，1923 年 12 月 20 日，轉引自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 4 卷（北京：三聯書店，1979），350。

[E] 〈日當局偵共產主義者〉，《民國日報》，1924 年 3 月 13 日，第 11 版。

[F] 〈[本埠消息]旅滬台灣人將開大會。假寶山路某處舉行〉，《民國日報》，1924 年 1 月 10 日，第 8 版。

⁶⁸³ 這兩則史料均將「戈登路」記為「才登路」，誤。

⁶⁸⁴ 這兩則史料中，《台灣社會運動史》所提到的茶話會記載為 12 月 1 日，所描述情形同於 11 日者，可能即是同一場集會。本文選擇 12 月 11 日，乃預設當時的情報資料較《台灣社會運動史》可靠之故。

- [G] 〈台灣人在滬集會〉，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月13日，第10版。
- [H] 〈旅滬台灣人秘密集議。在滬人數之調查〉，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月17日，第10版。
- [I] 〈在滬台灣人ノ決議文提出ニ関スル件(1924.1.17)〉，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第107頁影像。
- [J] 〈[團體消息]台灣旅滬青年會〉，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8日，第11版。
- [K] 〈[團體消息]台灣青年會〉，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4月7日，第11版。
- [L] 〈日共產黨領袖來滬說〉，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4月23日，第11版。
- [M] 〈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1號(1924，東京)，第16版。
- [N] 〈共產黨機關雜誌「平平」(1924.6.10)〉，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紀錄》，編號B03040865600。
- [O] 〈在上海一部台灣青年學生等行動ニ関スル件(1924.7.14)〉，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P] 〈在上海一部台灣青年學生等ノ傳單配布ニ関スル件(1924.7.2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Q] 〈在上海一部台灣青年學生等ノ傳單配布ニ関スル件(1924.7.31)〉，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R] 〈臺韓同志會ノ規約其他ニ関スル件(1924.8.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S] 〈臺韓同志會主催ノ臺鮮人大會ノ件(1924.8.12)〉，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T] 〈中華全國學生總會豫備會ニ於ケル臺韓同志會ノ宣傳ニ関スル件(1924.8.20)〉，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U] 〈中華全國學生總會豫備會ニ於ケル臺韓同志會ノ宣傳ニ関スル件(1924.8.30)〉，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V] 〈在上海台灣自治協會及台韓同志會ノ宣傳ニ関スル件(1924.10.6)〉，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W] 〈台灣自治協會ノ傳單配布ノ件(1924.12.27)〉，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紀錄》，編號B03041024600。
- [X] 〈台韓同志會ノ傳單配布ニ関スル件(1925.1.14)〉，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 [Y] 〈中韓台友誼會及台韓同志會ノ傳單配付ニ関スル件(1925.3.4)〉，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ノ台灣人ノ部(4.3.2.2-2)》。

表 4-5：「表 4-4」簡示

	上海台灣 青年會	赤華黨 台灣赤華會	平社	台灣自治協會	台韓同志會	中韓台友誼會
1923.10.06	(01)					
1923.11.10		(02)				
1923.11.23		(03)				
1923.12.20			(04)			
1924.01.12	(05)					
1924.3 月上旬	(06)					
1924.03.13			(07)			
1924.04.01	(08)		(08)			
1924.04.03	(09)					
1924.04.05	(10)					
1924.04.07	(11)					
1924.04.11			(12)			
1924.04.21			(13)			
1924.04.23			(14)			
1924.04.25		(15)				
1924.05.01			(16)			
1924.05.09	(17)					
1924.05.11			(18)			
1924.05.21			(19)			
1924.05.24	(20)					
1924.05.31	(21)		(21)	(21)		
1924.06.1			(22)			
1924.06.11			(23)			
1924.06.17	(24)	(24)		(24)		
1924.06.20		(25)				
1924.06.21			(26)			
1924.06.25				(27)		
1924.06.29	(28)				(28)	
1924.07.10				(29)		
1924.07.29					(30)	
1924.07.31				(31)		
1924.08.02					(32)	
1924.08.05					(33)	
1924.08.14					(34)	
1924.08.21				(35)		
1924.08.28				(36)		
1924.08.31					(37)	
1924.09.22				(38)		
1924.11.16	(39)					
1924.11.30					(40)	
1924.12.02				(41)		
1924.12.11				(42)		
1924.12.14					(43)	
1924.12.21					(44)	(44)
1924.12.23					(45)	
1925.1 月	(46)					
1925.01.04					(47)	
1925.01.10						(48)
1925.01.18						(49)
1925.01.26						(50)
1925.02.02					(51)	
1925.02.16					(52)	(52)

表 4-6：各種組織及刊物的中文、英文、俄文名稱對照表

(並具音譯與義譯者，均分行處理)

No.	白安娜碩論所用漢字	白安娜碩論所用英文	郭、白專書所用俄文	〈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所用英文	正確原名或可供參考的名稱
(01)	赤華黨	Red China Party, RCP	Партия Красного Китая, ПКК	The Red Celestial Party	台灣赤華會
			чи хуа дан	Sehikwotow	
(02)	平社★	Pingshe	Общество “Равенство”	Levelers	——
			Пиншэ	Heisha	
(03)	平平	Pingping	Журнал “Пинпин”	Hei-hei	——
(04)	台灣改造同志會★	Taiwan Reform Society	Тайван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реформ		可能是「台灣同志會」 ⁶⁸⁵
(05)	晨鐘會★	society “Bell”	Общество “Колокол”	Morning Bell	曉鐘會 ⁶⁸⁶
				Gyoshokai	
(06)	社會問題研究會★	Social Problem Study Society	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
(07)	上海青年會★	Shanghai Youth League	Шанха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тайвань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上海台灣青年會
(08)		the trade union of the printing workers	профсоюза печатников		印刷製本業工人的工會
(09)	無產階級政治研究會台灣支部	the Political Study Proletarian Society, Taiwan Branch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可能即日本「政治研究會」的台灣支部
(10)	共產主義同志會	Communist Comrade Society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оварищ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可能是「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
(11)	台灣民報	略	略	略	略

說明：臺灣人許乃昌抵達蘇聯之後，1924年10月27日遞交一份材料給蘇方，材料題為〈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 (Доклад 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Тайване)〉。據發掘史料者轉述，這份報告包括了關於島內地理、人口、經濟，以及政治情勢的幾個部份，也包括台灣人在島內、上海，及日本所組成之各種左翼組織的細節，是共產國際關於台灣形勢的第一手資料。⁶⁸⁷這份報告在2003年由當時正在政治大學留學的研究生白安娜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首先運用於其碩士論文《台灣共產黨與共產國際 (1928~1931)》(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⁶⁸⁸2005年，白安娜與郭杰 (К. М. Тертцкий) 合撰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 (1924~1932)》(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1924-1932гг.))⁶⁸⁹一書再次提及。然就討論許乃昌的這份報告以及1924年之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而言，2005年這部專著的內容並未超越2003年的論文更多，幾乎只是白安娜碩士論文的轉譯。不過上述兩書均未指明許乃昌報告的原文為何。

⁶⁸⁵ 黃玉齋曾指出「台灣同志會」於：「一九二五年」「成立於上海」。但成立時間顯然與此處的1924年有落差。見：漢人(黃玉齋)，《台灣革命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160~164。

⁶⁸⁶ 〈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所用拼音顯然以日語為準。從其拼音來看，郭杰與白安娜二人所譯的「晨鐘會」有誤，應為「曉鐘會」。至於「赤華黨」的翻譯則無誤。

⁶⁸⁷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45.

⁶⁸⁸ 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2003). 全書以英文寫成。本文亦有電子檔收於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網，唯其排版格式異於紙本。

⁶⁸⁹ К. М. Тертц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其研究部分為俄文，檔案部份為英、俄、德文。

表 4-7：許乃昌所謂的十三名台灣左翼積極份子（對照表 4-6）

No.	白安娜碩論及郭、白專書所用漢字	正確原名或可供參考的名稱	白安娜碩論所用英文	郭、白專書所用俄文	學經歷 (欄內號碼請參見表 4-6)
(01)	連溫卿	(同左)	Lian Wenqing	Лянь Вэньцин	師範學校畢業， ⁶⁹⁰ 曾在小學當老師。(9)的創建者。
(02)	賴維種	(同左)	Lai Weizhong	Лай Вэйчжун	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1924 年居住於北京。中共黨員 ⁶⁹¹
(03)	王傳枝	陳傳枝(?)	Wang Chuanzhi	Ван Чуаньчжи	台灣記者。(01)與(02)的成員。 ⁶⁹²
(04)	張煥珪	張煥珪	Zhang Huanwei	Чжан Хуаньвэй	中學畢業。(01)與(02)的成員。 ⁶⁹³
(05)	吳沛然	(同左)	Wu Peiran	У Пэйжань	在中國學習。(01)與(02)的成員。 ⁶⁹⁴
(06)	黃呈聰	(同左)	Huang Chengzong	Хуан Чэнцун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11)的記者。
(07)	黃周	(同左)	Huang Zhou	Хуан Чжоу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11)的記者。 ⁶⁹⁵
(08)	謝廉清	(同左)	Xie Lianqing	Се Ляньцин	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11)的記者，(01)與(02)的成員。 ⁶⁹⁶
(09)	李金錄	李金祿	Li Jinlu	Ли Цзиньлу	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 ⁶⁹⁷
(10)	曹登洲	黃登洲	Xun Dengzhou	Сюнь Дэньчжоу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10)的創建者、(05)的積極份子。 ⁶⁹⁸
(11)	呂盤石	呂磐石	Liu[Lü] Panshi	Люй Паньши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05)的積極

⁶⁹⁰ 「師範學校 (Normal College /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лледжа)」更正確的譯法可能是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範部」。但世言均云連溫卿只唸到公學校。

⁶⁹¹ 賴維種，臺南商業專門學校畢業。見：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189；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2），616。

⁶⁹² 可能即《台灣社會運動史》視為平社成員的「陳傳枝」。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5。

⁶⁹³ 白安娜將「張煥珪」記為「張煥珪」，誤。張煥珪畢業於公立臺中中學校，後來進入明治大學就讀。可見：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110；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570；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224；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247。

⁶⁹⁴ 可能即《台灣社會運動史》視為平社成員的「吳沛法」。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5。

⁶⁹⁵ 即黃醒民，又名省民。國語學校師範部、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畢業。可見：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128；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154。

⁶⁹⁶ 謝廉清應就讀於「台中商業學校」。關於謝廉清的研究，詳見本文第六章，或見：邱士杰，〈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 1924 年（4）〉，《批判與再造》，第 38 期（2006，台北），28~38。

⁶⁹⁷ 可能是「李金祿」。日本大學法科畢業。見：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404；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435。

⁶⁹⁸ 應為「黃登洲」，明治大學畢業。見：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157。細節請見正文。

⁶⁹⁹ 白安娜將「呂磐石」記為「呂盤石」，誤。呂磐石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商科。可見：興南新聞社編，

					份子，(09)的創建者。 ⁶⁹⁹
(12)	蔡炳曜(耀)	蔡炳曜	Cai Bingyao	Цай Биньяо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11)的記者，(01)與(02)的成員。 ⁷⁰⁰
(13)	蔡珍曜	(同左)	Cai Zhengyao	Цай Чжэнья	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11)的記者，(02)的成員，蔡炳曜的弟弟。



《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468。

⁷⁰⁰ 《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蔡炳曜」。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記為「蔡炳耀」。《台灣》，第三年第八號則記為「蔡炳耀」。而近年關於蔡惠如的專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全書記為「蔡炳曜」。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27、163、338、357、366；《台灣》，第3年第8號，69；謝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

表 4-8：上海各事件、組織的關係人列表（以 1924 年上海為中心）

◎代表關係人，●代表平社成員或平平同人，★為赤華黨成員，【】括號內表所任職務，()括號表化名、別名

No.	關係人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上海台灣青年會創始幹部(表 4-4 : [A], 84)	上海台灣人大會記載一(表 4-4 : [A], 86 ~ 87)	上海台灣人大會記載二(表 4-4 : [I])	平平同人(表 4-2 : 表 4-3)	平社成員記載一(表 4-4 : [O], 167 ~ 168)	平社成員記載二(表 4-4 : [A], 96)	平社成員記載三(表 4-4 : [A], 245)	台韓同志會發起人(表 4-4 : [A], 103 ~ 104)	恥政紀念日參與者(表 4-4 : [A], 87 ~ 88、91)	4-7 許乃昌及其所謂十三名左翼積極份子(表 89)	89 上海台灣青年會改組後幹部(表 4-4 : [A],	旅滬台灣同鄉會幹部(表 4-4 : [A], 89)
大陸人													
(01)	羅任一				●	●(羅豁、羅志道)							
(02)	盧劍波				●								
(03)	賀威聖				●								
(04)	姜冰生				●								
(05)	華崗				●								
(06)	崔曉立				●								
(07)	秦滌清				●								
(08)	徐介藩				●								
(09)	劉一清				●								
(10)	王秋心				●								
(11)	卓武初 701					●	●						
台灣人													
(12)	某共產主義者 702							●					
(13)	連溫卿										◎		
(14)	連枝旺		◎	◎					◎			◎【總務部】	
(15)	路夢榮			◎									
(16)	賴維種										◎		
(17)	許水	◎【庶務科】											
(18)	許乃昌	◎【文書科】	◎		●		●	●	◎		●		
(19)	彭華英				●	●	●		◎				
(20)	蔡炳耀					●	●				●★		

⁷⁰¹ 《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卓武初視為朝鮮人，但實際上是廣東人，並是何海鳴所創辦之北京《僑務旬刊》的上海代辦員。《平平旬刊》曾登載有《僑務旬刊》之廣告，也許正說明了兩份刊物之間的關係。可參見表 4-2 : (36)。關於卓武初，可見：〈在上海一部台灣青年學生等行動二關スル件 (1924.7.14)〉，收錄於《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 (4.3.2.2-2)》；胡訓珉、賀建，《上海幫會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17。

⁷⁰² 《台灣社會運動史》謂之從東京逃到上海，並與蔣渭水有密切聯繫。

	(曜)													
(21)	蔡珍曜										●★			
(22)	蔡孝乾							●		◎			◎【出版部】	
(23)	林耕餘				●									
(24)	林堯坤	◎【會計科】	◎(林鵬飛)			●							◎【會計部】	
			◎(林鵬飛)											
(25)	林瓊樹		◎	◎										
(26)	林存本			◎										
(27)	林維金									◎			◎【文書部】	
(28)	李金錄										◎			
(29)	李孝順	◎【會計科】	◎											
			◎											
(30)	張煥桂				●?		●(張沐真)					●★(張煥桂)		
(31)	張我軍		◎											
(32)	張樂君			◎										
(33)	張漢樹			◎										
(34)	張桔梗		◎											
(35)	張吉敬			◎										
(36)	張深切									◎				
(37)	施文杞	◎【文書科】			●?									
(38)	吳沛然 703							●(吳沛法)				●★(吳沛然)		
(39)														
(40)	陳傳枝							●(陳傳枝)				●★(王傳枝)		
(41)	陳滿盈		◎											
(42)	甘文芳		◎											
(43)	高金義												◎【總務部】	
(44)	黃呈聰										◎			
(45)	黃康榮			◎										
(46)	黃載鑫			◎										
(47)	黃周										◎			
(48)	洪輯德												◎【文書部】	
(49)	洪輯洽									◎				
(50)	謝廉清		◎	◎								●★		
(51)	謝雪紅										◎(謝氏阿女)			
(52)	黃登洲											◎(黃登洲)		
(53)	呂磐石											◎(呂盤石)		
(54)	游金水	◎【庶務科】					●							
(55)	王金章												◎【會計部】	
(56)	鄭進來		◎											
(57)	鄭雲鵬			◎										
(58)	羅渭章		◎	◎										
朝鮮人														
(59)	尹滋英				●		●(尹滋英)							
							●							

⁷⁰³ 《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吳沛法」。但外務省記錄的檔案與郭杰與白安娜所轉述的許乃昌報告均記為「吳沛然」，由於外務省記錄的形成年代較早，可信度較《台灣社會運動史》為高。如果正確記載為「吳沛然」的許乃昌報告是正確的，那末，《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陳傳枝」恐怕也應改為郭杰與白安娜所轉述「王傳枝」。可見：〈要視察台灣人／來往ニ関スル件(1929.5.7)〉，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紀錄》，編號 B04013163300，第 13 頁影像；〈要視察台灣人／來往ニ関スル件(1930.10.14)〉，收錄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紀錄》，編號 B04013163400，第 37 頁影像。

(60)	呂運亨					●	●						
日本人													
(61)	佐野學					●							
(62)	田口運藏					●							
(63)	平林初之輔					●							
身分不明													
(64)	王之石					●							
(66)	一之					●							
(67)	扶雅					●							
(68)	同舟					●							
(69)	白弓					●							



表 5-1：社會主義路線內的的兩條路線

文獻	路線 C	路線 S	選擇
1923 年的佐野學 ⁷⁰⁴		「國際的勞動革命」	路線 S
		「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	
		「世界共和國」	
1923 年的許乃昌 ⁷⁰⁵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無產階級運動」	路線 S
	「建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特殊階級的解放」		
1924 年的佐野學 ⁷⁰⁶		「全台灣人的解放」	路線 S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	
		「共產主義的日本」	
		「東洋共產主義聯邦」	
1924 年的平平同人：「尹蘇野」 ⁷⁰⁷		「歐羅巴共產主義聯邦」	路線 S
		「東洋革命」	
		「社會革命」	
		「自由的東亞社會」	
1924 年的平平同人：「真一」 ⁷⁰⁸		「東力[方]的社會革命」	路線 S
		「世界革命」	
1924 年的平平同人：「少峰」 ⁷⁰⁹	「共和」	「社會主義」	路線 S
	「民主主義」		
連溫卿		「無產階級運動」	路線 S
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	「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	「社會革命」	路線 S
	「全民族的國民革命」	「無產階級運動」	
	「國民運動」	「社會革命運動」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特殊階級的解放」	「全台灣人的解放」	
瞿秋白的回應	「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	「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路線 C
	「全民族的國民革命」		
	「全民族解放運動時期」	「單純的無產階級時期」	
范本梁 ⁷¹⁰	透過「弱小民眾（族）的革命運動」實現「無政府共產的社會」		路線 S
		「全世界的平民大革命」	
		「社會大革命」	
		「民眾革命」	

⁷⁰⁴ 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 4 年第 6 號（1923，東京），64~75。

⁷⁰⁵ 秀湖生，〈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 4 年第 7 號，43~46。

⁷⁰⁶ 佐野學，出處見表 4-2：(3)。

⁷⁰⁷ 尹蘇野，出處見表 4-2：(02)。

⁷⁰⁸ 真一，出處見表 4-2：(21)。

⁷⁰⁹ 少峰（華崗），出處見表 4-2：(62)。

⁷¹⁰ 斯民（范本梁），出處見表 3-2：(29)。

表 6-1：謝廉清在《台灣民報》所發表的文章列表

卷號	時間	頁	欄目	署名	標題
2 卷 1 號	1924.1.1	1 3	雜錄	虛無	上海台灣青年會之創立 (文末註明：「一九二三、十月十日稿」)
2 卷 5 號	1924.3.21	9	內外時報	廉清	北京通信：國務總理難免其責 ⁷¹¹
同上	同上	1 2	雜錄	北京廉清	對於今年暑假的希望 (文末註明：「一九二四、三、三、於朝大」)
同上	同上	1 0	雜錄	北京廉清虛 無	若廢姓則如何 (文末註明：「一九二四、二月廿五日」)
2 卷 6 號	1924.4.11	1 1	內外通信	廉清	北京通信
2 卷 7 號	1924.4.21	8	內外通信	廉清	北京通信
2 卷 8 號	1924.5.11	8	內外通信	廉	北京通信
2 卷 11 號	1924.6.21	8	通信	廉情 ⁷¹²	北京通信：神田正雄先生來京
2 卷 17 號	1924.9.11	2	內外時事	廉	北京通信
3 卷 1 號	1925.1.1	2	內外時事	廉清	北京通信

表 6-2：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
(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 目錄

頁數	作者	文章名稱	寫作日期
50	胡南湖	反帝國主義	1925.12.10, 「初稿」
10	許興凱	反帝國主義的教育	
5	熊得山	反帝國主義運動周	
9	王建侯	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時代意識	
7	呂一鳴	反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	
8	林可彝	反帝國主義與東方民族	1925.8.11
34	周敏侗	關稅會議與中國前途	1925.11.20, 「北京」
7	謝廉清(台)	帝國主義的運命	
4	金天友(韓)	怎樣打倒帝國主義	1925.8.8, 「於平大」 ⁷¹³
8	郭宗圭	一年來反帝國主義的進展	1925.5.8, 在「南昌青年會暑期學校」的 講演 ⁷¹⁴
11	張寧靜	帝國主義的道德觀	
15	胡南湖	五卅事件與反帝國主義運動	
107	李漢石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	1925.12 月, 「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秘書處」

⁷¹¹ 同欄目還有一則北京通信：〈中國憲法革命運動〉，不知是否亦為謝廉清所著。

⁷¹² 原文為「廉情」，應為「廉清」之誤。

⁷¹³ 按原書排為「一五二五」，應為「一九二五」之誤。見：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128。

⁷¹⁴ 按原書排為「一九五二」，應為「一九二五」之誤。見：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135。

主要參考文獻

一. 一九二零年代報刊

甲、大眾報刊

- 1 《中央日報》(南京)。
- 2 《文學旬刊》(上海)。
- 3 《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北京)。
- 4 《台南新報》(台南)。
- 5 《台灣》(東京)。
- 6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 7 《台灣民報》(東京、台北)。
- 8 《台灣青年》(東京)。
- 9 《台灣新民報》(台北)。
- 10 《民國日報》(上海、廣州)。
- 11 《國際事情》(南京《中央日報》副刊)。
- 12 《婦女週報》(上海《民國日報》副刊)。
- 13 《晨報》(北京)。
- 14 《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

乙、社會主義刊物

- 1 《中國青年》(上海)。
- 2 《今日》(北京)。
- 3 《台灣大眾時報》(東京)。
- 4 《台灣新青年》(廈門)。
- 5 《平平旬刊》(上海)。
- 6 《民鐘》(廣東)。
- 7 《春雷》(廣州)。
- 8 《新台灣》(北京)。
- 9 《新青年》(廣州、上海)。
- 10 《嚮導》(上海)。

二. 資料庫

- 1 台灣大學「中國國民黨史料資料庫」。

三. 個人文集

- 1 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東京：水曜會出版部，1923。
- 2 山川均著，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東京：勁草書房，1976。
- 3 山川菊榮，《山川菊榮集》。東京：岩波書店，1981~1982。
- 4 山川菊榮著，鈴木裕子編，《山川菊榮女性解放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84。
- 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

- 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 9 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編》。南京：現代印書館，1944。
 - 10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 周恩來著、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2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東京：大空社，1995。
 - 13 夏衍，《夏衍選集》。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
 - 14 馬伯援，《三十年的贖話》。台北：非賣品，1984。
 - 15 張仲實、曾葆華校譯，《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16 郭沫若，《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 17 陳獨秀著、三聯書店編，《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84。
 - 18 廖百芳，《濛江餘影》。出版地不詳，1928。
 - 19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 20 瞿秋白著、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21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2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

四. 檔案、文獻集

- 1 《外務省記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2 К. М. Терпщкий &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 3 上海市委黨史徵集委員會主編，《上海大學（一九二三—一九二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 4 山辺健太郎解說，《台灣（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 5 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年）》。北京：北京市檔案館，1991。
- 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 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 8 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三聯書店，1979。
- 10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 11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主編，《江蘇革命鬥爭紀略》。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
-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0。
-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台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1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文化」。（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1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民眾運動」。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1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政治」。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1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 18 五十周年籌備委員會編，《國立北京大學歷屆同學錄》。北京：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
- 19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
- 20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輯，《反帝國主義概要》。上海：經濟研究會，1926。
- 21 日本共產黨史資料委員會編，《共產國際關於日本問題方針、決議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
- 2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警察機關の構成》。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
- 2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中譯本分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
- 24 未註明編輯者，《打倒帝國主義》。上海：公理書店，1927。
- 25 江西省文化廳革命文化史料徵集工作委員會等編，《中央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 26 李漢石（李伯剛），《反帝國主義運動》。上海：經濟研究會，1925年12月以後出版
- 27 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東京：大月書店，1981。
- 28 松尾尊允編，《社會主義沿革（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
- 29 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政治研究會·無產政黨組織準備委員會》。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3。
- 30 孫武霞、許俊基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1 高軍等主編，《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32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三聯書店，1979。
- 33 黃美真、石源華、張云編，《上海大學史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 34 楊昭全編，《關內地區朝鮮人反日獨立運動資料匯編》。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87。
- 35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 36 賈桂芳編，《文學研究會資料》。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37 坂井洋史、嵯峨隆編，《原典中國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東京：綠蔭書房，1994。

五. 日記、回憶錄、傳記

- 1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 白堅武，《白堅武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3 江亢虎，《江亢虎南游迴想記（第五版）》。上海：中華書局，1928。
- 4 李振芳、郭德欽，《日據時期南京、廣東臺灣學生的政治活動史：南京中臺

- 同志會、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抗日史實》(手抄本)。
- 5 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台中:中央書局,1947。
 - 6 張深切,《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
 - 7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 8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
 - 9 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 10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2004。
 - 11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
 - 12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
 - 13 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
 - 14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15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 16 蕭友山,《臺灣解放運動の回顧》。台北:三民書局,1946。
 - 17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

六. 工具書

- 1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 2 《舊殖民地人事總覽·台灣編》。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
- 3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7。
- 4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2。
- 5 河瀨蘇北編,《滿洲及支那辭典》。東京:東方文化協會出版部,1932。
- 6 長野朗,《支那事典》。東京:建設社,1940。
- 7 倪興祥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8 高希聖等編,《社會科學大詞典》。上海:世界書局,1930。
- 9 郝志群主編,《北京史百年論著資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10 湖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湖北:北人民出版社,2000。
- 11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 12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
- 13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

七. 其他專書

甲、中文

- 1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年夏「學習楊逵精神」。2007,台北。
- 2 三浦藤作著,謝晉青譯,《西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 3 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北平:新亞洲書局,1930。
- 4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黨史專題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 5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 6 尼姆·威爾士、金山著,趙仲強譯,《阿里郎之歌——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朝鮮共產黨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 7 市川正一著,田舍譯,《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北京:世界知識社,1954。
- 8 皮明麻,《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 9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10 伊·費·伊瓦辛著，春華等譯，《蘇聯外交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117~123。
- 11 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國革命的悲劇》。上海：嚮導書局，1947。
- 12 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1996。
- 13 吳壽彭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1929。
- 14 李鴻文，《三〇年代朝鮮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東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 15 杜章智編，李渚青、莫立知譯，《盧卡奇自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
- 16 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 17 沈志華主編、楊奎松等撰稿，《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 18 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
- 19 周俟松、杜汝森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 20 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 21 林華國，《近代歷史縱橫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22 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23 侯志平編，《世界語運動在中國》。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85。
- 24 思想編輯委員會編，《思想(3)天下、東亞、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
- 25 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26 若林正文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
- 27 埃倫·M·伍德著，王恆杰、宋興無譯，《資本的帝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28 徐善廣、柳劍平，《中國無政府主義史》。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 29 馬克·薛爾頓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89。
- 30 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31 許南村編，《反對言偽而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 32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3 陳其人，《陳其人文集——經濟學爭鳴與拾遺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34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 35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 36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 37 陳彬龢，《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上海：世界書局，1928。
- 38 陳惇主編，劉像愚、曾艷兵等著，《西方文學史》，第3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39 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
- 40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1997。
- 41 漢人（黃玉齋），《台灣革命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6。
- 42 裴京漢，《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43 趙樂，《西方現代派文學與藝術》。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6。
- 44 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45 魯迅博物館編，《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5。
- 46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 47 戴國輝著，林彩美主編，《台灣史研究集外集》。台北：遠流出版社，2002。
- 48 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 49 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 50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

乙、外文

- 1 Gyorgy Luka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 : the question of parliamentarianism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LB, 1972.
- 2 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1993. 中譯見路愛國、丁浩金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 3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Ralph Miliband, eds.,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4 ラッパポート著、山川菊榮譯，《社會進化と婦人の地位》。東京：改造社，1929。
- 5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1972。
- 6 比嘉春潮，《沖繩の歲月——自傳的回憶から》。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
- 7 布施勝治，《ソウエート東方策》。北京：燕塵社，1926。中譯可見：布施勝治著，半粟譯，《蘇俄的東方政策》。上海：太平洋書店，1927。
- 8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中譯可參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 9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娥房，1974。
- 10 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
- 11 長野朗，《支那の反帝國主義運動》。東京：行地社出版部，1927。
- 12 鈴江言一，《中国革命の階級対立》。東京：平凡社，1975。
- 13 衛藤瀋吉、許淑真，《鈴江言一伝》。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

八、期刊論文、文章

甲、中文

- 1 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
- 2 王凌雲，〈大革命時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黨史研究資料》，第5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3 王凌雲、胡淑敏，〈關於民權運動大同盟組織及其活動〉，《黨史研究資料》，第7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4 王遠義，〈無政府主義概念史的分析〉，《台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2004。
- 5 史可乘（連溫卿），〈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台北。
- 6 何池，〈「彭榮」究竟是誰——試析中共黨史上的一樁迷案〉，《黨史文苑》，第 6 期。2004，江西。
- 7 何艷艷，〈「國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蘇建交談判（1923~1924）〉，《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2005，北京。
- 8 李伯剛，〈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 4 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9 李達，〈回憶老漁陽里二號和黨的「一大」、「二大」〉，《黨史資料叢刊》，第 1 輯（總第 2 輯）。1980，上海。
- 10 李銀耕，〈羅任一在安陽的革命活動〉，《安陽文史資料》，第 6 輯。1991，河南。
- 11 林書揚，〈追述世紀的旗手周合源先生〉，《海峽評論》，37 期。1994，台北。
- 12 邱士杰，〈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上）〉，《批判與再造》，第 20 期。2005，台北。
- 13 邱士杰，〈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下）〉，《批判與再造》，第 21 期。2005，台北。
- 14 金良守，〈日本佔領時期韓國和台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 年冬季號，北京。
- 15 金富軍、蔡樂蘇，〈對義和團的認識變化及其政治意涵〉，《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59 卷第 2 期。2006，武漢。
- 16 殷敘彝，〈略談國際共運史的研究範圍、學科性質和現實意義〉，《國際共運史研究》，第 1 輯。1987，北京。
- 17 康基柱，〈「中韓互助社」述評〉，《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北京。
- 18 張景，〈安那其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活動片斷〉，《文史資料選輯》，第 90 輯。1983，北京。
- 19 張慶海，〈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兩個概念的理論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北京。
- 20 曹世鉉，〈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2 月號，湖南。
- 21 許之楨，〈關於新漁陽里六號的活動情況〉，《黨史資料叢刊》，總第 2 輯。1980，上海。
- 22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3 期。1954，台北。
- 23 連溫卿，〈台灣文化的特質〉，《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2 期。1954，台北。
- 24 連溫卿，〈再就台灣文化的特質而言〉，《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3 期。1954，台北。
- 25 連溫卿，〈城內的政治發展〉，《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4 期。1953，台北。
- 26 連溫卿著，佚名譯，〈日本對台殖民政策的真相〉，《台灣思潮》，第 1 期。1981，洛杉磯。
- 27 陳金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北京。
- 28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

- 權》，《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春「2.28：文學與歷史」。2006，台北。
- 29 陳雪嶺，〈《閒話揚州》與作者易君左其人〉，《民國春秋》，第4期。1998，南京。
- 30 陸發春，〈蘇雪林與胡適二則史實的考證〉，《魯迅研究月刊》，第12期。2003，北京。
- 31 陶季邑，〈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與陳金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北京。
- 32 彭澤湘，〈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5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33 黃志榮、黃妙珍，〈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區青年團組織發展概況〉，《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2期，上海。
- 34 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第1期第1期。1946，台北。
- 35 葉博夫，〈羅任一傳〉，《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89，四川。
- 36 彰生，〈日據時期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夏潮論壇》，第1卷第3期。1983.4，台北。
- 37 劉曼容，〈孫中山國民革命觀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廣東。
- 38 德里克著，譚翠鶯、曹義恆譯，〈東亞的現代性與革命：區域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3期，北京。
- 39 蔡依伶，〈理論陳映真與小說陳映真〉，《印刻文學生活誌》，12期。2004，台北。
- 40 駱耕漠，〈回憶崔曉立烈士在獄中〉，《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1981，浙江。
- 41 駱耕漠，〈赤誠的愛國主義者——紀念台灣義勇隊創立人李友邦〉，《文史通訊》，第6期。1982，北京。
- 42 戴國輝，〈探索《台灣警察沿革誌》有感——《台灣抗日運動史》中譯本出版代序〉，《海峽評論》，第117期。2000，台北。
- 43 薛曉建，〈非基督教運動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
- 44 謝蔭明，〈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黨史資料通訊》，總第4期。1982，北京。

乙、外文

- 1 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2003.
- 2 Hsiao, Frank S.T.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1983): 269-288.
- 3 松尾尊兌，〈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26號。2000，東京。
- 4 金喜坤，〈追封建國勳章的被遺忘的革命家尹滋英——領導社會主義獨立運動的朝鮮共產黨核心領導〉，《新東亞》，第48卷第1號。2005，首爾。
- 5 若林正丈，〈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1號。1978，東京。
- 6 戴國輝，〈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35卷第2號。1975，東京。
- 7 戴國輝，〈連溫卿の二つの日記〉，附錄於連溫卿，〈連溫卿日記——一九三

○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 39 卷第 1 號。1978，東京。中譯可見：
連溫卿原著，林勞歸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的三十三天——備忘
錄〉，《台灣風物》，第 36 卷第 1 期。1986，台北。



跋

一、回心

研究並針對這個題目進行寫作，並非我進入歷史學系之初即能想到的事情。

在第一次聯考失敗之後，由於理組數學只有十分，物理化學分別不超過五十（其中不少分數還是從滾鉛筆滾來的，我生平第一次滾鉛筆求答案就是在聯考考場上），做為跨組考生的我便跑到文科去念書。聯考的挫敗當然對我打擊很大，每當想起當時的挫敗，我還能想起當年暑假在涼州街寧夏路口吃滷肉飯以及金針排骨湯時的夏季蕭瑟場景：獨自等待，默默承受。最初進入的學校是我想都沒想到的東吳大學英文系，這是志願卡所造成的奇蹟。東吳大學是個校風很好的學校，特別是我學習的外雙溪校區。每次去上課都覺得有種奇異的心情，因為士林一帶的風光街景實在高尚地令我無法承受：高級名店、士林官邸、有錢人的住宅，當時新政府的首任行政院長 T 也住在那附近。如果一個不小心，車子就可以轉上更有錢的仰德大道。因此，從士林捷運站到東吳大學的沿路場景還有公車上的炫麗學姊們，讓我這個貧乏人始終有種不現實的感覺。雖然這種「金光大道」般的感覺並不符合於東吳學生本身（私立大學學生的家庭條件通常會比公立大學的學生更惡劣），但我身上仍有一種強烈的志不在此的意念。入學沒多久，我就跑去參加社團。整天耗在社團辦公室裡，弄了差不多一個多月，我就離開了學校，回家準備重考。所以我始終不曉得素書樓何在，也沒有因此而去故宮或者中影文化城。在家準備重考的日子是平靜而痛苦的。在冬日裡，唯一的樂趣就是騎上腳踏車去遠方吃鍋貼酸辣湯，然後逛個書店。隨著末代聯考的來臨，我迷迷糊糊地考上了政大歷史系。回憶起重考的時光，心中只能想起我在微冷的秋天裡騎著腳踏車的場景。

考上大學當然是很令人高興的事情，與此同時我比較積極地參與運動（movement, not exercise）團體的活動，此時正值八四工時鬥爭、經發會、九一一事件、女工邱惠貞自殺，以及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學生營隊。於是，隨著我放下心來準備進入大學學習，我的另一部分的生活也逐漸展開，而這部份的生活始終是與運動聯繫起來的。也許是對高中之前的那種生活狀態的逃避，我的大學生活從一開始就不是走用功路線。由於向好友阿啞哥發了偉願，立志是男人就不要搭一元公車，所以我在政大的一年就是整天看著小巴士從我的身旁呼嘯上山，然後我再追趕著爬上山上的季陶或百年。政大歷史的生活是閑逸快樂的，上山唸書，下山吃飯；沒事回家，有事也不會到校。當時有相當的生活是在寧夏路的蘇區度過的。從政大下山、搭公車，轉捷運，民權西路站下車，然後向著台北橋走，繞過一堆葬儀社的擺設、加油站，就可以到蘇區。老實說，我現在也想不到最初的那一年我到底在那兒做了些什麼事情。不過那時的學運出現了奇異的復興趨勢。世新、東海、中興等校的同學們組成了新的跨校學生組織，台大與台北大學的同學則先後參與並退出。我對這次集結與詳細過程沒有發言的資格。在這些同學們的努力下，反智財權、反反盜版的運動應聲而起。我也參與其中。此時大約是 2002 年的夏天。

我在政大歷史的學習乃至對於歷史的認真，是從一年級的下學期才開始的。其實這個學期我也開始搞社團，但搞了之後才發現自己能力不足。與此同時，那學期新任教的王德權老師賦予了我一種就是我要的歷史學及其觀念。然而隨著我的史導被當、轉學意外成真，我也就離開了政大。從二年級開始，我成為了台大歷史學系的學生。進入台大的時間是 2002 年。在台灣，反健保雙漲鬥爭以及十二萬農漁民遊行等五次大型人民抗爭此起彼伏；在島外，中東形勢日趨嚴峻。美國輾平阿富汗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伊拉克，而在此之間，美國協同以色列加大了對巴勒斯坦的軍事鎮壓。於是，雖然進入台大應該努力用功，但我卻跟隨著許多朋友同志著手進行支援巴勒斯坦，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行動。由於我們在 2002 年末的準備非常充分，使得我們能於翌年年初立刻成為台灣反戰運動的火車頭。從 2.15、3.20、3.22、到師大附中前發生警民衝突的 4.12，我在台大的第一年就是在反戰、抗議、各種荒謬的藝文活動，以及瘋狂編撰刊物之中度過的。

就在這一年間，我在台大圖書館裡有了一個奇妙的相遇。當時二樓的密集書庫還放著不少舊期刊，我翻到了上海書店所復刻的十一卷本（或十二卷？我懶得查了）《新青年》雜誌。在我漫無目的的閱讀中，我翻到了《新青年》改組為中共中央理論誌以後的某一期，並在其中看到了一篇令我頗感意外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是本文視為研究重心的〈黎明期的台灣〉，作者署名「沫雲」。當時網路上查不到有任何研究涉及這篇論文。而我迅即針對這篇文章，寫了篇小小的期末報告，並交給了我當時正在修習其課程的王曉波老師。這篇文章之所以吸引我，並不是因為這篇文章沒有人研究，而是這篇文章所談論的內容是我所非常關心的問題，也就是革命性質的抉擇問題。

自高中以來，我對共產國際內部發生的斯大林／托洛茨基路線之間的鬥爭即抱持著極大的關注，由於兩條路線的分殊，使得「民主主義革命」（以民主專政為目標）以及「社會主義革命」（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我想到了沒想到，早在 1924 年便已經有人在類似的問題意識上討論台灣革命的前途，而討論這一問題的園地竟然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因此，我才下了決心要針對這個問題做個小研究，但當時並沒有想到這篇文章有任何發展的可能。後來讀到若林正丈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才知道若林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注意到這篇文章，並考證出當時在《新青年》上站在「民主主義革命」立場回應〈黎明期的台灣〉的另一個作者是瞿秋白。但若林的問題意識與共產國際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無關，因此除了瞿秋白這一發現之外，若林的研究對我並沒有太大的幫助。我在高中時期所關注的第二個問題則是陳映真與陳芳明之間的論戰。這場以《聯合文學》為主戰場的論戰，是身為高中理組生的我解消課業挫敗的出口。雖然我當時認識很淺薄，但從論戰進行的方式以及與論者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可以輕易地判斷孰是孰非。而我由此產生的許多疑問，就成為我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潛在動力。當然，在九二一震災中誕生的《左翼》（《批判與再造》雜誌的前身），對於高中時期的我來說也相當開了眼界。（只是沒想到後來竟然有幸參與了幾期的裝訂工作）

到了我進入三年級的 2003 年暑假，我開始把較多的心力擺在課業上。與此同時，由於某種機緣，我參與了一個由系上黃俊傑老師擔任主題演講的研討會。主題是 1926 年至 1927 年間在《台灣民報》上發生的「中國改造論爭」。當時我聽了這則演講很感興趣，便拿這論文所提到的各個人物上網查詢，特別是站在左派立場發言的主將許乃昌。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許乃昌的眾多筆名之一竟然包括「沫雲」二字。如此一來，就激起我的興趣了。在我看來，中國改造論爭是 1924 年〈黎明期的台灣〉之後的第二次路線討論。〈黎明期的台灣〉把「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當成討論的主題；中國改造論爭則是把革命（透過民主主義革命——即國民革命——追求社會主義革命）與改良作為論戰的焦點。就論戰把改良與革命當成問題意識來看，水平遠遠不及於〈黎明期的台灣〉，同時也比不上日後發生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充其量只能與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發生的社會主義論戰相提並論。但因〈黎明期的台灣〉與中國改造論爭都以許乃昌作為討論主將，因此許乃昌在 1927 年之前所發生的變化轉折就非常值得討論。1924 年的許乃昌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反對民主主義革命（及其代名詞「國民革命」），但 1927 年的許乃昌不但主張起國民革命，其後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更是如此主張，甚至把國民革命作為一種歷史建構的材料。如此變化，不正是很值得研究的沿革嗎？為此，趁著系上舉辦論文比賽（第二屆史學論文獎），我在截稿前一個月臨時寫成了〈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這篇論文。那是 2004 年 3 月之後的夏天，我不在左岸咖啡館。我在廟口廣場、中山堂的音樂會、荷花初開的植物園，以及大冒險般的台大畢業典禮上（喔！不是我畢業）。

當時只有兩人入選比賽，而我得了第二名，也就是最後一名。無論如何，得獎還是很高興，對於荷包不無小補。那篇論文後來分別在《批判與再造》以及《史繹》上發表，同時也得到陳映真老師的鼓勵。雖然我距離陳老師所鼓勵的「人民的知識份子」還很遙遠，但我始終抱持著一種懺悔的態度而在困窘的生活中前進（當然也可能只是踏步而不前）。對我來說，那篇論文是一個提綱式的寫作，反映了做為歷史系小學徒的我探索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初步心得。直到這篇碩士論文為止，我在〈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中的基本想法——以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發展作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研究方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直到考上碩士班，我也沒有想過真要沿著之前的成果繼續研究下去。因為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以及中國近代經濟史始終保持著非戰不可的意念，如果革命論爭史可算是經濟思想史，社會經濟史就是經濟思想史的根。但隨著我發現碩士階段的訓練與要求不可能完成我的目標，而我的準備也不可能讓我的目標符合碩士階段的訓練與要求之後，我就決定要另闢蹊徑。但是，真的決定回過頭來繼續研究革命論爭史仍是意外之事。其決定性的關鍵，是在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暑假，在暑假中，我陸續發現了台灣早期社會主義者謝廉清、范本梁、連溫卿的史料。在許多原始史料持有者與圖書館的協助下，我後續又找到更多。於是我立下決心，要一個一個地寫出寫出這些人與這些事的故事。其中，心力花費最大的部份就是連溫卿與山口小靜的故事；不消說，這部份的寫作包含了我個人所投注的感情，因為我能真誠地感受到山口小靜那樣的女性的悲歡苦樂。

最後，由於《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老師的應允，我便開始了長期的連載，從 2006 年暑假連載至 2008 年的今天。然後，又隨著我的指導老師王遠義老師的支持，我便在這些連載的基礎上進行全面改寫，面貌完全與過去的連載不同。而其成果，就是讀者現在所看到的這篇論文。

二、鳴謝

首先感謝三年來指導我的王遠義老師，如果沒有老師在學業上的指導、生活上的照顧，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不可能在半年之內完成這篇論文。對於老師的感謝實在很多，無論如何書寫都絕難表達我的謝意，在此只能深深地謝謝老師。其次則感謝去年底學科考以來予我許多建議的黃俊傑老師，雖然我直到畢業前半年才請老師加入指導，但老師還是給了很多建議、批評，與鼓勵。其三則感謝劉季倫、周婉窈兩位老師；兩位老師撥冗在口試之時為我指點論文缺失，予我鼓勵，令我感到非常溫暖。其四，我要特別感謝勞動人權協會的張增榮先生的協助，如果沒有張

先生在日語上的翻譯與指導，我不可能把為數不少的日語文獻進行解讀。而張先生所提供的指導還不僅僅是語文的，而還包括他從七十多年人生經驗所提煉出來的種種教誨。值此論草成之際，我要特別感謝尊敬的張增榮同志。（敬禮！）與此同時，林書揚先生、陳明忠先生，以及陳映真先生也都先後予我許多建議及鼓勵。在此特別感謝這些令人尊敬的老前輩，還有臥病中的梁電敏大哥，希望諸位能夠健康、長壽。最後，我還要感謝同樣予我鼓勵的世新大學的劉孝春老師。本來有同劉老師一起進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特別是女性運動者）的刊物計畫，但因我的怠惰，一切事情都拖遲了。希望在將來，能在劉老師的率領之下進行研究。在此並祝老師身體健康，心情愉快！

在史料的收集過程中，得到以下師友的協助，特此致謝：

首先感謝世新大學的王津平老師以及戴國輝夫人林彩美女士，因為有你們的協助，我才能依靠連溫卿的遺稿而展開更深入的探討。其次則感謝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醫師以及正在日本上智大學攻讀博士的胡冬竹學姊，謝謝你們協尋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的史料以及極關鍵的外務省記錄等史料。其三則感謝人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的大剛學長，以及為愛情而遠赴北京的政研所帛燦學弟及其愛人，因為有你們辛苦地幫忙協尋史料，台北與北京的距離似乎近了許多；願你們學業與愛情順利！其四則感謝提供協尋史料的武郎（勞動人權協會），感謝協助部份韓文史料翻譯的汝興（勞動人權協會），以及時常提供我日語諮詢並助我尋找史料的育勤學姊。其五則感謝慨然提供共產國際台灣檔案相關資料的台電林炳炎先生，以及正在幫我在俄羅斯當地尋找史料的韻聿學妹，在此祝你們健康。其六則感謝替我進行文獻傳遞的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台灣大學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以及各地熱情或不熱情提供協助的圖書館。最後，我要一併感謝曾在大陸替我尋找史料並正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的學政，以及那些被我無料破解的各地資料庫（百萬圖書、超星、北大未名電子資源，等等）。

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以下師友的協助，特此致謝：

首先要感謝系辦熱心的助教們，特別是幫我好多多忙多的怡燕助教！同時要感謝同門的師兄師姐們。立宜學姐在這三年之間時常在助教工作以及各種事務上提攜我，希望學姊接下來的論文寫作順利殺青。目前正在攻讀博士的純純學姊與景雯學姊在我撰寫論文、大綱發表會，以及博班考試期間總是不斷予我鼓勵、拔刀相助，實在感謝。今年一起畢業的坤騰學長與崇凱學長，更在這三年碩班期間予以許多趣味與溫暖。誠如崇凱所說，我們三人的論文或許正可集結成一套《中國與沒有歷史的人》叢書吧。但我想，我們一定要努力當個有歷史的人！其次則要感謝我的研究所同學們。感謝 R94 的諸君：亞灣、欣芳、芙安、俊棋、柏全、佩姣、佩璇、修平、益維、詩雯、韻如、耀緯、蘇書（以上按筆劃序），同時也感謝提供我許多協助的 R95 的冠妃。因為有你們，我的碩士班生活真是多姿多采，今後不管大家是否仍然為學問而努力，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雖然很想矯情地給每人送上一句話，我想我還是只能不點名地祝福你們——希望追求真理的你繼續追求真理（無論你我認知是否相同）、希望追求愛情的你不要放棄愛情（畢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希望始終白爛的你依然白爛（我講的就是你）、希望努力生活的你能夠好好活下去（其實也是勉勵我自己）。——不過，我還是要特別感謝論文寫作期間始終給我支援的韻如。

然後我要感謝給我論文提供關鍵幫助與重大靈感的秘書長唐曙同志、幫我翻譯本篇論文摘要的奎汶同志、堅持在法主公蘇區的娟萍、武郎，還有正在桃竹苗與工人弟兄並肩戰鬥的大家、以及人間出版社的乃慈等同志。還有我的版上的版友們：感謝旅歐求學的文威、北教大動漫社的明軒、北大文獻所的重方。想起我初遇唐曙以及奎汶的時間，竟然就這樣過了將近十年。十年之間，我從一個蒼白的高中生變成一個慘白的研究生，始終與世界奮戰的唐曙越來越年輕，奎汶則同樣將進入博士班奮鬥。世事、人事、運動的變與不變，對於突然回憶起這十年之間的我來說突然顯得模糊。此時的我，只能想起 2000 年時的重考、想起了 2001 年的國際營隊、想起了 2002~2003 年整天不念書搞活動的時光，還有 2003~2004 年反戰運動以及前前後後悲壯無奈的歷次抗爭、大大小小有效無效的各種讀書會。我這幾年對大家實在是很少貢獻，但大家總是鼓勵著我。在團結的路上（這是英華的名言），在一百六十年以及八十年之後的今天，我相信我們的事業終能勝利！

據說近年流行在謝辭中感謝咖啡店。我想我也不能免俗，但由於我在咖啡店內所實現的成果其實不多，所以我想換個方式感謝。在此感謝時常與我在丹堤、IS 咖啡、Here、麥當勞、吉野家、師大路夜市諸咖啡店，以及師大分部臭豆腐（現在臭豆腐收起來了，嗚）閒話家常到凌晨的業餘民樂研究家青年友人 S 君。雖然 S 君不願我將他的本名寫出，而且武郎也是我很重要的咖啡友，但還是希望在悲憤與賴床之間掙扎的 S 君能早日重振雄風。我願將郭沫若寫給「臺灣青年 S 君」的話轉贈給你，「S 君，人只怕是莫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做個『真個的人』罷！」（郭沫若，〈反響之反響〉，原載於 1922 年 12 月《創造》，第 1 卷第 3 期。）

我還得特別感謝提供《批判與再造》這個園地讓我陸續發表研究成果的杜繼平老師，雖然我常常如漫畫家那樣拖稿，但老師與刊物始終容忍著我。希望《批判與再造》所揭示的三大目標能夠實現：批判、進步、解放！

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的家人（除了我早逝的爹，最要特別感激的就是我娘）、長輩們（實在太多了，你們都是我的貴人）。研究以及研究這個題目並無法讓我們的生活向上提升，但你們還是包容我任性地進行研究。我心中只有無限的感激。

本論文的成稿頗為倉卒，筆者撰寫這篇謝辭距離論文繳交圖書館的底限也只剩不到三天，因此這篇謝辭也只能匆匆寫就。但我對一切為我提供協助之師友的感激之情，是真切的。

三、補注

如前所述，本論文的成稿很倉卒，因此筆者並未來得及仔細校稿，同時也沒有辦法把口試委員所提供的建議完全補入，或者說明何以不補入。實際上，直到筆下這段「補注」補上之時，已經是七月三十日中午，距離繳交論文之底線只剩一天。因此，一切訛誤之修正，只能有待來日。

本文定稿版與口試版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我將原先擺在附錄的山口小靜生平以及連溫卿赴日之旅先後擺在第一章以及最後一章的位置，希望能讓讀者較好地從體會當時的情境進入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本文的基本史實內容以筆者登載於《批判與再造》雜誌上的論文為基礎，但在本論文的處理上，沒有辦法沿襲當初投稿於雜誌的形式，因為當初的投稿形式採用紀傳體，以個別社會主義者或組織的足跡、沿革作為敘事主線，並配合說明當時的歷史背景。如果讀者認為本論文對於個別人物的處理太過單薄，希望讀者能參閱筆者當初所投稿的內容。但就史實的考訂而言，筆者在本論文中的處理比較完整。可惜有部分人物的史實（如山口小靜、謝康清、許乃昌）來不及詳加注釋。這是筆者引以為憾的。

最後，對於筆者論文有意見的朋友，歡迎來信：r94123002@ntu.edu.tw。

